

历史回顾：从“抗美援朝”到“大跃进”

历史回顾：一、从“抗美援朝”到“大跃进”

— 档案库节目回放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首播日期：1999年9月11日）

1949年开国大典，毛泽东的宣告，老百姓的欢欣

（播放录音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国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世沧桑，斗转星移。自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几亿中国人，曾经有过怎样的欢欣鼓舞，怎样的一腔赤诚。

（腰鼓，欢呼）

（当年歌曲“解放区的天”录音）：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呀呼嘿一呼呀嘿。。。”

打开记忆之门，回溯走过的道路

当一些人打开记忆之门，回溯走过的道路，他们说，当年欢庆胜利的腰鼓声仿佛还响在耳边。记忆中那红旗飘舞，口号震天，歌声如潮的一波波、一幕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轮，刻进了当代历史的长卷，留在了人们记忆的深处。

（当年歌曲“歌唱祖国”录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当年满怀真情唱着这些歌曲的人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走过了怎样的道路，迎来了怎样的生活？

寻访一些海内外中国人，听听他们谈自己的人生故事、心路历程和省思感悟，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当代史，也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今天。

中南海红墙内运作的每个细节，牵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

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变迁史，不可不了解北京中南海红墙内的运作，红墙内运作的每一个细节，直接牵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由于红墙之内很多秘密至今仍然被严密封存，即使有机会向红墙内投去一瞥的人，所看到的很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

访曾参与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者阮铭先生

今天要访问的第一位朋友，是曾经参与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现在台湾 淡江大学任教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阮铭先生。

我请阮铭先生先作个简要的自我介绍，他说：“我自己是在上海念震旦附中的时候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参加了地下党。1948 年我考上北京的燕京大学，作过燕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来燕京大学撤销后，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团委书记。1958 年以后，在《北京日报》担任过记者、理论部主任。六十年代初，到了中央宣传部。文革中在宁夏，大概有四年时间，对我隔离。文革后，胡耀邦到中央党校的时候，他把我调到党校去，跟他一起工作大概有五年时间。六十年代以后基本在上层，接触到红墙内的一些矛盾，一些状况。”

阮铭先生：朝鲜战争爆发，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出兵

阮铭先生认为：“1949 年后，五十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后来走向有着关键性的事情，就是朝鲜战争。”

（当年歌曲“志愿军战歌”录音）：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

阮铭先生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党内高层曾经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胡耀邦跟我讲过，当时开了几天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有三天三夜就在那里抽烟，也不讲话。当时反对出兵到朝鲜去的，在党内有很多。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分析还是很不充分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我们的想法里，毛泽东、共产党要建立的应该是比过去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不同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一个直到今天，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中国呢？

因为朝鲜战争 爆发时，党内像林彪、高岗他们是坚决反对出兵的，开始毛泽东要派林彪到朝鲜去，林彪装病，后来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

阮铭先生：韩战打断毛泽东“解放台湾”目标，引进苏联极权制度与美国隔绝

阮铭先生说：“毛泽东自己的规划，原来是要所谓‘解放台湾’，朝鲜战争实际上是把他的‘解放台湾’的目标打断了。”

而最重要的一点，经过朝鲜战争，中国跟西方的道路就断了。像中国跟美国，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尼克松去，才恢复过来。

中国就只能倒向苏联，因为朝鲜战争本身是金日成跟斯大林两个人决定下来，逼着毛泽东参加朝鲜战争。因为斯大林怕跟美国冲突，不敢出兵，就叫毛泽东出兵。一出兵，等于把中国跟苏联就联系在一起了。

朝鲜战争不但使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二十二年隔绝，而且跟苏联本身的关系，表面是把苏联的这套极权制度引进来了，可是这两个极权制度之间产生了冲突。因为当时在朝鲜，中国人不但流了血，而且中国人所买的苏联武器，都是要中国人自己去还债。”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声）：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为和平。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当年赴朝老兵薛先生：“军事大学”在朝鲜山顶

主持人：“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听听居住在中国黑龙江省的两位参加过韩战的农场退休职工谈他们当年的感受和今天的生活。”

薛先生说：“我那时候还在学校，由于家庭困难，上学也上不好。后来国家号召‘上军事大学’，自己就积极报名，参加到部队。

那时候，送到老闷罐车里头，‘咣咣咣’一家伙五天五宿就载到‘三八线’了，脑子发懵了。一看这不是‘军事大学’，弄到山顶上去了，到外国去了。也害怕，想不通，认为领导好像是骗人。说是上‘军事大学’，怎么弄到战场上来了？

因为生在农村没出过门，连火车都没坐过。在朝鲜一年多，五三年停的大战，我们五五年去的，小仗打了几次，我在部队上是高射炮的观测员。

现在农场退休职工薛先生年逾花甲，唱起当年的歌来，像是又回到青年时代。这位并不是自愿走上韩战战场的老战士，唱了一首歌颂志愿军的歌曲：

（录音）“紧敲那个板来呀，慢拉琴，我唱唱光荣的志愿军。

中国出了个志愿军，一棒打垮了杜鲁门。

中国出了个志愿军哪，和平幸福有保证啊，有了保证。

我这里呀，庆祝同志们身体好，代表全国来慰劳。

同志们受苦又受累呀，我们永远不能忘呀。

同志们不怕冷风吹，拿着那冰雪地当床睡。

渴了拿雪你当水喝，饿了炒面吃一嘴，

同志们受苦又受累呀，我们永远不能忘呀。”

薛先生（笑）：“这个歌，本来女的唱好听。我这嗓子不行。当时学这个歌是在火车上，路过鸭绿江桥的时候，唱‘雄赳赳，气昂昂’，唱这个歌。过鸭绿江桥时，两个桥炸坏了一个，到那儿他们停车检查。中国进去多少武器多少人，回国多少人多少武器，他们都检查。”

薛先生：现在没钱治病，没人管没人问

主持人：“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的生活情况？”

薛先生：“你要一提起这个来呀，我心里挺生气。像我这样的，现在没人管哪。闹病、高血压，头晕。吃药打针，打吊针打了七天，没钱了，不打了，不治了。反正现在啥也不能干啦，放牛也不能放了。你没钱，他不给你报销。药费不报销，也不‘开支’（发工资）。头几年，一年开九个月，近年一年开六个月，这上半年六个月才开给两个半月。五月节（端午节）开给三百零两块钱的工资，还给一百五十块叫你过‘五月节’。一直到现在没有开。据分析，八月十五（中秋节）再开给你这半个月的，叫你过节，到元旦，到春节。所以说‘没人管，没人问’就这么回事。”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声）：

“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
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双手擎。
两脚熊熊蹚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当年赴朝老兵李先生：十五、六岁报名参加志愿军

另一位参加过韩战的农场职工李先生说，他当时是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他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都愿意去，打美国鬼子。”

主持人：“您那时是上学还是工作？”

李先生：“上学，我们家乡小学，1953年我才十五、六岁，就走了。那时间就想着要准备牺牲。还没去多长时间就停战了，我们那个师打仗，我在司令部当警卫员。”

主持人：“那时候参加志愿军最小的多大年纪？”

李先生：“我们县去了不少，年龄都不大，都是二十岁以内的人。我们那儿是河南镇平县。我当时是最小的了。那时间，是要求十八岁，但你个子长够了也行。那时咱们国家兵员不太多。”

李先生：赴朝鲜参战，五年后被送到北大荒，最难忘漫山遍野战友墓

主持人：“您那个县有多少人当兵？”

李先生：“我们那一批有五、六十个。哎呀，我们经历过条件很艰苦，我们在防空洞里住。经常有飞机来侦查，轰炸我们那个师。我们一直在朝鲜待到 1958 年 4 月份，就来北大荒了。”

主持人：“您在朝鲜五年多生活里，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李先生：“唉呀，最难忘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朝鲜那个漫山遍野啊，都是埋着咱们志愿军，不管什么地方都有啊。我们在回国的时间，就给他们扫了墓、添了坟（土），隔的一趟一趟的，漫山遍野都是。”

（当年歌曲“志愿军战歌”录音）：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

阮铭先生：战争气氛与“镇反”“三反”五反”。。。极权恐怖主义走向

阮铭先生谈韩战对中国大陆当代历史的影响：“在朝鲜战争这样一个战争的气氛下，自然向极权恐怖主义走向。后来的‘镇压反革命’，大量杀掉地主，枪毙‘反革命’。还有‘三反’、‘五反’，斗资本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战争气氛之下越来越严重。包括 1953 年的‘统购统销’，都是朝鲜战争以后，完全学习苏联的一套。特别是 1953 年以后，苏联派了大量的专家，每个学校都改成苏联式的教育制度。”

在这样情况下，特别在经济发展上，引进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引进了苏联的重工业。现在可以看到，当时建立的坦克工厂、飞机工厂，当然是过去没有的。但建立起来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还需付很多钱给苏联，买这些机器。”

阮铭先生：为支付重工军工费，低价收粮统购统销，走苏联“计划经济”道路

阮铭先生谈到：“中国的积累没有（这些钱），就要靠农民。但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刚刚有一点积极性，当时就要把粮食完全用国家的低价收进来，为了去支付重工业、军事工业的钱。农民不愿意多交粮食，没办法就‘统购统销’，等于农村的市场完全被它压掉。全国几亿农民，怎么‘统购统销’呢？就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合作化’。然后是‘高级社’、‘人民公社’。一步一步完全纳入。。。因为（参加）朝鲜战争造成战争恐怖气氛，纳入苏联的制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

阮铭先生：原说没条件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阮铭先生认为：“原来中国根本没有条件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我们入党的时候，看到毛泽东的一些谈话，都是讲，中国跟苏联不一样，不适合一下子走社会主义，而且批判（走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想法，说中国是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是毛泽东1949年以前反复讲的。

可是到了1953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一个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走社会主义。而且他提早到说‘1949年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三年只是准备，1953年就要走社会主义’。

朝鲜战争当时还在谈判。这样一个战争的压力之下，又加上提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整个国内形势，过去的所谓自由民主，那种声音就被压下去了。”

阮铭先生：1956年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

（当年大型朗诵合唱“祖国颂”录音）

（男朗诵）：“啊！鸟在高飞，花在盛开，
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我们伟大的祖国。
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合唱）：鸟在高飞，花在盛开。。。

阮铭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声音敲锣打鼓就起来了。包括资本家，也都是敲锣打鼓，1956年就进入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说他不要赚钱了，只要拿国家的定息就可以了。当时北京有句话嘛‘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兆雄博士：‘公私合营’前，资本家已被整得很惨，恐怖使大家俯首帖耳

现在在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兆雄先生，回忆他家庭当时的境况说：“‘公私合营’是1956年上半年，我正在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当时我家是资本家，有一个商店，还有一个旅馆。

1956年的‘公私合营’实际是共产党动用了当时的宣传机器和他的政权，逼得你走投无路。他鼓动一些积极分子，像‘工商联’的。。。像北京‘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啊，还有一些人，带头拥护‘公私合营’，敲锣打鼓地上街。

实际上大部分资本家也都是没有办法。因为在‘公私合营’之前，在‘三反’‘五反’和‘打击反革命’这些活动当中，资本家已经被整得相当惨了。特别是‘三反’‘五反’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共产党操纵的工会动员店里的职工揭发，强逼着说是‘贪污’啊，‘偷税漏税’啊，逼着你去承认。我父亲当时并没有主持这个店，实际上是我祖父的店，我父亲有时候管些事情，结果我记得把我父亲逼得痛哭，也没有发现什么偷税漏税。

1953年已经把资本家整得很胆小了，所以1956年上面发了命令，整天开会，逼着你去表态。结果我家里迫不得已，把店全交了。另外那个房租，我家有十几所房子，百分之七十五的房租交给国家，这样一直到1966年（‘文革’中，私房都交公）。

当时的情况是非交不可。我记得我的父母心情很不好，在家里总发脾气。有一次发脾气的时候，我母亲把水泼到我们家的毛主席像上边了，当时我还很害怕，已经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公私合营’。

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搞的就是首先利用他的专政机器，制造一种恐怖，然后鼓动一些积极分子，造成一种声势，迫使大家觉得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所以大家就俯首贴耳屈从了。”

阮铭先生：家家户户“大炼钢铁”背景，1958年“1,070万吨钢”轶事

阮铭先生继续回顾后来中国大陆的那段历史。他说：“‘反右’以后，不同意见都被镇压下去，当时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认为‘反右’以后形势很好，当时斯大林也去世了，他对赫鲁晓夫也看不起，说‘我们先超过英国，超过英国以后，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超过美国，可以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他完全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头脑非常发热。

我听过薄一波讲，当时大炼钢铁是怎么来的。他说，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他去看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薄一波‘今年钢铁指标准备有多少？’薄一波讲‘我当时正好翻了个身，说，翻一翻，1957年是535万吨，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钢’。

到了北戴河，毛主席就公开向记者宣布‘1,070万吨钢’1958年要达到。这样一种决策，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出来的。那毛泽东是‘皇帝’啊，宣布了以后，不能不实现哪！后来查一下，钢铁业没有那么大炼钢能力，怎么办？大家都来炼。家家户户都来炼。”

*阮铭先生：报社也搞“小高炉”，炼出都是“烧结铁”，可笑事多，直到现在”

阮铭先生回忆：“那时我已经在《北京日报》了。就在北京市东单附近一个小胡同里。《北京日报》社也在院子里搞了个‘小高炉’，当然炼出来都是‘烧结铁’，根本就不能用。所以全国也可想而知。

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现在看起来是笑话，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本身，领袖，一个领导人他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决策，根本没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制度。不要觉得那时候可笑，这样可笑的事情，在毛泽东时候有，一直到现在，因为这个制度还是没有更改过来，像江泽民去抓‘法轮功’，这样一种命令，我觉得跟毛泽东当时那种命令异曲同工。

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派’，1959 年‘反右倾’以后，这样一种奇奇怪怪的命令多得不得了。当时搞‘超声波’运动，说是 只要拿一个刀片，把它振动一下，水就可以变成油，用水就可以炸油条。。。 ”

阮铭先生：专制制度、个人迷信导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恶果

阮铭先生认为：“这样一种专制制度，造成这种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被迫让中国几亿人都走上了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是不符合的。这就产生了后来 1959 到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这样一个恶果。”

（当年大型朗诵合唱“祖国颂”录音）

（女领唱）：“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 麦，
高粱红，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遍天山外。

（合唱）： 密麻麻牛羊盖遍天山外

（男领唱）：“铁水汹涌红似火。。。 ”

丁抒博士：研究证明—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提供的研究成果表明，当年就在这首“祖国颂”回荡在中国上空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上正发生着怎样惨绝人寰的悲剧。

丁抒博士说：“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 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

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人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61 年随刘少奇去湖南省作调查，她也发现，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还要压缩平衡， 不许如实上报。

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其实连中共中央的首长对死亡数字也不甚清楚。

1962 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亲自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责问安徽省委‘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就是不说老实话’。

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1960 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 1961 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 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户，三十九人。

1990 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谨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

1991 年我曾经估算过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 2, 470 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本集首播日期：1999 年 9 月 11 日） 历史回顾：二、大跃进/大饥荒/大革命 阮铭先生：朝鲜战争教训对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在上集节目里，曾经参与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现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阮铭先生，回顾了中国大陆从参加韩战，到“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这段历史。

阮铭先生说：“朝鲜战争不但使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二十二年隔绝，而且跟苏联本身的关系表面是把苏联的一套制度引进来了，把苏联的这套极权制度引进来了，可是这两个极权制度之间产生了冲突。

因为当时朝鲜，战争 引进苏联计划经济的体系，引进了军事重工业的体系，又没有资金的来源，只好去剥夺农民。统购统销粮食，一步一步走向合作化，走向人民公社。

朝鲜战争的教训不但是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课题，而且对今后，中国究竟是选择和平民主的道路，还是采取战争、霸权、独裁的道路，对今天来讲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 “大跃进”“钢铁时代的歌声”回放*

主持人：“对于家家户户大炼钢铁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儿离奇。但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无论是当时的歌曲， 还是当时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大跃进”年代歌曲“钢铁时代的歌声”录音）：

（合唱）“ 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

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

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

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男朗诵）我们的祖国，光辉灿烂。

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

我们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

我们的母亲，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女合唱）共产党好比红太阳，嘿！

照得六亿人民心头亮。

（男朗诵）东方的巨龙翻腾在蓝色的天空，

歌唱吧，歌唱吧，

歌唱我们亲爱的党！

歌唱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歌唱幸福的共产主义天堂！

（合唱）多炼钢，多炼钢，

炼钢炼钢日夜忙啊，

炼钢炉旁建天堂。”

* “大跃进 ‘钢铁时代’ ” 亲历者回忆*

主持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仲维光先生回忆起‘大跃进’年代全民大炼钢铁和驱赶麻雀的往事。他说：“我是1949年出生的，因此对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是亦步亦趋整个伴随它的。想起大炼钢铁，当时就是我们小学校，整个院子里操场四周大概架起了三个四个土高炉。我们自己都要去搜集废钢废铁，回家啊、在路上啊，要去捡。记得甚至当时我家有个脸盆架，是生铁的，我当时跟妈妈说‘是不是把这个也拿走’。因为学校让学生去找，学生找不着，在班里总是表现不是很好的，因此当时真是家家破铜烂铁都被收集出来。

现在想起来，炼出来的那些钢，觉得是一块一块的破渣滓似的，因为当时小，觉得这就是钢啊，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废铁。”

住在北京的郭先生说：“炼钢的时候，包括有些大的古的铜钟 都砸烂了，炼出来的都是废渣。因为温度达不到，就不可能‘脱硫’，或者是纯净化，结果弄出来的都是‘四氧化三铁’这类东西，把铁炼成铁渣滓了。”

仲维光先生接下来回忆了大跃进年代驱赶麻雀的活动。他说：“当时打麻雀，整个北京的大街小巷各个房顶上都是人。大家都在挥舞着飘带、竿子、‘咣咣咣’敲脸盆。我住的离西单北大街很近，整个西单北大街两侧全部都是敲脸盆的声音。麻雀到处飞飞飞，飞不动了，有的就累死了，掉地上。

当时饭店里突然就卖的‘炸铁雀儿’比较多了，都是累死的麻雀。”

阮铭先生：50年代整提意见者，巩固极权制度，1960年前后三年饿死几千万人

阮铭先生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作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看起来是笑话，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本身，完全是由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人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决策。根本没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制度。

‘反右派’运动主要是整知识分子里敢于讲意见的人，1959年‘反右倾’，主要是整党内

敢于讲意见的人。那就是彭德怀。把知识分子里的、党内的一些敢于讲意见的优秀分子，都给打下去。

这样，从 1950 年代建设起来的极权制度更巩固了，反民主、反自由的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党内原来存在的一些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到了 1959 年，差不多基本打下去了。1960 年以后，完全是一片所谓歌颂毛泽东的力量起来。然后就是三年的‘大跃进’饿死人。”

高昂歌声背后的事实

主持人：“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大跃进’之后，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就在一律由官方控制的广播电台从早到晚播放着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中国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正人人饥肠辘辘，各地饿殍遍野。”

（当时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录音）：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革命红旗迎风飘扬，

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

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

主持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的丁抒博士，发表了有关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1990 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谨中。安徽全省情况到处都差不多，宿松县人口减少了 9.5 万，差不多也是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县死了近四万人。灵璧县八万以上，涡阳县死了约十万人。

1958 年 9 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无为县志》仅仅含糊其辞地说‘逃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非常严重，其实该县饿死的约二十万人。。。。’

1991 年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 2,470 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阮铭先生：“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背景

刘少奇说“三年大饥荒”“三分 天灾，七分人祸”——

阮铭先生谈 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大饥荒”的成因”。他说：“在 1962 年的时候，开过一个所谓‘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有个报告，他分析我觉得比较符合实际。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当时地方上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都已经当成‘右倾分子’已经打掉了。有一些人故意哗众取宠，故意讨好领导，顺着爬。有一些人迫于这种形势，也不敢讲话。

大家就是干‘高指标’。农民种了粮食，统统交给国家，自己手里就没粮食。因为统统交给国家还不够那个指标。1958 年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吃饭不要钱，到时就吃掉，有的是在地里没有收成过来，浪费掉，因为炼钢铁去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发现很多地方开始挨饿。1958 年底，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或浮肿病的表现。

有些省委就说‘这不是没有粮食，是瞒产’，说有的地方把粮食藏起来了。把人家家里藏的那些粮食都把它搜出来，所以最后就是饿死人。

当然现在这个统计数字，中共没有公布，估计有两、三千万的，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从中苏分歧到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

阮铭先生又从“三年大饥荒”成因，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1956 年以后，毛泽东想批判苏联，来走一条所谓‘中国式的道路’，他如果坚持像 1956 年‘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那样来批斯大林的‘左’，把它深入到制度里去，把这套苏联的极权制度改变过来，比如说，改变成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他开始的时候是想，斯大林死了，要批斯大林的左，后来他发现赫鲁晓夫起来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关系 还不错呢。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他当时不是完全反对的，他讲过这样的话，说赫鲁晓夫批斯大林，说揭开斯大林的盖子，这还是对的。当时在 1957 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作过秘密报告以后，赫鲁晓夫跟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们作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莫洛托夫他们的教条主义，比赫鲁晓夫更危险’。所以当时他一度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中苏从 1958 年分歧越来越严重。

1959 年赫鲁晓夫到美国，从美国直接到北京参加当时的国庆十周年。他讲了一句话‘应该对对表’。就是 当时毛泽东已经提出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当然他是非常不赞成的，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我认为毛泽东反赫鲁晓夫，当然赫鲁晓夫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说，他要控制中国的军事，毛泽东反对他控制是对的。毛泽东当时‘批修’，搞得比斯大林更左、更荒唐。结果就一步一步越来越走得远。国内有人反对他的话，他就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 大家看‘五一六’通知就可以知道，‘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认为不能跟他一起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甚至把过去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的时候就支持他的刘少奇，都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认为，党内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所以就发动了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

文革：刘少奇之死与至少二百万非正常死亡者

（插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录片录音片段）（合唱）：“东方红，太阳升”（朗诵）“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阮铭先生：“按毛泽东来讲，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躺在我们身边。大家都猜想，到底躺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是谁？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起来以后，才发现毛泽东指的就是刘少奇。”

主持人：“196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南开封一个戒备森严的屋子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孤独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和嘴都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专包谷先生：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

专包谷先生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中说‘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刘少奇先生想了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无从猜测。作为这个国家的国家主席，他是否看出了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是否想过，如果他得以劫后余生，活到被平反的一天，重新成为国家主席，他将做出怎样的努力，来防止文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以免他和他的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文革浩劫，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先生认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至少为两百万。

他说：“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例如北京地区因冤狱而死的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约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被逼疯、被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比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是，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案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为二百万，或许高达三百万。”

专包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知道文革浩劫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了吗？我们有能力阻挡下一次文革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问另一个问题，是谁结束了文革？1976年是文革结束的一年，结束文革的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和行动，真正结束文革灾难的，是凡是人都要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专包谷说：“文革真的不会再发生了吗？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就因为文革的一切荒唐透顶？那么，为什么在那十年里，我们这几亿人，就不觉得他荒唐呢？”

文革：荒唐持续十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现场录音片段)：

(众呼)：“毛主席万岁！”“万岁！”(女孩狂呼)：“毛主席！”“毛主席！”(众呼)“万岁！”“万岁！”

居住在北京的郭先生回忆起文革中他的亲身经历：“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文革中那种‘忠字化运动’搞得极端的 大家都在那儿跳一种非常拙劣的‘忠字化’舞，而且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什么的，就是完全把毛主席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好像他就能听见，能够监督我们的言行。而且弄了一个‘忠’字，就是愚忠的忠，已经搞到那个份儿上。像我们所在的农场，就把这个‘忠’字用红色油漆喷在每家窗户的正中那块玻璃上，四周有一点装饰，呈一个心状的，到处都是。”

(文革歌曲录音)：“毛主席的像章挂在我胸前哪，

伊沙伊沙马尼拉，挂在我胸前。

唉—

金色的像章放光芒，

心中升起红太阳，

心中升起红太阳。。。”

郭先生说：“那时在北京上公共汽车，登上车门要报出身，出身不好不让上车还是怎么的。在北京买东西，第一句话要背一句毛主席语录，打电话也是。”

专包谷先生的文章中说：“既然我们那个时候会让这一切发生，让荒唐整整持续了十年，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解脱。那么，以后我们就真的有能力阻挡文革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吗？”

从回顾文革看今天批法轮功

专包谷先生文中说：“1999年夏天的席卷全国的一场运动，又给这个问题 作了一个注释。”专包谷先生在这里所讲的，是批判法轮功的运动。对于批法轮功，不少老百姓心里有些与官方不同的看法，只是不敢公开说。

现在请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市民谈她的看法：“我以前不接触法轮功，也不知道法轮功怎么回事。他这回一宣传，我倒明白好多事。老百姓为什么信他呢？说明老百姓现在信仰乱了，没的信。

李洪志讲这以后，大家觉得又健身，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改革，好多本来给你的公费医疗都没了，都不给报销了。老百姓一看李洪志搞的这个健身，不用看病，这不省钱吗？很多人就这么信了。

另一个，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信法轮功？说明对你共产党不信任了。很多人说，这次法轮功可真是把他们吓得够呛，要不这么搞？

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搞？他自己有了政权的危机。当然我跟您说这话，您可真是不能用我的名字。我也代表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这么说。”

自秦朝以来“聚天下之兵于咸阳，以弱天下之民”

接下来发表意见的是北京的郭先生：“我觉得你让人信法轮功，信一段他觉得这些说法太浅，若是胡说八道太荒谬，有思想的人就离开了。但是你要用这种无休无止、连篇累牍的大批判，现在老百姓就觉得很可笑，没有分寸感，几个月电视广播报纸里全都充斥着这些东西，大家就觉得有点‘小儿科’，水平不怎么样，并没有达到想用这个来收拾民心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心黑手辣的，你稍微拂逆它一点儿，他就动用手里掌握的强大的专政机器。一旦专制主义掌握了政权，国家力量就变得空前强大，而人民相对来说就空前弱小。但是国家拥有各种监听手段、枪、监狱，但老百姓就越来越弱化。从秦朝以来就是这样的，‘聚天下之兵于咸阳，以弱天下之民’。他不让人民群众信法轮功的意思，就是要信他们，你要不信还不行。既有强烈的欺骗性，更有非常严苛的强制性。这点就说明他和人民是对立的。所以他不能信任人民，不能给人民一点自卫手段和任何权利。”

专包谷：今天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明天就会轮到你和我

专包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现在批判李洪志先生的人们真正相信自己是掌握真理的，那么就放弃仗势批判的条件，站到法轮功信仰者一样的条件场地上。你能发表文章，也让法轮功发表文章；你能上电视台，也让法轮功上电视台。你既然真理在手，就和你的批判对象按同样的讨论规则来辩论。文革十年已经证明过一次，今天，我们对不公正仍然如此麻木，我们在等待下一次。”他说“今天上百万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明天就会轮到你和我。”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本集首播日期：1999年9月18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另一种解读 看真实毛太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监军太子是怎么死的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另一种解读

如果毛岸英当上了国家主席,就是和胡二世一样的下场,隋朝的二世也不是灭了吗?这样的话中国就可能又一回的大战争,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话,那么如果他还活着,中国可能还要晚一百年进入现代化呢!

大雪

毛泽东是多子之人。杨开慧生育了三个儿子，贺子珍生了十个子女，江青生了一个女儿，但存活成人的，只有两子（岸英、岸青）两女（李敏、李纳）。岸青有精神病，身体健康的岸英就成了毛的唯一希望。关于毛岸英的生平，资料很少，其实他从苏联回国后到在朝鲜牺牲，也有近五年的时间，应该留下一些事迹才对。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提供了毛岸英的不少资料，尽管作为主旋律文学，作者着力于歌颂毛岸英的超凡品质，特别将援朝牺牲这一段作为华彩乐章，但还是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长期阅读官方宣传材料，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去伪存真的能力，学会透过人为的光环，

注意书中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才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汇总、分析这些难得的资料片段，我们看到了一个接近真实的毛岸英。

一、 来去随意，做工作 浅尝辄止

毛岸英 1946 年初回国，到 1950 年 10 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泽东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国克格勃）部长 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毛岸英在 1950 年 5 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 30 年前毛泽东欠下 100 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 28 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经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对苏联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 1950 年 8 月中旬到 10 月 8 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 月 8 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 月 14 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书中记述，10 月 5 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晚或次日晚，毛泽东叫回岸英：

“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泽东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泽东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 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 (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 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 M 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 151 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 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 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 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 11 月 25 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 点多，美军四架 B-26 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炊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 1922 年 10 月 24 日出生，5 岁离父，8 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泽东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国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揭秘：毛泽东儿子毛岸英之死真相

毛泽东儿子毛岸英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原沈阳军区参谋长、毛岸英牺牲的目击者杨迪著了《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一书，这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介绍了毛岸英的经过。

书的第 56 页记述了 1950 年 11 月 13 日，第一次战役后，38 军军长梁兴初被彭德怀狠狠批评的过程。第 58 页，杨迪写道：

“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以后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我说‘哪有这么神秘？不让知道，不让问，就拉倒。’

“丁甘如说：‘老杨，不要说气话嘛，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呀！’

“我说：‘我不过随便说说问问，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一直到敌人飞机轰炸志司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在彭总指挥室内被炸牺牲的两名同志中，那一位俄文翻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当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对发生的一切就不觉得奇怪了。”

1950年11月中旬，驻在大榆洞的志司遭美机轰炸，志司马上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其中就有拂晓后一律不准冒烟这一条。23日，志司得到情报，次日上午10点，麦克阿瑟将发动“圣诞节攻势”。解方参谋长召开志司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要进防空洞。”连彭德怀也不能例外，还专门安排洪学志拉彭到防空洞里下棋。

杨迪的书中第293页继续写道：

“第二天（即11月24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情况，我自己也准备到重点地方去检查，这时，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

杨迪到防空洞看见洪学智正拉彭德怀进防空洞，准备下棋。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囱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炒米饭吃。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还在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立即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正着大火冒烟。看到成普满脸黑呼呼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上打滚，将火滚灭。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很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随后，我迅速跑到彭总和洪副司令的防空洞，看到他们很安全就放心了。

“我急喘喘地向洪学智副司令报告：‘洪副司令，不好了，彭总办公室被炸毁了’。

“洪学智副司令急着问：‘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说：‘只有成普跳窗户出来了，还有两位同志没有出来。’

“洪学智副司令一听那两位同志没有出来，就急了，洪学智喊着赶快派人抢救。

“我说：‘已调部队和医务人员抢救。’

“洪学智副司令很快向着火的房子跑去，我也跟着跑去，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洪学智副司令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洪学智副司令要我赶快去报告副司令，他去报告彭总。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也很着急很悲痛地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彭总和其他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由此，我突然想起在 11 月 13 日志司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微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

.....

“后来丁甘如同志长叹一声，悄悄对我说：‘炸死的那位俄文翻译，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那位参谋是彭总从西北第一野战军刚调来的叫高瑞欣同志。毛主席的儿子炸死了，这怎么向毛主席交待？主席最喜欢这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回国后要他到农村、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这次又把他送到朝鲜战场来体验战争，刚入朝一个月就牺牲了，我们知道情况的人都很悲痛难过。老杨，这件事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你是作战处副处长，来问我，我也了解你、信任你，不会乱讲，就告诉你。你一定要遵守纪律，这事在没有正式公开以前，你不准对任何人讲。’”

毛岸英之死真相：无视禁令彭总办公室生火炒饭 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险难中的共和国领袖与将帅》中敌机轰炸 再次遇险一文，作者杨迪。

240 页---241 页

第二天（即 11 月 24 日）拂晓前，.....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跑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 10 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磁卡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长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叫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随后，我迅速跑到彭总和洪副司令的防空洞，看到他们很安全就放心了。

我急喘喘地向洪学智副司令报告：“洪副司令，不好了，彭总办公室被炸毁了。”

洪学智副司令急着问：“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说：“只有成普跳窗户出来了，还有两位同志没有出来。”

洪学智副司令员一听那两位同志没有出来，就急了，洪学智喊着赶快派人抢救。

我说：“已调部队和医务人员抢救。”

洪学智副司令很快向着火的房子跑去，我也跟着跑去。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

洪学智副司令员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洪学智

副司令要我赶快去报告副司令，他去报告彭总。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也很着急很悲痛地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彭总和其他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由此，我突然想起在 11 月 13 日志司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微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原沈阳军区参谋长、毛岸英牺牲的目击者杨迪著了《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一书，这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介绍了毛岸英的经过。

书的第 56 页记述了 38 军军长梁兴初被彭德怀狠狠批评的过程。第 58 页，杨迪写道：

“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27、8 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 1 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 1、两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 1 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以后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我说‘哪有这么神秘？不让知道，不让问，就拉倒。’”

“丁甘如说：‘老杨，不要说气话嘛，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呀！’”

“我说：‘我不过随便说说问问，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一直到敌人飞机轰炸志司后，经过了 1 段时间，才知道在彭总指挥室内被炸牺牲的两名同志中，那 1 位俄文翻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当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对发生的一切就不觉得奇怪了。”

毛岸英究竟是怎么死的，看了下面一段就会明白：

1950 年 11 月中旬，驻扎在大榆洞的志司遭美机轰炸，志司马上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其中就有拂晓后一律不准冒烟这 1 条。23 日，志司得到情报，次日上午 10 点，麦克阿瑟将发动“圣诞节攻势”，解方参谋长召开志司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要进防空洞。”连彭德怀也不能例外，还专门安排洪学志拉彭到防空洞里下棋。

杨迪的书中第 293 页继续写道：

“第 2 天[注：即 11 月 24 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情况，我自己也准备到重点地方去检查，这时，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

杨迪到防空洞看见洪学智正拉彭德怀进防空洞，准备下棋。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囱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 3 个人正在炒米饭吃。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1 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还在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 1 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立即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正着大火冒烟。看到成普满脸黑呼呼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上打滚，将火滚灭。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很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引至此，我们便不难明白，毛岸英无视解方参谋长严格的禁令，在彭总办公室生火炒饭，炊烟引来美军飞机的轰炸，然后惊惶失措钻进床铺底，结果....

杨迪

毛岸英之死和彭德怀冤案内幕

（读者推荐）毛岸英之死和彭德怀冤案内幕

姜青

中共军方 2007 年 7 月底在军事博物馆举办国防和军队建设展览纪念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开国元帅」展览橱窗里,林彪的元帅戎装照片 36 年来首次展出.展览负责人、军博的姜廷玉处长说,这样展出是尊重历史的做法.

今年 1 月 12 日新华网不寻常的出现了两篇文章『钩沉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真实原因图』(内标题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和『还原毛岸英牺牲历史彭德怀未收过毛泽东电报』,一篇转载自今晚报,另一篇转载自中新网.两篇内容一模一样.

文章开篇一针见血指出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及其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这部书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

看来还原历史,澄清彭德怀冤案的时机已经成熟.

●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编假话出书

李银桥在『历史的真言』里说了怎样的假话呢？

『历史的真言』第 495 页至 496 页写道

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

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

「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历史的真言』第501页是这样捏造的

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牺牲而最终却未能逃脱.责任在于彭德怀。

但文章作者作为当事人写了一段证明『历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1986年离休后曾参加『彭德怀传』的编审工作,对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

也就是毛岸英的死与彭德怀没有关系。

● 李银桥没这么大的胆儿

李银桥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贴身卫士,打死也不敢胡乱编造中共历史,那么是谁让他起混淆视听的作用?是谁让被中共捧上神坛的毛泽东迫害彭德怀有理的?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把毛泽东吹捧成「红太阳」和「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怎么可能随便害人呢?更不要说中国人最容不了的是残害的还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

这就象中共执意把毛的尸体摆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样,是借让民众膜拜毛泽东、崇拜毛泽东而达到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中共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毛泽东本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党的生存的需要.因此,党授意李银桥为毛泽东迫害死正直、敢说真话的彭德怀制造了理论根据.『历史的真言』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允许出版,说明它没有真言。

● 导致毛岸英死亡原因

毛岸英从苏联初回中国时,中共还没有建政,还躲在延安那块地方.在那种环境下,狂傲的毛岸英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摆出太子架子,狂跳交谊舞,和未成年女子谈情说爱,为人处事不拘小节,在延安臭名远扬.

很年轻时毛岸英就深知父亲要培养他当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时,毛岸英就参与政治,在毛泽东面前谈论对高层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很倾听他的意见,他说谁不好,毛泽东就疏远谁.因此,当时很多人都为免遭难,不是躲着他就是哄着他.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后,对于提拔儿子更加着急的毛主席在1951年3月,与周世钊的谈话中透露说「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它环境来得更严更快.」

于是,1950年10月22日,毛泽东把儿子送进设在朝鲜的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11月25日,毛岸英入朝后仅仅34天,就在刚过完28岁生日的一个月后,被美国侦察机炸死了.

有目击者回忆毛岸英之死的原因,说,「抗美援朝」期间,生活艰苦.金吕成派人给总司令彭德怀送了一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极难得极难得的.除了给总司令吃以外,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鸡蛋的算盘.

11月25日上午,彭已吃过饭,在外边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觉,才来上班,并擅自拿鸡蛋做蛋炒饭.拿鸡蛋吃已经超狂妄了,而且在不应该做饭的时候让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目标,毛岸英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

● 彭德怀没有错

新华网刊登的『还原毛岸英牺牲历史彭德怀未收过毛泽东电报』的作者说,从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志愿军在朝鲜的收电中翻找,根本没有所谓11月23日聂荣臻告转移的电报,23日没有北京的来电.24日确有毛泽东来电,但电文中丝毫没有讲为防轰炸应转移司令部的字句.该电全文如下

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廿二时半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已全文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685 页,公之于世.所谓聂荣臻 11 月 23 日、毛泽东 11 月 24 日两次 告彭德怀转移司令部的电报纯属子虚乌有.

当事人透露,即使退一万步讲,毛泽东当时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李银桥也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因进入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保密守则教育.不该自己阅看的文电不阅,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项不探问,首长和别人谈机密时躲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位机要秘书徐业夫是老机要工作者,罗光禄是军事干部.徐、罗秘书绝不会把电报给李银桥看,因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李银桥当年不可能看到电报,也不可能听到军事机密.那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桥口述回忆录时认为需向中央和军委档案馆查阅 某些文电,以他的身份当有批准的可能.

但为什么他和执笔人并没有寻查当年的历史文献,就随便放这么大的假消息呢?这可是往彭德怀脸上抹黑啊,又是谁指示李银桥这样做的呢?又是谁允许此诬蔑彭德怀的假消息放行的呢?给毛泽东出假消息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没有幕后因素和目的地是不可能的.

● 毛对彭德怀的疯狂报复

张玉凤回忆,1976 年毛自知时日不多,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逐个听取她和毛远新的意见.他俩都说名单上的人都是忠于主席、忠于党的.毛不停的摆手说「听够了,是你们忠于我姓毛的」.一句话道破天机.什么党啊、母亲,那都是说给傻青儿听的.

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毛岸英被炸死,下午 4 点,彭德怀才缓过劲儿来,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共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37 天后,1951 年 1 月 2 日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志愿军司令部电报送给毛泽东.

据『叶子龙回忆录』(第 196 页至 198 页)记载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的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

毛从中共建政开始就处心积虑要建立家天下,毛把一切希望和赌注都下在唯一不痴呆的大儿子毛岸英身上.让毛岸英入朝是为了镀金,积攒政治资本,好迅速当接班人.毛尽作好梦了,没想到毛氏家族没这个运.毛岸英的死把毛的家天下计划统统打入地狱.

毛泽东把这一切都算在彭德怀头上,从此寻找机会报复.

● 毛再次「引蛇出洞」

从 1958 年到 1961 年,毛推行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害死了五千多万中国人,并造成了饿疯了的人把亲人勒死并吃掉的惨剧.各个省的领导都非常清楚这样下去是不堪设想的.毛更清楚.所以毛想借此机会找出高层中反对他和拥护他政策的人,无论他是是对是错.毛只想留唯唯诺诺的人.

于是,毛用和 1957 年反右「引蛇出洞」的同一手法,在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毛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 19 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对如何估计国内当前形势时,一部分高官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 1958 年的经验教训.当时自由交谈,各抒己见,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和 1957 年反右初期的气氛一模一样.

7 月 10 日,毛泽东看风头不对,在组长会议上定调说,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后没有人敢再说什么,会议继续开并准备在 7 月 15 日结束.

1959 年 7 月 14 日,这是彭德怀永远忘不了的一天,那天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 1958 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打倒彭德怀的机会来了,毛松了一口气!

1959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写给他个人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毛要一网打尽与彭德怀意见相同的人.这种手法与两年前的反右斗争何其相似.

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揭发批判,并立马把他们升级为「反党集团」.

8 月 2 日到 16 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 4 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就这么简单,毛贼一句话,中共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立刻从显赫的高官跌成反党份子.被撸下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再无一人愿意和彭同机.

● 置彭德怀于死地

即使这样,毛没有了家天下接班人的仇恨也消不下去,1966年6月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整人运动开始后不久,即把置彭德怀于死地的任务交给了老婆 江青.12月,江青当第一副组长的文革小组打电话给当时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造反派之一的韩爱晶,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在深入发展,你们可以派学生到四川,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斗争.」

1967年7月12日,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专门下达了折磨彭德怀致死的信号,听江青喝儿的戚本禹指示说「彭德怀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江青被捕后,声称自己是「主席的一条狗,让咬几口咬几口」.

得到最高指示的韩爱晶有恃无恐,10月19日在北京航空学院斗争彭德怀,表面原因是彭在1959年为饿死的老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实质原因是因为1950年当入朝总司令时毛岸英自己找死.1967年已近七旬的彭帅被批斗时,被打翻在地七次,额头打破,肋骨打断,惨不忍睹.1974年11月29日下午33时35分,被折磨了15年的彭德怀蒙冤去世.过了不到两年,1976年9月9日,中国的灾星毛贼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 党永远是邪恶的

又过了两年,1978年12月,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届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做主为彭德怀等人平了反.

毛泽东没有人性,所以到现在还被中共膜拜,而胡耀邦正因为有人性,所以为邪党所不容.那些希望中共好的,希望中国好的党的领导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悲惨的,因为党没有变,党永远是邪恶的,只有甘愿与恶党互增邪气的才是党的真正代表,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1月12日新华网公开反驳毛的贴身卫士的所谓内幕,也就是公开指责毛贼残害彭德怀是胡作非为.推下神坛的毛贼又被体制内的正义人士踹了一脚,肝儿疼的是「伟光正」.

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高层内斗的血雨腥风 ——彭小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作者：彭小明 叛徒情结

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党化宣传文艺中,除了革命英雄男女形象鲜明以外,叛徒形象也比较生动,并得到反复渲染.所以在人民的印象中,王连举(红灯记)、甫志高(青春之歌)、马家辉(党的女儿)、刁德一(沙家浜,汉奸),已经成为固定的叛徒汉奸代名词.这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反映,也是党的政治需要.当然,这些形象都是奸佞的恶徒,远不是法国作家萨特笔下,《肮脏的手》中的贺德雷和雨果那样,既是共产党的领袖,又可能是叛徒的革命家兼理论家立体形象.中国文艺界要达到萨特这样的境界,恐怕还有很长的跋涉路途.

(2010年《肮脏的手》又在上海上演,可惜导演将剧情地点移开到中东某国,大大削弱了原剧对共产党的指称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于叛徒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纠结.历代主要党政领导人中,除向忠发、张国焘是叛徒以外,还有多人都曾经被指斥或怀疑为叛徒: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伍豪)、王明、康生、江青、张春桥;文革中所谓61个叛徒集团案,包括薄一波、彭真、王鹤寿、刘澜涛、王若飞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总理、副总理;中宣部、钢铁工业部、西北局、中南局、华东局等省部级高官和陶铸、曹荻秋(上海市长)等地方大员,以及许多著名已故领导人.文革的批斗行动包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揪叛徒,各地红卫兵组织,以天

津大学揪叛徒战斗队最为著名。许多忠诚的干部不是在是否执行革命路线问题上被批斗，却是在革命历史上的所谓叛徒问题上遭到怀疑，结果长期遭冷遇，被审查，有的人被耗尽了有生之年，有的人选择了自杀。

叛徒的危害小于内斗的危害

每一个政党，尤其是经过恐怖镇压时代的政党都对叛徒保持警惕。因为叛徒了解内情和党内机密，一旦投敌，势必造成党的人员和地下组织的严重损失。凡是政党都不可避免会有党员和干部背叛党章和主义，或脱离组织，或投入敌营，如果告密，就会对组织造成伤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叛徒。从一大开始，陈公博、周佛海都是创党元老，后来不仅背弃马列，而且成为汪伪汉奸政权骨干。地下党领导人任卓宣叛党后，成为国民党反共的理论家和最坚决的反共铁人。但是他们叛离甚早，党组织也不庞大，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精神影响远超过组织影响。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期间，顾顺章叛变造成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处决。但是由于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迅速及时地报告地下党，使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干部基本未受重大损失，地下机关被迫转移。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因为地下交通员黄慕兰小姐偶然听到特务议论，猜出被捕的“湖北人”就是向忠发，及时报告组织，也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江西根据地时期，多有红军人员“反水”（叛变），但是这些人员多数都是下层喽罗士卒，并无全盘影响。唯有龚楚这样的高级干部，造成了比较重大的危害，但是总的来说，红军长征后，江西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产生的政治影响比组织损失更大。（龚楚晚年被允许从香港返回广东，捐助桑梓，终老乡里）。纵观中共党史，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党（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李竹声）和红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部队官兵集体叛变。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这些变节分子本身已经丧失斗志，离开革命队伍，并带走或劝降部分动摇分子数十或数百人，对革命组织来说反而是一种去污行为。1947年北平王石坚叛变，造成123人被捕，损失较大。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干叛变造成的损失不小，堪称全军覆没。但是毕竟仅限于台湾一隅。相比之下，这些叛变造成的破坏远远比不上红军内部斗争和阴谋造成的损失，例如富田事件屠杀AB团近十万官兵（毛泽东与江西地方干部内斗）、红四方面军近乎全军覆没（毛泽东与张国焘内斗）和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毛泽东与项英内斗）。共产党的战争历史上没有一次单一战事的兵员损折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牺牲达到十万（富田红军）左右的。陈昌浩痛悼红四军的牺牲将士时泣不成声：那是两万多名干部战士啊！皖南被俘的新四军官兵6000余人。延安整风时期所有知识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所有单位无不鬼哭狼嚎，不断发生自杀、疯癫的案情，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国民党特务。大量干部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直到文革仍然没有完全治愈。他们基本上都成为后来的国家干部，内斗伤害的正负面影响都融入到嗣后的政治生活之中。在李锐、李慎之、韦君宜、李维汉、何方等老干部的回忆文献中都有痛苦的记叙。

叛徒问题是一个禁区

经过延安整风等党内斗争，人们发现叛徒问题最为敏感。特别难以说清。特务受敌方派遣，破获后可能查清组织关系，比如口供或情报，造成损害等等。出现叛徒，可能造成组织损害，也可能没有重大损害，证据有时完全在敌方手中，很难说得清楚。而且所谓变节、叛变，也很难划清界线。例如所谓61个叛徒的集团，明明是中央同意，张闻天操办，毛泽东、刘少奇签字的；完全是毛泽东故意出尔反尔，结果文革中竟然成为集体冤案。新疆马明方案是康生等人诬陷，造成的集体叛徒冤案，以致牵涉到演员赵丹这类基层党员。北京学运领导人袁永熙当年是杰出的学生领袖，也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婿，他与妻子陈琏被捕后，因陈布雷的关系，终于被释放。袁曾受酷刑而坚贞不屈，结果1949年后立刻受到所谓的叛徒质疑，在团中央受到排挤，五七年打成右派，陈琏与之离婚。陈琏后来在上海也因叛徒问

题自杀。文革中袁永熙遭受更大冲击，尽管续弦妻室挺身保护，毕竟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另外，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师大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夫妇。30年代他们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穆木天被捕，当局散布谣言说穆已经变节。鲁迅听说后，在文章中嘲笑“穆木天也反正了”（意为叛变）。不久穆木天出狱。依旧从事左翼反蒋拥共的斗争。可是从此不再获得党组织的信任。鲁迅全集出版，嘲笑几乎成了“铁案”。1949年建国后，知识界的学术生命越来越受制于本人的政治表现和政治经历，所谓叛徒问题越来越影响穆教授的教学科研活动。1957年他们双双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不准授课。从事体力劳动或到资料室整理资料。穆木天是二十年代中国最早的印象派诗人，也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早期介绍文艺阶级论的先驱并用之于实践的批评家。（比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早十余年）。文革中夫人彭慧被批斗后押入小房间过夜，竟从此不再醒来。穆木天的儿子被打成反革命死于劳改营，女儿在干校劳动，身边没有任何人照顾，1970年死后被人发现，竟不知死于何日何时。等到改革开放以后，钟敬文教授等人出面作证，否定所谓“反正”的谣言时，穆木天已经去世十余年了。他的学术著作和翻译作品主要都在3、40年代问世，后半生最成熟也最应出成果的20年几乎全部荒废了。

这类似是而非的政治历史结论，都是通过人事档案，然后经各级党政组织干部和人事干部（特务系统）的暗示，风传或直接透露，让各级领导和群众不断歧视，羞辱和怀疑当事人，让他们平时不得安生，运动期间备受打击。袁永熙谈他为什么成为右派，“原因首先是被捕后没有牺牲”。党的非人性本质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时期的抓叛徒狂潮

某种程度上说，文革就是以揪叛徒为序幕的运动。戚本禹按毛泽东的意旨将瞿秋白打成叛徒，为嗣后的整倒刘少奇，整肃61人叛徒集团作了铺垫。叛徒的定义在文革的审查中任意扩大，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陶铸、魏文伯、曹荻秋等地方大员都成了叛徒，红岩作者罗广斌，渣滓洞烈士江姐，上海工运烈士王孝和（狱中曾有动摇情绪），都谣传说是叛徒。八宝山坟场多处墓茔遭掘土破棺，毁碑鞭尸，一片狼藉。几乎凡是在白区工作过，曾经被捕过的人员一律都成了叛徒嫌疑。林彪九一三事件后，陈伯达叛徒历史被公开；四人帮倒台时，康生、江青、张春桥夫妇和姚文元的父亲叛徒问题日益公开化，中央核心人物中只剩下毛本人没有叛徒嫌疑了。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关于叛徒的见解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例如李维汉回忆说，七大时毛曾提议薄一波出任中央委员，陈赓认为薄一波从北平反省院出狱，属变节行为，不宜升任高级职务。毛不仅不采纳，反而进一步推举之。1950年毛曾为瞿秋白题词，赞颂他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是这篇文字没有发表，原因是当时已经发现了瞿在被害前另有遗言即《多余的话》。戚本禹认定李秀成为太平天国叛徒，连带根据《多余的话》指称瞿也是叛徒。毛泽东批示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揪叛徒的黑浪由此翻腾而起。不仅在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抓叛徒，而且祸及普通平民。比如在当年的游击区，地下党留在贫农家庭中少量枪支，还乡团回来威胁说，“一旦查出，格杀勿论”，结果该贫农就将步枪缴了出去。文革中定为叛徒。

文革晚期，中共高干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叛徒，愈演愈烈。文革组长陈伯达在林彪事件中倒台，叛徒历史被公开。文革专案总管周恩来的“伍豪问题”是周心中最大的隐忧。重病开刀出来，急切要说的竟是身后的伍豪叛党问题。说明肯定有人在背后追究这件事。康生临终前向王海容、唐闻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有叛徒嫌疑。周恩来也向毛做了类似汇报。毛泽东对于康生、周恩来的汇报不以为意，说是早就知道了。对此，邓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毛泽东：“文革中根本没有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

（该书331页）。另一种说法，是曹轶欧说“毛认为江、张、康三人树敌太多遭人忌恨，所以才有人诬陷”。其实，毛泽东追究历史问题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凡是他树的典型，例如陈永贵，被揭露是日伪汉奸小特务。毛泽东却下令不予整肃。如果不是误撞误中被毛树为典型，

陈永贵这类维持会的汉奸恶棍，在文革中早已遍体鳞伤九死一生。仔细分析文革宠臣的历史，还是很惊人的。康生没有被捕的历史记录。但是他曾是王明的心腹助手。打击何孟雄、欧阳立安等人的“非委反对派”不遗余力。甚至就是他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借刀杀人，害死了包括左联五烈士（殷夫冯铿柔石李伟森）在内的 24 名地下党干部。文革中康生急切地通过谢富治迅速处决羁押上海多年的地下党叛徒卢福坦，就是杀人灭口，以免暴露康生自己叛党或勾结特务的经历。陈伯达被捕的历史是明确的。而且向当局交待的历史被讥讽为可当传记来读。自首后甚至曾经为特务指认地下党同志。江青在上海也的确被捕过。因为她到延安不久就成为主席夫人，所以没有受过整肃，跟延安整风和历次运动被审查迫害的干部相比，是很不公平的。揭批四人帮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徐明清（王观澜夫人）的证词断言说江青是叛徒。但是 1980 年审判四人帮时徐翻供，说是专案组逼迫她签字的。中共中央对此却没有发出更正的文件。这样做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江青本人来说都并不公平。江青被捕时才二十岁。很少社会经验。她与黄敬恋爱同居后又分离，哭哭啼啼，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一度呈现精神病态，曾到徐明清家中疗养。依此推断，江青被警察抓捕、关押审问，能否镇定自若，冷静沉着，非常值得怀疑。她任教的晨更工学团是左翼团体，识字班也有明显的工运色彩。她真的没有供出其他人员的姓名，没有承认自己的共青团身份？没有写过自首或认罪文件？为什么他对 30 年代的上海经历外泄那样害怕，又必欲置上海公安局杨帆等人于死地？无意中接触她的历史材料而在上海被迫害致死、疯癫或自杀的人，绝非个别。越是这样，江青的叛徒嫌疑就越不易排除。一个陈永贵，毛都可以不予追究，何况是他的妻室，又是闻名的文革旗手。权倾十年之久，要消灭任何证据都易如反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30 年代被捕，叛变了地下党，只是因为协助了一些共产党文化人，所以 1949 年后没有立遭打击。后来也因为姚文元受宠，乃父也得庇荫，免遭劫难。张春桥虽然没有被捕的经历，可他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崔万秋派遣打入左翼队伍的敌特，按照文革的政策，重视干部的经历，强调家庭出身，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强调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可偏偏就是在毛的身边，叛徒和叛徒敌特嫌疑，叛徒嫡子都环侍左右，前呼后拥。后人回看这段历史，不啻观看一场荒诞戏剧。如此种种，刚好证明了独裁暴君的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也就是说，表面上党有铁的纪律，实际上毛与封建帝王并无区别，朕即是法。1949 年后，毛的独断更超过历代帝王，党代会、政治局、政协、宪法都是摆设，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也只是手中的棋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辞海》删除了叛徒词条

叛徒问题是一种定义不明、难以确认，而又杀伤力极强的嫌疑，所以是党内斗争的利器。叛徒嫌疑令所有老干部无不闻风丧胆。刘少奇被捕 4 次，每次都有亲友、名流暗中营救，有惊无险。可是后来叛徒问题也从此如影随形，相伴送终。幼年学友杨剑雄曾经在赵恒惕逮捕刘少奇时下力营救。1950 年土改惨烈，杨作为官僚地主在羁押中写信给刘少奇，希望刘念及当年旧情施恩相救。刘少奇不仅没有为之缓颊，反而致信省公安厅：“当时营救者甚多，宜当按党的政策处理”。结果杨被就地处决。文革中中央文件称刘的冷酷措辞为“杀人灭口”。按政策说，凡确曾保护营救地下干部之有功人员，当酌情免罪。即使营救者甚多，总不能说当年杨出面救刘毫无尺寸之功吧？如果刘少奇信件语气稍为缓和，以中央副主席、全国土改工作总负责人之尊，依法施仁，也不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可是刘出言冷峻，铁面无情。杨便必死无疑了。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刘深知杨若不死，留下活口，未来斗争复杂，万一漏出任何细节，缠夹不清，只有祸患，绝无裨益。不如借土改之力，快刀斩除，血不沾手，干净利落。杨很可怜，而刘既冷酷，也很可悲。虽杀旧友，亦难逃厄运。

周恩来为伍豪事件心力交瘁也令人瞩目。即使是歌颂周的文章报道，也无法避免描写周在病重期间，首先不是忧国忧民，而是担忧伍豪声明被追究。

曹荻秋在万人批斗大会结束时，不争辩任何路线问题，回过头来坚决否认自己是叛徒。

从这些事例看来，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最大的梦魇不是工作成绩的优劣，或路线的正误，而是叛徒的嫌疑。一旦嫌疑缠身，身心必受巨创。关键问题是组织部门也没有客观标准。文革结束，61名高官恢复名誉，刘少奇、瞿秋白等人免除叛徒冠冕，重获无产阶级革命家称号。此后中共组织部门被叛徒的定义折腾得死去活来。结果连官修的国家大辞典《辞海》（1989年版和1999年版）竟然删去了“叛徒”这个条目。难道汉语词汇中已经失去这个概念？海内外一时传为笑谈。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什么是背叛革命？刘少奇接受赵恒惕送的《论语》出狱，称谢说“有生之日，便是戴德之年”，陶铸写信给蒋介石（黄埔军校校长）说“学生交友不慎，误入歧途……悔念前愆，改邪归正”，算不算背叛革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里强调自己“不是烈士，而是叛徒”，“参加革命是历史的误会”；乃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算不算背叛革命？

从概念上说，像顾顺章、向忠发那样，跪地求饶，屈打成招，带领特务捉拿同党的人就是叛徒。但是虽不出卖同党，却在组织上脱离，思想上划清界限的人，更是叛徒，比如陈独秀、任卓宣等人，（关于任出卖杨开慧的说法，时间上并不吻合）。这两类是最容易分辨的叛徒。然而现实总是比定义更复杂。如果身份未暴露，巧计脱险，不承认党员身份，证据不足终于释放，不应说成是叛徒；或者当时党员多有富豪高官的子女，一旦被捕，家人、亲友多来营救，终于出狱；这些情况也不是叛变。历史上的情形千差万别，还有很多史实是无法核实的。例如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被捕。据他在延安对斯诺的谈话提到，是将身上带着的几十块钱收买了团丁而脱逃。近年来国内的《毛主席指点江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58页；《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1993年，399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71页；《险难中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76-77页，相关的介绍多语焉不详。网上作者分析认为，既被捕捆绑，钱财还不被充公？如何还能贿赂？既已贿赂而脱逃，为什么又说再被追踪？所有记叙，关于被抓捕和脱逃皆一笔带过，而逃脱之后的情节则都十分生动入微。为何毛一人还，同行者潘心源等人却被捕？是否毛泽东叛变投降，出卖了同志？按照延安整风和文革审查的标准，毛的被捕经历是很难通过审干大关的。但是谁敢审查这位伟大领袖和马列神仙呢？（参见《百家争鸣·双腔龙》网）

毕竟历史的公案必须证据为重，既然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或者相应的证据都已经被当事人及时有效地销毁掩盖，就只能存疑而已；既存疑，按无罪推定原理，就没有理由做出“叛徒”的结论。关键还应看重当事人恢复自由后为谁工作，为谁服务。西方社会比较宽容。凡是被敌方扣押的记者、官兵人等，在暴力胁迫下发表的反西方、反国家的声明，一概不予承认。反而谅解当事人在暴力胁迫下违心认罪委曲求生的处境。相反，中国抗越自卫反击战中，凡是被越方胁迫发表过承认“中国是侵略”的我方军官，交换回国后皆被判处死刑。抗美援朝的被俘志愿军，凡有动摇言行者，回国也一概处死，虽未动摇者也遭迫害多年。再看印度支那战场的美军人员，他们每人都携带一方绸巾。上面写有越老柬英法俄中（简繁两体）多种文字，大意是说：“我是美国军人，现在与部队失散。我向你们投降，请你不要伤害我。请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或政府那里去，谢谢！”甚至美军人员在估计部队或战友已经及时转移的情况下，供认自己的番号驻地等信息，也可以原谅。当他们终于生还时，仍然被当作英雄受到欢迎。这样的态度既人性化，又现实主义。

中共把叛徒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并非毛泽东特别看重气节情操。毛从来不在乎道德节操。向日本高官感谢日军侵略，跟美国高官开玩笑愿意出口中国妇女。说到底，中共纠缠干部的历史问题，包括叛党经历，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秘密性质的党，缺乏民主的组织机制，没有合理的意见采纳程序，也没有合理的人才竞争制度。任何政见分歧一般都不易立见优劣，于是就不择手段地相互攻讦。叛徒问题最易置对方于难以说清的困境。所以内斗愈炽，叛徒问题愈敏感。最后弄到人人自危。文革时代有一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当中有一段对话十分传神：“三爷（匪首座山雕）最恨的就是被共军俘虏过的兄弟”！党政领导集团猜忌、痛恨被敌方捕获过的同志，竟然跟封建土匪团伙如出一辙。

叛徒定义的现代解读

法国政客克里蒙梭（1841-1929）说过一段名言：“30岁以前若不信仰共产主义，他的良知有病；30岁以后若依然信仰共产主义，他的脑袋有病。”此人是法国激进党人，无神论者。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他30岁时正是巴黎公社兴起而又覆灭的时期；他生命的晚年已是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殊死对抗的年代。中共著名的烈士夏明翰有过慷慨就义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如今每个年龄段的中国人真的应该问一问，这个主义真不真？如果这个主义不真，值不值得为它去牺牲？

60年来党政日益腐败，专制、黑社会化，意识形态神话日益破灭。国民党抗战卫国的形象逐渐得到恢复，当年的民主宪政承诺在台湾地区逐渐实现，令人民逐渐开始认知国共两党的本来面目。两党政争和内战其实跟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并无本质差别。由于理想神话的破灭，干部形象的贪恶，人民逐渐省悟共产党不仅剥夺了本来有限的新闻、言论、信仰和迁徙自由，而且连实行宪政的承诺都没有。经受了大饥荒和文革等更大的身心折磨和牺牲的人们正在认清共产政权比民国政权更反动。从这个前提回看历史，除了那些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变节者（这类人渣对任何组织来说都是祸患），共产党的精神叛逆者们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陈独秀不愧是中共最伟大的叛徒。他创立了党，又摆脱了党的束缚。婉拒国共以及任何派系的召唤和资助，对马列的专政理论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他体尝过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监控的苦果，又观察了苏俄克格勃统治的恐怖，相当冷静地走出了共产迷信的误区。任卓宣是另一位背叛中共的理论家。他所依附的国民党也有专制的一面，所以他对专制的批判不能揭露到最彻底的深刻程度。但是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他说：“（中共）新华日报能办到（陪都）重庆，就是民主”。他的头脑比当时绝大多数左倾民主人士（跟随中共建国，57年噤若寒蝉）清醒很多很多。龚楚叛变后撰写了《我与红军》揭露了根据地红军的血腥和暴戾。王明、张国焘、郑超麟等人都是中苏两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来人”，他们的揭露和陈述包含亲历的切肤之痛，对于清算共产主义罪恶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亲历中共教育：尼克松要来 我们学校的谎言培训

1972年2月21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达北京

沈睿

从我睁着眼睛看世界开始，到我上大学——小学，中学和高中，学校里天天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他们生活得水深火热，特别是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而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而且中国人民总是受西方人欺负。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受欺负的历史。中国人都如小受气包，在外国人的大皮靴下挨踹挨踢。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美国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要来中国了。为了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我们学校给我们进行培训教育。如果美国记者问你们你们每天吃什么？告诉他们我们每天吃鱼和肉。我们使劲地点头。那时我的肚子想到鱼和肉都高兴得得咕咕叫，因为我们并不每天吃肉和鱼。吃肉是我们生活中值得庆幸的一件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一个月每个人有半斤油，一年每个人有半斤花生，二两瓜子。我们想象的最好的生活就是每天吃肉。我们要告诉那些吃不饱的美国人，我们天天吃肉，还吃鱼。大鱼大肉。

尼克松来的那几天，我们必须穿最好的衣服。可是那时我一年只有一件新衣服，还是新年时

才买，所以我没有。老师说，没有新衣服的人就一定早早地来到学校，免得路上遇到美国记者，让他们看到你穿的带补丁的衣服。我看看自己的补丁连天的衣服，我怕美国人看到我，我早早地到学校。等尼克松走了以后，我才恢复正常时间上学。学校里为尼克松来鸡犬不宁，我们都等待美国人问我们吃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遇到过美国记者。

于是老师开始在课上给我们讲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人民是多么给中国争脸的故事。比如，在西单菜场，一个美国记者看到一个老太太，跟老太太说话。老太太听不懂，可是立刻走到鱼摊子前，买了一条最大的鱼，拿着鱼照相，显示中国人民能吃得起鱼。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热血沸腾地鼓掌。多么爱国的老太太！能吃得起那么大的鱼，让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看，中国人生活多好啊！还有就是一些老科学家被访问。他们住的房间里有沙发！沙发那时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家具。他们有沙发的家都给中国人争面子啊！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见零星的外国人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很少看见外国人，一见到白人，我们就把他们团团地围住，围得水泄不通。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在中国被围的水泄不通。因为很少见到外国人，我们以为外国人是天外来客，忍不住围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莫名其妙地说什么话，我们也听不懂。我那时天天看报纸，报纸上只要有一个外国人来，就报道他何等热爱中国。他们热爱中国都热爱得来这里看看了。报纸上常常报道世界各国热爱中国的故事。我那时坚决相信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首都。我为自己出生和生活在中国而无比自豪。

所有这一切我所被告知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都如一座破房子一样纷纷倒塌了。第一，我知道在中国人民都生活得幸福无比吃一斤棒子面也要粮票的时候，美国人民天天吃黄油面包各种鱼各种肉而不需要粮票肉票油票。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票是什么。而且，他们家家户户都有沙发！第二，原来中国人幸福生活的时候，同时有很多中国人自杀而死，流放而死，饿死——四千万人（40,000,000）在三年之内被饿死。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导致的人口死亡发生在中国的1959-1962。我查资料，从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中查出，1962年中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第三，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并非是西方欺负中国的历史，而是中西互相不了解理解而逐渐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所谓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中国人签了字画了押，同意的，清政府并非是在刀架在脖子上才画押的。而且所有的暴力冲突最初都是由没受到过教育的中国人挑起来的。这是一个吃惊的发现。我才明白中国的历史教育里几乎全是谎言。凡是涉及中国与外国关系的，中国的教育的几乎都是从害怕恐惧外国人的 xenophobia 出发。这种教育塑造中国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只要有问题就指责外国人。害怕外国人导致的是莫名其妙的崇拜外国人。崇洋媚外与自惭自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恨外国人，其实内心很向往外国人。永远不能平等地对待自己和外国人。

第四，北京不是世界的首都。实际上，哪里都不是世界的首都。世界没有首都，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与中国很多人都希望到北京生活和工作不一样，美国人大多不愿到首都华盛顿工作。华盛顿最大的优点就是所有的国家博物馆都免费，包括国家艺术美术馆，这让我最高兴。而且国家美术馆的餐厅的饭也挺好吃的，不过不是免费的。

以此文回应那些针对我的博文而在网上谩骂的人。

和林彪翻脸 毛泽东出尔反尔对世人撒弥天大谎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 50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陈伯达，吴法宪谈庐山会议的情况。这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高文谦先生的著作《晚年周恩来》的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的最后部分“庐山会议的真相”和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五十二章——“和林彪翻脸”的第三部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中共官方一直说是林彪“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和我以及其它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江青闯进去）。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高文谦先生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高文谦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毛：我想讲话行不行？毛问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了底，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早就对中央文革憋了一肚子气、因“二月逆流”而被打入冷宫的陈毅也在小组发言中愤愤地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张春桥之所以在林彪讲话后立刻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因为文革派一千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党内外结怨太深的缘故。

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全会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黑手。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而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毛泽东与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最后彻底闹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结果两败俱伤。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身异国荒漠；但毛也不是赢家，从此一蹶不振，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终日困坐愁城。

“九·一三”事件中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过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零年春节，叶群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零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 一、不要拉关系；
- 二、不要串门子；
- 三、不要请客送礼；
-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藉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

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义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的中国三年大饥荒的真相，由于中共的讯息封锁，经民间和学者的努力追寻，最近几年才渐渐浮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最近，香港开放杂志出版新书《信阳事件》，披露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展示中共政权所犯下的残忍罪行。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中共上台以来，中国发生很多次人为的大灾难，但灾难程度最厉害的应该大饥荒，因为大饥荒以死亡生命来计的话，是几千万人的死亡。……这段历史，好多年都没有什么披露。

开放杂志今年 3 月出版的《信阳事件》中首次揭露了 50 年前发生在河南信阳的人间惨祸的真相。一个人口 600 万的鱼米之乡，竟然在大饥荒不到一年时间内，饿死了 1 百多万人！

相对于其他大饥荒专著而言，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介绍说，该书的价值在于从典型个案的呈现，真实还原了大饥荒真相。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河南信阳是农村大跃进、大饥荒的发源地，人民公社就是从河南信阳开始，最早的大饥荒就是从河南信阳开始，饿死人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作者乔培华是中共河南省党校的教授，走访区内十多个县市，而且查阅到至今尚未解密的大量相关档案，写成该书，也是至今为止第一本探讨信阳事件的书。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他当时是河南党校的教师，所以他会接触原始资料，而且他接触这些史料的时候，用的很多都是中共官方的史料。

书中首次公布了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在 61 年所作的检讨书。文中写道：“估计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11 月，全省共死亡人口 2 百万以上，单是信阳地区就占 1 百多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检讨书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如果学者来研究这本书，这完全是信史，就是很可靠的资料。

书中描述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信阳作为首个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树为典型，在大跃进的号召下，制造小麦钢铁放卫星的假象，影响全国。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将彭怀德等人打成右倾反党，河南大反右倾，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将农民的口粮、种子搜刮一空，造成大面积饿死人。

蔡咏梅痛心的描述当时被活活饿死的情景。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那时候都是公共食堂，不准你在家开伙，饥饿嘛！就

想搞一点东西来吃，被发现了 … 很多情况都遭打死的 … 而且 … 大人打死了以后，自己的子女就活活饿死。还有很惨的是，当时农民逃荒，就不准，完全把整个信阳地区包围起来了，抓回去就打，连逃荒都没地方逃，就残酷到这种程度，其实当时有些仓库里面都还有粮食，没有人敢去动这个东西。

然而官方至今没有公布死亡数字，死亡原因也是所谓的非正常死亡。蔡咏梅认为该书出版意义重大。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这么多人完全从地球上消灭，甚至这段真相完全被抹杀。…… 就要认真的对这些死难者，对几千万生命我们就是要去探寻真相，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珍重，对历史苦难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它。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造成这样的人间惨剧呢？著名作家李锐在序中称，“根本还是在党和国家体制上有问题造成的”。蔡咏梅认为，该书的出版帮助人民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开放杂志出版社执行编辑蔡咏梅：大饥荒 … 共产党一贯宣传的伟大、光荣、正确 … 人类历史上一个政权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政权，你还有存在的理由吗？你应该下台，但是至今毛泽东的相片还摆在天安门的城楼上。

虽然该书在大陆被列为禁书，但蔡咏梅表示，该书在香港非常畅销，一面世就被登上发行商田园书屋政治类的畅销书榜。

官方文件：大饥荒时代中共官员就对百姓性酷刑 官方文件：大饥荒时代官员性酷刑残杀百姓
《阶级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完整版

中共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前冬去春阶级敌人采取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手段，残害贫雇农和广大群众，不少群众被致死，人身遭受到极大的摧残。现将运动中揭发的主要刑罚、手段，简要汇集如下：

1、 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父亲当过 20 年伪甲长），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 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伤（丧）命。

2、 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付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己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3、 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 ● 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4、 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的两件小东西，回去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 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 ● ● 上，后伤残。

5、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社员高少银于 60 年 6 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6、缝：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支书●先华，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

7、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伪甲长）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8、大针扎嘴：何店公社官●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 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9、割嘴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付支书汪守兴，于 60 年 2 月 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10、称钩子勾嘴：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土匪，伪军班长），前冬把雇农余培●的儿子（15 岁），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11、铁铤铲脰（颈）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铤在脰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血，当场昏死。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 门里通，当即通死。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14、通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 1959 年 11 月分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住队干部彭帮后知道后，用一尺五寸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通进去，当场通死。

15、踢阴道：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的 鲜血直流。

16、煤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燃烧。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特务份子），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绳绑起来，燃上干柴，燃烧烈火，活活烧死。

18、火烧婴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的小孩（三岁）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后又将 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

烧死。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国民党员，特务组长，47年杀害解放军二名）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某某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嘴咀里，并把嘴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21、大椒面渗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里薰，当场薰死。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金●大队贫农社员潘●●，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小保队，已法办）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24、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按其反革命父亲的吩咐，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富农成份，伪兵痞）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胫脖子上挂两张铁犁（约60斤）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大队付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社员毛德●，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嘴里塞生牛肉吃。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张●大队●●生产队长●发龙（已法办）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傅●田，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已法办）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30、头朝下掣：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已法办）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头朝下使劲掣，头脑掣破，当即死去。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东●从五尺高的大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伪保丁、小保队，已法办），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嘴里，当即呕吐不止。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已法办），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萝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是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社员花●昌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已法办），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42、雨淋：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贫农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

山上，用锄头对头脑猛砸，接着埋掉。

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莫忠（土匪），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塘子活埋掉，幸被人得救 未死。

45、剥人厅、落魄厅：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已法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国民党党员、伪县政府书记处书记，已法办）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魄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魄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孙乃修：郭沫若：大饥谨时期的颂歌者

吹了牛，撒了谎，害了民，毁了财，中国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等人强迫推行“大跃进”运动中极度疲惫熬过去。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大搞公社分光吃净、全国高官小吏大吹牛大撒谎掩盖严酷实情，这些严重错误导致巨大灾难，使中国陷于危亡绝境。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三年大饥谨，整个民族在死亡边缘挣扎，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有人估计六千万），创了人类历史上大饥谨死亡之最，亦创了人类历史上由于政府犯错误造成整个民族大灾难大死亡之最。这个政治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优劣，暴露净尽。中华民族为一九五八年这场大疯狂以及持续的左倾殃民路线，付出极其惨重代价。上天冥冥无言，自有惩罚降临。

一、一九五九年：灾难初年狂吹跃进、痛诋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大饥谨第一年。二月四日，郭作《春暖花开》诗，调子明快，歌唱春天，如痴人说梦：“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一九五九年一定要胜过一九五八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我们要使工业和农业的指标超额完成，我们要使科学和文艺尽可能放出卫星。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要保证：一九五九年要作出更大的更快的跃进！”（《长春集》）

郭继续吹牛鼓气，“十倍地鼓足干劲”，要人们“有献礼火箭上天”“放出卫星”（当时“卫星”特指惊人数字、产量），一九五九年要有“更大的更快的跃进”。他要人民保证，自问自答：“办得到吗？我们肯定地回答：一定办得到！”他甜蜜颂扬：“党的关心更和春风一样十倍地温暖呵，它叫人们要能够保证到睡好觉，吃饱饭”。残酷现实粉碎了他的谎言。大饥谨浓重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郭却在歌颂党的英明、大跃进 的干劲、五九年继续放卫星。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准备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二十三日，彭德怀依据民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愤怒怨言和强烈呼声而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人信件被毛印发，受到无理批判，会议转为反“右倾”，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揭发批判。这实际是对全国民意的严厉打击和压制，再次显示毛氏倒行逆施行为。

在这场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郭沫若完全站在错误的毛一边。这年九月，大饥谨遍及全国（据韦君宜《思痛录》第八十二页说，“一九五九年，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郭歌颂“大广场”“大会堂”“博物馆”“民族宫”“军事馆”“北京站”等所谓“十大建筑”，诗中飘着“满苑松风天地香”，诗中响着“山呼万岁廿垓声”（意思是六亿五千万人各呼三声万岁），诗中狡辩：“谁云跃进非真实？轮奐首先看北京！”（见九月十四日作《十年建国增徽识》）这首诗，对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作出表态。郭颂扬毛，反驳彭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

九月十五日，郭参加毛主持的文化界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总路线座谈会（见十六日《人民日报》）；十九日作七律《三呼万岁》三首（三十日《人民日报》），拥护毛祸国殃民路线、痛斥彭等正义之士，歌颂“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颂“总路线”曰：“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红日，…鸾凤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颂“大跃进”曰：“万千公社翻禾浪，大小高炉涌铁泉。化尽昆仑巔上雪，要将戈壁变良田”；颂“人民公社”曰：“一大二公岂可忘？创新宇宙控玄黄。按劳分配权三级，乐业欢虞颂万章”（《诗词选》）。他知道去年这“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知道中国出现怎样的大饥荒，知道国内众多反对和批评意见与呼声，却依然歌舞升平、高呼万岁，痛骂有政治勇气、为人民“鼓与呼”的人“狂犬吠红日”。在此全国大饥谨之时，他高喊“跃进再加鞭”（欲置人民于死命么？），“百花齐放蕊”（五七年绞杀，何来百花？），“万千公社翻禾浪”（不见饿殍遍野？），“一大二公”（分光吃净，坐以待毙）。

九月二十一日，作《庆祝建国十周年》道：“破浪乘风齐跃进，排山倒海敢争先”（《诗词选》）。九月二十五日，作《读好书》：“人间成乐园，生产水平高；务使生活资，按需不按劳”（《东风集》），在此大灾难之年，还在为国人画饼充饥，鼓吹“乐园”图景和不劳而获观念。十月二十四日，写《歌颂群英大会》，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将开幕而“献出衷心的歌颂”：“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捧献出心肝”“骀宕的东风把九天四海一律吹遍，请看呵，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国内和国外尽管有一些吠尧桀犬，它们的狂吠只表现了它们的可怜。帝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右倾保守的霜雪怎敌得大火燎原？”“谁要否认大跃进，那是它瞎了两眼，太阳，不因盲人不见，而非灿烂在天！”（《东风集》）其诗低劣不用说，其人媚骨亦不必说，其对苦难现实的美化（“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以及对敢于为民请命、仗义直言的彭德怀等正义之士作的诬蔑，凸现郭的品质和为人。

二、一九六零年：民族大死难中欢唱“千秋庆岁丰”

一九六零年，大饥谨第二年，哀鸿遍野，死亡剧增，百姓持续逃荒乞讨。到这年七月，全国已经饿死二千万人。其中，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数高达一百万人。这个地区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两年后这个地区饿死人最多，发人深思（官吏谄上压下，为保第一之名而掠夺、压榨乃至批斗拷打百姓等等残暴行为愈发厉害）。这一事实有力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充满着怎样的血腥和黑暗、暴力与欺骗。在这大灾之年，各地官员不救灾救民，却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各种“斗争大会”，逼农民上交粮食（地方官员吹牛虚报，上面要粮交不出，便转嫁农民身上），到农民家里搜刮粮食财物，用各种灭绝人性的刑罚折磨农民，甚至将妇女剥光衣服游街，多人被折磨死。与此同时，耗资巨大的毛泽东庐山豪华别墅以及在湖南老家韶山的大型别墅“滴水洞”开始动工。

这大苦难之年，郭歌唱大跃进、人民公社，调门高昂。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旧历春节前二日，他作《迎春》诗，一派喜气洋洋，春随人意，唱起“千秋庆岁丰”来：“开门迎春节，

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东风集》）瞧瞧诗中用的意象：“旭日”“颂歌”“瑞雪”“东风”；看看诗中的吉祥如意：“满堂红”“四海颂歌乐”“千秋庆岁丰”；再瞧瞧诗中歌颂的关键词：“跃进雄”“公社好”，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当此大饥馑，哪里有“连年跃进雄”“公社诚哉好”？哪里有“瑞雪”、“东风”、“岁丰”？在这饿殍遍及全国之际，唱出这种昧良心的颂歌，与“人血馒头”何异？

同日，他又作《〈淮海报〉创刊二十周年题寄》：“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歌颂“总路线”（《东风集》）。二月六日作《重庆行十六首》，重复陈词滥调：“民意乐洋洋”“今日东风遍九垓”（“东风”“九垓”已用滥）。诗有“微闻春闹早，仍见菜蔬丰”句，“微闻”二字，可见他明知时有大灾，却极力缩小灾情。仍不忘歌颂毛、同时虚造形势：“领袖诗词好，工农气象雄”（《东风集》）。三月二十二日作《颂延安》：“秧歌舞罢笑盈腮”；作《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于今跃进着先鞭”“风卷红旗分外鲜”（《东风集》）。三月二十四日作《在西安参观工厂》：“东风吹放百花枝，机械高歌跃进诗”（《东风集》）。四月三十日作《“五一”颂》：“寰宇八方传捷报，周年四季颂东风”“公社欢虞五月红”“路线光辉昭跃进，万条火箭一条龙”（《东风集》）。

五月作《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一次在诗中露出“天灾人祸”四字。不过，他只提抢救上海钢铁工人、抢救平陆六十一个人以及京沈铁路遇洪水的第十二次列车这三件当时报刊大肆宣扬的消息（宣扬社会主义好、转移人们对大饥馑、对共产党的怨言），丝毫不提遍及全国城乡的大饥馑。诗中“天灾人祸”四字，虽隐含此意，却依然吹牛：“我们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我们要使它们在我们的目前低头”“死神、洪水、特大的天灾人祸，在英雄们的眼中应该是根本没有！”（《东风集》）郭说，人人都可成为英雄，条件是“但就要你政治挂帅，首先把你自已忘掉”，“真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宇宙缩小！”让人民忘掉自己，无视饥饿，没有思索，没有抗议。这显然是愚民。这些话的狂妄之气，亦是那个时代特产。郭以毛诗句歌颂“今朝”：“十年来的英雄事迹可以写成二十五史，真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六月八日一大早，郭沫若轻松地观鱼去了。其《紫竹院观鱼》道：“晨来紫竹院，拔草饲草鱼”“小鱼问大鱼，其乐复何如？”（《东风集》）你瞧他在大灾难时期雅兴如何？“天灾人祸”在他眼中“根本没有”，“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的战斗精神，那是别人的事。何妨他观鱼的闲情逸致？

九月六日作《十六字令三首》：“花，歌颂东风遍天涯。春永在，亿载斗芳华”。九月七日作《劈山大渠歌》：“第一条，颂东风，人民公社大而公”，称赞贻害无穷的“一大二公”。九月三十日，作七律赠日本话剧团团长曰：“纵有波澜横海岳，要将喉舌替人民”（《东风集》）。要别人大无畏，替人民说话。返躬自问，何如？倘有后世浅见之辈，取出此语为之辩护，恐不是不可能。研究历史与人物者，此辈多见。

这年秋天，作《金田新貌》，高歌“领导正确”“乐无边”：“工农联盟基础固，领导正确政权专。殖民锁链已摧毁，封建死灰不复燃。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东风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处于大饥饿大死难哀恸中，郭却写出这种毫无心肝文字。注意，这里他歌颂“封建死灰不复燃”，同年十二月三日郭在信中却别有腹诽这么说：“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余。因此，对于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官僚本位’之形成、发展，作出彻底的解剖与批判，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定要持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埋葬‘官僚本位’的封建残余。”（《书信集》第一一五页）这两种话相隔仅一个月，其奸伪面目暴露无遗。九月三十日《题日本话剧团》诗“沉酣未醒有奴才”句，似是自嘲。十二月九日作《题〈向农村大进军〉》：“跃进歌声漾遐迩，拿云直上九重巅”（《东风集》）。可怜天下农民心，中国农村在郭笔下依然一副热火朝天跃进图景。

这些诗，是郭在全国一片苦难悲恸中涂抹的虚假欢乐。其中很多收入《沫若诗词选》，是他一九七七年三月挑选出来、重新校阅、认为值得留下来的诗。诗中皆是“东风”“跃进”“公社”“路线”“红旗”滥调，不是“秧歌”“捷报”“火箭”，就是“满堂红”“颂歌乐”，没有丝毫民生苦难，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没有一星社会思考，不倦做着泯灭良知、推波助澜的拼字游戏。这大饥馑大沉痛时期，他没有一首诗透露民族哀伤、长歌当哭之音。在他轻飘飘哼写这些无聊诗句时，中国大地上多少可怜兄弟姐妹和孩子死于大饥馑中，甚至出现人相食、父母杀子卖女充饥、彼此换杀亲子以食的惨痛不忍闻之事。唐代诗人杜甫有“千家今有百家存”“恸哭秋原何处村”句（《白帝》），痛写内乱中人民死亡十分之九、深秋大地一片哀哭之声，竟不辨村墟。这惨景正是三年大饥馑大死难的当代中国写照。诗人郭沫若给人们留下的是些什么呢？

三、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中高颂河山美、领袖好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饥馑第三年。饿殍遍野，家绝户，村民死亡十之七八、余者离乡乞讨之事屡屡可闻。草根树皮，皆已挖净、剥光，乃至人相食之事多有所闻。

这是七十岁郭沫若兴致大发、游山玩水的一年。他一路乐陶陶，玩了云南游海南，访了泰山进四川，逛了上海奔广州，一路喜洋洋，颂歌一首接一首，舞文弄墨喜欲狂。

一月下旬，到昆明游览名胜古迹，正是“茶花盛开，景物宜人”。他作《昆明杂咏》九首，诗中只见“景物宜人”，不见民生痛苦；依然歌颂“跃进”。如此灾年，忒深苦难，却口不停歌。

其《游黑龙潭》：“黑水池中三异木，千年万代颂东风”。还是“东风”之类陈词滥调。其《游安宁温泉》：“劳农今幸成真宰”“跃进楼台满院春”。劳农是否成真宰，郭未敢扪心自问。当此大难之年，他能唱出“跃进楼台满院春”。

其《题翠湖宾馆》全诗如下：“六年之后我重来，映日茶花次第开。水月风光欣遇旧，翠湖春晓乐登台。豪游踪迹经三海，跃进歌声遍九垓。地上乐园真个有，万方宾至幸如旧。”（以上均见《东风集》）春光美好，游兴勃勃，又是“跃进歌声遍九垓”，把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饿殍遍野的苦难中国称为“地上乐园”。

二月十一日作《颂湛江》五首：“苍波红日颂无疆”，歌颂毛万寿无疆。三月十五日，作《浴从化温泉》：“跃进楼台拥秀峰”，歌颂跃进。临走时颇恋恋：“勾留一日雨中别，寄语云山约再逢”。这是郭的温泉、乐园，却是中国百姓流离逃难的饥困之乡、饿殍之野、洒满人间仇恨之地。

三月十八日作《回京途中》：“湖南桃李甚芬菲，湖北玉兰花正肥。满望农耕春水足，沿途绿化惠风吹。辉煌路线飞金箭，大好河山换锦衣。游罢琼崖来武汉，域中无处不新奇。”歌颂“路线”好、“山河”锦绣，遍地“新奇”，无一丝民生怨苦。一九五九年彭德怀以湖南家乡民众贫苦无告、深受“大跃进”之苦为内容上书毛泽东，惹毛大怒。郭此诗中“湖南”句，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着笔，说明“辉煌路线”引来“大好河山”，为一九五八年那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大饥饿、大死亡、使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大跃进”辩护。

四月二十五日，作《游览北京植物园》，满纸“牡丹开”“春烂漫”“香韵低回”之类粉泽香态，最后以陈词作结：“跃进上天阶”。五月游泰山，六月十六日写《颂党庆》，满纸浮辞滥句“旭日”“东风”“红旗”，粉饰现实、歌颂毛：“六亿神州乐，讴歌实践篇”（指毛的《实践论》）；末句亦陈辞，是一篇本意：“巍巍大哉党，领袖颂无疆”。

九月三日由仰光回昆明，作《昆明七首》，留连一片美景中：“大观楼下低回久，喜见茶花上海棠”“山有美人云里卧，池开明镜月中陈。农田处处翻金浪，民族家家碾玉尘。”山如美人，池如明镜，农田丰沃，又是天堂：“昆明仿佛是天堂”。不见诗人悲天悯人之叹，却见小匠津津自得之态，将俗句抄来抄去（诗有“岁首茶花开满苑，秋来又上海棠身”句，实为上面“喜见茶花上海棠”句之演绎）。

九月十八日作《蜀道奇》，大话满嘴、高呼万岁：“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三年大灾难，他有吃有喝有地位、游山玩水颂万岁，那些“险阻”当然不足道。

十月三十日写《游闵行》，满桌美餐佳肴：“蟹饱鱼肥红米熟，日高风定白云绵。谁能不信工程速？跃进红旗在眼前”。满纸肥蟹、肥鱼、大米，大约受到款待，以为天下人都食“肉糜”了。“跃进”不离嘴，“红旗”不离手。好一个“路线”捍卫者。

十一月十三日写《从化温泉》：“远处山山开画卷，浮沉叶叶荡扁舟”。郭氏所到之处，都是良辰美景。

十二月一日写《流溪水库观鱼》：“红旗风漫卷，奇迹满神州”。又是“红旗”“奇迹”“神州”，他的词汇已用光。十二月二十二日作《题桂花轩》：“果然风景这边好，如此江山何处来？”（《诗词选》）玩弄文字游戏，粉饰苦难现实。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民族大死亡中，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了，要为处分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云云，却对眼下这场民族大悲剧不置一辞，似乎中国大地安然无事。郭依然走“歌颂”道路，他知道毛听不得真话和批评，便一路是假话和歌颂。

这些诗表现出，游山玩水的郭沫若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不仅极力逃避，而且积极美化。倘若说，鉴于毛强权专横之威，一个元帅都被牺牲掉，一个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为，保持沉默态度，那还可以理解。但是，象郭沫若这样丧失良知，极力美化苦难现实，不能不说品德有亏。这样的人，不是人民的诗人，而是权势的食客与吹鼓手。震惊！中国大陆大饥荒缺的不是粮食！

作者：剑中 自由圣火

1959~1962 年饿死 3775 万人的惨剧[1]，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俄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不缺粮：

自 1954 年至 1978 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 75 笔，协议金额为 100 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 180 万吨.....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2]

雷兹*于迈尔*马利列 60 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 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的缺粮危机。[3]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从 1954 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 90 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 100 亿），阿总人口才 200 万，平均每人达 4000 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 20 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 400 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 年，中国征购粮食 674 万吨，出口粮食高达 415.75 万吨。1960 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 510 万吨，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 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〇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〇年。"[6]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 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 年 4 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 1960 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 8 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 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据中共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 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 23.62 亿元。1964 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9]真是恬不知耻！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 3775 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

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主、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主、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工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儿、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饿殍遍野的年代，毛泽东等中共大佬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管理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

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 19 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是给屁民吃的！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惨无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和粮：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注释：

[1]《“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档案解密死亡原始数据 3755 万》，《争鸣》，2005.11。

[2]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2008.10。

[3]星星索《令人欲哭无泪的报导》，天益社区，2001.4.26。

[4]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1.1。

[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

[6][7]《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2。

[8]人民日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4.9。

[9]周恩来《196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12.31。

[10]徐宝凤《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华夏》，1998.11。

[11][12][13][14][15]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11。

[16]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

[17]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

[18]柴子文《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亚洲周刊（二十二卷 二十九期），2008.7.27。

曹树基：

“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 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 3250 万”；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16

-

大饥荒死亡率分布图 转引自：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

陈丕显前副委员长笔下的“三年大饥荒”按：陈丕显，“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自官方评价），在上世纪三年大饥荒之时，任华东

局书记处书记。本文摘自他的回忆录。 上世纪的三年大饥荒，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以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才是大饥荒的重灾区。而陈丕显先生本文中所描述的福建省，远不是重灾区。

1960 年 4 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 月 30 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 月 2 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

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

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出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道："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 800 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 800 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 月 4 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8000 人左右（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 1300 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慎 大饥荒 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

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 3812 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 万元）的 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 1246 万元，相当于五九、六〇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 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 29563 亩，社员自留地 24307 亩，房屋 123960 间，各种农具 3823837 件，现金 2699000 元等，每户平均 90.4 元，人平 24.77 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 172076 元，每户平均 106.8 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千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 年 9 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 25 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憨货，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 年 9 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 1959 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 20 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

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 5 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 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萝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 1964 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杨显惠：大饥荒时期的吃人惨剧 天津作家谈 47 年前的吃人惨剧

以下的全部文字是 2007 年 7 月 29 日〈潇湘晨报〉B07 版的文章照录。（摘自大陆论坛资料）

杨显惠，男，1946 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 90 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 100 多万， 河省死亡 400 万，安徽省死亡 380 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 年 7 月 26 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 / 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 10 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 50 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 1979 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 50 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 1965 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

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捡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两个人提了铁锨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儿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掘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

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渭源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 1250 万人口；死亡 100 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 400 万，安徽省死亡 380 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点评】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定西专区”是 1960 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 60 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毛泽东下令“万吨茅台香”饥荒年代的茅台跃进 作者：安子 本文的关键词是“酒”。说到酒，有人会想到夏桀商纣，“酒池肉林”是夏、商亡国的原因之一。到近现代，美国曾立宪禁酒，不过后来又取消了这一条宪法。俄罗斯目前总人口减少与男子平均寿命降低，据说与酗酒相关。因此，酒也是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也。

烟酒税收曾经是一些地方财政税收的大户头。以高税率来限制烟酒消费，仍然不得遏制，可见酒文化、烟文化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公款吃喝有多少花费在高档酒方面，没有见到统计，但陪官员喝酒把陪酒女士醉死的新闻却见到过几个。国宴官席少不了酒是没错的。笔者陪着吃了一餐公款酒席，4000 多元，烟、酒、鱼翅、饭菜各 1000 元，酒约略 1/4。以此计，每年 1000 亿公款酒的花费是有的啦。

以上是多余的话，本文在最近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一个大跃进期间茅台酒的旧闻新报，感觉到大饥荒年代居然为了毛泽东一句不经意的话，却百般努力地饥民口中夺粮大搞茅台酒跃进。其中寓言非常之深远。事实上别人的，评论性与情绪性话语是咱的，可别让我掠人之美，又陷人受过呀。

茅台酒有其得天独厚的地利：无法复制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酿制工艺，决定了茅台酒的独一无二的味道，也决定了其产量受到一定的限制。1957 年，茅台酒年产 283 吨，1958 年跃进

到 820 吨，1960 年跳跃到 912 吨，茅台酒也放了"卫星"。

茅台卫星源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当贵州省省委书记周林 1958 年陪毛泽东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时，毛对周说："你搞他一万吨。要保证质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奉了"圣旨"的周林回到贵州积极落实。时任县委书记的庞耀增亲自抓茅台酒厂。"万吨茅台香"，斗大字的标语上了茅台酒厂河对岸。

当年建工厂的卫星回想起来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矣。甘肃静宁县谎报 15 天内建了 1 万家工厂，而这县总人口不过是 25.7 万人。云南是每分钟办一个工厂，有的工厂的经费仅仅有人 民币 2 元。不过茅台酒可不敢忽悠了，茅台酒工人由几十人增加到七百多人，酿酒原料粮食也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调来。

1960 年，正是饥荒已经夺走许多人命的时节，2 月 20 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密电安顺、毕节、铜仁、黔东南、贵阳市分别调运高粱给茅台酒厂 5 万斤、25 万斤、16 万斤、5 万斤、5 万斤，共 56 万斤。

据仁怀县志记载，1959 年贵州省全省调拨茅台酒厂的粮食有：遵义 11 万斤、毕节 29 万斤、铜仁 10 万斤、黔东南 12 万斤、贵阳 7 万斤、湄潭 1 万斤、习水 10 万斤、务川 1 万斤、熄峰 1 万斤，仁怀 20 万斤，共计 117 万斤。

有年以 400 万斤大豆与四川交换了 400 万斤高粱，交给茅台酒厂酿酒。上述三笔粮食共 523 万斤，就以 500 万斤计罢。

笔者设想：假设饥饿者每人补充 125 斤粮食就可以不饿死的话，那么，500 万斤粮食可以保证少饿死 4 万人；以补充 250 斤活命 1 人的话，则可以多活 2 万人。

贵州省在以酒与农民争口粮的同时，也在谎报产量并导致高征购：1958 年报产 180 亿斤，实际 104 亿斤，征购粮高达 33 亿斤。1959 年贵州省产粮仅 84 亿斤，却被征购 40 亿斤。1960 年贵州省粮食产量下降到 63 亿斤，征购却高达 32 亿斤。贵州省大跃进年间饿死多少人？以相当于至少多饿死 2 万人~4 万人的代价，茅台酒厂多生产了 1000 多吨酒(产量上去了，质量可下降了哟；供高官与洋人哟)。谁知杯中酒，滴滴皆鲜血！谁知杯中酒，滴滴融白骨！哪是啥子茅台酒哟，明明是毛氏酒嘛。

这是不是专制制度的恶果？是不是独裁制度造的孽？

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

最新爆料：毛泽东的破毛巾被和他的女人们 作者：春秋冬月 2 毛泽东的那床补了又补的破毛巾被，中共一向把它大吹大擂成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榜样。

让我来揭开它的真面目。

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曾是上海市委锦江饭店(招待所)的保卫科长，专门从事接待中央来沪的高官，包括毛泽东和他的老婆们...

一次他无意中谈到毛泽东的被褥问题。"知道主席将来沪，我们准备了上等的丝棉新被褥...谁知道汪主任(东兴)一挥手，不用了，我们从北京有现成的带来..."

一看，破破烂烂的毛巾被，给我当 XXXX，都不行。汪主任神秘一笑，"主席喜欢这个，干净，安全..."

我才知道："原来是怕下毒!!"

当我听到这个轶闻，嘴都合不上了。

我说嘛，别说新丝面被子，毛泽东想穿金 玉衣都可以做到，为什么非要那床破毛巾被？咳！他老人家的革命警惕性高的不得了!!

只信任张玉凤和那床破被。。。。

江青和毛泽东

中共总书记李立三横死之谜：毛泽东下毒手 李立三（1899 年 11 月 18 日—1967 年 6 月 22 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

袖。

李立三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其中1922年安源大罢工中任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中李再次任罢工总指挥。从1927年起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他出任中央主要领导期间，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路线错误，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平反。

夫人李莎 (俄语: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Кишкина)，俄罗斯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李立三曾主张工会保护工人权利、工会独立，被毛泽东批判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仪式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奉献，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总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李的职务被解除，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李立三受批判后，刘少奇也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运动，对毛、刘、李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毛泽东来说，发起这场斗争既是当时党内政治形势的反映，也与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

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共产党既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也高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站在党的立场，毛高度警觉“工人至上”、工会独立的倾向，绝不允许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

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1排左起：周恩来、李立三、贺龙、陈毅。

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审讯李立三，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李立三夫人）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指李思慎）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指李思慎）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

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 1.63 米（与实际的 1.78 米相差了 15 公分），体重 56 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大饥荒 毛泽东的 17 道西式海鲜大餐 作者：2 可器

(以下部分数据摘自网络大侠“资料”的帖子，经 2 可器收集整理。致谢)

1959-1961 年，中华大地饿殍遍野，3000-4000 万国民直接或间接死于饥饿。但这些死去的人只是普通国民，从最高领袖到各地高官，不仅能吃够普通人民亟缺的粮食，还能享受海鲜、水果、名酒。真是“红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

下图显示，毛泽东一家在 1961 年 7 月的伙食费开支是 654.82 元；另有水果费 86.65 元。此时毛家只有三口人：毛、江青和江的姐姐，孩子在外地读书。

(以上资料来自：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所编《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轶事》，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ISBN：780108005X)

这是个什么水准呢？以下三组数据可做对比：

一、当时的国宾级接待标准仅 12 元/天，每月不过 360 元。

当年的“国宾接待开支标准的规定”里，当年国宾日常生活费标准定为每人每天 10 至 12 元，包括饮料、酒类、纸烟、水果、点心、糖果等。另外还规定，主席宴会每人每次 10 至 14 元；总理宴会每人每次 8 至 10 元；主席、总理酒会，每人每次则以 5 元左右掌握开支。

(以上资料来自：<http://msn.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115275202/>)

二、正处于大饥荒的 1961 年，普通百姓的年均口粮只有三百多斤。

城镇户口的职工口粮，从 1957 年的人均 392 斤，降到 1962 年的 368 斤，下降 6.1%，食油从 1957 年人均 10.3 斤，降到 1962 年的 4.9 斤，下降 52.4%；

全国农民人均口粮从 1957 年 407 斤下降到 1961 年的 307 斤，

(以上资料来自：http://book.cn/longbook/1093161985_dengnanxing/43.shtml)。

另据《在三年困难时期代理福建省长——伍洪祥回忆录选登》记载，1957 年福建省农村人均口粮 530 斤原粮，1959 年就下降到 366 斤，1960 年 337 斤，1961 年只有 316 斤。

三、毛一家伙食费开销相当于 46 个普通工人

1961 年 7 月，邓小平第一次到大庆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前线，看着忙碌的石油工人，他问得最多的是职工生活。

他十分关切地问：“现在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伙食费多少钱？”

康世恩回答：“过去一个工人平均一个月十三四块钱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 3 角 2 分钱，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生 活很紧。”

如此算来，毛一家的饮食费用相当于 46.7 个普通工人。

(以上资料来自：<http://www.oilnews.com.cn/bk/system/2007/10/16/001130007.shtml>)

四、毛家伙食费是如何开销的？

请看 1961 年 4 月的 17 道西式海鲜大餐：

五、三年饥荒，统治阶层喝掉了 2000 吨茅台

1959-1961 年茅台酒产量为 2079 吨。其中出口 139.86 吨，国内消耗 1939.14 吨。按茅台酒粮酒生产比例 5：1 计算，茅台酒厂用去原粮 10395 吨。（数据出自贵州 仁怀当地公开出版的史料）。

当时仁怀有 20 多万人，年人均口粮为 300 斤左右。有学者参照不同数据估算，仁怀在饥荒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不会低于 4 万人。

如果把茅台酒的用粮再换算一下，一万多吨的粮食，够仁怀县每人平均分得 50 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

（以上资料见：<http://blog.cat898.com/boke.asp?twokeqi.showtopic 66897.html>）

严家伟：大饥荒岁月里的悲惨故事 —— “反右” 轶事拾零 作者：严家伟

今秋为了看望阔别多年的“右派”难友，特别绕道去重庆拜会车玉生医师。车老今已年届九十，是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骨科主任医师，中国著名的骨科专家。1957 年被打成“右派”，送 415 劳教支队“劳教”，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15 年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劳改。是当时四监狱医院里顶尖的技术骨干。当时我也是四监狱的劳改政治犯。监狱当局见我年轻，又有点文化，就叫我在医院当一名“护士”。车老便成了我学医入门的启蒙老师，并跟随他一起作医务“临床”工作七、八年之久。因此，我们既有难友之情，又有师生之谊。

此前，我曾数次赴渝，他也两次来宜宾相会叙旧。但这次一别四年，车老明显地“垂垂老矣”了，心脏带着启搏器。上下楼都需人搀扶，再也不能像十年前那样陪着他去登临南山、黄山，瞻仰抗战遗址“复兴”“雄关”、中正故居，畅游南北温泉，令人不胜感慨。于是几天时间里，就只能陪着他促膝谈心。但车老仍思维敏捷，每天坚持记日记，写回忆录。可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那个小保姆，对此却有点持不同“政见”。她说“哎呀，车爷爷你好好休息嘛，一天到晚写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用啊”？我听了连忙说“你错了，小妹妹，这可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叫抢救历史，留下历史，拒绝遗忘。你车爷爷就是一本活的历史”。小保姆对我的话似懂非懂，一脸疑惑地望着我。车老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好像焕发出了青春活力似的，于是翻开他厚厚的回忆录，讲出了一段沉痛而震撼人心的往事……

王眉白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医学家，抗日战争时期，因躲避日军侵略，迁来重庆。在当时战火纷飞，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卡介苗的研制工作。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接种后可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由于这一疫苗是由两位法国学者卡迈尔与介兰发明的，为了纪念“发明者”，将这一预防疫苗命名为卡介苗。王眉白先生是中国制成卡介疫苗的奠基人之一。在当时抗结核药还极其昂贵稀缺的年代，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王眉白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作医学检验，是重庆市一医院的检验师。1957 年因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送 415 劳教支队劳教。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中，这位检验师，被饿得皮包骨头，全身浮肿。当时车玉生是 415 医院的医师。而王眉白先生是车的老朋友。他看见自己好友的儿子奄奄一息，却爱莫能助，只能给他注射点葡萄糖液，而当时葡萄糖也比黄金还宝贵，要院长批，所以形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王检验师临终前在病床上拉着车医师的手无限悲愤地说：“车叔叔，你有朝一日回重庆一定去问问我父母，他们究竟还认不认我这个儿子？为什么让我饿死，都不给我寄一点吃的东西来救救命……”说罢，在哽咽含恨中离开了人间。

车老流着眼泪送走了好友的儿子，把他的话也牢牢记在心中。当时 415 劳教支队，由于极缺医务人员，而像车玉生这样专家水平的人更是没有。于是他们便对车医师施点小恩小惠的“仁政”，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劳动力”的“积极性”（这是劳改队内部的专业术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笔者注）。他们给车医师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还给了他一张按“技术干部对待”的“空头支票”。不过比其他那些“右派劳教份子”不但可多得几个钱，每年还可“恩准”回重庆探亲一次。

那年车玉生回渝探亲，望着妻子、儿女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真是心如刀绞。但他仍然抽空去了王眉白夫妇家。车老是个直性子，几乎用责问的口气问老朋友夫妇“你们怎么一点东西都不给儿子寄去，等他饿死，你们当真是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吗？”王眉白夫妇一听，真如晴天霹雳，哭着答道“我们怎么没寄啊？我们每个月口中不吃肚中省地做成炒面粉，糖，油都用邮包寄了去，寄了还不放心，还去邮局复查……”。接着他们拿出一大叠邮寄包裹单，邮件复查单，上面赫然盖着邮章，明白无误地写着“对方单位已收妥”！真是天大的怪事！那么多次寄去的食品，难道都被狗吃了？！

还用问吗？不就是那些穿着“军干服”成天绷着脸教育“劳教分子”必须“改造反动世界观，重作新人”的劳改干部们干的“好事”吗？除了他们，还能有谁？他们真不愧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抓住了“生”的机会，却把“死”的后果留给了“阶级敌人”。真是做到了雷锋同志说的“对敌人，象严冬一样的冷酷”！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啊！

这位老科学家，王眉白老人当时就哭晕了过去。这位中国杰出的卡介苗专家，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不知挽救了多少孩子的生命，而他唯一的独生子，却被这几个猪狗不如的人渣谋害了性命！但这位老科学家，当时半个字也不敢向人提，否则，又是“诬蔑”、“恶攻”了。

刚才还在劝车老别再写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保姆，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显得一脸的惊诧莫名，她说“哎呀，真有这些事吗？好恐怖啊”！

没有被魔鬼抓去囚禁过的人，怎能体会得到魔窟内的恐怖？

隔了好一阵，车老才从回忆往事的伤痛中缓过气来。趁着小保姆出去买菜的时候，又向我讲了一个似乎属“女孩不宜”听的故事。叫人听后，啼笑皆非。

也是在那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岁月里，一天下午，住在 415 劳教队附近的一个贫下中农老大娘，怒气冲冲地跑来找着队上的劳改干部说“你们队上有个犯人，跑到我自留地里来偷我的菜，他要偷集体的我不管，他偷我自留地里的菜，那是我家救命的东西，我非

找他不行"。那农民大娘把劳教份子喊作"犯人"，好像不知"我党"的政策，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人家还有"公民权"呢。其次她说"偷集体的我不管"，偷我自留地里的那可不行，倒也心直口快。于是劳改干部就问她"是哪一个，叫啥名字"？她说"名字我叫不出来，但人我一看就认得出来"。

于是劳改干部就把所有收工回来的"犯人"（不，劳教份子）集合，排队站在一起，叫老大娘来认。老大娘左看看，右看看，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他，就是他"！

干部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叫人"给我捆起来，操蛋家伙，敢去偷东西，破坏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与革命群众的关系，反改造，反革命行为"！那人马上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但他却并不"认罪"，连声大叫"冤枉呀，冤枉呀！你说我偷菜，你把我偷的菜拿出来嘛"！道理也是如此。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总得有凭据呀。可那老太婆似乎胸有成竹，她说"我是没有抓住你偷的菜，但我亲眼看见你蹲在我自留地里，你在那里蹲着干啥"？那人忙说"大娘，我是在那里解小便"。老太婆一听哈哈大笑道："哪个男人解小便，会蹲在地下才能解，你哄老娘这辈子没见过男人呀"？此言一出，引得劳教人员哄堂大笑。更有几个无聊的"看客"起哄凑趣说："对，对，对，他是婆娘变的，不敢站着屙尿"！那人顿时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钻了进去。这时幸好车医师在场，他突然一下想起了什么，于是挺身而出，高声叫道："大家别吵，这人我给他看过病，检查过他的身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转身对劳教干部和老太婆说，"我们别在这坝子里说，一起到办公室去"。当时，大家都知道车医师是大城市来的名医。那时还没搞文革，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诛语，所以在生理、医学方面的事，干部都要相信车的话。于是一起去了办公室。

原来那人数年前，因患阴茎癌，作了"阴茎全切除"的手术，根本就没有男人的阴茎了。其外阴部酷似妇女外阴，他解小便不蹲下，岂不流得一身都是尿？他当时可能一时内急，遂忘了"瓜田莫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幸有车医师，否则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后经几个干部一查看都忍不住笑了。那老太婆也说："哎哟，活了几十年我才头回遇见这种怪事。错怪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车老讲至此，无限感慨地说："那些人不懂医，都无可厚非。但人家都残疾成这个样子了，还划什么右派，送什么劳教，还长期关在劳教队里强迫劳动改造。什么'革命人道主义'，是挂在口头上呢，还是丢进太平洋里去了"？车老 还说曾多次给干部反映说，这人应"保外就医"，可谁也不理。后来文革一到，车老都"升级"为"反革命"打入大牢，就更不知此人"后事如何"了。

这时小保姆摆上饭来，她说"你们刚才说得那么起劲，怎么我一来你们就不说了"？车老故作神秘地说："你小娃儿不能听"。小保姆故作生气的样子。我才连忙来"解围"，我知道小保姆爱唱歌，这几天我见她边做家务都在哼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套用了一句歌词说，我们讲的都是些伤心的事，"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把她也逗笑了。可这些"伤心的话"，明天哪说得完啊？

第二天，只好在依依不舍中和车老告别了。想着过去我们一道走过的岁月，更感到暮岁将至，来日无多，都黯然神伤。别前我给车老留下小诗一首，也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访友重来山城，
正橙黄桔绿秋将晚。
长江东去，嘉陵北流，
参差广厦万间。

往事堪悲，故人情重，
与我长作竟日谈。
更难忘，同游处——
复兴故关，陪都遗址，（注）
无不令人神往流连。

兴亡事，知多少？
已化作一片过眼云烟。
凭谁问：
当年英豪安在？
到而今，都付与
渔樵闲话，废垒残垣！

注：抗战期间重庆为中国陪都，抗日圣地。一时多少豪杰。重庆市郊有地名曰“浮屠关”。蒋中正委员长将此处更名为“复兴关”，以宣示我军民抗日必胜之决心。曾与车老同游于此，指点关山，无限感慨。

2008年12月20日完稿 父辈讲述：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一件事 爸爸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饱，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

好在奶奶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奶奶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奶奶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这一天里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谁偷的呢？

奶奶仔细回忆来过家里的人。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

姨妈家里也揭不开锅了，她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一个寡妇，哪里有能力救她呢？但奶奶看见妹妹实在是可怜，还是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了。

"难道亲妹妹居然干出这样可耻的事情来？"奶奶痛苦地想。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家里来过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妈再没有别的人。那么，这是唯一的事实。

当机立断，奶奶带着爸爸飞奔向粮站。奶奶对爸爸说："如果真是你姨妈偷走了粮食本，她一定会到粮站兑现粮食的。我们预先堵住粮站，找回粮食本就还有一线的希望。"

来到粮站，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看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瘦的孩子，听完他们的哭诉，立刻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工作人员答应他们，如果有人拿着写着爸爸的名字的粮食本来取粮食，他们立刻就把他扣下来。

奶奶没有说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妈。这个事实令她无比的羞辱。但是，这一事实很可能马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面前。

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一有消息便通知他们出来抓住小偷。

爸爸和奶奶呆在粮站的办公室里。整整呆了三个多小时。

对于奶奶来说，那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够找回粮食本，找回了粮食本，也就找回了儿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啊！以后，她怎样面对亲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发生了争执。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声音很大，屋子里听得非常清

晰。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果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

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儿。她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她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

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她们一个哭得比一个伤心。她们引来了旁边好多人的围观。反正脸面都已经撕破了，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索性大哭一场。

她们不知道该诅咒谁、该怨恨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生产队长吗？是县委书记吗？是省城的李井泉吗？还是那个在紫禁城的帷幕后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几年以后，在大学里念书的爸爸，经过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渐明白了妈妈和姨妈苦难的根源。读了一大批教授借给他的"禁书"之后，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后，他把答案告诉了我。

而在那时，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劝妈妈，更不敢去看姨妈。他一直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像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仅仅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最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缩影。

后来，找回粮食本的爸爸，总算在那场灾荒之中幸存下来。他没有辜负奶奶的厚望，考上了大学，成为村子里人人羡慕的孩子。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在饥荒中饿死了。

从此之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李井泉的发家史

"八一"枪声划长空，铁流奔涌过赣东。1927年8月10日，李井泉与420多名临川热血青年一道，离别故土，随起义军南下广东。部队进入广东，在大埔三河坝与敌军进行

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因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

李井泉在丰顺找到当地农民自卫军接上关系，先后担任中共东江特委机关文书、东江特委团委书记，干了将近三年。期间，M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1929年红四军主力还曾进军东江，帮助东江特委发展武装，造成了很大的革命影响。李井泉对红四军十分向往。

1930年春夏之交，党组织为李井泉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他接受了一次特殊任务：将东江特委密信送往红四军前委。当时，红四军正在从赣南寻乌向闽西长汀转移途中，李井泉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找到了部队。

那天，李井泉将密信送到了红四军前委书记M手上。M看过密件和介绍信，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位年轻人：中等身材，清瘦，五官匀称，两眼炯炯有神，给人感觉是精明强干。

M沉思片刻，对李井泉说：“你文化高，很适合部队政治工作，留下吧。希望你努力，把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就这样，李井泉被安排在红四军司令部政委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从那时起，他在M身边记录、登记、抄抄写写，后勤总务，样样都干。很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M等首长的影响和熏陶，思想进步很快，政治上日趋成熟，他立志跟M革命到底。

大半年过去了。1931年春的一天，M与李井泉长谈过一次，希望李井泉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加强锻炼，增长才干。于是，他奉命去担任一支由赣南地方武装改编不久的地方红军部队——红三十五军（先后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红二十一军）的政治委员。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与邓毅刚、刘铁超、刘畴西等一道，率领这支部队协同主力红军，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为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立下战功。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于1933年春荣调到主力红军部队，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并拟选送到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校”）干部队培训。

1933年初夏，风云突变。在前线的李井泉得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中革军委接受“谈话”。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M受排挤，属“毛派”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相继被排斥。由于李井泉在M身边工作过一段，与邓、毛、谢、古都有接触，因而此时被传询就不足为怪了。

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弼廷与李井泉谈话，严厉批评他是右倾，要他交待自己的“右倾错误”，要他揭露邓、毛、谢、古等人。可他什么也没交待出来。

谈话后的一天，李井泉被指定参加李弼廷召开的一次会。会上，他与肖劲光、余泽鸿等被指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他坦然地承认自己拥护M的正确主张，也不否认与邓、毛、谢、古的联系，但始终认为没有什么错误。

那次会后，对李井泉宣布了三条：一是通报批评，二是取消其上“红校”深造的资格；三是从主力红军下派到地方武装带新兵。这既是党内处分，也算是惩罚。李井泉以大局为重，服从分配到第一补充师任政治委员去了。

西南王李井泉和没咽气就送进焚尸炉的儿子

今天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其中有一小标题是「大饥荒」，这一段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这使我想起「父债子还」的古训在这个家庭的具体体现。

李井泉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不清楚，但三年大饥荒他背的血债可不是一千两千人的问题，而是八百万人的性命。

九评之七写道：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

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祸首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八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开放杂志2005年九月刊有蔡咏梅的一篇回忆录《李井泉害死无数四川人》，文章说，李井泉废掉省粮票四川人恨之入骨。现在年青一代根本不知道粮票一说，那时每个城市有自己印制的粮票，不能通用，而省级粮票才可以通用。那时每个月发的粮票比金子还贵重。

蔡咏梅写道：1960年8月23日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会忘记。大饥荒已很严重，许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父亲从荣昌县回来时一身肿得发亮。大家开始吃一种叫「康麸散」的麦麸代粮，还以炒盐当菜，养小球藻补充营养。大街上抢食的天天都有，我亲眼见抢食的被人拳打脚踢也要先把抢来的半个馒头狼吞虎咽下去。一个我认识的中学俄文教师为了吃饱饭，辞了教职，到街头卖烤红薯。邻居有一家母子分了灶，儿子在自己面粉盆做记号防母亲偷吃……千奇百怪的事都出现了，人的存在意义已完全返祖到最原始的本能：活命。

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时候，这一天清晨饥肠辘辘的人们醒来，骇然听说四川省当局宣布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远在白江的母亲气得跺脚，欲哭无泪。要知她身上已变成废纸的十多斤省粮票是她饿着肚子一口口省下来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儿女的！

回忆录继续写道：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饥饿中的人赶向了绝路。李井泉最恶劣的是，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不但非常卖力，还学毛泽东搞引蛇出洞整人。李井泉开了庐山会议回四川后召开省委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将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决议告诉与会干部，而是把彭德怀的万言书交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让大家发言表态，结果许多干部中招，说他们与彭德怀的看法一致，也认为大跃进政策失误。待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李井泉才铁青着脸将中央决议抛出来，在会上当场就有发了言的干部吓昏过去。

结果发言支持彭德怀的干部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全国反右倾运动中，四川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干部也最多。因此四川人对西南王李井泉恨之入骨。

几年以后的1967年6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触及到各层领导干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这对李井泉的嘲讽实在是太大了，他饿死自己管辖的老百姓，共产党要饿死他的孩子。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

李井泉后来复职任人大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事情，听完之后他默默的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当晚痛苦到没有出来吃饭。四川人说，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痛苦到极点，而大饥荒时，他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他怎么毫不动心？

历史上有很多祖辈不干好事，给儿女带来灾难，由儿孙去偿还的惨烈故事，只不过人不但不去检讨忏悔自己都干了什么，反而埋怨老天爷不公平。

李井泉早已过世，现在那些不干好事的人是否考虑悬崖勒马，给自己的子孙留一条后路？

1951年的李井泉_文革漫画：打倒李井泉！

当年的领导同志是这样说三年大饥荒的——（以下引文均来自公开发表的文章）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笏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难免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上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上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周恩来：（一九六二年）

由于连续三年灾荒，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我们减少了粮食的征购数量。一九六一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大家知道，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现在进口粮食，虽然一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地努力加以改变。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

一九五七年时，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去年是二千九百亿斤，今年不晓得能不能搞到三千亿斤。

陈云：（一九六二年）

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农业上的困难是大还是小？有不同的估计。近来听到一些同志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二亿亩，菜地扩大了五千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一亿五千万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一亿亩。

李先念：（一九六一年）

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李富春：（一九六一年）

去年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粮食，一九五二年三千二百七十八亿斤，一九六零年二千八百七十亿斤），而一九六零年的全国人口则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今年粮食的总产量不会比去年增加多少。在明年秋收以前，吃穿问题仍然很紧。

全国农业劳动力，一九五七年为一亿九千三百万人，一九六零年曾经减少为一亿七千万人。一九六一年以来，由于缩短了工业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缩小了文教事业的规模，动员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一九六二年底，农业劳动力已经增加到二亿一千万人左右，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最后，再来学习老人家在大跃进时期的最高指示：

一九五八年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一九五九年

“一个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啊，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九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

“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XXX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XX建议，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

一九六一年

“这几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份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一九六零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

“这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作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

“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杨奎松 运动的结束及影响

毛泽东给各地规定打“虎”数目，各地又是如何具体消化分解的呢？这里可以华东区的报告来一窥究竟。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华东局也是一次次提高打“虎”数字，2月8日最终确定不含军队、学校、工商界和区乡一级，要打“大老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华东局创造了这一各大行政区“最高数字”，即分派任务给各省市地区。具体分派指标如下：“山东四千三百只（内大虎八百只，中小虎三千五百只）；浙江三千七百只（内大虎七百只，中小虎三千只）；苏南三千一百只（内大虎六百只，中小虎二千五百只）；安徽三千二百只（内大虎五百只，中小虎二千七百只）；苏北二千七百只（内大虎四百只，中小虎二千三百只）；福建二千一百只（内大虎三百只，中小虎一千八百只）；上海三千五百五十只（内大虎七百五十只，中小虎二千八百只）；南京七百五十只（内大虎一百五十只，中小虎六百只）；华东直属机关一千六百只（内大虎八百只，中小虎八百只）。”[91]毫无疑问，具体到各个省市地区，自然也是一样将自己得到的打“虎”数字进一步向下分派，最后分摊到具体单位或部门的头上。

至于每一个领受到具体数字的单位或部门，其完成任务的办法也是大同小异。即是首先“采

取经费站队（用了多少钱？用在哪些方面？），经手人站队，关系人站队及有关私营厂商站队（跟那些厂商有过多少交易？），再联系其他因素（去查本人出身、社会关系、生活收支情况、平素表现、是否兼营工商业等），加以对照分析”，查“虎迹”，找“虎窝”。一有线索后即专人专案，或交专门的打“虎”队，包查包打，开始全面内查外调，包括检查账面、单据、进货、质量、仓库存货等。同时对嫌疑人“实行隔离、封锁，切断其一切内外联系”，并“采取大会压、小会挤、内外追、个别谈、领导开导、家属劝说、反复对证等方法，使‘老虎’无喘息、通气、招架之余地。”[92]很显然，由于不少部门和单位，有贪污行为者达半数以上，中共中央专门下令解除占整个贪污分子 90% 以上的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将那些贪污在 50 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又能彻底坦白，保证不再重犯者，一律不按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使其轻装上阵，参加打“虎”，对运动帮助极大。[93]因为，出于感恩戴德或戴罪立功的想法，这一部分人多半都能够在打“虎”战役中充当积极分子的角色。

但是，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 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一些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大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94]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其实，打“虎”斗争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一些部队和地方在搞“逼”、“供”、“信”了。他为此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95]打“虎”进入高潮后，各地也先后提出过“防止单纯逼供不择手段”的问题，甚至提出过“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主张，对此毛泽东也表赞成。[96]但实际上，不要说对非“老虎”者，就是对诸多算得上“老虎”之人，要在那样一种压力之下，又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要想不利用“逼”、“供”、“信”的办法来达成目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注意到这种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此的态度也多少留有余地，即“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任务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结果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是没有贪污的党员，也说贪污过几百万，以示党员“示范作用”。有的团对怀疑对象打、骂、捆、冻，指数问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并上肉刑伺候，两天就搞出贪污 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 20 多人。[97]如察哈尔省天镇县以区为单位，为找嫌疑，打“老虎”，把干部集中在一个院里吃饭睡觉，紧闭大门，一律不许出入。街上还布置了警卫队，一碰上区干部便端枪逼问，严禁信件往来、打电话和会客。又如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 17 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活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八十人统计，戴蓝条的仅二十五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五十五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指头、扭耳）；（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98]

虽然一般情况下“逼”、“供”、“信”问题中央比大区好些，大区比省好些，省比地、市好些，地、市又比县好些，但上级单位其实也一样存在“逼”、“供”、“信”，不过程度不同

而已。如华南财委各机关就同样存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现象。据报，“由于老虎顽固不化，拒不坦白或再三反供，群众激愤，对贪污分子施以打骂。如物管局斗争走私老虎方兆辉时，竟至打伤其面部，领导阻止不了。有色局平时常罚老虎跪地，在斗争顽固到底之黄敬文时，个别群众把他绑起。商检局斗争破坏商检政策之简建贤时，要他跪凳跪木条，手上还要举木凳。” [99]

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等到运动转向定案和结束时，则大批“老虎”翻供，很多材料无法核实。比较典型者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打“虎”高潮时，因打“虎”队手法简单急躁，依靠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以致自杀者即有 9 人，“其中上吊者五人，刀割者三人，跳楼一人，已死者三人，未死者六人。” [100]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使用“逼”、“供”、“信”办法，仅在 3 月 13 日至 23 日 10 天的时间里，就造成 60 人自杀。 [101]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 58 人自杀。 [102]淮北盐特区“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九五五人，遭受肉刑者即有二一八人，肉刑和逼供信花样多至一二五种，残酷程度骇人听闻，不少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被打伤致死者二人，自杀五人，共死七人（其中被株连而死的群众五人），自杀未遂者十三人，打伤甚至终身残废者十九人。” [103]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市的“三反”打“虎”战役，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一百七十二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 54 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 50 人自杀未遂，还有 26 人被打致残。“在这一百零四起案件中，大多数既无贪污又无政治问题，而工人及其家属和警卫人员则达六十六名。” [104]

由此不难了解，打“虎”战役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的情况。

上述淮北盐特区总共 955 人，打出大小“老虎” 282 只，被施以肉刑逼供者就有 218 人。经复查，282 只“老虎”均不能成立，一部分根本就没有贪污问题。 [105]

乌鲁木齐公安局打“虎”中由于使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一些没有贪污的打成了贪污分子，把有的小贪污打成了大贪污。事后对其中 43 件案件加以甄别，结果全部不能成立，12 名被打错，31 名被打冒。 [106]

陕西省军区“三反”复审定案时发现，“全军区原共打虎 1231 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 14 只。第一次甄别定案，（只能）定虎 276 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 3 只。经过复审以后，现肯定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上的 227 只，一亿元以上 2 人。原打为虎，现下降千万元以下 500 万元以上者 205 人；降至 500 万元以下 100 万元以上者 535 人；降至 100 万元以下者 213 人；确定查明无贪污者 24 人。”另外像“安康军区原打虎 112 只，第一次定虎 33 只。经复查后，真正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只有 11 人，占原虎数的 11%。” [107]

苏南地委因为打“虎”战役中普遍发生逼供现象，不少“老虎”打冒，甚至打假了。最后发现“原反出来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老虎’有 5471 人，经定案后，结案的占 16.4%；销案的占 76.2%”。 [108]

据安子文就结束“三反”所做的报告中说：“‘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为二十九万二千多人，现在剩下十五万五千多人，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东

北区老虎下降最少，约百分之三十一，华东区下降比例最大，为百分之八十三。”“由于追算时间过长，折算标准不统一，折价过高而成为老虎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三，小贪污打过头而成为老虎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七。由于对贪污界限不清，把公私不分、失职、浪费和有政治问题的人算成老虎的，约占百分之十五。根本没有贪污，完全打错了的约占百分之五（河北最高，占百分之十点五四）”。[109]

其实，安子文报告的时间是1952年10月18日，其当时所得上报材料既不包括10月以后各地复审的资料，如上述淮北盐特区和乌鲁木齐公安局100%打错的数据，更不包括当年被各级领导强制压下，未能查出冤情和解除罪名的种种情况。最明显者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注明者，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朱由芹，当年受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1980年才得以复查平反，恢复级别和待遇。[110]查原西康省地区这时被冤打定罪者，不少人也是存活到1982—1986年间，才得以向四川省法院申诉并获平反。[111]全国类似的情况尚不知有多少。

当年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压制甄别和平反工作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这里仍以上述被发现的青岛市的问题为例，即可有所了解。由于青岛市前市委书记被当作“老虎”打倒，新市委领导与旧市委领导下属之间存在矛盾，故“三反”运动中青岛市委对打“虎”战役十分投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而运动结束后自然也就被受压一方告到中央。不得已，青岛市委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复查工作，承认在运动中完全打错了的，有129人之多。然而，因为此一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中央与山东省联合派出调查组赴青岛调查。结果，虽然只调查了几个部门，就证实青岛市委的复查结果完全不可信。据查，仅纺管分局一个部门被打错者即有470人，比青岛市委自报全市被打错人数就超出3倍以上。如果再加上已调查的港务局打错的54人，四方机厂打错的34人，连同青岛纺管分局，这三个单位被打错的人数就达到612人。而已知青岛国棉六、七、八厂3个厂还有184人被打错，两项加起来被打错者就已经达到将近800人之多了。仅由上述6个单位的数字简单推算一下，就可以确信，青岛市在“三反”中被冤打成贪污分子的，恐怕不下数千人。[112]

实际上，还在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已经多少开始意识到打“虎”运动的一些偏差了。2月29日，毛泽东特别批转了东北贸易部关于打“虎”要严格规定纪律，禁止打人和变相打人的经验。[113]3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批转肖华关于军委直属部队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的打“虎”经验，要求各部仿行。[114]可知此时各地各单位用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办法来打“虎”已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非出面阻止不可了。

3月6日，毛泽东明令批准发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第一次对贪污问题提出了统一的政策性标准。其规定明确指出：“凡贪污未满一百万元者，只要其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凡贪污超过一百万元，未满一千元之贪污分子，只要其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予刑事处分……如系年岁较轻或偶一失足而能自动坦白者，或系发觉后积极参加三反工作并业已立功自赎者，得免以贪污分子论处，不予行政处分”。“凡贪污超过一千元，未满一亿元之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赃和检举立功等情况，分别给以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而只予行政处分”。“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真诚悔过，退出赃物，在反贪污斗争中检举立功者，亦可免于刑事处分，改给以适当的行政处分。”而计算贪污违法

时间，则“一般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算起……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解放的地方，应自解放之日算起。惟起义部队一律自该部队建立革命政治工作制度之日算起。” [115]

紧接着，毛泽东亦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其中具体规定了贪污和惩处的标准。对贪污罪的定性为：“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赃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 惩处标准则以 1 亿元，5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为界线，贪污数额 1 亿元以上者，可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处死刑；5000 万元以上不满 1 亿元者，判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1000 万元以上不满 5000 万元者，判处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 年至 4 年劳役，或 1 年至 2 年的管制。不满 1000 万元者，可根据情况判处 1 年徒刑、劳役或管制，亦可免于刑事处分，给予开除、撤职、降职、降级、记过或警告等行政处分。凡有危害国家、社会或人民生命安全、或出卖坐探国家经济情报、敲诈勒索、组织集体贪污、拒不坦白或掩饰罪行之情况，得从重处罚；凡主动或彻底坦白、检举他人或年岁较轻者，可从轻处罚。 [116]

尽管《条例》的规定形式上仍旧相当严厉，实际上，只要注意到毛泽东在指导起草上述规定和条例过程中，再三强调“要宽一点”，不要太严， [117] 就不难看出，毛这时其实已经从最初扬言非枪毙几万贪污分子不能解决问题的激愤中平静了下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开始同意对打“虎”运动可能出现的“假老虎和不够标准的老虎”做甄别工作，而且对随后的追赃工作和定案工作，也再三做出指示，强调：“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者暂不处理”。“对赃款凡有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不得硬追本来追不出的部分。” [118]

除了对“三反”的种种作法做出政策性的修正和约束以外，毛泽东还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其此前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态度。比如，他不仅开始公开批评因“三反”而一浪高过一浪的广泛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法， [119] 而且明确提出，无论是贪污分子，还是资产阶级分子，最严重最恶劣的只是极少数，因而号召一切“洗了手的工作人员和工商业者也和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 [120] 他甚至表示：“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 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而对那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我们并不要求他们马上改变自己的成份和事业，同时也欢迎他们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 [121]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其内心对资产阶级高度戒备的心理。其在“三反”运动结束前明确主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普遍交待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就是一个证明。 [122]

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及其打“虎”战役，至 1952 年 3—4 月间先后结束，定案和追赃工作持续时间较长，但至 6—7 月间多数地方和单位也渐告一段落。据 6 月初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华北、华东、东北、西南和西北五个行政区（军队和中央机关除外）“三反”运动结果的统计报告，即参加运动 312. 2437 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可以定为贪污分子者 122. 6984 万人，占参加运动人数 39% 强，其中党员 20. 2683 人，占贪污分子总数 16. 5 %。 [123] 加上中央机关等还有 70 余万人参加运动，被认定有贪污行为和可以定为贪污分子者亦在 30% 以上，可知被认定有贪污行为和可以定为贪污分子的人数应在 150 万人左右。

经过部分甄别，至 10 月初，这一数字就已经大为缩水。安子文在 10 月 18 日报告称：“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三百八十三万六千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其中共产党员十九万六千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贪污一千元以上的十万五千九百一十六人，占贪污总人数百分之八点八。”这里，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者少了将近 30 万人。另外，上述人中，总计判刑 38402 人，其中处以死刑者 42 人，死刑缓期执行者 9 人，无期徒刑者 67 人，有期徒刑 9942 人，劳动改造 11 165 人，机关管制 17175 人。[124]

但是，无论最后定案人数如何缩水和在打“虎”战役中发生了怎样严重的扩大化的情况，中共进城以后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依旧是极其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的。类似刘青山、张子善[125]那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利用职位和权力，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情况，人数已经越来越多，一般罚刑都难以起到威慑的作用。特别是县以下的基层干部，相当多数因为权力不受监督和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一些地方民众认为“看不出他们和国民党作风有什么区别？”咒骂他们“比国民党还厉害”。[126]罗瑞卿所谓“国民党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应有尽有”，毛泽东所谓“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并非危言耸听。[127]1952 年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在 1953 年不得不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三反”运动，同样也是逼不得已之举。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52 年“三反”运动的发动，毫无疑问有其遏止共产党逐渐国民党化的发展趋势的意义所在。“三反”运动之后，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地较前减少了。然而，这并不等于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会因此而得以解决。“三反”运动过去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度普遍发生贪污事件和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128]以后更是几度再次大规模地进行反贪污斗争。[129]这足以说明，“三反”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事实上，真正使此后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再像建国初期那样恶性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三反”运动本身具有多么久的持续效力，而是因为中国很快就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市场经济，包括一切可以被联想到“奢侈”二字的生产和服务行业，确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正是这些制度和政策强制性地地在权力和金钱之间设置了障碍，使党政工作人员大笔贪污公款和进行奢侈性消费的难度大大增加。然而，一旦市场经济重新启动，国门大开，而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却毫无改变时，权力寻租、权钱勾结乃至权力腐败的现象就会卷土重来，并且会随着开放程度以及整个经济规模的日渐扩大愈演愈烈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绝对权力”还是会“绝对腐败”。

归根到底，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机无可指摘，其效果却利弊可见。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的问题，只有在成熟的法制体制内，使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并且只有在公民对行使权力的人员以及行使权力的过程能够保持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被减少和遏制。

毛主席说：“日本人实在好！”作者：樊桂 毛主席说：“日本人实在好！”

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1 年 6 月 1 日发行的《毛主席会见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下称《纪要》）原件，大喜过望。它应该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及毛泽东本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将有助于我们澄清对中国革

命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误读与曲解。我花两块钱买下，大大超值！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从《纪要》中我们能看出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我的感觉是，参加革命后，他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权，直到他生命终结。

首先，为夺权，死多少人他都不管，只要他能赢。

中国民众被杀，对他夺权有利，他就大声叫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在《纪要》中看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原因。

当他与斯诺谈到，在以保安为根据地，只有两万多兵时，他感叹：“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后来日本人又来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在《纪要》中显示，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显然他对他的这个观点颇为得意。日本人侵略中国让多少中国人血流成河，多少人流离失所。据估计，直接死于抗战的中国人就有2千万人。当今天的爱国者们还为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人不依不饶的时候，谁能想到在那中国人遍野尸骨、火影血光背后有这样一幅血脉扩张、露着得意而狰狞狂喜的面孔，连最起码的恻隐之心都没有！

除了感谢日本人之外，他还感谢蒋介石说：“后头还是蒋介石帮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可是我们知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杀人，是要杀绝共党。而毛泽东却为自己的同党被杀叫好，这是怎样一种冷血与无情！曾有朋友批评我，说我等平凡人根本无法理解伟大领袖的超常思维。是的，我理解不了，也许因为我的心是肉长的。大概只有那些“纵做鬼，也幸福”、甘心情愿地做领袖炮灰的人才能真切地、衷心地理解他们的伟人。

《纪要》中还有这样表现毛泽东对民众生命冷血的证据。如，为了让造反派帮他夺权，他支持武斗。原来我一直听人说，毛主席不主张搞武斗。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的原话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高兴的是武斗了不承认，讲假话，以及虐待俘虏。而用矛、枪、炮真的武斗，他家老人家看着这出戏是满心欢喜的。他才不管有多少革命小将和无辜民众为此失去生命。他唯一关心的是——权在谁手上。

其次，对妨碍他夺权或对他既得权力构成威胁者，他格杀无论。

当斯诺问到：“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回答：“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还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这里，想请我的朋友们注意，毛说北京市委的权他管不了，他要的就是权力在他个人手上才算数。很显然，他追逐的是满足个人对权力的占有欲，以实现将其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强加于中国大众，以满足其实现个人理想所获得的快感。为了这种快感，他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只要认为有人挡他的道，他就会让拦路者死。为了这种快感，为了扫清道路，他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所以，他夺权完全是满足其个人私欲，并不是我们原先认为他是为了劳苦大众，大公无私。之前，他一言九鼎，北京市委都是乖乖听话的，现在对他不理睬了，他极度失落。他认为权力已旁落，他必须绝对地控制局面。要能绝对控制，就必须夺回最高权力。是刘少奇这样的当权派破坏了他的快感，阻止他实现乌托邦。刘少奇这样的拦路虎必须清除掉，最好的借口说是指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局如何大家都清楚，刘少奇死得惨啊！

从毛前面所说的话，我们还可以顺便澄清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毛主席不赞成搞个人崇拜。

我们再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北京市委的权，他管不了了，那个时候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继续对斯诺说：“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很显然，是毛需要崇拜，正是他刻意要搞个人崇拜。毛搞个人崇拜其实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从延安整风时始，也有学者认为毛从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搞个人崇拜。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目前中国人都熟悉的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看，彭德怀仅因为不满大跃进，让毛难堪一回，便被整肃得毫无还手之力。见到这样功高盖世的人都被修理成这样，全党从此噤若寒蝉，都知道毛心狠手辣，从此再也听不到与毛不同的意见。毛利用恐怖气氛树立了威信。有识时务者开始明白，吹捧毛是最安全的，而且还可以获得政治实惠。于是崇拜毛主席逐步推向高潮，直到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口号出现。

而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要掀起个人崇拜运动呢？很容易就能想明白，他要通过崇拜者来向自己的政治对手显示自己的力量，向他们示威，为他的夺权行动造势。所以，在 1966 年 8 月到 11 月间他八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超过 1000 万。他的目的就是暗示他的政治对手——就有这么多人狂热追随我，你们不要动我，只要动我一根毫毛，你们就会被这些发疯了的人浪所吞没，将会死无葬身之地。看着这场面，那些对毛主席不满的人，哪个不胆战心惊，唯有跟着高喊“毛主席万岁”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后来由于刘少奇已于 1968 年在开封被整死，所以，毛觉得暂时安全了。于是他认为个人崇拜要降温了。然而也只是降温而已，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个人崇拜以威慑那些潜在的政治对手，现在先把刀收一下，在将来用得着的时候还要拿出来。

况且，毛泽东其实很享受个人崇拜所给他带来的幸福。所以他批评斯诺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很享受个人崇拜，而且还要把它变为他的夺权工具。说他不赞成搞个人崇拜并不符合史实。

《纪要》还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及揭示尼克松访华之前的一些密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找这份《纪要》来看看。当年此文件印了四万份，存世也应不少，要看到大概不会很困难。毛泽东最后对斯诺说：“我对你不讲假话”；《纪要》红色的主标题下注明：已经主席审阅。我相信毛泽东在这里不说假话，所以，我相信在《纪要》中，毛泽东是真实的毛泽东。

*

读着这份史料，我有四个强烈的感受：

第一，当最高权力不能公开透明的竞争使其和平更迭，而是以暗斗的方式夺权，过程往往很暴力、很血腥，结局很惨烈。

不论是彭德怀还是刘少奇，都没机会向全国公众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或辩解，以便公平地接受公众的质询和选择。毛泽东一声令下，他们或是被打入冷宫，或是丢了性命。这种夺权的方式承袭着中国宫廷斗争模式，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夺权内斗大都伴随着兄弟、母子自相残杀，民众跟着受连累。这种斗争的技术要求是一招制敌，绝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稍存慈心，便反而让自己身首异处。毛泽东运用这一技术时，手法娴熟，所以他暂时赢了，但全中国人跟着他遭殃。

第二，高度集权，权力就会失控。

用无法无天来形容毛泽东是再恰当不过。建国后他一手遮天，谁也管不。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家权力和暴力机器成为其个人私有物，他想拿来整谁就整谁。在《纪要》中，我甚至见到宪法的修改也是先由毛来定调。他一句话、一挥手，全中国都被他搅如痴如狂，也

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然而，因为他是至尊，所以中国人不用他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任何责任，其所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无法挽回的重大摧残后果，却由几代中国人来承受。不改变这种状况，高度集权仍将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乱源。要彻底改变，唯有对权力进行横向分立，让它们相互制衡才能解决。

第三，当“个人崇拜”只有崇拜的权利，而不许有反对的自由时，个人崇拜很容易被权力挟持。

毛时代，人们只能向主席表忠心，不能有半点不敬，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人是真心崇拜毛泽东，他们主动维护毛的权威，对他们认为反对毛的人大打出手。毛泽东却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将这种崇拜挟持为自己夺权的资本和工具。当这种崇拜没有利用价值或是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甚至打击。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头头们被抓进牢里蹲 100 多天就是明证。

第四，当思想被极度专制时，生命就会被极度冷漠。

读着这份《纪要》时，对我造成最强烈的刺激是，毛泽东这个人太冷血了！我的这篇文章也会给朋友们这样强烈的印象。但当我回顾建国后的历史时，却发现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许不能把建国后所有罪过都归罪于毛泽东，有很多东西助纣为虐。对于这些罪过，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有人归罪于中国人整体冷漠和对毛泽东的奴性。

的确，不论是三反、五反、镇反还是反右，都有大量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互斗中死去，不但没人对此忏悔，甚至有人认为这些人活该死。还有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几千万生命，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觉得痛心疾首。不但毛泽东，中国人整体都对生命极度冷漠。所以，有人说，是中国人整体冷漠造成中国人大量非正常死亡到处蔓延，而无法控制。

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还是没有人能醒悟过来？毛泽东为什么能在执政过程中造成这么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却仍身居高位，直到还能让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把毛泽东神化，极力崇拜、吹捧、纵容，他能翻这么大的浪吗？所以，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毛泽东奴性，促成毛泽东对中国人造成大面积伤害。

我认为，不能否认上述两种因素造成对中国人大面积伤害，但不能如此简单归罪。当时的中国人，只要他敢说他不崇拜毛泽东，他很快连命都没有。即使在今天，面临这样境地，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以卵击石，何况那时的专制是如此严密。设身处地，我们应该理解当时人们的一些作为。

也有人将这一切伤害归罪于马列主义，是这个鼓吹暴力专政的理论，让中国人对生命漠视，充满暴力。

的确，那些被打倒的人都被认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或坏分子。如果没有马列主义这面旗帜，毛泽东不可能舞动中国人。

但能怪马列主义有错吗？不能！因为思想无罪。

我们知道，建国后，除了毛泽东和马列的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之外，其余思潮的作品一律对广大公众禁止。中国人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乌托邦理想。每天讲的、见的都只是马列毛，所以只能相信马列毛。加上不服从马列毛将被暴力镇压，甚至生命都要被消灭，中国人想不从都难，中国人从此被劫持，被强制信仰马列毛，从此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马克思主义流传于全世界，那些允许各种乌托邦理想自由生存的自由民主国家并没有受到马列主义的毒害。所以，不是马列主义的问题。

归根结底，罪在中国人的思想被极度专制。在这种极度专制之下，马列毛主义成为唯一被允许信仰的宗教，异教者被无情打击和镇压，不服从者将无法生存。从此中国人不再思想，只要能生存就行，结果造就了群体无意识，中国人成了别人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低等动物。

当思想停滞、枯竭到只知道盲从时，人就只剩下兽性！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冷血地纵容、

追随毛泽东作恶的原因。生命就这样被极度冷漠的！

这里，我需要作一个说明，我虽然归罪于专制体制，但不否认中国人应对建国后因政治内斗失去的生命忏悔。不能把责任推给专制体制，中国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必反省。毛泽东和马列主义能上台，是有很多人主动推动的，并不完全被劫持，之前中国人还是有其他选择的。可以说，毛和马列是中国人自己选的，中国人必须承担自己的所选择的道路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在建国后各种运动中积极主动去残害他人生命的人，更应该忏悔和道歉，没有你们的疯狂，中国不会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尽管你们有不忏悔的自由，但我仍认为应该忏悔。这种忏悔将是中国人从兽性向人性的回归，也将一条 使中国人更少暴力，由恶重归于善的和谐之路。

最近这几天，我们还看到华东政法大学的新女红卫兵告自己的老师是“反革命”。毛泽东和文革就在我们身边，没有离我们远去。中国人还要背负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多久？

所以，让大家了解历史真相，反思历史，以避免重复历史错误，就是本文的宗旨。

樊桂-----2008 年 12 月 8 日

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百度百科）：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其他所有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消息）。
-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 年 8 月 23 日，两名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 130 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 Christian 竟然还爱上劫匪 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陈奎德：问责：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毛泽东：应否与希、斯并列？

中国在 1958——1962 年发生的大饥荒，其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海内外众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别是最近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墓碑》发表后，各方估算的差距正在缩小。其上限是四千万，下限是三千万，大体上已获得基本共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并非源于自然灾害或前苏联逼债，也为各界所承认。但是，对于这起惨绝人寰的灾祸，毛泽东个人应当承担多大责任，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注意到，海内外有部分学者，仍不愿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譬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历史教授 Maurice Meisner，（马

思乐) 就认为:

“……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屠杀犯, 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 不管多么恐怖可怕, 与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 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1)

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 需要分别澄清:

第一, 对政治人物而言, “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孰轻孰重?

第二, 毛泽东是否没有实施“故意制造的屠杀”?

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

第一点, 对政治人物的评判, 由于其行为关乎公众的利益乃至生命, 故有其更严的特殊的伦理标准, 上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士几乎对此不抱异议。这通常是指马克斯·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其精髓在于, 掌握政治权力者除了承担一般的公民义务之外, 还需承担更多的由权力引出的责任, 且这种责任与权力的递增成正比: 权力越大, 责任越重。

简言之, 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准则, 首要是“责任伦理”。

与之对照, 传统的“意图伦理”(亦译信念伦理, ethic of conviction), 则强调个体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信念及其意图, 强调只要动机是美好的, 意图是正确的, 目标是正义的, 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并且, 拒绝对后果负责。

对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毛泽东, 马思乐据以(减轻或)豁免其罪行的伦理准则, 基本上属于“意图伦理”。我必须说, 这是“伦理标准的误置”。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 必须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行动, 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 至于其主观意图, 则是第二位的。试想, 在毛的那个变幻莫测的头脑里的意图究竟是 A 还是 B, 对于因他的政策而饿死的三千多万中国民众, 难道有什么区别

只有毛的政策是相关因素, 其意图则是非相关因素(irrelevant)。

无意后果还是蓄意屠杀？

第二，让我们姑且退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旁观者（非饿死者）的伦理直觉中，“故意制造的大屠杀”与“偶然失手未曾预料的”政策后果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在道德上有所差别，我们仍然要追问：毛泽东是否真的没有实施过“故意制造的屠杀”？

在这里，需要分两个层面来考察：

其一为，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其二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屠杀”？

毛的蓄意屠杀史

我们先考察第二点：故意屠杀的问题。实际上，在毛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在党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谈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暴戾乖张，杀气重重。

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基本点是，在毛统治时期由毛政权实施的屠杀之背景，既非战争状态，也非源于自己生命或政权存亡受到威胁，而是在承平时期的大批杀戮。屠杀对象均为非武装的驯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级官员、地主、富农、思想异己分子等等。特别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湖南道县和广西等地对地富家庭老弱妇孺满门屠杀，令人髮指。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运动，是彰显毛泽东屠杀手段最突出的运动。在他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在毛心中，是没有存在丝毫“法治”观念的。譬如，“镇反运动”从1950年3月就开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是说，杀戮在先，杀戮的规定在后。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国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2)

北大杨奎松教授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描述了毛泽东如何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在“镇反”中“毛泽东的‘大杀几批’，……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他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1月21日，他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当中，明确告诉

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1月22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1月29日，见到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级机关内亦逮捕160人，担心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的恐慌与思想波动的报告时，他亦明确告诫公安部称：“湖北做得很对，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报告，两个月已捕500多人，并处决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3）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方数字差异很大，而且多数实际仍旧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4）

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较为顺利，毛泽东“镇反”的胆气大了起来。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5）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在镇反运动中，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7）。

而到1958年，毛的这一作派变本加厉了。当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中共，毛勒索苏联成功后，立即停止炮轰金门，并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

毛的确有敢于叫中国人去死的宏伟气魄，他对中国人生命的冷漠令人惊诧莫名。而且，在

事实上，通过镇反等各次运动，他确实亲自下令杀死了无数前政府官员和平民。

诸案种种，已不难看出，在毛统治中国的全时段，毛泽东个人的确是在非常具体地指挥一场场的屠杀，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杀人比例到具体数位。上述中国民众所以被屠杀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政权意识形态的昔日对手，或原政府的中低层人员。用毛的话来说，即，反动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根本无须这些身份，就可杀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铁板钉钉，正是一场场“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在那场大饥荒前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证据，坐实了毛作为的“精心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罪魁祸首的身份。有鉴于此，即使是撇开大饥荒这一亘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另外两名刽子手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也是实至名归，毫无逊色的。

大饥荒中故意制造的死亡

回溯到第一点，我们来考察，就在那场人为大饥荒中，有没有由毛“故意制造的死亡”？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著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日，毛公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9）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10）

话虽这样说，毛毕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心虚了，因而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不着痕迹地“纠偏”、反左，从而把经济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轨道。然而，彭德怀出现了。彭的《意见书》虽然委婉却认真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给会议。当时在庐山的中共高干，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的占多数。这就极

深地刺激并惹怒了毛。在他看来，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就是对其权力的威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突然袭击，发动猛烈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挟下，庐山会议就此转向反右，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则是其“导火索”。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是要表明他对“正确性”的垄断权，任何人不容置喙。为了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他坚持恢复祸国殃民的政策，哪管饥民相食，饿殍遍野。

据毛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一九六〇年二月，国务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调查组就已发现，该地饿死的人高达百万。

对大量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反应是硬着头皮顶住，然后指鹿为马，竟敢于谎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1)

毛在1960年3月，中国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刻，他在杭州会议上还要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在那怨声载道的岁月，毛对自己的名声极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档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他采取进攻姿态，大讲阶级斗争，居然正式把饿死大批同胞的大饥荒最后正式归结为子虚乌有的“地主阶级复辟”，(12)而广大的地主们，此时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呢。很显然，在毛泽东明明白白已经饿死人的情势下，他的“硬着头皮顶住”和“指鹿为马”，就是故意制造死亡。

同时，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〇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克说：“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〇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15) 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斯大林杀人也不过如此。他杀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苏联的高级军官和干部，毛泽东同样杀死了大量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干部。这两种屠杀之罪无分轩輊。而最为世人切齿痛恨斯大林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与毛泽东明知饿殍盈野，仍铁石心肠坚持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暴政，坚不开仓济民，坚不允许逃荒要饭之赐死，二者的残忍也是相当的。

况且，毛还并未有过像斯大林那样领导全国性反法西斯战争的功绩。

仔细审阅毛的著作及其讲话，笔者愈益确定地意识到，“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毛居然只字不提。他从未公开谈及“大饥荒”的死人问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一九九八年发表文章，谈到其父刘少奇六二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当时无言以对。但是他记住了刘的这句话。为这句话，毛就认定，刘少奇必须下台，必须去死。果然，血的代价，几年后就付出了。

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但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如此，又故意屠杀了更多的中国人。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蓄谋杀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并意图追究责任的人，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为了掩饰这一罪行，他又无中生有的号召其党-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把中国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这种杀人灭口的罪孽，这种不惜以千万人身家性命为自己殉葬的暴君行为，双倍残忍，双倍暴虐！如果这不是故意屠杀，什么才是？如果这还不 足称为道德恶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环环相扣层层扩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三人，暴行昭彰，犯下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群体灭绝罪。因此，使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为二十世纪最大屠夫，铸进史册，是伸张历史正义，祭奠千万中国亡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千秋大业。

权责相应，功罪同当

最后，想考察一下中共对毛的评价问题。笔者注意到，其中存在一个“赏罚不对称”的问

题。

中共论述毛泽东，有一个基本倾向：功劳一人独揽，错误大家分摊。谈及毛泽东对于中共的功劳，北京当局往往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把它几乎全部归功于毛个人的天才、睿智和高瞻远瞩，决策的成功似乎与中共的其它成员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算在毛的身上。如叶剑英在六十年代曾说过：“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典型的中共评估毛的句式。然而谈及毛（对于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虽然很多中共领袖都看到了甚至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但是，他们为维护这个庞大的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因为害怕承担类似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罪名”，却又往往把毛的罪过平摊，大家有份。譬如，对大饥荒的罪过，邓小平就说过：三年大饥荒“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最起码，我自己也有责任，当时政治局常委中，只有陈云没有表态和举手，而邓小平、周恩来等其它常委们对于毛泽东是赞同的，如果讲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果---死了诸如 3000 万人的话，帐不能全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云云。

中共似乎对于其中逻辑的荒诞熟视无睹。如果前者对（致胜因毛主导），则后者就错（致罪是众人责）；反之，如果前者错，则后者才可能对。事实上，一个政治领袖对他的党，乃至他掌控的国家政权而言，正如权力与责任必须相应一样，功劳与罪过也是对称的。如果说，在毛掌控中共的时期，他对中共的正面的业绩在多大程度上归于他，则所犯下的罪过，也在同等程度上应当归于他。简言之，“权责相应，功罪同当”，这是一个普遍的伦理原则。中共对于毛泽东，不能机会主义的加以粉饰，而无视其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如此，不仅有失公允，有失正义，而且，还堵死了该党未来脱胎换骨、断尾自新的可能前路。何去何从？这是值得中共主事者深思的。

注释：

(1)(14) 马思乐：《毛泽东与大饥荒》，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The Free Press, 1999, pp. 236-238

(2)(4)(5)(6)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2007 年 11 月 4 日华盛顿报导

(3)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7)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p.285

(8) 同上 p.374,

(9) 同上 p.375

(10) 同上 pp.383-384

(11)(12) 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13)《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贾斯柏·贝克著,姜和平译,纽约明镜出版社,2005

(15)《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380

(本文是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北京之春首发) 毛泽东罪恶展示录

(编者按:本文摘自铁流文章《毛泽东罪恶展示录》)

一,从江西“苏区”一路杀到延安,从延安一路杀到北京,再从北京杀向全国。杀,杀,杀,是毛泽东生命的主旋律,美其名曰“伟大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说,“革命不是清客吃饭,描龙绣花,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暴力,就是要放火杀人!他不但对革命的“敌人”烂捕烂杀,对自己的同志也是如此。远在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事发的起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省行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

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

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 35 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 1931 年 5 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 人，其中 700 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 4 个师 12 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 30 团被杀的干部就有 500 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以上材料引自胡星斗先生“抵自毛邪教”）

1937 年红军败退到延安后，由于毛打着“抗日民主”的欺骗旗号，使大后方数十万不明真相的青年知识人涌向所谓的“革命圣地”。不久，亲信康生秉承他的意志，以“肃奸肃特”为名，在大后方延安开展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对数以万计的有正义感的革命青年进行拘捕审查和治罪下狱，《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掉的。总之，毛一路打劫，一路放火，一路杀人，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推动他的赤化革命。

二，崇苏媚苏“一边倒”，不惜国人生命涂炭，冒然卷入所谓“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借用战争大肆坑杀人民，美其名曰“巩固红色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在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 9 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 50 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以上资料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作儿皇帝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南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中共政治局开会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也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牺牲了 30 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 30 多万，总共死亡 70 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 5 万 4 千 2 百 46 人。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 2 万余人，其中 14000 人去了台湾，6673 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返回大陆。开始毛泽东用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有的被开除出党，有的逮捕法办，大部分折磨致死。毛泽东的论断是：为什么不杀身成仁，要去当俘虏？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失掉政权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以及原有的地方势力（乡保甲长），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2 年 10 月，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杀了国民党旧政权人员 71 万余人，关押劳改了 300 多万人。以杀人为己任的毛泽东，多次理直气壮不断向全国各地大军

区、地市委下达镇反指标和镇反命令，在指示中说：“应当放手杀几批”，“应杀者均杀之”，“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杀，杀，杀，真是一个杀人魔王的变态心理。

“镇反”刚一结束，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机关肃反”运动，对私人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史称对私改造）。这些运动虽没有大规模的抓人杀人，但却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固有的善良与诚实的美德，使全民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连一声咳嗽都得环顾左右

三，大兴文字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搜查个人来书信，编造政治谎言，罗织罪名，扑杀不顺眼不听话的鲧鯀之士，美其名曰“纯洁革命队伍”。

纵是历史上制造文字狱的朱元璋，以文杀人的清雍正、乾隆，如果和毛泽东相比，也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第一次文字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是左联作家，一贯支持共产党的赤色革命，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仅因生性耿直，不尊命于歌功颂德文学，于1955年向中共书写了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亲自断头去尾摘编胡风与友人来往书信，为《人民日报》加评加按，活生生地打成“反革命集团”。此案共牵连2100多人入狱，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接着以此为借口，在开展了“机关肃反运动”，对全国企事业单位近五百多万干部进行历史审查，集中学习，限制行动自由，搜查信件，收缴私人书籍，至少有一百万人蒙冤。

第二文字狱是《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四，开启“以言治罪，以言杀人”的历史先河。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实为政治陷阱，一夜之间把全国近百万知识精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使千万个幸福家庭破碎，数十万人死于劳改折磨之中，美其名曰“打退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惶惶不可终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制服敢于直言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广大知识人和年轻的革命干部，巧设“引蛇出洞”的“阳谋”奸计，开展所谓的除“三害”的“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宣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骗人鬼话，结果使五十多万知识人上当受骗，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庭破碎，亲友受到株连，整整毁了两代人。众多受害幸存者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此事至今仍有哭声眼泪，他们大好青春全葬送在劳累的“改造”中。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他们中不少佼佼者还被杀掉，仅北京大学就有女大学生林昭、沈元、张锡珉、黄宗羲等，还有北京农机学院学生陆鲁山、北工大学生孙本乔、四川大学的女大学生冯元春、兰州农校女教师毛应星、中央编译局翻译王桐竹、外贸部姚祖彝、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重庆渣滓洞的幸存者、市委党校马列主义教员周居正等几百人。惨绝人寰，不忍书纸，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不，他杀的不仅是生命，是正直、是正义、是良心、是忠诚、是民族的真正脊梁！

一个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个灾难又旋风般的降临。1959年在庐山纠偏的会议上，“唯我彭大将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因为为民请命，建言毛泽东以老百姓为重不要再搞“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带头人，时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当年毛泽东的顶头上司）、解放军上将总政主任谭正、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均入围成了“反党”干将，全国立马掀起“拔白旗”的“反右倾运动”，致使300多万忠诚之士的干部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的“下放”，解职的解职。自此人们再不敢说实话讲真话，诺大的中国成了谎言王国，位居要津的达官贵人者皆是作奸犯科媚谀之辈。

五、疯狂的大跃进，人为的大饥荒，毛泽东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老百姓，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出七百六十四万多人。美其名曰：“干革命就是要死人”。

1958年4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为取悦毛泽东，在一篇社论中竟然无耻地说：“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政治思想之花”指“反右斗争”，“丰硕的经济之果”指“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大跃进”（彭德怀语）。由于毛泽东好大喜功，逆天行事，他以为“反右斗争”死死封住了人民嘴巴，没有人再敢于说东说西。贸然提出“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结果不到三年时间，活活饿死了3000多万中国人。我们从无饥馑“天府之国”的四川，也饿死了1250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回忆录）。

二〇〇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〇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一十七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见辛子凌《千秋功罪—红太阳的陨落》）。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空特徵》）而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就是魔鬼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瞎指挥瞎折腾的必然结果。

五，“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妄图把“党天下”变成“毛天下”，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浩劫：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损失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美其名曰：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毛泽东这个魔鬼，为了把饿死三千万中国人的罪行嫁祸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搞“家天下”的封建世袭制，假“革命”之手，“反修防修”之名，悍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打倒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123 名，其中有 88 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还采用各种卑鄙伎俩，假“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手害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陶铸、罗瑞卿等几十位老一代革命家。除此，全国有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 5000 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的特大罪恶。将其碎尸万段也难中国人民心中之恨！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8 年 8 月 18 日到 12 月 7 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人家被抄家。计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上海十万户被抄，它所辖的郊区川沙，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

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士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在此期间，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仅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1967年8月28日，在长沙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铤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刮、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可是至今中共领导层里的毛派人物，仍把一切罪恶都推之于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仍然是“伟大的领袖”，可他的老婆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六，骄奢淫逸，生活放纵，腐化堕落，玩弄女性，抄袭剽劫，毫无人格，道貌岸然，从不恤民，卑鄙齷齪，形同禽兽。还美其名曰：“伟大导师”。

毛泽东是个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彭德怀曾斥责他“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目的是“选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团女琴师说，毛泽东没一个品位。他一见着漂亮女人就拉人上床，他任何办公地方都有“密室”。他对女性从来不尊重，包括自己的妻子，是个见异思迁的淫君。原配夫人杨开慧为他身陷囹圄时，他在井冈山早与贺子珍合欢交眠；在延安当着贺子珍面竟与他人上床，当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又与江青同室周居；在与江青结婚后又与许多女女“暗渡陈仓”。有人统计，他玩过的女人不少于一百人，在死前还在玩女人，任何时候身边都佳丽如云，自然活不到“万岁”。

他的骄奢更是惊人，每次外出坐专列，数千警察、军队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耗时两年，耗资1点2亿。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本人2001年曾去韶山滴水洞参观，留有一首诗：“君王席上一戏言，百万民膏扔此间，寂寞行宫寒光锁，借问疆吏可汗颜？”

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上有：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儿、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

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毛选”。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是个典型的口是心非的混帐！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爱民的“领袖”。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的稿费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辛子陵在《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写道：“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

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2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

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

我们再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 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

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造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制的家长制生活。”（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在中南海帝王般的生活 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住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科头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像，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

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

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又称内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即外卫，则防守内住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距放哨。

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用这种保护网层措施。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

毛的住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宫房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它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

旧式传统大门上，绘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宫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集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

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

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

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含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是否有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长年关闭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姊姊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她便姊代母职，扶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她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

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四到五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

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 后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着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

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

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于是我将见到傅连璋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注意地听着，然后抬起头说：“在江西反 AB 团、打 AB 团的时候，傅连璋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 AB 团打死了。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

前面他讲傅连璋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严家伟：统购统销——毛泽东砍向农民的第一刀 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说起“统购统销”可能已感到有些陌生，甚至不知为何物。而当年它确是悬在亿万农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条缠在亿万农民颈上的绳索。也是毛泽东开始把亿万农民“农奴化”的第一步措施。更可悲的是此“绳索”在农民身上一套就是半个世纪。“套”得农民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直到前几年，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燎原之势时，官方才终于将此“绳”从农民身上

解了下来。

1953年4、5月间的一天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准备去买点吃的东西。由于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剥削阶级”的家庭，已被伟大的党“清算”得一贫如洗了，而学校离我家又较远，所以中午只能在街上去买点锅魁一类的便宜食品来充饥。“锅魁”是一种用面粉烘烤而成的饼状食物。价廉物美，充饥很实在，颇受低层劳动者的青睐。而且我的家乡成都市卖锅魁的店铺又很多，所以购买也很方便。可是那天不知怎么的，我一连走了几家，平日并不热闹的锅魁店，那天却“购销两旺”围了一大堆人要争着买。我急了，便拚命往里挤，看见他刚出炉的锅魁，顾不得烫手，用手帕包着就去抓了两个。旁边的人见了便大声责备我“这娃娃怎么不讲理，不守次序，你还是个学生呢”！我边抓着锅魁边答道“我要去上学，晚了要迟到”。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没好气地对着我吼道“你上学好不得了呀？我们早饭都还没吃，饿着肚子呢”。我抬头一看，这人好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接着又一个老年妇女对我怒气冲冲地叫道“你们城里人把我们农村的粮食都抢光了，还要来和我们抢锅魁呀”！这时幸好卖锅魁的老板帮了我一把，他说“哎呀，算了，让这个读书娃买两个”。我才在众人的谴责声中，拿着锅魁赶紧狼狈而逃。

跑出来后我才发现，满街尽是一大群，一大群农民模样的人，他们不仅买锅魁，而是只要吃得着的，馒头、包子、饼子、饼干……见啥买啥，而且一包、一袋地装起来。那时买熟食品还不要粮票，所以有钱就可买。当时我心里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到家我就把这情况向我爸爸和姑姑讲。他们小声地告诉我说“农村的粮食几个月前被政府大量收购去了，现在正是青黄不接，农民普遍缺粮了”。末了又叮嘱道“到外面和学校里千万说不得呀”！

这时我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有天上午学校把我们集合起来，对我们说“今天上午停课半天，去欢迎进城卖余粮给国家的农民伯伯”。那个政治辅导员，还说“同学们，这是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大家要热情欢迎，还要从中学习到农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改造你们不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讲了一大篇大道理。大家并不怎么在意，却高兴等于放了半天假，可以去玩一玩。

于是我们列队来到成都老西门外，这时才发现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干部及市民之类的人，站了许多人在“夹道欢迎”。还有几十个青年妇女扭秧歌，打腰鼓，场面盛大而热闹。不一会，乡下的农民大挑、小挑，还有用川西平原最方便的手推独轮车（农民叫它为“鸡公车”）推着粮食进城来了。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外加鼓掌，呼口号，像欢迎什么英雄似的。我们那个政治辅导员，用个铁皮制成的话筒，带领我们高喊口号：“增加生产最光荣，卖余粮给国家更光荣，光荣上面加光荣，我们大家来欢迎”！于是口号声此起彼伏“欢迎，欢迎！”“农民弟兄最光荣”！这些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哪里被人如此“尊敬”过？所以一时真有点受宠若惊。特别有个中年男子，推着装有粮米的“鸡公车”，几乎开小跑似的边跑边喊“加油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了”！我们那位辅导员立即高喊“向这位农民同志学习、向他致敬”……

我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回忆至此，突然想起了，那天那个推着“鸡公车”高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了”的中年男子，不就是今天在锅魁铺里对着我怒吼“你上学好不得了呀？我们早饭都还没吃，饿着肚子呢”！对，对，对，就是他！难怪当时我觉得那么面熟却一时想不起了。于是我忍不住自个儿笑出声来了。姑姑很奇怪，就问我“你一个人傻笑什么”？我于是便将原委讲给他们听，我姑姑听了笑着说“那些人斗地主、打人、整人好起劲啊，今天也尝到了点共产党的利害了吧！喂，你娃娃真笨，你怎么不对他说‘毛主席的

社会主义都马上就要来了，你还和我抢什么锅魁’嘛”？我父亲听了，连忙制止我姑姑说“你别这样逗孩子！他不知利害，当真拿出去对外人讲了可不得了呀”！我说“我不是傻瓜，你们放心”。这时我父亲忧心忡忡的自言自语道“这么弄下去，可要国将不国了啊”。可是我爸哪里知道“国将不国”的“好戏”才序幕呢……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政治辅导员就在教室里，对近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给我们学生来了个“正面性”的“舆论导向”。他说：“近来，有暗藏的反革命，不法地主，煽动农村少数思想落后的人，进城来闹事，闹粮，搞破坏。同学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接着这位政治辅导员更振振有词地说“统购统销是党中央制定的粮食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但我们动员农民卖出的只是他们剩余的粮食，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是完全留足了的，根本不存在缺粮的问题。而近日出现的少数农民进城来抢购食物，完全是少数不法地主、坏人煽动部份落后群众进城闹事。大家相信我们政府肯定会加以严肃处理”。

政治辅导员的这一番崇论宏议，自然也是有“法令”依据的照本宣科。原来在1953年，当时中共的政务院（即今国务院）便颁布了一个名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如下：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在中国官方的政令文件上，从来都是充满了仁义道德的词语，这个文件当然也不外。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你们农民的粮食既可“自由存储”，又可“自由使用”；既可卖给合作社，又可在集市上交易。你们够“自由”了吧？但是请注意，人家还有个绵里藏针的“温馨提示”：你的这一切“自由”，必须是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分配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以后，才“可能”有这些“自由”。而到这时，你连填饱肚子都大成问题了，你那些“自由储存”，“向集市出售”的“自由”就做梦去吧！

其实农民只要年景好，无天灾，确也有一定的余粮，也会拿到集市上来出售，以购回一些生活日用品，这本是自然而正常的事。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暴政借口要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搞所谓“统购统销”，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尽量囤积粮食，准备打仗；其次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剥夺，他们所出的那个“统购价”，还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一半。这实际上就是假“统购”之名，行抢夺之实。更重的是既曰“购销”，那就是买卖。买卖就是要双方自愿公平合理。而这个“统购统销”则根本不管你农民愿不愿都得卖。县里把“统购”任务下到各区，区把任务分给各乡，乡分给各村，村直接按户、按人头下任务，农民愿卖也得卖，不愿卖也得卖。

更要命的是那个“统购”任务之高，以我的家乡成都市附近农村为例，农民平均每亩田就要卖“余粮”上等黄谷350市斤左右。而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什么高产良种稻，一亩田的产量也不过500来斤，卖了一半以上的“余粮”还有公粮任务必须上交，你说这农民不闹粮荒能行吗？这是“地主、反革命份子、坏人煽动少数落后群众闹粮”吗？这和去年的瓮安事件，最后贵州省委负责人都承认是当地官员之错，而官方媒体一上来动不动就是什么“不明

真象的群众”被“坏人煽动起闹事”，真是如出一辙。怎么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的政府，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仍然是只知委过于民，而不“下诏罪己”呢？

为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当时各地专门派了工作队，直接下到区、乡、村进行“督战”，软硬兼施。所谓“软”，就是讲大道理，进行政治宣传，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得解放，吃水不忘挖井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等等等等，接着再哄，说“卖余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好了，以后耕田不用牛（用拖拉机），象苏联的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神话鬼话，天花乱坠。这时再选中农民中一、两个积极份子，或许以入团，或许以入党，或提拔当农村干部，或将来招工进城之类的空头支票。更在私下里对这些积极分子“透露”点“内部机密”说，“万一你们将来缺粮了，政府又可以返销一些粮给你们呀，所以这就叫统购统销嘛，未必共产党还会哄你们呀”？

农民当时确实还是相信党和政府的。更不知这些工作队干部只是为了他自己要完成任务保住饭碗，乃至升官便信口许愿，你农民将来有无饭吃与他们何相关。于是积极分子们便信以为真，出来带头表示响应政府卖余粮的号召，甚至还要超额多卖。其他农民谁还敢叫苦、反对，或说不卖？如果这一切“软”的都还不行，“硬”的就来了。俗话说“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农村中最“软”的莫过地主，富农，抓两个出来，或说他家私藏粮食（农民哪个家不藏一定储备粮？），或说他“不满统购统销造谣破坏”，或说他“煽动闹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咋说都行。于是弄来开大会批斗，公安局马上配合，当场逮捕。那时连逮捕证都不需要，一根绳子捆起拉走就行了。老实的农民早都吓呆了。当时有个和我父亲多年相识的老农民，到我家悄悄对我父亲说“到了这一步，莫说喊你卖粮食，喊你卖婆娘你也不敢不答应啊”！

这就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苛政、暴政下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过平心而论，统购统销虽然让农民受害不浅，但又还没弄到要饿死人，象三年大饥荒中“猫儿饿得舔磨子，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样的惨景。因为当时农民手中毕竟还有些芋头、红薯、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可以“抵挡”一阵子，到夏粮一出来，情况就缓解一些了。于是当时报上便大肆宣传“瓜、菜可代半年粮”，“红薯营养很丰富”。不过写文章的人，却不会去拿瓜菜红薯当饭吃，就像今天那些帮闲作家、文人大谈“下岗创业前景广阔”，他自己决不会去“示范”的“下”一回“岗”一样。

所以“统购统销”是毛泽东准备掠夺农民的第一手小试牛刀，而“小试”之后，善良老实的中国农民，基本都逆来顺受了，反应并不强烈，更没在全国出现上万宗“群体性事件”。于是毛皇龙心大悦。“他老人家”一道道的“优惠套餐”就给农民端到桌上来了，从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无偿劳动大炼“钢铁”，乃至收回自留地，不准搞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招比一招狠，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到这时，农民别说反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所以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三十万人而风平浪静的、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大官人见此情景，不无得意地赞叹道：“多么好的老百姓啊”！

如果您还没弄明白路大官人此言的“微言大义”，那么就请允许我套改一句诗人北岛先生著名的诗句送给您吧：

凶恶是凶恶者的通行证；

善良是善良者的墓志铭。（注）

2009年1月30日完稿

(稿系首发)

(注): 北岛先生诗, 原句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出人意料! 解密毛泽东睡衣 73 神秘补丁的含义 ——毛泽东睡衣 73 补丁代表 73 少女的贞操 韶山毛泽东遗物馆 25 日建成开馆, 展出毛主席遗物 1008 件, 另收藏和保护毛主席遗物 6536 件, 其中有一件穿了 20 多年、打了 73 个补丁的睡衣引起关注。

韶山人揭发内情说, 伴随毛泽东走过近三十个年头、打了七十三个补丁的睡衣, 之所以最有价值保留, 是因为代表主席曾经玩弄过的 73 位少女! 1959 年返乡时乘坐的红旗轿车; 毛泽东用过的牙刷、牙粉, 听过的磁带、唱片……都是他老人家玩弄少女的纪念物! 今后, 人们可以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亲眼目睹这些他曾经用过的“器物”。

12 月 25 日正式对外开放的毛泽东遗物馆总建筑面积 1.9 万平方米, 馆内辟有《风范长存--毛泽东遗物展》、《毛泽东主席生活用瓷展》、《毛泽东珍藏唱片磁带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艺术品展》等四个陈列, 展出毛泽东遗物 1008 件, 再现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其中, 多件毛泽东书信及诗词手迹, 均是第一次公开披露。文物库房另收藏和保护毛主席遗物六千余件。

陈列的毛泽东遗物, 反映出他的生活习惯。展出中有这样一组日常用品: 牙刷四支、牙粉三瓶、牙膏一支、搪瓷缸二个, 均为原物。遗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毛主席当时刷牙一般使用牙粉, 工作人员劝他改用国产牙膏。他说, 全国人民都能用上牙膏后我就用。他的牙刷也总是等到用秃后才同意更换。但是, 他只在玩弄女人的时候才刷牙。平时拒绝刷牙。

毛泽东穿的衣服许多都是补丁迭补丁。展物中有一套拼接的棉毛衫衣裤引人注目。毛主席晚年身体发胖后, 衣服小了, 他就叫工作人员将衣、裤送去拼大接长。因为上面有许多女人的体液, 老头子不舍得扔掉!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 有时来不及换衬衣, 就套上一种可拆换的活动领、袖。

展厅第四部分有一本生活账目, 那是关于“还钱”给章士钊的记录: 毛泽东非常感激章士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筹款资助革命的义举。从 1963 年开始, 他以“还钱”的名义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两千元给章士钊, 帮助其贴补家用。展馆中还展出了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段谈话记录: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 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 可是架子很大, 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 不要靠先烈, 要完全靠自己。”其实这也是鬼话, 毛主席给钱章士钊, 是用来“购买”他的干女儿章含之的“肉体使用权”的!

这是毛泽东建政以后春秋两季一直穿的睡衣, 补了 73 个补丁, 领子全换过, 袖子已面目全非。

毛泽东遗物馆内陈列着一件毛泽东穿过的睡衣打了 73 个补丁

毛泽东《沁园春·雪》当年曾被民间痛批 作者：严家伟

近年来，国内又有人对"造毛神"，十分热心，什么"旗帜网"，"乌有乡"闹得乌烟瘴气。不仅吹毛的"文治、武功"，"政绩、理论"，还吹毛的"文采风骚"。不过毛的"风骚"，除了是超一流的"妇科专家"外，就是还会写几首歪诗。但诸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之类，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有《沁园春·雪》还可以拿得出手。于是有位高人狂吹、猛吹之余，还编出了一段"蒋介石曾秘密下令围剿沁园春"，而中国文人无一人能把毛批倒的神话。在海外自由媒体《博讯》上先后刊出七、八次之多，真是既把毛痞王吹上了天，又欺我中华无人。于是作者不揣浅陋，来对当时情况，作点介绍，以正视听。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在陪都重庆。蒋中正先生为了在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实现和平，特向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邀请，请他来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开始，毛心存疑虑，怕遭蒋氏扣留不敢来渝，后经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担保，毛始敢成行。所以柳亚子在毛夺得政权后，在诗中向毛献媚说，毛来重庆与蒋氏会谈是什么"弥天大勇"，那只能是无行文人的弥天大马屁。没有马歇尔出面担保，借一百个胆与毛泽东他也不敢来重庆，这就是历史事实的真象。

近年来有人爆料说，毛在离开延安赴重庆前夕，胡乔木把一首词送给毛看，毛看后很赞赏，遂将其带在身上。来渝后将此词交给了郭沫若，郭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的厅长。曾说他握着蒋委员长的手"心情十分激动"。不过此君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双脚踏着两只船。毛来重庆后，郭又与毛过从甚密，并送给了毛一只当时堪称十分名贵的瑞士表。五十年代中期，毛还将此事兴致勃勃地讲给他的首席保健医生李志绥先生听，足见毛对此事印象之深。

1945年10月，蒋中正先生在与毛经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毛当着中外记者之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后返回延安不久，郭沫若便将这首词交付当时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沁园春·雪》。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数年前，一家外国广播电台曾报导说胡乔木到了晚年，对此事仍耿耿于怀。病危时，还向当时中央某领导倾诉此事。当然谁也无能为力。胡乔木当年是毛的秘书班子中的一员，为毛起草诗、文，也属常事。而众所周知，中共的大、小"首长"作报告，写文章，多由秘书"捉刀"代笔后，然后照念，照发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胡乔木当年是否是该词的第一创作人，是否毛又作了某些修饰润色，还是就照原稿发表，因现在所有当事人均已作古，恐怕就只有成永远之谜了。

当时，我虽年纪不大，但还清楚记得，我父亲某日带我去赴一宴会。席间我父亲与他几个昔日军政界的老朋友坐在一席。其中有一人名杨洛生，是我父多年的旧交，父亲叫我称他杨叔叔。杨洛生此时担任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团长的。国民党政权的宪兵部队是其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并有"见官高一级"的说法，有些类似苏联克格勃那种味道。当时全国只有不到十个宪兵团，因此杨虽是团长，却是少将军衔。酒至半酣，我这位杨叔叔的"话匣子"打开

了。他说"此次老毛来重庆，要是委座用戴笠之计，早把老毛干掉了"。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因蒋氏长期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故称蒋为"委座"。杨团长又说"戴笠几次晋见委座，痛陈今日除掉毛乃天赐良机，此人不除将来必为心腹大患。戴笠在重庆要干掉老毛，那还不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之事。可惜委座碍于国际关系与马歇尔之面，投鼠忌器，因而坚决不听。最后一次甚至说得委座发火了，他说，'一个小小毛泽东算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我蒋某人岂能失大信于天下？谁再敢来劝我杀毛泽东，我先枪毙他！'戴笠无奈，只好叹息而退"。我父亲听了也说"老头子这步棋可能是没走好，你看老毛回延安后最近发表的那首沁园春咏雪词，觊觎皇权，狂妄至极，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可小看此人，此人是个黄巢、李闯之流，将来祸国者，必此人也"！我父亲在这里说的"老头子"也是指蒋氏。是他们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在私下里对蒋氏的一种戏称。

当时杨洛生在席间谈的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绝对的"国家机密"。不过大家觉得同桌之人，都是党内的老同志，自家人，所以杨才敢口无遮拦地畅所欲言。几十年过去了，但至今还记得我那位杨叔叔（他1949年去了台湾），当时既慷慨激昂又不胜惋惜的神态。

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只有平面纸媒报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媒体上对毛这首词的一些议论吧。

首先是著名文人易君左在《三湘词人》上也以一首《沁园春》词对毛进行了驳斥。易君左（1898—1972）湖南人，原名家钺，后以字行，又字敬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诗、文、书、画俱佳。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史》等。易君左的词原文如下：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汉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在词的上半阙里，叙述了抗战甫胜利，"国脉如丝"，遍地疮痍的情景。警告了那些一心想成秦皇汉武帝业的黄巢式的"造反"夺权人物，莫用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的滥杀无辜，来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下半阙更以"一念之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说明不管你口号喊得再好听，装得再象，再会"冶态妖容学细腰"也逃不脱青史"细细雕"的审判。从后来毛泽东打内战使用"人海战术"对付国民党，到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无一不是拿千百万无辜生命来"坑杀"，以便成就其帝业。也终将神州大好河山弄得"支离破碎"，"葬送妖娆"，一切都被诗人易君左不幸言中了。

另一位是署名"老酸丁"的作者，其词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八载兵侵，一意萍飘。凭延安内外，生灵草草，大江南北，祸水滔滔。袭击国军，坐收渔利，强向尊前共论高。媚晴日，愿红妆素裹，卖弄妖娆。河山割据多娇，忍驱使健儿又折腰。口笑开白合，略输文采；数宗忘祖，自诩风骚。混世魔王，侈言"解放"，聚得猢猻著意雕。内乱苦，劝风流党首，解甲今朝。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说蒋氏要"下山来摘桃子了"。现在大量史料证明（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国民党的军队，才在抗日的主战场上。并与日寇拚了个鱼死网破，元气大伤。而毛先生的伟

大战略部署则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请参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老酸丁说毛是"坐收渔利"后，到重庆来向国人"卖弄妖娆"，更对蒋氏"强向尊前共论高"。词的下半阙更叫毛不要再"驱使健儿又折腰"来打内战。而对毛在词里表现的狂妄自大，更痛斥为"数宗忘祖，自诩风骚"。因而劝这位"风流党首，解甲今朝"吧！

第三位作者也未署真名，其词发表于当年的《大公报》：

卅载兵争，千里坟堆，万里血飘。幸长城内外还馀莽莽，大河上下，尚有滔滔。仁者安人，智者化俗，不嗜杀人义最高。试放眼，看弹丸瑞士，绝代妖娆。将军倚马多娇，念塞上单衣雪满腰，请记取秦皇，金销十二，服膺宋祖，杯解腥骚。一代天骄，原子（能）宇宙（线），何必荒城竞射雕？民苦矣，莫谈谈打打，暮暮朝朝。

这位作者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手法，让老毛看看一个小小的瑞士，也能如此国富民丰，久安长治，说明不倡乱，不嗜杀，方为"义最高"。因此告诫他，民众经过八年抗战，已经够苦了。莫再"谈谈打打"，还是放下屠刀，实现全国和平吧！——当然，这不过是与虎谋皮罢了。

最后这位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他针对毛泽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在该文中王先生严肃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志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更不肖的如石敬瑭、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立汉奸政权，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因此王先生说他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后来毛的所作所为，直到文革时的封建帝王式的专制，不是被王先生一语中的，说了个正着吗？

所以毛泽东当年的这首《沁园春·雪》正好是他的帝王复古梦的"夫子自道"罢了。我父亲说他是个黄巢、李闯之流，虽没错，但应补充一句是，他是个成功了的黄巢。民间人尽皆知"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在当时已是"空前"，但却未能"绝后"，被毛杀死，害死，饿死的中国人是八百万后还要乘以几。他肯定"空前"了，但也"绝后"了。他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又哭又闹地骂道"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另一个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说得好，报应！活该！

面对前辈先贤的义正词严，更有幸能看到毛盖棺论定，罪行大白于天下，我不禁有点技痒，于是不揣浅陋，也来"涂鸦"几句，作为拙文的结束，敬请编者、读者指正。

华夏无尧，魔逞凶器，大地血飘。叹美丽海棠，惨变"鸡头"，（1）大好山河，黑浪滔滔。扯谎大王，嗜杀魔鬼，欲与秦皇试比高。（2）更每日，善高歌"革命"，卖弄妖娆。江山如此枯焦，把千万无辜尽斩腰。胜商纣夏桀，荒淫无道，三宫六院，逞"性"狂骚。（3）一代暴君，古洋集成（4），凶暴骄狂玩伎刁。崩驾日，剩声名狼籍，臭遍今朝。

注 1：中国的地图原似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苏俄强行割走我外蒙古后，中国地图变得象只母鸡一样。

注 2、4：毛自称"秦始皇算老几？他焚书坑儒，一次才坑 400 多儒生，我们镇反，一次就镇

压了 xxxx 人”。毛又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故曰“古洋集成”。

注 3：彭德怀对毛泽东将海政、总政文工团女演员弄去陪他跳舞，淫乐，斥其所为是搞“三宫六院”。看看有多少“秘密小组”曾为毛泽东服务？作者：一清
有些什么样的“特殊”且“秘密”的小组呢？

首先当然是“医疗小组”，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两次医疗组成立的时间是：第一次“1971 年—1972 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 1974 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高日新、吴阶平、尚德延、徐荫祥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 1974 年的 6 月中旬。谁是组长的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出版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书，且书中多有杜撰，以林克、徐涛、吴旭君三人为名义出版的《历史的真相》组织了参加过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多位专家回忆，确认李志绥不是第二次组的组长。但是组长是谁，至今没有答案。但组员中还是有李志绥，其他专家有王新德、方圻、陶寿淇、高日新、陶桓乐等。据回忆结论，总负责人是陶桓乐。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与之相同情况的另一个组是毛泽东的“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 1972 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准确时间是 1972 年 10 月 1 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他们是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吴乾兑、刘修明、谭其骧、杨宽、邹逸麟、王文楚、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等等。当然，这个小组里的成员不是太固定的，以专长而定，或进入全部注释工作，或进入擅长科目。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 15 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 15 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 5 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为毛泽东阅读服务的“大字本”

再大的读本，也毕竟要用眼睛去读，能不能让毛泽东的精神生活更充实一些呢？这样，又产生并成立了与之相关的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歌唱演员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要炳淑、要元华、方洋、计镇华，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一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弟，二春演员闵惠芬、许蒋德，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 59 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有从事词牌“翻译”的专家，他们是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的廉颇、周大风，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根据个人的理解，谱成演员们能读懂并能演奏的简谱或五线谱。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人北京大学调来 4 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以便进入“角色”。

最有名的莫过于 1975 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那个曲子了，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在这个故事之外，实际上，上海、北京的一大批艺术家为了打发主席晚年的寂寞，付出了大量劳动。

供毛泽东“听”的古诗词

有音乐吟唱小组，也有戏曲小组。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 年，毛泽东在长沙修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托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意，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还有一些什么秘密小组，随着历史迷雾的消散，将会陆续显露出来。但有一个“秘密小组”，这里却不得不说。那就是为毛泽东服务的“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从抽中华烟到抽雪茄，这事是贺龙引起的（一说由李先念）。1956 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玩意儿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毛泽东感兴趣的東西，当然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毛身边的人没有惊动什邡烟厂，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这样每批烟就通过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然后被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

毛泽东在火车上抽的就是这种雪茄

这种取烟方式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但这样取烟，毕竟不是很方便。发生在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让中央笼罩了一层紧张气氛。其间，毛泽东身边的各项事务防范更加严格，有关人员做事比平时更趋谨慎。由是反思到毛泽东所抽雪茄烟一事，万一有人捣乱，后果不堪想像，毕竟从什邡来的烟经手太多、运转时间长，这些都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于是，在“九·一三事件”过后不久，从什邡取烟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抽起了“中华”牌来。但抽惯了什邡雪茄了，不免有些挂欠。于是，中办准备派人学习制烟技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经过认真权衡，最终也选定了人选，他们是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他们去什邡学习，但学了好长时间，实在是太难了，学不会。做出的烟也没有那种味道。为此，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决定下来后，甄选工作在什邡烟厂严格且秘密地进行着，最后选中了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于是，研制小组成立了，研制小组的名义是“一三二小组”。时间是 1972 年的 3 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首都北京，为了保密，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八十号作为生产场地，这是一个相对很隐密的地方，既方便，又安全。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一三二”雪茄烟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烟叶的特别，二是手工卷制技术的精湛。所谓烟叶特别，是说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有 200 亩油沙地，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

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其每年产量最多不过 20 担（2000 斤）。“一三二小组”所用的正是这种烟叶。

为毛泽东特制的什邡雪茄烟

这个称之为“一三二”的小组名字看起来很是神秘，其实，也就是两种烟的型号，即十三号和二号，简称就成了“一三·二”小组了。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此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也接着抽着“一三”号雪茄烟。但毕竟这是毛泽东独家抽的烟，在那个时代其他人要抽这种烟，多少得掂量一下自己。这样，对雪茄的需求量也就明显减少，国家领导人都改抽纸烟，到年底，“一三二”就停止生产了，随后“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当然，有这么多人毛泽东服务，作为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感到幸福的。毛泽东自己对一个厨师说过：“你们为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差点枪毙毛泽东下 毛对周人格羞辱和蔑视 ——看看毛泽东对周恩来人格羞辱和蔑视到何种地步

王笃若 摘编自

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79 奉陪到底 周旋到死 下有删节

周恩来活得真不轻松。用他晚年的话来说：半辈子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令周恩来最感痛苦的，莫过于一次又一次遵从毛泽东的旨意，修改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他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于一九五七年忙活了大半年，编制好了一九五八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亦已获得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一通劈头盖脸的批判，“二五计划”尚未执行，即胎死腹中，成为废纸一堆。

以钢铁生产指标为例。一九五七年钢铁产量为五百三十五万吨。为了不受毛泽东的指责，又不至于太离谱，周恩来咬了咬牙，把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指标调高至六百二十万吨。可是，到了全国开始疯狂大跃进的八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属下的冶金部也是一派昏头胀脑、大唱高调，吹成了九百万吨，无形中造了周恩来的反。周恩来又属右倾了。毛泽东根本不知道钢铁生产需要些什么原料、钢铁生产为何物，竟在会上睁着眼睛瞎指挥说：

“干脆点吧！翻一番嘛。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七亿人中需要多少钢啊？我看一人一吨，搞他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接着毛泽东大气磅礴，胡吹海夸，甚么“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啦，甚么“三至七年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甚么“每个省拥有几百架飞机，每个乡两架飞机”啦，甚么“搞一个地球委员会，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啦……希特勒似的狂言浪语和歇斯底里的叫器，却赢得中共中央委员们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一派法西斯似的癫狂。

从此，钢铁不是出产在炼钢厂里，而是出产在“伟大领袖”的嘴里。结果是七亿人民齐上阵，全民炼钢煮铁，大面积破坏森林、破坏资源，直接损失中央财政的八百多亿元人民币。

粮食产量更是在毛泽东的斥责下一再提高。他要求粮食部门搞三万五千万斤，实现全国吃饭不要钱。没有人告诉毛泽东不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他们也只是热烈鼓掌、坚决拥护，何惜国计民生？而实际的粮食产量，一九五九年仅为四千万斤，大饥荒的一九六〇年只有二千八百万斤，还不到计划指标的一个零头。结果紧急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度荒，全国饿死人口五千多万。

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意见被罢了官之外，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以图自保。他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可以出卖天理良心，背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顺从一个领袖，从而保有自身的权柄和利益。为此，他们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都在所不惜，真是一群寡廉鲜耻、天良丧尽、人格全无的政客。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子稍许好过一点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毛泽东退居第二线，暂时不过问国民经济，周恩来从来就没有想过将毛泽东赶下台去，他已经做惯了小媳妇，胆识不足，且乏人合作。毛泽东名曰退居第二线，但通过林彪牢牢控制住军队，通过康生、谢富治、王震牢牢控制住情报系统。要赶毛泽东下台，关键在于三个人物：一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是总书记邓小平，一是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刘少奇唯毛泽东之命是从，他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寄生在毛氏的党中央主席的胯下，又一味的讲究修养，甘当“二把手”。周恩来和刘少奇关系从来很疏淡，还相互防范着；邓小平则学得越来越滑头了，每天除了批文件，开开会，听听汇报，就是抽烟打桥牌。常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且自井冈山时候起，邓小平就跟周恩来拉开了距离；北京的彭真呢？眼下正在毛泽东面前走动最勤，红得发紫。庐山会议上，因为彭真在批彭德怀问题上的异常卖力，毛泽东舍其他政治局常委不顾，指定由彭真主持政治局会议，即是明证。

一九六二年之后，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他的忌恨，已经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他松了一口气。他等着刘少奇来赶毛泽东下台，或是毛泽东赶刘少奇下台，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他要小心翼翼地窥视、规避着党内这两只最大的老虎。

毛泽东虽然把刘少奇看作头号对手，却仍然不忘警戒他，捉弄他。最伤他颜面的一次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共、日共两党会议。日共建议跟中共一起联合北韩、北越组成反美战线；中共则提出反美帝必须同时反苏修。结果谈不拢，不欢而散。但日共的主张得到了北韩、北越两党的赞同，发表了联合公报。一九六六年三月，日共代表团从河内回到北京，中共由周恩来、彭真负责再与日共谈判。碍于兄弟之邦的北韩、北越的面子，也是出于国际

统战的目的，周、彭二人代表中共做了妥协，不再坚持反美必须同时反修，拟好了两党联合声明。在送别晚会上，周恩来讲了话，彭真讲了话，盛赞了两党会谈成功。但两党联合公报须在日共总书记宫本一行赴上海拜会了毛泽东之后才公开发表。宫本一行到了上海。毛泽东一看联合公报就大为恼怒，提笔就加了反苏修的内容。否则，两党会谈就算破裂。宫本也是一条硬汉，表示不能接受他的修改，愤而率代表团回了日本。

毛泽东蛮横地踢翻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日共总书记所达成的协议，可想而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格的羞辱和蔑视到了何种地步。真是人无人格，党无党格，国无国格。

一九六六年夏季，毛泽东调兵遣将，对北京市实行全面军事控制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初的布置是先打倒周恩来，然后再收拾刘少奇。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边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命刘少奇、邓小平去发动对周恩来的批判。但刘、邓这时已经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肯动手。刘少奇甚至说：批判恩来同志，等毛泽东自己来办吧！毛泽东得知刘的这一意向后，老羞成怒，咬着牙齿说：好，回来就从你刘少奇身上办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刘少奇赶到火车站去接驾，毛泽东不与见面。晚上，通知政治局成员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碰头会，竟然不准通知刘少奇与会。周恩来获知此事后大为吃惊，立即给刘少奇的中南海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光美啊，请少奇同志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文革铁拳虽然是砸在刘少奇、彭真头上，但周恩来的日子也不也越来越险恶了。

首先是他的心爱的私人秘书许小阴被捕，因不愿揭发他而身亡；接着是他和邓颖超自井冈山一手抚养成人的烈士遗孤孙维世被江青投入牢房，被折磨致死，他的戏剧家女婿金山自杀；再接着是他未能保护下与他有着生死之谊的贺龙元帅的性命……

一九六六年冬天，心疲力竭的周恩来曾在人民大会堂晕倒，医生检查出他的心脏、心血管皆有患病。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打倒刘、邓之后，进而要收拾周恩来。周恩来避开正面攻击而竭尽全力跟毛泽东周旋。也就在这时，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力军人对抗集团，其主要骨干是“三总四帅”的元帅们。所谓“三总”，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所谓“四帅”，就是四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他们的亲信部下大多为全国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即所谓的“二月逆流”案，也就是“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名义上是跟中央文革小组闹对抗，实际上是跟毛泽东、林彪闹对抗。“中央文革”的后台是毛泽东，“三总四帅”的后台是周恩来。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了。他最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权哲学，因之他最怕军人起来造他的反。

同年七月中旬，武汉军区爆发了逮捕中央文革大员谢富治、王力的兵变事件，更是一次实力军人对抗中央文革的坚定行动。事件虽然由周恩来出面平息下去了，但却使毛泽东感到来自周恩来的巨大威胁：虽然自己比较容易打倒了刘、邓、彭，要打倒周，却十分棘手。周恩来真是只老狐狸精啊。他借重实力军人来保全自己。弄得不好，是会引火烧身的……

但毛泽东整肃周恩来的决心并未动摇，只是要更为注重策略罢了。他指使中央文革去组织狂热的红卫兵来向其发难。中央文革的方针是：周恩来已患有心脏病，整不垮他，也要拖垮他，拖不垮他，也要累死他！当然，为着发动群众，必须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做理论依据，或称为锐利武器才成。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矛头直指周恩来及其国务院：

南京新华社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甚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要革到你的头上来，为甚么不准包围省市、报馆、国务院？……工作组撤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怕吗？有些部长、报馆是谁掌握的？

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预料到北京将有更为激烈的红卫兵造反浪潮发生，又坐了他的专列，带上张毓凤，以及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南巡去了。他把周恩来留在北京，交给狂热的红卫兵去对付。北京街头贴出了一批“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的大字报。不久，在中央文革的幕后操纵下，北京市五十多万红卫兵包围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被包围在人民大会堂里。他发挥了谈判天才，跟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小将辩论了三天三晚。在这三天三晚的时间里，除了人民大会堂警卫连还守卫着他，没有任何人来替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解围。近在咫尺的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没有任何人出面。任由红卫兵轮番上阵与他舌战激辩……直到第三天晚上，竟是他凭着自己的惊人毅力、韧劲，说服了红卫兵小将，撤除了对他的包围，让他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他总算熬过了文革中最危险的时刻。

据说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感到十分惊奇，十分欣赏周恩来顽强的生命毅力，要整垮周恩来，还真不容易弄呢，尤其是他身后站着一大批实力军人。刘少奇的失败在于他的软弱，在于他的不抗争和听天由命，在于邓小平阵前倒戈和反水，自己被出卖了还蒙在鼓里，最为关键的一条，还在于他没有枪杆子在背后撑腰；周恩来的不败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实力军人的支持，在于他的政治智慧和韧性战术，也在于刘少奇已经承受了运动的第一打击波。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周恩来退居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前三位是：主席毛泽东，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常委陈伯达。或许，毛泽东鉴于自己的接班人——林彪系统的权力膨胀过快过大，而留下周恩来做缓冲，搞平衡。“九大”开过不久，毛泽东就与接班

人林彪展开了新一轮权力决斗，周恩来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利用了毛泽东的多疑，来促成毛、林矛盾的激烈化。比如说，毛泽东找他谈工作、了解情况时，他只要不动声色地顺便提到：现在军队总参、总后、空军、海军，全部成了“四野”的人马，不大利于团结其他三个野战军的干部嘛；我拥护主席、林副主席撤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决定，用军委办事组来代替。但叶群同志当军委办事组组长，指挥军队，搞成了一家子，恐怕不大妥当嘛！对林副主席也影响不好嘛！再比如说，周恩来曾两面讨好地说：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这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敏感的神经，加重了他对林彪的疑虑：甚么意思？谁的发明？缔造者就不能直接指挥了？等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谋刺毛泽东失败之后，毛泽东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明显地垮了下来，党政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立即抓住历史性的契机，借了揭批林彪集团罪行，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给全国军民。林氏在“纪要”中称毛泽东为：现代秦始皇，大独裁者，怀疑狂，迫害狂，他的副手、秘书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纪要”更指目毛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变相失业，“干部进五七干校”为变相劳改，城市职工几十年不长工资，乡下农民吃苦受累等等。这正是周恩来反击、贬低毛泽东的最妙的一笔，且不担干系，不露痕迹。自此，毛泽东的种种神话开始破产，毛泽东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

接着是中美恢复关系，促成尼克松访问北京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周恩来却当仁不让地做了大英雄。事后毛泽东对此十分光火。一九七二年夏天，尼克松又访问苏联，与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威见面。周恩来让外交部给毛泽东呈送了“重要外事简报”。毛泽东在“重要外事简报”上批示道：

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周恩来及其外交部，如果不改正，必然变修正。

这个批示不像批示，顺口溜不像顺口溜，打油诗不象打油诗的“最高指示”，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大的威力了，周恩来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此时的周恩来，身上已检查出了癌，但他一直拖了两年才入院手术治疗。他比文革派棋高一着的是：他让叶剑英、徐向前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并让王震等人动员和劝说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出来工作，从而堵住了文革派权力接班的路。

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搞掉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春天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文革派的四员主将王、张、江、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将“批林批孔”加上“批周公”。但这场运动首先受到了来自中共高级将领们的强烈抵制，人民群众也缺乏热情。加上周恩来的癌症已进入晚期，被送进了医院。而毛泽东本人也身患重病，进行大规模的整人斗争已力不从心。“批林批孔批周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搞了半年，便虚应了故事，草草收兵了。

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饱受着癌症的折磨。先后动了三次手术。殊不知，他最痛

苦的不时肉体，而是心灵深处。他为了顺从毛泽东，保全自己，出卖了多少原则？丧失了多少良知？甚至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包括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包括自己心爱的女秘书小许……

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对他克制痛苦的毅力表示由衷地敬佩。有一天，大家要求跟他合影留念。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合影洗印出来了，大家要求他签名。一向亲切待人的他，竟然无比凄惶地说：签名可以，日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啊……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周恩来最后一次本能地保护了自己。痛苦中，他呼唤着夫人邓颖超的小名：小超，诗词，给我毛主席诗词，读给我听，我听……说罢，他像一个“伟大”的演员，合上了痛苦的眼睛。周恩来终年七十七岁。
不幸的“幸运儿”——大饥荒年代被胀死的人 作者：张先痴

今天，中国大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应该记得，五十年以前，祸国殃民的暴君毛泽东，他因为急于夺得斯大林死后“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把手的皇冠，便把有可能仗义直言者都打成右派分子，将他们的声带掐断，异想天开地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号令全党、强令全国人民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似乎是谁统治的国家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谁就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是当仁不让的地球“球长”。

被这个利令智昏的馊主意害得最惨的还是中国的劳苦大众，1958年搞所谓“大兵团作战”的“全民炼钢”，让成熟的农作物没人收割烂在地里，紧接着第二年农业“放高产卫星”，吹嘘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实际上违犯农业生产常规，胡作非为地移栽密植，几乎使粮食颗粒无收，最后造成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全国饿死的平民百姓在四千万人以上。

那时，我早已是一名右派劳教分子了，四川省将右派劳教分子中的年轻力壮者约六千人，押送到一个名叫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二支队的新单位，象这类能将右派分子改造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地方，共产党无论如何也得把我弄去。就这样我到了内江至昆明的铁路工地，地点在与四川接壤的云南省盐津县。我所在的是一个隧道中队，具体的劳动就是在隧道里打炮眼、放炮和出渣。当时这个重体力工种的粮食标准也许是全国最高的，每人每月六十斤。可惜好景不长，自1959年开始，突然降为五十二斤，然后四十二斤，更可怕的是伴之而来的糖、油之类副食品从市场上消失，我们便开始接受饥饿的煎熬。某日，在我们下班后排队打饭时，我听见排在我身后的一位来自中江县的丁姓小学校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活了四十岁才第一次闻到饭香！”这便是刚刚被共产党的铁蹄踩破了胆的知识分子在饥饿熬煎中的一声微弱的呻吟。

随着工程进展的需要，支队部办了一个安砌工培训班，其实只是从各中队抽调些劳动力去突击修建一个大型桥墩。在这里，我碰到一个和我一样也是来自南充的老熟人，他是驻军预备师的一个中尉军官，在南充时，我俩同为文学爱好者有点交往。见面时他一改以往那种玩世不恭的乐天作派，而是苦笑着说：“这辈子我作过挨枪毙的准备，就没作过挨饿的准备”。我盯着他身高一米八三的大块头，只好用解嘲的口吻安慰他说：“当了右派，你反倒连升两级，从中尉直接晋升到大尉（尉）了”，回答我这个苦涩的诙谐的依然是一脸苦笑。几天以后，安砌培训班结束，我俩便各自回到原来的中队。

突然间，内昆铁路下马停建，筑路支队将全部迁往大凉山去修成昆铁路。按中共对付被专政者的惯用手段，绝对不会宣布这类调动的来龙去脉，以防阶级敌人乘机逃跑或搞其他破坏。直到出发前夕，监管干部象骗幼儿园的小孩似的对我们这群“狡猾的敌人”说：“我们将去的地方物资供应特别好，猪肉都不定量……”一年多的劳教生涯，特别是近年来吹得离谱的“高产卫星”，加上右派们刚刚领教过共产党在反右运动中搞阳谋的自我暴露，认清了他那副“骗你没商量”的蛮横嘴脸，付之一笑而已。

此前，炊事房忙了几天，烤制出一批特大型的烧饼，每个劳教分子发了六个并宣布说：“这是你们途中三天的早餐和午餐。”按劳教队转移工地的常规，爬上大卡车以后，“分子”们用各自的背包充着坐椅，列成四排一个紧挨着一个拥挤在车上。最前面是一个手持冲锋枪的武警士兵，他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群饥肠辘辘的劳教分子，他们盯着前面那阴森的枪口纳闷：“不是口口声声说我们还有公民权吗，枪口对准的公民还能叫公民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湖南痞子”的那一句无耻谰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无法无天”。

三天的旅途结束，我们便来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工地，等待着我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坏消息，那位经常苦笑的（大胃）军官死了，他在旅途中一顿就吃完了六个大烧饼活活胀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不到一年，成昆铁路又下马停建，再次扔下一个半成品，我们又被押解到旺苍县，去修建一条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经过此番大饥荒的扫荡，农村里已是十室九空，饿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劳教分子们被安排住进那些十室九空的大四合院，它替代了以往自己搭建的简陋工棚。

邻居们便是熬过了饥荒的幸存者，在听过他们讲述的各种饿死人的往事里，一则胀死人的离奇更令我终生难忘：

住地的对面有一条公路，公路前方的拐弯处，有一段陡峭的上坡，汽车上行到这里都得气喘吁吁地爬坡，饥荒年代，汽车里装着的一袋袋大米更容易刺伤饥民的眼球。某夜，被饥饿逼上梁山的四个有心人协同配合弄了一袋回来，此刻他们最迫切的愿望是饱餐一顿，便七手八脚的用一口大沙锅煮了满满一锅，就在即将生米煮成熟饭的那一刻，传来了敲门声，敲门者在门外晃着电筒自称民兵前来查夜，这四个气急败坏的“有心人”只好从后门仓惶逃出。破门而入的两个民兵闻出屋内似有异味，而这股异味正是久违的饭香。那年头的凡夫俗子没人能抗拒饭香的诱惑，在炉火的引导下，他俩很快地找到了沙锅的所在。说时迟那时快，这锅夹生饭作为战利品把他俩胀得东倒西歪苦不堪言。上世纪所修的老式房屋，房门的下方都镶嵌有一块长形木板充作门槛，堂屋的大门下更嵌有一块高达三十多公分的木板，可能为防止鸡鸭等家禽窜入屋内影响卫生。其中一个民兵甚至俯卧在门槛上将胀得难受的腹部在上面压揉，直到他呼妈喊娘的叫声变成低声呻吟，到最后一声不吭了；另一个经过一番呕吐，捂着肚子哼了半个多小时似乎有了转机，他以为他的同伙已经睡着，一边叫他的名字一边向他走近，来到身边用电筒一照，那张瞪眼歪嘴的畸形面孔让他着实吓了一跳，一摸他的鼻孔，断气了……

说完这则往事，讲述者硬拉着我去看那块俯卧过死者的门槛，距我们说话的地点还不到十米远。

两个月后，我从劳教队逃跑，抓回来便以叛国投敌罪判刑十八年，押解到地处大凉山的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这是个关押了近万人的大型农场。1956 年左右，凉山彝族人民曾抵抗共军的入侵而奋起自卫，遭到中共血腥镇压，战斗中的被俘者七百余入曾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度过了可怕的三年大饥荒年代。1962 年这批彝族犯人迁往西昌监狱，离开这座监狱时只剩下七十多人，不足十分之一。我到这个农场后，老犯们也常常讲述前几年饿死人的惨状：

1960 年冬，农场开始播种小麦，便派了犯人到场部去挑运麦种。饥荒年代的犯人，还能挑五十斤左右的绝对靠偷吃生产成品才保有这个体力，这个挑麦种的彝族犯人以往生包谷、生洋芋、生南瓜曾经吃过，这些麦粒似乎更为可口，加上他独自一人除却相互监督的压力，吃起来精神放松毫无后顾之忧，左一把右一把地大饱口福。回到中队以后，为避免嫌疑他照常吃下自己那份不多的口粮。睡觉以后，他口渴难忍，不断地喝水止渴，显然肚子里的麦种吸收水分以后膨胀，肚子明显鼓胀起来，他也痛得得呼妈喊娘满地打滚。犯人卫生员要求队部允许将他送进医院，但崎岖的山路和四肢无力的犯人阻止了这个抢救机会，次日凌晨就死了，死时他的肚子已大得象一个临盆的产妇。

我作为那场饥荒的见证人，知道那千千万万死难者，在临终前絮絮叨叨的呻吟着说的一句话是让我吃一顿饱饭，比起那些连吃顿饱饭再死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不幸同胞，这些被胀死的人也许可算是“幸运儿”，但他们的这种幸运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

大跃进时代多美好！副总理发话：燕窝按需供给 作者：新浪文化 被删除文章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官员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民众的奋斗精神，那些宣传语让现在的人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猴头燕窝按需供给

当时中国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说公社的好处是猴头燕窝都能按需供给。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幅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

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 6.4 万多户，32 万人口，248 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共建立了 1777 个公共食堂，有 28.5 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 1410 个，幼儿食堂 119 个，老年食堂 248 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

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种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蜜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中国普遍开花了。

书记一字一泪 大跃进四川饿死了1000万 编者按：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有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区，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 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 年 6 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 400 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 800 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 1000 万。”

“1000 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 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 6236 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 1957 年的四川人口是 7215.7 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 1957 年到 1960 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 1960 年的数字，从 1961 年到 1962 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 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 200 多万；1962 年 3 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荣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 1959 年就到荣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 250 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 1000 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 年 6 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 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 1959 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 1961 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

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

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杨宽兴：父亲的大跃进记忆 对于年长的乡亲们来说，在走马灯式的政治运动中，大跃进记忆可能是最难以忘怀的，这些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作的山东沂蒙山区农民，终其一生的劳作，只求一个温饱，但大跃进的愚昧和疯狂却使他们连自己的最低要求也难以满足，由于这个缘故，自孩提起，瓜棚豆架之下，便会常常听到他们对于可怕生活的回忆。但是，由于年龄的差距，作为孩子的我，最多只能记得一些回忆的断片，对于五十年前家乡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其实是不甚了了的。时值大跃进五十周年，当我决定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那些依然健在的乡亲，父亲却自告奋勇：“我先给你讲一下。”在自家人面前，每一个从大跃进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1958年到来的时候，父亲16岁。大跃进运动是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始的，但在父亲记忆中，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饥饿却是从1958年春天开始的——1958年的大跃进还没有开始，父亲便与奶奶一起外出讨饭了。

1953年的统购统销和1955年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将越来越多的粮食从乡村抽走，加上1957年收成不好，春节刚过，父亲便开始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于是他上山抓蝎子卖钱，这是全家唯一的现金来源，卖掉蝎子后，父亲会带上村里发给的定量供应粮粮本，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粮所买些瓜干补贴家用，那个春季，父亲靠抓蝎子赚到的钱，为家中增添了差不多一百斤瓜干的口粮，但供应粮定量是有限的，当无法买到更多的粮食时，奶奶只好领上父亲和姑姑到几十里外的村庄里讨饭，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除了日本人打进来的年月，很少会发生讨饭的事，乡下人讲究面子，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是不会出门讨饭的。讨饭是件丢脸的事，所以要走得尽量离家远一点，不要被人认出来才行。于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农民往往相互交叉进行着这种丢脸的生计方式。

不过，大跃进运动的展开让父亲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外出讨饭了。政治动员之后村里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然后就开始了共产主义生活。一开始，食堂遵循着按需要分配的原则，允许村民敞开肚子随便吃，就连过路人饿了也可以随便走进路边的村庄里吃饱饭再走，这使父亲即使遭受后来的严重饥饿，仍有些怀念那短暂的共产主义社会。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就是大炼钢铁。炼钢炉并不是每村都有能力建起来的，年仅16岁的父亲和一些同村劳力被集中起来，步行到30里外的里庄去炼钢铁（据说里庄出产矿石），住的是里庄农民的房子，吃的是里庄农民刚建起来的食堂。饭仍然是管饱的，于是，摆脱了饥饿威胁的父亲感到浑身是劲，下决心要为大跃进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对于炼钢铁这件事根本

找不到头绪，别的不说，通往铁炉的轨道车（俗称轱辘马）上面就没有提供。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要父亲他们回到本村将自家的木床一锯两半，连接起来作为轨道，再把原本放衣服的空箱子抬去，装上四个轮子，作为运送矿石的工具。炭火自然是炼不出矿石的，便四处寻找铁器来重新回炉，很快，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鏊子便被一扫而空。

石头和金属融炼为一块块铁疙瘩，显然不是合格产品。等了几天，上级来了指示，把铁疙瘩送到八九十里外的垛庄去再加工，那里有一个“更高级”的炼钢炉。但这时候沿途各村的公共食堂已不再向过路人提供免费食物，父亲便担上三天的食物和一块块生铁蛋子，朝垛庄进发了。磨洋工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往返垛庄一次要用至少三天时间，当他们终于到达垛庄，把生铁蛋子朝地上一丢，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鬼知道垛庄的炼钢炉最终有没有炼出钢来。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是管饱的，16岁的父亲在共产主义的阳光雨露下屁颠屁颠地干得很高兴，而他的共产主义觉悟也日复一日地在提高。就是这个时候，乡里办起了劳动大学，由于父亲属于当时的知识青年，便被抽调到乡里的劳动大学“就读”。所谓的劳动大学，除了晚上被集中起来唱歌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学习，父亲每天的任务就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吃得很差，这让他感到很有些吃不消，好在没过多久又被抽调参加了村里的青年突击营，到王家庄去伐树烧木炭，作为炼钢铁的燃料。王家庄是一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山村，村子里长了上百年的大树很快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父亲所在的青年突击营见大树就杀，一直杀到王家庄再无可杀之树，才转战到水泉峪村，使水泉峪的大树成了第二批牺牲品。家乡的山上原是茂密的树林，自1958年的砍伐起，植被覆盖率连年下降，迄今再未恢复生机，自我记事起，山丘便是光秃秃一片。

1958年就这样过去了，对父亲来说，1958年是繁忙的一年，但也是不再挨饿的一年，尽管到了1958年底村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但青年突击队的伙食供应还是能够保障的，只是饭菜质量逐日下降罢了。

1959年一开春便开始修水库，村里的青壮劳力被抽调到几十里外的黄土山，将土地上的营生丢给妇女和老年人。所有我曾问过的家乡老人都告诉我1959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1959年和1960年也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但由于少了青壮年劳力的耕作，加上共产主义大锅饭的低效率，庄稼只能被马马虎虎地种上。与父亲同住一村的母亲当时只有10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一年总是吃不好，但饿肚子的时间还不是很多，因为越来越多的男人被抽调到外面修水库，村子里吃饭的人少了。公共食堂依然在办，但已不再允许过路人打秋风。至于村民家中的存粮，早就被以“挖老鼠洞”为名的搜粮队搜走，没有被搜走的，也不敢拿出来吃，由于担心受到批斗，即使在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这些存在地下的粮食也只能继续埋在地下。

雨季开始的时候，父亲从黄土山回到家中，由于麦收刚刚过去，仍然没有遭遇严重的饥饿，但与在黄土山水库的生活待遇相比，伙食质量显然在下降。不过，一项更大的水库工程在雨季过后又开始了。这一次是在家门口修水库，而且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自我记事起，这座如今被称为云蒙湖的岸堤水库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夏季里，它是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乐趣所在，但也残忍地先后夺去了我家两条人命。1959年，为了修建这座水库，政府集中了方圆几个县大约7万人（号称10万人）拦河筑坝。由于是国家重点工程，在当时全国已经普遍存在饥饿的情况下，被抽调到水库工地的劳力们仍然可以有一口饱饭吃。这再一次减少了当地农民遭受死亡威胁的风险，不过，庄稼活更没人做了（一些妇女也被抽调到水库工地），到了秋季的收割季节，由于缺少劳力，有些生产队索性用牛拉犁的方式刨地瓜，而刚刚被刨出来的地瓜，则被就地掩埋地下，算是被储存了，这导致当时作为主食的地瓜大量变质腐烂，当严重的饥饿来临时，村民挖出掩埋在地里的庄稼，却发现已基本上没法食用。修水库的工作是艰苦的，作为农民他们不怕苦，但在冬季施工的时候，几乎每个劳力都有过下水工作的可怕记忆。父亲回忆说，天上漂着鹅毛大雪，人一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反而觉得

很暖和，不想上来，挖完沙子后，一跃出水面，立时就会冻得骨头疼，赶紧钻进旁边的帆布棚，将光溜溜的身子扎进柴草里取暖——连把烘干身子的火都没有。“受的那个罪啊，没法说。老人们说，修水库给国家做出的贡献，比当年支前还多。”由于总是下水工作，民工们身上的皮肤裂开了鱼鳞口，一到晚上睡觉，就又疼又痒。

不管怎么说，受苦受罪和死亡相比，总还是仁慈的。家乡的许多老人都曾对我说，也许正是因为修水库所受的这份哭，使村里终于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为了保障重点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总要让这些壮劳力活下去的。

但1959年底到1960年的可怕饥饿还是到来了。不参加修水库的老人和妇女从夏季就开始挖野菜、摘树叶，掺着粮食做饭，可是到了冬季，野菜和树叶都挖不到了，人饿得头昏眼花。十几里外的刘官庄（巨山）一带不时传来饿死人的消息，父亲的姥姥就是刘官庄村的，姥姥来村里讨过饭，但尽量避免从女儿家中走过。后来父亲了解到，刘官庄发生的饿死人现象主要是在老年中当中，为了孩子们能够活下去，老人先是吃树皮，后来就吃观音土，肚子涨得老大，却没有任何营养，饿死前连观音土都吃不上，抓起地上的黄土就吃，死的时候，手指仍然深深插在泥土中。

因为即将成为库区，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这再次降低了饥饿给村民带来的死亡威胁。当时村里大约有500口人，按照上面的计划，要迁移到黑龙江省海伦县约200人，其他人搬到高处的山坡上居住。山东人恋家，很少有人愿意离开故土，但上级已经制定了搬迁的标准，家中没有老人的家庭首先被编入迁移队伍。当时，我的老奶奶（父亲的奶奶）已超过70岁，所以全家可以不必背井离乡。但母亲家中的老人身体还硬朗，却是要迁移的，于是母亲随家人去了东北。但不到一年，移民纷纷回返，母亲又随家人回到时代居住的村庄。假如没有这种对故土的眷恋，我的父亲母亲将不会在多年后结为夫妻，也就不会有我的出生了。

移民开始前村里还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有一户人家做了豆腐准备带在路上吃，把豆腐渣用来请客，一位前来道别的临村的亲戚好不容易见到吃的，猛往肚子里塞豆腐渣，吃完后一喝水，豆腐渣便在胃里膨胀，结果刚出村口就涨破肚子而死。

由于部分村民的离去，村里的粮食压力有所减小，但父亲仍然饿得要命，麦糠、野菜、树叶都已吃过，到了冬天，粮食越来越少，加上又有很多村民从黑龙江返回，饥饿的威胁更加严重。食堂已经停止，村里每五天一次向村民发放粮食，当时父亲已担任村里的统计员和粮食发放员，经常饿得直吐酸水，有一次饿昏在村部，但他告诉我，自始至终没有多拿过村里的一粒粮食。我对父亲的讲述表示怀疑，可他却说那么做并不奇怪，当时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威力，即使在饥饿面前，仍然是有效的。

到了1961年，移民黑龙江的村民已多数回返，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在那个漫长的饥饿时期，农民只好依靠他们特别能吃苦的身体硬撑。由于水库蓄水，家园已经淹没在水里，所有的村里住在山坡上临时搭建起的草棚里，野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们不知道饥饿何时才会结束，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只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四处找点什么东西吃，争取活下来，便成了他们唯一的愿望。男人瘦得象猴，成年女人绝了月经，孩子发育不良，这一可怕的情况直到1962年的“三自一包”政策开始后，才开始有了改善。

亲历饿死也无人公开说话的时代 作者：傅国涌（浙江）

在历史的各个侧面，隐伏着无数双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双眼睛摄取了历史的镜头，并记录下来，后人就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与官方历史总是着眼于实际政治利益不同，个人的记忆和叙述常常透过自己的眼睛，经过内心的沉淀，即便这中间也有过滤、有遗忘、有不够准确之处。一句话，私人记录中往往传递出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能击穿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便能把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

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真相逐渐揭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重新获得自我解放的过程。

以《党史笔记》受到知识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时代进入抗大，从延安一路走来，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在驻苏联使馆、在外交部，他曾长期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目睹并身历了权力舞台的风云变幻和上层政治的诡谲残酷，人性在革命的旗号下的扭曲和异化，他作为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命运遭遇……70 年的风雨仓皇，他就是红色大门内的一双眼睛，他看到了许多 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态，回忆生平的所见所闻所历，他的自述因此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张闻天曾是遵义会议推出来的中共头号人物，是一个书生革命家，心地比较干净，在政权到手之后，却为毛泽东所忌，先是外放使馆，再是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欲改行而不许。所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泽东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这样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现代君王之下当差，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主管外交事务，无时不诚惶诚恐。何方回忆，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一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 周都不敢做主，要写上“请主席批示”送呈，毛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

1958 年炮打金门，北戴河会议上明明定下了解决台湾问题“两步走”（即先收回金门、马祖，台湾、澎湖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说）的方案，毛泽东一转眼又要变“两步走”为“一步走”，“强调对美帝的‘绞索’政策。因为金马离大陆近，我们想什么时候惩罚，就可以打一阵子炮。台澎离得远，打炮够不着，‘绞索’就断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变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亲自拟电批王“胆大妄为”，指名王炳南，实批周恩来。周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检讨，说毛的批评是“暮鼓晨钟”。

周贵为总理，却形同旧时大家庭的小媳妇，时不时要受委屈。1958 年 2 月何方随周出访朝鲜，周在欢迎会上喝了 40 杯茅台酒，对于敬酒来者不拒，喝完酒还跳舞，在看文艺演出时，“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兰花花》，还拿起大红旗舞了几下。”事后，他才知道周在南宁会议上挨了毛的严厉批评。

更可怕的是，周恩来他们的日常规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转动，“独行其是”的毛个人白天睡觉、晚上办公，“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何方一度住在张闻天家，就是替张值夜班。

在全面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早已在党内确立。1947 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风盛行，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就与毛肯定和赞扬康生在山西临县的极左做法有关。1947 年 6 月 21 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1959 年，打倒彭德怀和张闻天时，毛泽东自己解释为什么反对党的领袖就算反党时，如此说：“因为党的领袖就是党的首脑。一个人把他们的头割了，他还能活吗？”

众所周知，储安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见，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多”与“少”的问题，到共产党统治下，将是自由“有”和“无”的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1946年何方到东北工作不久，与《东北日报》记者穆青、张凖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来的，能谈到一起。他就问：“国民党的统治严格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严格？”穆青他们说：“当然是共产党统治严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还可以写文章骂他，在共产党统治下，行吗？”尽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内千千万万青年仍然真诚地毫不犹豫地跟定了共产党。即使储安平1949年也选择了留下，这是历史的无奈还是个人的悲剧？1957年的大厄运降临到储安平头上时，不知道他内心有过怎样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张闻天的“右倾”冤案之中，尽管他也站在了揭发批判张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幸免，从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说，有着自由主义追求的储安平始终是共产党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么，像何方这样从小就追随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吗？数十年后，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认为自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是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他未来的命运在踏上延安那块土地时，就已注定。他被纳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机器之中，机器如何运转，何时牺牲哪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有偶然性，被抛弃、被打击、被牺牲的可能却随时存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延安的抢救运动不过是后来类似反右运动的预演。覆巢之下无完卵，何方是幸运的，晚年还有机会从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农村，一下乡，他就听说了饿死人的事，还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女人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了浮肿病。他在饥饿线上挣扎，最后得了浮肿病才回京。因为饿，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萝卜。善良、软弱的中国人，即使面对饿死的威胁，也不敢说话。他在农村就没有听到有人公开讲怪话，顶撞领导，更不要说聚众闹事了。这当然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严格”，没有反抗的余地。一年间，他只听到一句出格的话，是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说的：“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的《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记录表明，当时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何方着，邢小群录音整理《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2007年]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作者：高华 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动。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丰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

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跃进馍真正好，
既顶饥又顶饱，
节约粮食营养多，
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标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蒲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花八门。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0年3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

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 50%至 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 1960 年头几个月 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58 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 6 个省存在着浮肿病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 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菏泽地区：1959 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病人达 72.7 万人，死亡 1558 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 年 7 月，海口市与其它 6 个县有浮肿病人 4.3 万人。

至 1960 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 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 35.9 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 12.6 万人。6 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 89.2 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6]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地方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 年 4 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 1959 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 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 28 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 32 万，其中青壮年 10 万人。[7]

1960 年 1 至 4 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 17 万人次，比 1959 年同期增加 3 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 60%，前往西北的占 20%，其它城市占 20%。同年 1 至 6 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 60 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 30 万人。[8]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年11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年5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洋槐叶5分钱一斤。[12]

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1958-1959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年4月，江苏省宝应县3539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 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2) 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 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4) 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

(1) 继续出口粮食。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2) 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19]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 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21]

(4) 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

匿灾不报。

最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年—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了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沪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不知吃几两？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24]

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主席寄去。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毛主席。[25]……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和“反动言论”。[26]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

一，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正确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27]

二，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难，国家有国家的困难，群众应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

四，社会主义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在修复和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同时，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意识形态，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够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类平民化语言诉诸并调动群众的情感，使其服从于自我克制。现实世界早已是满目萧肃，但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就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领导者的常识思维，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1960年5月，北京领导层开始逐步知晓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维持，但直至此时，北京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而仅将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29]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也有省级大员。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大炼钢铁。[30]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体化为1960年7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粮食出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力粮食”。毋庸置疑，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1860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动员干部下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省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32]

在非常形势下，北京高层终于完全清醒。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三、大饥荒日趋严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广运动

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省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日的96天里，每人口粮仅82斤。[33]1960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已减至232斤，比1957年减少了55%。[34]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分地区，则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而国

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1960年7-8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35]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6]毛泽东虽没问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但他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才有了新的工作目标。

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竟使得意识形态机构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向人民解释这一切，只能空洞地开展“三大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活动。直至196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然而，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总得想出解决问题之道。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12条），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希望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网”，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1960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

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1955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广西灵山县数千人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之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通报中。之所以将野菜、树皮等名之曰“代食品”，其关键的考量是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政治立场问题。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旧社会劳动人民吞糠咽菜不能称其为食用代食品，而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所食的稻秸、糠根、玉米芯一类必须称之为“代食品”。以后相延成习，“代食品”一词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汇。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

（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物

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

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粱等）的秸秆；

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糠、根，土伏林等；

冷树皮；

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

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

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栳、芭蕉等）

各类昆虫……

（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

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

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

人造奶；

人造食用油脂…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 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饲料的食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这项发明在上海等地迅速得到了推广。至 1960 年 7 月底，全国二十七年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人类食物领域，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 年 10 月，胡乔木呈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知此物有如此功效，遂于 10 月 27 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37]要求全面推广。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报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北京、湖南的经验是，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 15 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粱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缈。[38]

四、组织、意识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得少于180斤；在1961年8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300万斤，叶蛋白1500万斤，人造精制淀粉2亿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1961年1至9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出安排，力争每人日口粮达到120斤，每天2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2.5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4月15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70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还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部，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槲树叶混入玉米面做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

红薯秧：含水分 39%，灰粉 1.84%，淀粉 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 30%至 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 1960 年 11 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 年 4 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 5900 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 1100 余人中毒，38 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 月，山西省 3800 人吃苍耳中毒，54 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 年下半年后，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 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卫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作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 1961 年。在这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 40 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 0.8%至 2.96%，蛋白质 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 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食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绝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 1960 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 1957 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 1960-1961 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 1961 年 11 月 15 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 12.2 万斤，高级饼干 1.9 万斤，高级糖果 12.1 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 7.6 元一斤，最低 3 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 5 元一斤，最高 16 元一斤；高级饼干分 4 元一斤和 5 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 1960 年 11 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 17 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 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 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 2 斤、蛋 2 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 17 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 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 8-10 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 40 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 17 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照顾 17 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 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 17 级”的范围，规定 17 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 1 斤、大豆 3 斤、

食油 0.5-3.5 斤，肉 0.5-3.5 斤，鸡蛋 0.5-2 斤，纸烟 2 条，下水 2-3 斤，水产 3-5 斤，粉条 3-5 斤，豆腐 3-5 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 200 余名负责干部划分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 40 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 70 多斤肉。[61]

17 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 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 6 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 32 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 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 39.3 万人，虽比 1961 年底增加了 8 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

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 1960 年 11 月和 1961 年 6 月作出的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 1961 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 1961 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 500 万吨，1962 年又进口 300 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 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 30 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 3 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 2 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 160 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几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 32 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 月 25 日至 10 月 5 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 80 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 10 月 2 日，仅销售了 30 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 1962 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廷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 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

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1][2][3][4][6][7][8][9][10][11][12][13][15][16][17][18][20][21][23][24][25][26][27][28][32][40][41][42][44][45][46][48][49][51][54][55][61][63][64][65]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

[5][14][33][6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 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南京：2001），页 365，365，368，380。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884。

[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社，1997）页 57。

[29][34][6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 369-370、368、38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872；另参见杜虹：《20 世纪中国农村问题》（北京：中国出版社，1998），页 450。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 365。

[3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 202。

[36]杜虹：《20 世纪中国农村问题》，页 458。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页 327。

[38]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195。

[39]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马明 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 86。

[43][60]邓自力（邓小平族弟）：《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页 156，157。

[47]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 409-410.

[50]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 197.

[52]丁学良：〈革命回忆录之五。我最早遇到的“持不同政见者”〉，载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01 年 2 月 13 日，第 24 页。

[53]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 426.

[56][59]韶华：《说假话年代》（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页 60，61.

[57]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页 116.

[58]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11 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 170.

[6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 89.

[68]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页 23-25；另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页 304、307；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页 295-302.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 年 8 月号总第 72 期

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一千二百五十万人 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 1957 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1962 年 6 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

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为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 候补委员）一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

因为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一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楨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着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

我想起市财政局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 年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有一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问他

什麼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着觉。

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爲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一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爲之苦涩暗叹。

冥想中，又一组画面 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 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麼叫“家徒四壁”，什麼叫“野有饿殍”什麼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爲实。人民群众 剝窃吮 遥 拇ㄣ廊已 舂酥 嗽 移衲茱 椴槐ǎ空庖灰冠に伎嘲慕熤崱 俩晌夷谴伪本 械乃 魍鷄慙>」軒 濃嗽饒芟私 甌慕倌眩 抑丈紫拊刮藁淤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

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一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怎麼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爲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后，中央爲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 80 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两个人。……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为什么开这么长时间？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一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

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为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为什么讲话啊？一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一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一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一颗真正为人民为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一大愿望。

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一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一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不大一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

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

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一条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因为我汇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

作为团中央的书记，对一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么，提出什么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一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一个是曾德林。看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一道去？他们说可以。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

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

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间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荣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

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反映荣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荣经县委书记姚青 1960 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 1959 年因到荣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

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荣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陈海儒：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代食品运动探微 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微

陈海儒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摘要]三年困难时期，面对普遍的缺粮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代食品运动。在农村，代食品的生产主要利用农作物的秆、叶、皮等和采集到的野生植物；城市的代食品生产则以小球藻和合成类代食品为主。代食品运动是一项重要的救灾度荒措施，但代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小秋收

[作者简介]陈海儒（1972—），男，陕西城固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史。

在中国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许多人也许已经淡忘了 40 多年前席卷全国的代食品运动。在 1959—1961 年粮食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为了缓解人们的饥饿感，中共中央倡导并组织全国人民大力生产、采集代食品，并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应该说，对这一运动的研究，是考察三年困难时期度荒策略及其效果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史学界对代食品运动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据笔者统计，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成果仅有高华教授的《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1]与罗平汉的《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代食品运动》[2]。两篇文章都从政治层面对代食品问题的产生及效果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考察，本文拟利用《人民日报》及一些地方档案资料从微观的角度，对代食品运动做进一步的探讨，渴望能达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代食品运动的背景

随着 1958 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比如云南省在 1958 年春夏之间就有 70 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导致 23 万多人因饥饿而得了肿病，其中有 3 万多人饿死。[3]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以河南、山东为例：1958 年底，河南省一些乡的食堂经常吃的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红薯面汤或红薯粉汤；山东省有的地方的群众不得不一日三餐在食堂光吃萝卜喝开水，有的整天喝地瓜干粥，情况好一些的也不过每天喝稀饭，外加一至两个菜窝窝或者豆子掺粗粮的窝窝，到 1959 年初，则连红薯也没有了。[4]就连一些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地区，也到处可见因没粮吃而或水肿、或干瘦、或毙命者。比如在有名的“西北小江南”——汉中，有的县大量群众弃家外逃讨饭，以谋生路；就连情况不算差的宁强县，群众也已经普遍断炊，有一个断炊多日的妇女获得照顾，被分给 2 斤肉、2 斤麦子，这个女人未等到回家已经在路上把 2 斤肉和 1 斤麦子生吃光了。[5]到 1960 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蒋介石：大坏蛋，一天能吃三顿饭；共产党，好领导，一天两顿吃不饱”，“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江西群众讲“走进食堂门，稀稀拉拉一大盆，锅里照见人，碗里照见魂。”[7]

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新中国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以《人民日报》为例，它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 1958 年和 1959 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新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救灾措施：低标准，瓜菜代。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因为原本就不高的口粮标准降低后要使群众不饿肚子，只有掺杂其它的东西当饭吃；在副食品供应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大量生产出来当饭吃的东西只有瓜果、蔬菜和代食品了。于是，在中央倡导与组织之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大种瓜菜和大力生产代食品的运动。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生产实践，中共中央于 1960 年 6 月发出了“积极采集和储备代食品，必要时粮食部门应当收购一部分代食品储备起来”[9]的指示。到 1960 年 11 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的下发，一场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

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二、代食品的采集与生产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曾采集、食用过代食品，如树皮、草籽等。然而当时的行动都是人们自发的、出于本能的生存欲望而采取的，大都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从总体上看，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玉米包皮、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秆、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茎、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太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由于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广大农村主要以采集和制造农作物类代食品和野生类代食品为主，同时也非常重视小球藻的培育；城市则主要培育小球藻和制造精细代食品。

1、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

人们在寻找代食品时，最容易想到的是从农作物上入手：除了平常食用的粮食之外，农作物的其它部分是否可吃呢？既然平时可以用它们来喂养家禽家畜，那么人应该也可以用它们来充饥。于是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把农作物的秆、叶、皮、壳等做成代食品。

(1)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比如把玉米包皮沤在一个大池子里，经过几天的浸泡、搅拌、沉淀，池底就会出现淀粉。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日报》和一些内部刊物都有文章推介此类制作淀粉的经验。如《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3版该报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讲：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中共陕西省委的《代食品工作简报》也向全省宣传西安市雁塔区食品加工厂用豆秆、豆壳成功制作淀粉的事迹，说每百斤豆秆、豆壳可产湿淀粉80斤左右，将该淀粉和面粉混合可以蒸馍、擀面、炸丸子和制作各种糕点。[10]《农村工作通讯》则早在1959年就介绍了河南省清丰县用玉米包皮制造淀粉的经验，而且用河南省粮食厅粮食研究所的鉴定结果向人们说明玉米包皮中含有33.36%的淀粉，如果能将全国种植的近二亿亩玉米的包皮充分利用起来制成淀粉，无异于增产粮食七、八十亿斤。[11]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12]

实际上，在 很多农村，人们在 1959 年粮食紧缺时就已经食用农作物的秆、壳、皮了。媒体和政府及党委的推介只是使得农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地食用它们。而且，与推介的经验不同的是，人们不是用各种方法把农作物的秆、壳、皮先制成淀粉食用，而是直接把上述农作物的秆、壳等磨成粉末，与少许玉米面粉或小麦面粉掺杂在一起做熟用以充饥。

为了大大加快利用农作物的“废料”制作代食品的进程，一些机械部门还专门研发了相关的设备。如陕西科学分院机械厂制造了一种电动粉碎机，每小时可以粉碎玉米根 80 斤，玉米芯 90 斤，红薯蔓 180 斤。[13]该粉碎机 分配到陕西各县使用后，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2)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连《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14]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15]云南墨江县的农民在困难时期大种芭蕉芋，用以渡荒。

此外，苜蓿也是三年困难时期值得一提的代食品。苜蓿耐旱，管理成本低，如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是当时人民公社主要的牲口饲料。饥荒中，人们把它当菜来吃。

2、“小秋收”与“小夏收”

如果说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与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相关联，那么野生类代食品的采集与“小秋收”、“小夏收”是分不开的。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 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 1959 年 11 月 30 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 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有一首黔东南的山歌很能反映当时群众采摘利用野生植物的情景：“贵州山多坡接坡，山中宝藏多又多，男女老少齐上山，采下山货来加工，去时一对一对空箩筐，回时一箩金子一箩歌。”[16]1960 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 年 8 月 10 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1961 年的“小夏收”和“小秋收”活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也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有一些机关、工厂等城市单位纷纷抽调人力支援这一活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对多种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图片或文字介绍。比如对橡子，据《人民日报》介绍，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 30—50 斤，经过水或碳酸钠溶液浸提，除去单宁，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虽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含量也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 17 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体 所不能合成而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 8 种氨基酸。”[17]再如《农业技术》刊物对沙枣的介绍：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以甘肃省最多；沙枣的果实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沙枣面可以蒸馍、作饼、作面条，还可以作糕点、果酱、酱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枣可产沙枣面 38 斤左右；沙枣的嫩叶煮熟可以当菜吃。[18]一些出版机构也在 1960、1961 年出版了大量的介绍野生淀粉植物的书籍，为人们采集、制造代食品提供依据。以 1960 年为例，全国发行的此类图书有《山西野生植物》、《甘肃土产淀粉植物资源》、《福建野生淀粉植物》、《河南野生植物的利用（土产部分）》、《湖北野生淀粉植物》、《野生植物的鉴别采集与利用》等。[19]

通过“小夏收”和“小秋收”，群众采集了大量能吃、能穿、能用、能烧、能喂的野生植物，除了供应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外，其余的部分被制作成各种代食品，有的植物的根、茎、叶、皮被直接食用，有些则经过了初步的加工如浸泡、磨碎等之后被食用。

3、小球藻及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但《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1959 年 12 月《人民日报》文章《小球藻——可作精饲料》报道说：浙江省温州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用人粪尿代替化学肥料培养小球藻成功；小球藻具有繁殖快、产量高、营养好的特点，“用一斤浓缩小球藻喂猪，每日体重可增加 0.95 斤；用来喂牛、鸡、兔等，体重也都有显著增加，效果相当于二斤豆饼”。[20]随后，《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小球藻，围绕它的研制、繁殖、作为饲料的营养价值等问题做了详细介绍。

直到 1960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报》第 1 版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比如《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21]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渡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就连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不例外。他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并列举了生产和食用小球藻的几个好处：一、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可以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三、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四、小球藻的生产不与农作物争地、争水、争肥、争劳力。毛泽东于 1960 年 10 月 27 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22]

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与此同时，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纷纷出版，仅 1961 年就出版了《国外小球藻的试验

和研究》《小球藻生产知识》《小球藻生产技术问答》《小球藻（僮文版）》等。[23]各地也竞相开展相关研究，改进小球藻的生产技术。如西安铁道学院用面筋试制小球藻，经西安制药厂分析，用面筋生产的小球藻干粉中蛋白质含量比鲜猪肉要多十个百分点。[24]此外，仅据《人民日报》报道，1960年下半年就有一系列加速培育小球藻的新方法、新技术被研制成功，如宁夏石嘴山市使用咸水培养法、浙江杭州市留下公社利用水田挖池培养法、华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小球藻研究组关于适当搅拌能促使小球藻加速繁殖的发现、北京农业大学防治小球藻害虫的方法、浙江省瑞安县和北京中德公社让小球藻在严冬也能正常生产的技术等。[25]

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大范围推广的难度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门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各地介绍。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科学分院和陕西科技大学试验以萝卜、红薯取代琼脂、葡萄糖为培养基的人造肉生产技术，陕西省大荔农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培养链孢霉的技术，以及西安化学研究所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绍这一经验。[26]一些县、市如兴平县、大荔县等随之纷纷建立了一些小型的精细代食品生产点。可惜的是，1960、1961年萝卜、红薯以及玉米叶等生产精细代食品的原料在各地已属稀缺，人们无力将这一试验成果广泛运用。

三、代食品的功效及人民的反应

应该说，代食品运动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突出。当时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极低，以西北地区较为富庶的陕南汉中为例，1960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按原粮计算，一些平川县区的大队为半斤[27]，丘陵地区只有4.1两[28]。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口粮仅仅靠精打细算、多吃瓜菜根本难以果腹，因此用农作物的根、秸、叶等生产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补了粮食上的不足。如上述汉中地区的多数平川社队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原粮安排群众每日生活，丘陵地带的社队每人每日约吃2.5两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代食品。[29]虽然，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30]，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有农民将这样的食品高价出售竟也颇有市场，例如陕西省长安县五星公社部分社员剥食榆树皮之余，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达500元之多。[31]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如1961年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了《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预防与治疗》、《食品中的化学毒物系统检查法（第二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食物中毒防治手册》，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提高警惕预防食物中毒（宣传挂图）》等，黑龙江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有毒的野生植物》、《几种常见的有毒植物》，[32]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仅以陕西为例，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其中中毒较重者11人，经过抢救，4人脱险7人死亡；[33]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34]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其中26人中毒较深。[35]

综合说来，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之不能估计过高。应该说，代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参考文献：

[1]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72期。

[2]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3]当代云南编辑部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4]《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河南、山东有些地方缺粮》，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总第2693期（1959年1月24日出刊）。

[5]《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汇报全县黄肿病人情况》、《关于宁强县几项主要工作情况 的报告》，汉中市档案局档案，全宗号081，案卷号019，永久。

《部分富裕中农及其代言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种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思想动态》1959年第31期。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案卷号763，永久。

[7]马社香《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人民日报》1960年8月25日第1版。

[9]《中共中央关于抗旱备荒的指示》（1960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10]《西安市雁塔区食品加工厂利用豆秆、豆壳制作淀粉成功》，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1期（1960年12月9日）。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

全宗号 123-30，案卷号 17，永久。

[11]张浩天《人民公社喜事多—清丰县玉米包皮制淀粉的经验》，《农村工作通讯》1959年第24期，第21页。

[12]冀社《“饲料之王”登殿就位》，《人民日报》1960年1月15日第3版；《把玉米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人民日报》1960年1月15日第3版；《人民日报》评论员《把玉米提到主粮地位》，《人民日报》1960年3月24日第3版。

[13]《陕西科学院机械厂仿制电动粉碎机成功》，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9期，1961年2月11日。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7，永久。

[14]刘宗棠《取尽甘薯全身宝》，《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1日第3版。

[15]云南省农科所综合组《高产的地下粮食和饲料—芭蕉芋》，《云南日报》1960年8月10日第3版；张克爱《芭蕉芋用处多》，《云南日报》1960年11月12日第2版。

[16]《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3日第6版。

[17]《橡子》，《人民日报》1961年9月19日第2版。

[18]《沙枣》，《农业技术》1961年11月刊，第4页。

[19]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60年全国总书目（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年版，第329、330页。

[20]《小球藻——可作精饲料》，《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日第3版。

[21]《小球藻是个宝》，《云南日报》1960年8月17日第3版。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23]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61年全国总书目（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

[24]《西安铁道学院用面筋试制小球藻成功》，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2期，1960年12月27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7，永久。

[25]《改进繁殖技术 大量生产小球藻》，《人民日报》1960年8月6日第3版；《浙江省瑞安县、北京中德公社让小球藻冬季正常生产》，《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第3版。

[26]《陕西分院、科技大学用萝卜、红苕培养“人造肉”菌种》，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四期）；《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可以培养链孢霉》，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五期）；《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九期）。以上均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23-30，案卷号 17，永久。

[27]《浮肿病情况报告》（1960 年 2 月 13 日），汉中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081，案卷号 037。

[28]《汉中专区浮肿病调查防治工作组关于勉县褒联人民公社浮肿病调查报告》（1960 年 12 月 23 日），汉中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081，案卷号 037。

[29]同 28。

[30]惠文《困难时期整社记实》1961 年 7 月 16 日，转自[新]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org。

[31]陕西省委生活办公室《关于生活安排工作情况汇报》（1961 年 4 月 30 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23-30，案卷号 2，永久。

[32]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61 年全国总书目（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87、175 页。

[33]洋县人民委员会《关于我县谢村公社食枇杷子发生中毒问题的报告（60）会卫字第 105 号》，陕西省汉中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081，案卷号 040，永久。

[34]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大办代食品的情况报告》（1960 年 12 月 15 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23-30，案卷号 16，永久。

[35]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紧急情况汇报》（1960 年 12 月 23 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123-30，案卷号 16，永久。

大跃进与大饥荒 余习广：《天崩地彻像深渊》 【历史背景】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场「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中共提出「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的目标。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了三百多万吨废铁。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人收获，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

那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但由于害怕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害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有些地方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由于受到「翻一番」的假数字的欺骗，全国各地「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

行，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又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疾呼。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大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

「大跃进」导致至少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饿死的。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两千年来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一事件成为中共继「土改」之后的又一社会大悲剧。

【新闻背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兰青报道）二零零八年是中共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五十周年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研讨会探讨了中国当代史上这两大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这对当今中国的发展走向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透视中国』栏目继二零零八年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之后，今年再次开辟「大跃进与大饥荒」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的演讲文摘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一起回顾、反思和探讨。

【余习广演讲】暂缺

【作者简介】余习广：原籍燕赵，长于湖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师。自称“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主持“共和国上书史”系列、“大跃进 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系列、“文革造反夺权大典”系列；《擎起共和国圣火：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等。常乙太史公风范自勉，常以以商养文自得，常以还历史真相自诩的一介书生而已。（摘自作者博客）郭沫若抛弃日本妻子的借口：日本军国主义惹祸

郭沫若和肖志军

1916 年，留学日本、身为官费留学生的“流氓加才子”郭沫若用 100 多封情书伴随着诗人般的甜言蜜语，搭上了日本士族人家中的小姐佐藤富子，并与其生了 5 个儿女。

佐藤富子为了表达对郭沫若深切的爱情，后更名为“郭安娜”。

此后，大革命中郭沫若与安娜的始乱终弃、1933 年流亡日本后嫖娼染上性病并传染给了安娜、花心导致才女于立忱的自杀这些事都无需说了，我只说自从他 1937 年离开日本，离开安娜和五个子女回国“参加革命”后，从此断绝了与安娜的一切联系，没有片言自语对安娜

说明、交代，妻子换成了于立群。

关于这一点，安娜后来曾经痛哭流涕地说过："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安娜这段哭诉的话，明白地透露出郭沫若存心抛弃安娜与孩子这个客观事实。

郭沫若用暗示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过。他曲折地讲了十九路军一位团长的故事：这位团长与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美满。"9.18"事件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打响了对日抗战的第一枪。"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决心奔赴国难，遂与妻子离婚。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

郭沫若讲这个故事的暗示原因很简单：他要告诉人们"忠孝不能两全"，他是为了抗战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而抛弃安娜和五个子女的。

太光辉灿烂的理由了：他非但没有罪过，而且显得灵魂行为是多么崇高与伟大。

抛妻弃子经过这种合理化的理由后，成了英雄的壮举。

后来，郭沫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一直回避见来中国定居的安娜。病危临死前，在安娜的强烈要求下，在病房中见了一面。安娜并没有追问自己和子女当年被抛弃的原因，反倒是郭沫若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原因。

郭沫若说：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惹得祸。

用一个堂而皇之、虚无缥缈的理由来掩饰遮蔽个人的罪恶与错误，为自己个人的罪恶寻找出合理化的根据，这是中国人最乐于做的事，从政府到组织，从组织到个人，无不如此。

于是，太多的个人罪恶，用一个模糊的文字概念或者说游戏，就轻轻划过摆脱掉，与自己没有任何牵连与关系。一切都没有得到清算和反思，任何迫害他人的受害者，都在几个大而空的虚无字眼中让自己也变成了受害者。

郭沫若如此，目睹着与自己共伴多年、怀孕女人痛苦死掉的肖志军也如此。

抗日战争再轰烈，国家、民族利益再伟大，也掩盖不了、洗刷不掉郭沫若抛弃安娜与子女，视女人如同穿过的衣服随意抛弃的丑恶。

任何体制上的不足与缺陷，也抹不掉肖志军眼睁睁看着与自己共患难、怀孕女人死掉的冷酷与恶毒；如果他要寻找任何理由来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辩解的话，只能是越发证明了其卑鄙与污浊，其它任何作用都没有。个人是个人，政府是政府，体制是体制。

要追究要清算的话，要区分开来，而不是搅成一锅粥。

民族不是两个字，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成员来组成。

这一个个具体成员的优与劣，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走向。

可以谴责个体的郭沫若，可以谴责具体的肖志军；可以探讨造成郭沫若、肖志军背后的社会原因，这二者相辅相成，丝毫没有半点的矛盾与冲突。

但是，不要为郭沫若和肖志军的个人卑劣行为打掩护，尽管你可能是无意的，但我们要预计到客观上所产生的结果。

谁的责任谁承担，要分开来说。

郭沫若最无耻的一篇文章 作者：西风独自凉

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那个时代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文人操守、气节可言的无耻小人，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郭沫若通过《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他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把四人帮骂得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

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 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不知道一些用心险恶、丧心病狂的台独分子看了他的大作会作何感想。

1949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

马屁文人之最高境界：郭沫若诗词欣赏 内容摘要：一组郭沫若不朽传世之作,共大家消遣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 70 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 **
妄图倒退
奈 “ 翻案不得人心 ”
“ 三项为纲 ” 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 · 粉碎四人帮》 1976 年 10 月 21 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也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作者：西风独自凉 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文革时期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气节可言的知 識 分子，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 年， 36 岁的郭沫若通过自己创办的《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攻击鲁迅 “ 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 ” ， “ 阿 Q 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 Q 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 ，说鲁迅 “ 蒙蔽一切社会恶 ” 、 “ 麻醉青年 ” ，是 “ 反动的煽动家 ” ，比 “ 贪污豪绅 还要卑劣 ” 。还在署名 “ 杜荃 ” 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 “ 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 、 “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 、 “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 、 “ 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帝 ” 。

郭沫若 1937 年回国后，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他， “ 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 ” ，说蒋的 “ 眼睛分外的亮 ” ， “ 分外有神 ” ， “ 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 。

1948 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 “ 桃红色 ” 作家，朱光潜界定为 “ 蓝色 ” 作家，萧乾则是 “ 黑色 ” 作家， “ 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 。

沈从文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后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

郭沫若随便也报了一箭之仇 ----1931 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 “ 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 ，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 “ 不节制 ” 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乘火车出访苏联，正值斯大林 70 大寿。郭沫若发表《写给斯大林元帅 70 大寿》：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1953 年，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下对联：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58 年，毛泽东说： “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 闻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认为李白、杜甫是中国 “ 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 的定论，发表《李白与杜甫》，把留下千古绝唱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的诗圣拖出来鞭尸：

“ 杜甫仅仅是记录，作壁上观，并没有斗争，也没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统治，是改良主义，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石壕吏为什么不抓杜甫，这说明杜甫有特权，属于地主阶级。 ”

1955 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和《请依法处理胡风》：

“ 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 ” 他主张对胡风及 “ 胡风分子 ” 们处以死刑！

1967 年 6 月 5 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 “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 ‘ 黄梁 ’ 写作 ‘ 黄粱 ’ ，无心中把梁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 ‘ 分田分地真忙 ’ 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

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于是，毛的这些失误和硬伤都化做诗词和书法的顶峰，且上升到了“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堪称马屁之王。

1976年郭沫若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这篇奇文：人民日报 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伦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伦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食不安的，今天民 × 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态，但象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寡廉鲜耻、丧心病狂、不遗余力地践踏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自己变成一条乱咬胡捧的小丑加“狂犬”，也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个案，对解析中国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恐惧和献媚心理不无裨益。

附：关于郭沫若的个人生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藤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 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

下落不明；他的小姨妹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多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于立忱自杀的内情：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

郭沫若是与安娜自由相爱结合的，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宪兵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郭“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忧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死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郭沫若对他自己本人的评价是：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歌颂消灭麻雀运动揭密 作者：王鑫海 麻雀、狼和中国人是建国以来有关“权威”们先后认定的三大环境公害。认定三大环境公害所使用的借口惊人地一致：消灭麻雀是为了节省粮食；消灭狼是为了避免牲畜损失；消灭人口是为了节省资源。反对的人都会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发动的形式也很相似：消灭麻雀运动发端于1955、1956年“青年团甘肃省委”、“青年团北京市委”的号召；打狼运动在大批知识青年到内蒙古草原后达到高潮；“一胎化”计划生育运动正式启动的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请注意，这一信件仅仅是“号召”，无法律效力。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仅仅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1，麻雀。

《咒麻雀》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1958年4月21日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理由是为了节省粮食。尽管从事件一开始就有科学家顶住巨大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鸟，不应消灭，但他们的呼声并没有能够阻止一场针对麻雀的“人民战争”，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1955—1960）。

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城市附近的农田啄食谷物。在起草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负责人也曾就麻雀的益害问题咨询过鸟类学家郑作新，郑作新的答复是：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在农业区它肯定是一种害鸟，但在果区、林区则有捕虫的益处。

“然而农民常常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只看到庄稼成熟时，成群的麻雀飞到田里吃谷子，使农作物的产量受到损失，并没有看到麻雀也吃害虫。”

于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青年团甘肃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组织100万青少年，在冬春两季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青年团北京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们广泛发动群众，1956年1月7日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

1956年1月8日，竟有科学家在中国影响最大、权威最高的《人民日报》上公开撰文，大谈麻雀的害处，并介绍了诸多消灭它的方法，直接影响了决策者。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剿雀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打麻雀运动进入了一段缓和期。从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开始，麻雀尽管还在打，但其命运有所改观，可以讨论了。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谈谈麻雀》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促成了一场关于麻雀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回忆称，在拥护消灭麻雀的队伍中，最典型的是当时任教育

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鲁迅之弟）。他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由于存在相当数量有理有据的反对文章，麻雀讨论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很可惜这种有益的大讨论被1958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断，人们彻底疯狂了！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随着小麻雀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打麻雀运动虽然停止了，但其余波数十年未熄，打鸟活动屡禁不止，直到现在还有人振振有词，称打鸟是“除害”。

2. 狼。

与麻雀相比，狼被当作公害剿灭的时间更长，平反也较晚。

从1949年到1978年，狼一直名列害兽榜。在南方山区，剿灭狼造成的生态危害相对来说较轻，因为这些地方的生态系统比较复杂稳定，即使狼被消灭了，它的生态功能也可以由其他食肉动物替代，但是草原灭狼运动却对草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千万年来草原民族一直认为狼是草原的保护神，狼是草原四大害兽——草原鼠、野兔、旱獭和黄羊的最大天敌（草原罕见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四害”中尤以鼠和兔危害最烈。鼠、兔的繁殖力惊人，一年下几窝，一窝十几只，一窝鼠、兔一年吃掉的草，要比一只羊吃的还要多。鼠、兔最可恶之处是掏洞刨沙毁坏草场。草原上地广人稀，人力无法控制鼠灾兔灾，而鼠、兔恰好是狼的主食。在冬季，鼠和旱獭封洞之后，野兔和黄羊就成为狼群的过冬食粮。狼又是草原的清洁工，每当草原大灾（白灾、旱灾、病灾等）过后，牲畜大批死亡，腐尸遍野，臭气熏天，如果不及时埋掉死畜，草原上就会爆发瘟疫。据草原老人们说，草原上很少发生瘟疫，是因为狼群食量大，它们会迅速处理掉尸体。此外，草原狼常常攻杀牲畜，客观上起到了调节草原载畜量的作用。事实证明，狼是草原生态的天然调节器，内蒙古草原过去几千年一直保持生态平衡，草原狼功不可没。

牧民每年杀狼，但是从未赶尽杀绝，保持了生态平衡。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政府鼓励打狼，评选“打狼英雄”，提议给狼留活路的老牧民被指责为“思想落后”。牧区政府、

驻军甚至亲自动手，用汽车、步枪、冲锋枪“帮助”牧民消灭大量的狼群，有的地方形成了百里无狼区。

狼逐渐减少甚至灭绝，导致草原四大害兽迅速繁殖，再加上大规模的开垦，草原发生了迅速的、不可逆的沙化。

在 1978 到 1998 年期间，狼的生态功能逐渐被人们承认，待遇转好，不再被赶尽杀绝，但草原已经是千疮百孔。1998 年起，随着生态保护资金的大量投入，内蒙古草原才开始局部恢复生机，境外的狼群分批迁入。狼的数量成为草原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

3，中国人。

在 1977 年之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在 1977—1979 年期间试点，1980 年全面推行），中国人被“权威”们认定为主要的环境公害，“人口多”成为环境与资源危机的重要解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3 亿人中间确实有环境“害兽”，但不能因此说 13 亿人都是环境公害，从而推行强制、过激、不计后果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

环境危机可以分为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两大类。

在一系列的大规模环境污染群体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要求保护环境，但是资本和权力的勾结导致某些严重的环境污染项目逆民意违法上马，受害人求告无门。那些违法污染环境的“一小撮”人才是不折不扣的“害兽”。

在环境破坏方面，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农民直接参与猎捕、采挖野生动植物，但他们并非真正的“害兽”。歧视、剥夺、陷他们于绝境的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体制才是真正的“害兽”。要改变这些人破坏环境的行为，就必须对一系列涉及利益分配的相关法律（例如选举法、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规）进行变革，这种变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由于原有利益格局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变革进程的主导权，而弱势集团很少有参与变革的机会，这种变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面对环境恶化的压力，决策者必须选择是继续牺牲环境还是“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对乡村地区大量的环境破坏行为有意无意的“宽容”和“放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者通过牺牲环境暂时缓解社会内部冲突的“决策”。实际上，数亿贫困农民所消耗的资源，可能少于最富的几千万中国人消耗的资源。

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指出，“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重新分配”。“即使是在其他国家，从长远的观点看，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也常常使得穷人难以分享那些通过牺牲荒野地而获得的利益。无论在哪个国家，试图以牺牲荒野地来使社会的不利阶层获得利益的做法都是徒劳无益的，除非社会结构足够公正从而使得利益的这种转移成为可能。如果社会结构不能确保利益的这种转移，那么牺牲荒野地以拯救穷人的做法就不过是权势集团保护既得利益的一种烟幕；那种做法几乎牺牲了处于不同层面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延误必要的社会变革，使社会的不公正（一种社会性的负价值）延续下去。如果社会制度是公

正的，那么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会得到满足”。“人类内部的比例失调(不公正)的分配不能靠进一步扩大人工环境与原始自然环境之间的比例失调来解决”。

例如每年春夏，在宁夏、甘肃、内蒙挖甘草、发菜的流动大军就有百万之众，每年破坏草地几百万亩。记者采访发现，在早春，夜晚气温还是零下十几度的时候，采挖大军就开始准备行动了，在这批人中间，八、九岁的孩子随处可见，每个孩子一天的劳作（破坏环境）所得不过是几元钱。采挖的发菜，却绝大部分为城市富裕阶层所享用。确保这些孩子坐在温暖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而以中国当前的财力，只要用心去做，并非难事。

传统的经济学一般只涉及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而无法就业的所谓“剩余人口”历来被看作是资源消耗者和环境破坏者。

计生部门所说的“剩余劳动力”真的是环境破坏者吗？实际上他们是被闲置、浪费的宝贵资源。

从新兴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一个环境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基础是三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环境生产三者之间的和谐。

当前中国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失业和半失业的两亿左右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不能够被工业化进程吸收（由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人口结构畸形发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趋势），被计生部门和很多“社会精英”视为包袱，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宝贵的人力资源。

现在朝有余财，野有饥民，政府游资和剩余劳动力被人为分离。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将社会给他们的生存压力转嫁给周边的生态环境。

如果能够有一、两亿农村人口投入中国的环境资源建设，全国环境状况将会日新月异，而这些人的平均年工资需求不过是两、三千元而已（大致接近现在的农民平均纯收入）。中国现在一年的公款消费超过一万亿，节省一半就够了。

持续的环境生产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环境质量，积累环境资本，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人们在感受到消灭麻雀和消灭狼的危害之后，才改弦更张，尊重自然规律。麻雀、狼的悲剧源于片面的政治宣传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打压，与现行人口政策的出台背景如出一辙。直到现在，深刻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还很难在主流媒体刊出。

人既可以破坏环境，也可以保护环境。13亿中国人被当做“害兽”，替体制弊端背环境危机的黑锅，不利于探究环境危机的真正原因，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就像一个人患肺炎导致发热，糊涂医生偏要说他是“肥胖导致发热”，“理论基础”是“胖子都容易出汗”。病人一命呜呼，医生难辞其咎。中国已经错过了至少十几年最佳应对时间，现在亡羊补牢，也许可以减轻一些损失。

如果继续把全体13亿中国人当作环境“害兽”，继续推行南辕北辙的强制“一胎化”计

划生育政策，延误环境治理及环境建设，中国 很有可能面临老龄化危机与环境危机并发的可怕后果。

参考文献：

1，欧阳海燕，反思 50 年前全民围剿麻雀运动，《新世纪周刊》，2007 年 2 月。

2，[美]霍尔姆斯 罗尔斯顿 著，杨通进 译，许广明 校，《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 沙叶新

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

记得 1958 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 1921 年写作此诗，时年 28 岁。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 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已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谄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

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巴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使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冉云飞：饿死3775万的惨祸

目前北方15省的旱情相当严重，冬小麦的情形不容乐观，据官方说是43%是严重减产。当然由于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注水和压缩统计数据，因此已经有人开始怀疑这旱情比43%的数字更为严重，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报喜不报忧，这六十年来的可怕传统，依旧统领着官方执权柄者的思维，也是上下沆瀣一气，欺瞒民众，以达在高压桎梏下的稳定，从而形成统治者阶层利益最大化。

大家都在担心经济危机给农村民众所带来的进一步影响的时候，哪知如此严重的旱情从背后横插一刀，给农村民众的生存雪上加霜。有些很会为农民“盘算退路”的专家学者继续在政治正确上叫好：农民工在城市失业还可以退回去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事实上农民求生不仅在城市是脆弱的，容易失业的，就是在农村也是靠天吃饭的，其保障何在？几十年了，在教育、卫生、大病统筹、养老保险诸方面的投入，在农村可谓少得可怜。且不说计划生育政策有悖人权之嫌，老实说计划生育在农村为何困难重重？其症结在于缺乏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养儿防老”观念的根深蒂固。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会实行野蛮的罚款、没收、牵牛抢羊、上房揭瓦、关押拘留等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基本国策”，导致了今天许多农村问题的积

重难返。由于农民的非国民待遇，其在经济危机和天灾面前的应对能力，几十年来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才是当今农村的最大问题。不要说失业找不到工作，连吃饭都快要成问题，你说这 2009 年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阿玛蒂亚·森有个著名的说法，他说印度也很穷，印度也发生过饥荒，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这样惨绝人寰的事，这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物资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从而有效地弥补了灾荒所造成的损失。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哪怕今春这样的干旱，只要官方不封锁消息，不进行粮食自由流通的限制，不会发生像 1958 年至 1962 年这几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惨祸。同时，官方对受灾受害的这些农村进行切实有效的补贴，以使有购买粮食的能力，从而度过今年的难关。但问题在于，你度过了这次难关，还有下次难关，农村自我救济的脆弱是有目共睹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统治，已经给农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今后的日子还会进一步地显现出来。如若不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大下功夫，那么农村随时就是中国社会稳定无法消解的定时炸弹。

说到大饥荒，当然又会说到 1958 年至 1962 年的大饥荒。目前有文章指出，由于国家档案的开放，1959 至 1962 年饿死人数基本确定 3775·8 万。这个数字，与杨继绳先生《墓碑》里得算出的 3600 万人，差别不是太大，但依旧有 100 多万之众。这样的差别，只有待各地关于饥饿的种种档案完全解密，才能做得更加细密。饿死的数字不够准确，可以允许诸种争论与辩难，关键是要开放诸种档案，允许官方和民间研究者去研究，共同说出事实的真相。只有弄清真相，为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向民众道歉，有效实现和解，才是中国民众之福。那种想掩盖与否定曾经发生过这样惨绝人寰灾难的机构与个人，都是罔顾事实的。

——转自冉云飞博客

严家伟：大饥荒岁月里的悲惨故事 今秋为了看望阔别多年的“右派”难友，特别绕道去重庆拜会车玉生医师。车老今已年届九十，是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骨科主任医师，中国著名的骨科专家。1957 年被打成“右派”，送 415 劳教支队“劳教”，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15 年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劳改。是当时四监狱医院里顶尖的技术骨干。当时我也是四监狱的劳改政治犯。监狱当局见我年轻，又有点文化，就叫我在医院当一名“护士”。车老便成了我学医入门的启蒙老师，并跟随他一起作医务“临床”工作七、八年之久。因此，我们既有难友之情，又有师生之谊。

此前，我曾数次赴渝，他也两次来宜宾相会叙旧。但这次一别四年，车老明显地“垂垂老矣”了，心脏带着启搏器，上下楼都需人搀扶，再也不能像十年前那样陪着他去登临南山、黄山，瞻仰抗战遗址“复兴”雄关、中正故居，畅游南北温泉，令人不胜感慨。于是几天时间里，就只能陪着他促膝谈心。但车老仍思维敏捷，每天坚持记日记，写回忆录。可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那个小保姆，对此却有点持不同“政见”。她说“哎呀，车爷爷你好好休息嘛，一天到晚写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用啊”？我听了连忙说“你错了，小妹妹，这可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叫抢救历史，留下历史，拒绝遗忘。你车爷爷就是一本活的历史”。小保姆对我的话似懂非懂，一脸疑惑地望着我。车老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好像焕发出了青春活力似的，于是翻开他厚厚的回忆录，讲出了一段沉痛而震撼人心的往事……

王眉白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医学家，抗日战争时期，因躲避日军侵略，迁来重庆。在当时战火纷飞，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卡介苗的研制工作。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接种后可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由于这一疫苗是由两位法国学者卡迈尔与介兰发明的，为了纪念发明者，将这一预防疫苗命名为卡介苗。王眉白先生是中国制成卡介疫苗的奠基人之一。在当时抗结核药还极其昂贵稀缺的年代，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王眉白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作医学检验，是重庆市一医院的检验师。1957 年因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送 415 劳教支队劳教。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中，这位检验师，被饿得皮包骨头，全身浮肿。当时车玉生是 415 医院的医师。而王眉白先生是车的老朋友。他看见自己好友的儿子奄奄一息，却爱莫能助，只能给他注射点葡萄糖液，而当时葡萄糖也比黄金还宝贵，要院长批，所以形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王检验师临终前在病床上拉着车医师的手无限悲愤地说："车叔叔，你有朝一日回重庆一定去问问我父母，他们究竟还认不认我这个儿子？为什么让我饿死，都不给我寄一点吃的东西来救救命……"说罢，在哽咽含恨中离开了人间。

车老流着眼泪送走了好友的儿子，把他的话也牢牢记在心中。当时 415 劳教支队，由于极缺医务人员，而像车玉生这样专家水平的人更是没有。于是他们便对车医师施点小恩小惠的"仁政"，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劳动力"的"积极性"（这是劳改队内部的专业术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笔者注）。他们给车医师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还给了他一张按"技术干部对待"的"空头支票"。不过比其他那些"右派劳教份子"不但可多得几个钱，每年还可"恩准"回重庆探亲一次。

那年车玉生回渝探亲，望着妻子、儿女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真是心如刀绞。但他仍然抽空去了王眉白夫妇家。车老是个直性子，几乎用责问的口气问老朋友夫妇"你们怎么一点东西都不给儿子寄去，等他饿死，你们当真是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吗？"王眉白夫妇一听，真如晴天霹雳，哭着答道"我们怎么没寄啊？我们每个月口中不吃肚中省地做成炒面粉，糖，油都用邮包寄了去，寄了还不放心，还去邮局复查……"。接着他们拿出一大叠邮寄包裹单，邮件复查单，上面赫然盖着邮章，明白无误地写着"对方单位已收妥"！真是天大的怪事！那么多次寄去的食品，难道都被狗吃了？！

还用问吗？不就是那些穿着"军干服"成天绷着脸教育"劳教分子"必须"改造反动世界观，重作新人"的劳改干部们干的"好事"吗？除了他们，还能有谁？他们真不愧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抓住了"生"的机会，却把"死"的后果留给了"阶级敌人"。真是做到了雷锋同志说的"对敌人，象严冬一样的冷酷"！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啊！

这位老科学家，王眉白老人当时就哭晕了过去。这位中国杰出的卡介苗专家，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不知挽救了多少孩子的生命，而他唯一的独生子，却被这几个猪狗不如的人渣谋害了性命！但这位老科学家，当时半个字也不敢向人提，否则，又是"诬蔑"、"恶攻"了。

刚才还在劝车老别再写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保姆，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显得一脸的惊诧莫名，她说"哎呀，真有这些事吗？好恐怖啊"！

没有被魔鬼抓去囚禁过的人，怎能体会得到魔窟内的恐怖？

隔了好一阵，车老才从回忆往事的伤痛中缓过气来。趁着小保姆出去买菜的时候，又向我讲了一个似乎属"女孩不宜"听的故事。叫人听后，啼笑皆非。

也是在那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岁月里，一天下午，住在 415 劳教队附近的一个贫下中农老大娘，怒气冲冲地跑来找着队上的劳改干部说"你们队上有个犯人，跑到我自留

地里来偷我的菜，他要偷集体的我不管，他偷我自留地里的菜，那是我家救命的东西，我非找他不行”。那农民大娘把劳教份子喊作“犯人”，好像不知“我党”的政策，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人家还有“公民权”呢。其次她说“偷集体的我不管”，偷我自留地里的那可不行，倒也心直口快。于是劳改干部就问她“是哪一個，叫啥名字”？她说“名字我叫不出来，但我我一看就认得出来”。

于是劳改干部就把所有收工回来的“犯人”（不，劳教份子）集合，排队站在一起，叫老大娘来认。老大娘左看看，右看看，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他，就是他”！

干部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叫人“给我捆起来，操蛋家伙，敢去偷东西，破坏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与革命群众的关系，反改造，反革命行为”！那人马上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但他却并不“认罪”，连声大叫“冤枉呀，冤枉呀！你说我偷菜，你把我偷的菜拿出来嘛”！道理也是如此。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总得有凭据呀。可那老太婆似乎胸有成竹，她说“我是没有抓住你偷的菜，但我亲眼看见你蹲在我自留地里，你在那里蹲着干啥”？那人忙说“大娘，我是在那里解小便”。老太婆一听哈哈大笑道：“哪个男人解小便，会蹲在地下才能解，你哄老娘这辈子没见过男人呀”？此言一出，引得劳教人员哄堂大笑。更有几个无聊的“看客”起哄凑趣说：“对，对，对，他是婆娘变的，不敢站着屙尿”！那人顿时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钻了进去。这时幸好车医师在场，他突然一下想起了什么，于是挺身而出，高声叫道：“大家别吵，这人我给他看过病，检查过他的身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转身对劳教干部和老太婆说，“我们别在这坝子里说，一起到办公室去”。当时，大家都知道车医师是大城市来的名医。那时还没搞文革，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诛语，所以在生理、医学方面的事，干部都要相信车的话。于是一起去了办公室。

原来那人数年前，因患阴茎癌，作了“阴茎全切除”的手术，根本就没有男人的阴茎了。其外阴道酷似妇女外阴，他解小便不蹲下，岂不流得一身都是尿？他当时可能一时内急，遂忘了“瓜田莫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幸有车医师，否则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后经几个干部一查看都忍不住笑了。那老太婆也说：“哎哟，活了几十年我才头回遇见这种怪事。错怪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车老讲至此，无限感慨地说：“那些人不懂医，都无可厚非。但人家都残疾成这个样子了，还划什么右派，送什么劳教，还长期关在劳教队里强迫劳动改造。什么‘革命人道主义’，是挂在口头上呢，还是丢进太平洋里去了”？车老 还说他多次给干部反映说，这人应“保外就医”，可谁也不理。后来文革一到，车老都“升级”为“反革命”打入大牢，就更不知此人“后事如何”了。

这时小保姆摆上饭来，她说“你们刚才说得那么起劲，怎么我一来你们就不说了”？车老故作神秘地说：“你小娃儿不能听”。小保姆故作生气的样子。我才连忙来“解围”，我知道小保姆爱唱歌，这几天我见她边做家务都在哼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套用了一句歌词说，我们讲的都是些伤心的事，“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把她也逗笑了。可这些“伤心的话”，明天哪说得完啊？

第二天，只好在依依不舍中和车老告别了。想着过去我们一道走过的岁月，更感到暮岁将至，来日无多，都黯然神伤。别前我给车老留下小诗一首，也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访友重来山城，
正橙黄桔绿秋将晚。
长江东去，嘉陵北流，
参差广厦万间。

往事堪悲，故人情重，
与我长作竟日谈。
更难忘，同游处——
复兴故关，陪都遗址，（注）
无不令人神往流连。

兴亡事，知多少？
已化作一片过眼云烟。
凭谁问：
当年英豪安在？
到而今，都付与
渔樵闲话，废垒残垣！

注：抗战期间重庆为中国陪都，抗日圣地。一时多少豪杰。重庆市郊有地名曰“浮屠关”。蒋中正委员长将此处更名为“复兴关”，以宣示我军民抗日必胜之决心。曾与车老同游于此，指点关山，无限感慨。

2008年12月20日完稿 三年大饥荒为什么没引发农民暴动 作者：魏九洲

由于中共疯狂推行大跃进政策，1959至1960的三年间，中华大地发生了饿死3000多万同胞的大饥荒。随着信息的发达和众多史料的披露，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真相正在大白于天下。古人有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共置数以千万计的人于死地，竟然没有发生一起有规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其宁死不反的异常现象，决非一句“中国农民老实”就能解释清楚的。

这其中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每思及此，笔者无不仰天长叹！

叹而生疑，疑则自答。

自答之一：形形色色的屠杀制造的恐怖气氛，淡化了人民的反抗意志。夺取全国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共产党先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而且大造声势、株连亲朋，并且要家喻户晓、全民皆知，无异于昭告天下：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共产党的气势大增，人民的威风大减，到了1958年，人民在共产党面前只有高呼万岁、服从领导的义务，而无监督、批评的权利，为了求生，绝大多数人连批评共产党的胆量也没有了。这种思想转变的结果是：大饥荒来临时，不要说在落后的乡村，就是在城市也难以凝聚反抗共产党的意志，更不用说发动针对共产党的暴动了。

自答之二：民间精英被摧残殆尽，陈胜吴广止于萌芽状态。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必须有组织领导者。在三年大饥荒中要发动暴动，更需要一不怕捕、二不怕死的英雄人物。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阳谋”的得逞，因言治罪、因文治罪野蛮政策的实施，反对共产党、不满共产党、抱怨共产党，乃至腹诽共产党者，非杀即关，非关既斗，头脑清醒、具有斗志的民

间精英几乎被摧残怠尽，陈胜吴广类的人物在大饥荒到来时竟不能应运而生，以至饥民群龙无首，几千万人宁愿饿死，也不造反。相比现在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在人类的生存史上，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悲哀啊？

自答之三：反动宣传歪曲了事实真相，农民在迷惑中渴望，在渴望中死亡。对舆论的垄断，对新闻的钳制，是共产党得以胡作非为的重要保障，也是隐瞒大饥荒真相的拙劣伎俩。“初级社前土改后”，得到土地的农民们一度尝到共产党给的甜头，加上“舆论一律”的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不知麻醉了多少善良的人们。大饥荒来临时，农民们相信共产党会给予救济，当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农民们更渴望共产党来救命，已经公开的资料证明这期间没有发生过有组织的或者自发的暴动。可是，与善良的农民们的期望相反，为了自保，共产党的地方官员不但不上报饿死人的真相，不但不象历朝历代那样开仓放赈，而且厚颜无耻、一如既往的利用他们的喉舌自吹自擂，并且毫无人性的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当灾情瞒无可瞒，最高当局着手救济时，几千万人已经在渴望后的绝望中死去。三年大饥荒没有引发农民暴动，也许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有待于人们去剖析，去挖掘；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剖析或挖掘也许不无裨益。

2008.3.15

中共大跃进死人 近三倍于纳粹屠杀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2006 年第一期刊登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35 个国家发生的大屠杀死亡人数图表，并指出，大屠杀是各国处理政治、种族和宗教问题经常使用的手段。

国家地理杂志刊登的图表显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造成的死亡人数最高，达 3 千万人。德国纳粹时期屠杀的犹太人达到 1 千一百万。萨达姆政权下的大规模政治屠杀造成 20 万人死亡。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至今仍在继续。

附：资料「中国官方公布饥荒受难者数据」

在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之后，中共决策层今年终于下令 1959 年至 1962 年的档案解封，但又严格 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根据这些档案：

1959 年至 1962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9 年全国 17 个省级地区有 622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 95 万 8 千多人。

1960 年，全国 28 个省级地区，有 1155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 272 万多人。

1961 年，全国各地区有 1326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 211 万 7 千多人。

1962 年，全国各地区有 751 万 8 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 107 万 8 千多人。

1959 年至 1962 年中国人口增长率

1959 年人口增长率为负 2.4%；1960 年为负 4.7%；1961 年为负 5.2%；1962 年为负 3.8%。

大饥荒中不该遗忘的姓名与数字 对大李大队 1960 年春饥荒情况的社会调查
管中村

2007 年 8 月 16 日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不完全统计，灾前 180 户 868 人中，381 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 139 户，其中 22 户人口死绝。作者本人当年只有 10 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本文记录了 381 名死难者者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1959年冬天至1961年春天，中国面临建国后连续三年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并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但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口，由于相关档案资料没有开放，死亡人口的确切数字人言人殊，说1000万、2000万、3000万、4000万的都有，总之至今没有定论，并因此在党史与国史研究中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

安徽省是笔者的故乡，也是当年全国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笔者童年、少年和进入青年后的早期阶段均生长在该省的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今属肥东县杨店乡向阳村），而且饥荒发生时已经10岁左右，并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因此对当年遭遇的灾情具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记忆。近来，由于工作的原因，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时常碰到究竟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歿的问题，面对莫衷一是的数据与观点，常常难以选择，也颇觉尴尬。正是这个原因激起了笔者深入实地调查，选择一个特定的微观的角度搞清基本事实的学术动机。

正是本着这样的学术动机，笔者于2007年1、2月份先后两赴安徽原籍，对当年隶属于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的14个生产队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且获得了可靠的第一手的调查数据。本调查虽然把1959年冬天至1960年春天作为特定的调查时间段，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个别人死于1959年的冬天，其他人均死于1960年春天；当然，本调查所统计的死亡者唯一的死亡原因必须是饥饿，因其他因素致死者不在统计之列。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当时所管辖的范围，如按自然村落布局划分，有“三管”、“两白”、“一李”，三管即后管、中管、前管，两白即后白、前白，一李即大李集。如按行政建制划分，共有14个生产小队：三管中的后管较大，所以分为管东与管西两个生产队，大李集作为自然村落范围更大，所以分为八个生产队，前白户与后白户各为一个生产队。由于近几十年来，农村无论村民聚居的自然布局还是其行政隶属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尊重历史起见，本调查因袭当时的生产队行政建制，以生产小队为基础，把整个大李大队分解成为14个调查单元。但大李集第三生产队的资料不全，在前白户生产队也没有获得具体的数据，所以，上述两个调查单元的数据只供参考，不纳入总统计范围。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本调查最终只以12个调查单元为统计基础，但这12个生产队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在大李生产大队的周边地带，既有死人较少的湓荡武生产队，也有死人非常严重的吴王——两个生产队只剩3户人家，由于他们跨出了大李大队的行政范围，对于这两个极端典型的数据，本次调查就没有采集。

在本调查进行过程中，笔者感触良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这项工作如不抓紧进行，再过几年，随着一些老人离世，将会成为永久的谜案。二是就在笔者如此熟悉的地方进行此类调查，也已经不敢保证所有的饥荒死亡者都能被活着的人们记起。毕竟时隔30多年了。当然，这种感触也在鞭策着我：如有可能，笔者将不仅会进一步抓紧时间继续做好这件工作，同时，在基本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将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

这里，笔者愿意首先把最近两次调查所获得的相关数据公诸于世，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考虑到使用者的方便，笔者把整个调查材料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每一个生产队的各类项的具体数据；第二个层次是该生产队的各个类项的总计数据；第三个层次是12个生产队的各类项的总统计数据。在每一个调查单元的表格后面，注明该调查信息提供者和组织者的基本情况，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相关人员的应有尊重。在最后附上调查课题论证及调查提纲，供相关刊物的编辑参考。

一、后管东生产队

序号 户号 姓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注

11 管恒山 男 60岁上下 该户共2人，死2人。绝户。

2 杨氏 女 60岁上下 管恒山妻

32 管恒早 男 50岁上下 该户共4人，死3人。

4 李氏 女 50 岁上下 管恒早妻。
5 管怀干 男 10 岁上下 父子。
6 3 管恒新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6，死 4 人。
7 管恒新子 男 10 岁上下 名字不详，乳名长元。
8 管恒新母 女 60、70 岁 姓氏不详。
9 二长子 男 7、8 岁 乳名，管恒新子。
10 4 管 茂清 男 60 岁上下 该户共 3 人，死 2 人。
11 薛氏 女 60 岁上下 管茂清妻。
12 5 管恒良 男 40 岁上下 该户共 6 人，死 4 人。
13 二涛子 男 11 岁 乳名 管恒良子。
14 管怀源 男 8 岁 管恒良子。
15 管怀意 男 4 岁 管恒良子。
16 6 管恒友 男 60 岁上下 该户共 11 人，死 7 人。
17 李氏 女 60 岁上下 管恒友妻。
18 管怀忠 男 24 岁 管恒友侄。
19 管怀本 男 40 岁上下 管恒山子。
20 刘氏 女 40 岁上下 管怀本妻。
21 管锦宝 男 17、8 岁 管怀本子。
22 管锦海 男 14、5 岁 管怀本子。
23 管锦堂 男 20 岁 管怀本子。
24 7 管恒富 男 60 岁 该户共 5 人，死 3 人。
25 计氏 女 57、8 岁 管恒富妻。
26 管怀玉 男 30 岁上下 管恒富子。
27 8 管恒业 男 60 岁上下 该户共 4 人，死 4 人。绝户。
28 计氏 女 60 岁上下 管恒业妻。
29 管怀银 男 30 岁上下 管恒业子。
30 唤英 女 8 岁上下 乳名，管恒业孙女。
31 想元 男 18 岁上下 乳名，管恒业子。
32 9 管 恒升 男 50 岁上下 共 6 人，死 3 人。
33 计氏 女 70 岁 恒升母。
34 管怀堂 男 20 多岁 恒升子。
35 10 管恒义 男 共 2 人，死 0。
36 11 管锦堂 男 19 岁 共 10 人，死 1 人。
00 12 管怀榜 男 共 6 人，死亡 0。
00 13 管怀友 男 该户共 3 人，死亡 0。
00 14 管怀柱 男 该户共 3 人，死亡 0。
37 15 管茂业 男 73 岁 该户共 8 人，死 6 人，丢 1 人。
38 谢氏 女 73 岁 管茂业妻。
39 管恒俊 男 32 岁 管茂业子。
40 蔡继珍 女 32 岁 管恒俊妻。
41 管怀香 女 11 岁 管恒俊女。
42 管怀馨 女 7 岁 管恒俊女。
管怀聪 男 2 岁 管恒俊子，丢失。
43 16 袁氏 女 70 岁 该户共 11 人，死 5 人。

- 44 管怀仁 男 40 岁左右 袁氏长子。
45 管怀礼 男 33 岁 袁氏三子。
46 蔡氏 女 33 岁 管怀礼妻。
47 管怀智 男 32 岁 袁氏四子。
48 17 管茂明 男 70 岁 该户共 6 人，死 3 人。
49 丁氏 女 70 岁 管茂明妻。
50 张氏 女 33 岁 管茂明儿媳。
51 18 管恒成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3 人，死 2 人。
52 李氏 女 50 岁上下 管恒成妻。
53 19 管支财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3 人，死 3 人。绝户。
54 张氏 女 50 岁上下 管支财妻。
55 小重圆 男 17 岁 管支财子。
56 20 管支银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4 人，死 3 人。
57 管支银妻 女 50 岁上下 姓名不详。
58 管茂堂 男 10 岁上下 管支金子。
59 21 管支元 男 30 岁上下 该户共 2 人，死 2 人。绝户。
60 管支元母 女 50 多岁 姓名不详。
61 22 管怀苹 女 14 岁 该户共 5 人，死 2 人。
62 兰英 女 9-10 岁 管怀苹妹妹。
63 23 管恒春 男 60 岁 该户共 3 人，死 3 人。绝户。
64 管怀成 男 20 岁上下 管恒春子。
65 管怀美 男 20 岁上下 管恒春子。
66 24 管恒章 男 60 岁 该户共 5 人，死 2 人。
67 管怀德 男 23 岁 管恒章子。
68 25 丁氏 女 70 岁上下 该户共有 5 人，死 1 人。
69 26 管怀高 男 8 岁 该户共 6 人，死 2 人。
70 管怀姐 女 9 岁 管怀高姐姐。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26

灾 中绝户数 5

灾中残户数 17

灾中全户数 4

灾前人口数 132 人

灾中死亡数 70 人

灾中存活数 62 人

死亡率(%) 53.03

存活率(%) 46.97

绝户率(%) 19.23

残户率(%) 65.38

全户率(%) 15.38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

- 1、管恒美，男，后管管中村人，生于 1937 年，现年 70 岁，中共党员，曾任生产队队长。1960 年时在南京第二工程处工作，后来离职回乡务农至今。

2、管恒学，男，后管管中村人，生于 1942 年，现年 65 岁，初中文化， 1960 年饥荒发生时曾任 吴王大队粮管员，现在居家务农。

3、马绍银，男，后管管东村人，生于 1955 年，现年 52 岁，高中文化，曾经加入共青团，做过乡办企业会计，现在管东村务农。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

管怀超，男，后管管中村人，生于 1955 年，现年 52 岁，初中文化，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肥东县杨店乡向阳村会计兼出纳。

二、后管西生产队

序号 户号 姓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注

1 1 李其昌 男 50 岁上下 该户共 6 口人，死 4 人。

2 鲁氏 女 50 岁上下 李其昌妻。

3 李其昌女 女 7 岁上下 姓名不详。

4 李其昌子 男 6 岁上下 姓名不详。

5 2 管支财 男 50 岁 该户共 6 人，死 5 人。

6 张万英 女 47、8 岁 管支财妻。

7 管茂元 男 22、3 岁 管支财子。

8 管茂贵 男 16 岁 管支财子。

9 管小妹 女 17 岁 管支财女。

10 3 管支和 男 41 岁 该户共 7 人，死 1 人。

11 4 龚氏 女 50 多岁 该户共 1 人，死 1 人。绝户。

12 5 夏迺荣 女 4、50 岁 该户共 6 人，死 1 人。

13 6 王氏 女 60 多岁 该户共 5 人，死 5 人，绝户。

14 7 朱氏 女 30 多岁 李光余 妻。

15 李炳辉 男 12 岁 李光余子。

16 李银姐 女 10 岁 李光余女。

17 李某 男 8 岁上下 李光余幼子。

该户还有李光余，因在劳改没死。

18 8 管家应 男 60 多岁 该户共 1 人，死 1 人，绝户。

19 9 管家仁 男 60 多岁 该户共 7 人，死 3 人。

20 李氏 女 60 多岁 管家仁妻。

21 管三平 男 13 岁 管家仁子。

22 10 管家斌 男 60 多岁 该户共 6 人，死 4 人。

23 王氏 女 60 多岁 管家斌妻。

24 斌儿媳 女 28 岁 管家斌儿媳。

25 管茂 诚 男 4、5 岁 管家斌孙。

26 11 管支海 男 35 岁 该户共 4 人，死 3 人。

27 管支海女 女 7、8 岁 名字不详。

28 管支海子 男 4、5 岁 名字不详。

29 12 管家财 男 68 岁 该户共 15 人，死 7 人。

30 管支江 男 36 岁 管家财子。

31 管孝英 女 9 岁 管支江女。

32 管大祝 女 16 岁 管支江女。

33 管茂珍 女 13 岁 管支江女。
34 管冬姐 女 4 岁 管支江女。
35 管茂春 男 1 岁 管支江子, 1959 年冬天死亡。
36 13 管家先 男 60 多岁 该户共 1 人, 死 1 人。绝户。
37 14 管家仓 男 37 岁 该户共 1 人, 死 1 人。绝户。
38 15 袁仲和 男 62 岁 该户共 3 人, 死 2 人。
39 管氏 女 60 岁 袁仲和妻。
40 16 管家怀 男 63 岁 该户共 12 人, 死 4 人。
41 李氏 女 61、2 岁 管家怀妻。
42 管支年 男 30 岁 管家怀二子
43 管支年子 男 5、6 岁 名字不详。
44 17 管家华 男 70 岁 该户共 7 人, 死 6 人。
45 蔡氏 女 70 岁 管家华妻。
46 管支顺 男 40 岁 管家华子。
47 杨氏 女 40 岁 管支顺妻。
48 管支顺子 男 6、7 岁 名字不详。
49 管支顺女 女 6、7 岁 名字不详。
50 18 管启运 男 72 岁 该户共 8 人, 死 6 人。
51 管家礼 男 40 岁 家信兄。
52 管家信 男 39 岁 家礼弟
53 乐氏 女 40 岁 管家信妻。
54 管家信女 女 7、8 岁 名字不详。
55 管家信子 男 6、7 岁 名字不详。
56 19 管家春 男 63 岁 该户共 1 人, 死 1 人。绝户。
57 20 夏迺华 男 65 岁 该户共 5, 死 3 人。
58 管氏 女 65 岁 夏迺华妻。
59 武氏 女 28 岁 夏迺华儿媳。
60 21 夏朝根 男 36 岁 该户共 5 人, 死 5 人。绝户。
61 武凤英 女 36 岁 夏朝根妻。
62 夏仕银 男 12 岁 夏朝根子。
63 夏仕银弟 男 10 岁 名字不详, 夏朝根子。
64 夏仕银妹 女 8 岁 名字不详, 夏朝根女。
65 22 管茂朝 男 48 岁 该户共 5 人, 死 4 人。
66 许和英 女 47 岁 管茂朝妻。
67 管茂朝子 男 8、9 岁 名字不详, 管茂朝子。
68 管茂朝女 女 6、7 岁 名字不详, 管茂朝女。
69 23 管怀安 男 40 多岁 该户共 4 人, 死 2 人。
70 管怀安女 女 10 岁 名字不详。
00 24 管家升 该户 5 人, 死亡 0。全户。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24 户

灾中绝户数 6 户

灾中残户数 17 户

灾中全户数 1 户

灾前人口数 121 人

灾中死亡数 70

灾中存活数 51

死亡率(%) 57.85

存活率(%) 42.15

绝户率(%) 25

残户率(%) 70.83

全户率(%) 4.17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

管支山, 男, 后管管西村人, 生于 1935 年, 现年 72 岁, 高中文化, 曾任肥东县黄栗公社大李小学教师, 下放回村后任生产队干部, 后又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现以教师身份退休, 居住在管西村。本次调查先后两次访问他, 均获得他认真接待与全力支持。

本表调查组织者的一般情况:

管怀超, 情况同前。

三、中管生产队

序号 户号 姓名 性别 死亡年龄 备注

11 管恒有 男 60 多岁 该户共 10 人, 死 5 人

2 张氏 女 60 多岁 管恒友妻。

3 管怀升 男 20 多岁 管恒友子。

4 金贵 男 7、8 岁 怀德子

5 管怀德女 女 4、5 岁 名字不详。

62 管恒忠 男 60 多岁 该户共 6 人, 死 2 人。

7 李氏 女 60 多岁 管恒忠妻。

83 管茂文 男 47 岁 该户共 4 人, 死 1 人。

94 管茂友 男 46 岁 该户共 5 人, 死 2 人。

10 李氏 女 70 多岁 管茂友母。

115 管茂新母 女 60 岁 该户共 5 人, 死 1 人。

126 管茂仓 男 44 岁 该户共 1 人, 死 1 人。绝户。

137 李氏 女 60 多岁 该户共 1 人, 死 1 人。绝户。

148 管恒彪 男 46、7 岁 该户共 6 人, 死 2 人。

15 二河 男 17、8 岁 乳名, 管恒彪子。

169 管茂全 该户 4 人, 死亡 0。全户。

类项 总计

灾前农户数 9 户

灾中绝户数 2 户

灾中残户数 6 户

灾中全户数 1 户

灾前人口数 42 人

灾中死亡数 16 人

灾中存活数 26 人

死亡率(%) 38.09

存活率(%) 61.90

绝户率(%) 22.22

残户率(%) 66.67

全户率(%) 11.11

本表信息提供者的一般情况:

管茂全,男,中管村人,生于1925年,现年82岁,1956年加入中共,此后长期担任基层干部,饥荒发生时为中管生产队长。现在思维清晰,身体健康,可以全日从事正常农业生产。

{以下数字`姓名从略} 两份报告: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 官方报告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缺西藏地区历年死亡数据。

1958年天津市从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所以表中不包括天津市。1961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单独进行统计,因此1961年以后全国及各省市数据均不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死亡人数(万人)

全国 3602

四川 667

山东 320

河南 313

安徽 245

湖南 217

江苏 197

河北 173

广东 155

贵州 153

湖北 142

广西 131

云南 107

辽宁 101

甘肃 91

浙江 85

江西 80

山西 66

陕西 64

黑龙江 60

福建 55

吉林 48

内蒙古 33

新疆 30

上海 22.2

北京 20.6

青海 17

宁夏 8.3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全国的总死亡率为:1959年14.59%、1960年25.43%、1961年14.33%。在最困难的1960年,死亡率比较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安徽50.17%、贵州49.87%、四川47.78%、甘肃41.45%、青海40.73%、河南39.21%;比较低的有:上海6.84%、北京9.22%、内蒙古9.66%、吉林10.07%、黑龙江10.47%、辽宁11.45%。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风风雨雨，冲击了中国的各个角落，自然也冲击了个人生活。这一时期的婚姻家庭变化，在家庭方面是家庭数量的减少与规模的缩小，在婚姻方面最突出的是推迟结婚和离婚率上升。对婚姻与家庭的冲击也直接影响了生育率，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在灾难过去以后，结婚高潮很快出现，生育率也迅速提高，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史和人口史，对全面了解当代中国有一定的价值，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家庭数量与规模

一般来说，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家庭数量也会增加。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年份是例外，就是大跃进的1958年，1958年中国户的数量从14431万户下降到14320万户。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影响自然要波及到家庭。在大跃进的1958年，户的数量下降，平均家庭规模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刮“共产风”，建立供给制的食堂，打破了传统家庭的经济功能的结果。到了困难时期，供给制的食堂瓦解，特别是农村的“三自一包”政策的推行家庭的恢复，因此家庭的数目增幅上升。除了家庭经济功能恢复的因素外，因为经济困难，家庭内部矛盾增加，使得一些大家庭瓦解，也是导致家庭数目增加的重要原因。

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的家庭规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58年平均每户人口是4.6人，1961年只有4.3人。由于当时发生了大饥荒，因此家庭规模的下降最主要的是饥荒的结果。

当饥荒结束后，家庭规模有所回升。

在饥荒严重的地区，由于部分家庭成员饿死，导致孤老、孤儿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是当时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1960年全地区有孤老50416人，孤儿45648人。1960年信阳地区总人口是741.1万人，总户数是170.8万户，这意味着该地孤老、孤儿占总人口的1.3%，同时也意味着该地大约5%左右的家庭在1960年前后被破坏。

二、婚姻

饥荒同样对婚姻与家庭带来冲击，饥荒使得一些人无法结婚，其结果是结婚人数少，结婚率下降。根据北京与天津的资料，在困难时期的结婚率大幅度下降。天津市1961年的结婚率只有1957年的13.6%，其他地方的情况或许没有天津那么严重，不过结婚人数减少则是普遍的，这从各地低龄初婚率的下降可以推断出来。

饥荒结束的一个标志就是结婚人数的增加。虽然没有全国性的结婚登记资料，不过从四川峨边县等地的情况可以看出，结婚率登记在1960年跌到谷底，而1962年马上反弹回升。结婚人数的变化情况，从前面结婚年龄的变化也可以得到佐证。这种结婚率的大起大落体现了灾荒的影响，也加剧了人口出生率的波动。

经济上的困境，特别是面临死亡的威胁，使许多到了结婚年龄的人无法按时结婚，被迫推迟结婚年龄。这种情况从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可以体现出来，在1957—1963年间妇女的

平均初婚年龄基本上保持上升趋势，特别是城镇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几乎一年。从已经了解到的各地情况看，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是普遍的现象。

妇女低龄初婚率的下降是一代人的结婚年龄推迟，也就是常说的晚婚。从表 5 中可以看到在困难时期，15—18 岁年龄组的初婚率都比 1957 年有明显的下降，而 19 岁以上年龄组则明显上升。这一升一降，说明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是晚婚的结果。

在大跃进时期，高举着政治旗帜，喊着狂热的政治口号，个人问题，特别是一些私生活问题很难被注意到。与 1957 年相比，1958—1960 年的离婚率下降。然而当空洞的口号破灭之后，面对着贫困的生活时，被掩盖的家庭矛盾终于爆发，导致了困难时期的离婚率上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资料。1957 年经法院判决和调解的离婚案 26.1 万对，1961 年达到 30.1 万对，1962 年为 36.1 万对。实际上还有一些离婚并没有经过法院，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离婚是通过民政部门办理的。根据 50 年代初期资料，在离婚人口中约一半在法院离婚，一半在民政部门离婚，因此实际离婚人数要比法院数字高许多。

在农村有些人私奔使婚姻事实上破裂。例如，据 1981 年在江苏苏南的一个村庄里的调查。

全村有 35 名离婚男性，其中的阴人是因为饥荒期间妻子“外出讨饭去了”。1959 年—1962 年甘肃省大批妇女外流，流入陕西省 5 万多人。到 1964 年后仍然有 4 万多人滞留在陕西省。

其中相当多人与陕西人同居，而这些人中又有不少人原来在甘肃时已经结婚，当灾难过去后，原来的丈夫寻找到原来的妻子后引起许多纠纷。1963—1964 年间，甘肃天水地区的婚姻案件中，此类案件占 36.6%。甘肃流入陕西咸阳地区的妇女共 20200 人，这些妇女中 36.2% 的人后来返回原籍，63.7% 的人留了下来。这批妇女中有夫之妇 7932 人，有夫之妇后来被送回的占 70.3%，留下的占 29.7%。从现有的资料看，当时离婚率上升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据甘肃天水地区资料，当时农村离婚人数是城市的几十倍，因生活困难而引起的离婚案件占离婚案件的 30%-40%。宁夏的情况也是农村的离婚问题比城镇严重。在河南省禹州市因为困难时期人员外流，导致婚姻案件增加，在 1963 年的婚姻案中，涉及重婚、姘居的占 30%。在城市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是人口外流、夫妻一方在压缩城镇人口中被下放农村和政治运动队。

三、生育

主要受饥荒的影响，造成育龄妇女营养不良，导致在 1957 年-1963 年间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过程。这一大起大落过程，使在相近的年龄组中，一些年龄的人远远多于其他年龄的人，给人口结构造成不良的后果。

出生率是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比较简单而又有一定局限的指标，通过出生率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对生育度的异常波动有一初步了解。1957 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是 3.4%，随后逐般步下降，到 1961 年达到最低点 1.8%，下降的幅度是 47.1%。1962 年开始出生率迅速回升到 3.7%，超过 1957 年的水平。在这场人口出生率的变动中，地区差别十分明显。这种差别一方面表现在出生率达到低谷的时间，另一方面表现在出生率下降的幅度。

用出生率来研究人口的生育，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当两个地方人口的性别比、年龄结构不同时，可比性不理想。因此要深入探讨人口问题，往往需要其他指标作进一步研究。

与出生率这一指标相比，总和生育率（TFR）是衡量生育水平更好的指标。总和生育率，是某一时期各年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这。指标克服了不同年龄结构带来的不可比问题，总和生育率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妇女的终生生育率。

与出生率类似，1957—1963年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以出生率看1957年城市人口的出生率高于农村，而根据总和生育率，实际上农村的生育水平高于城镇。中国妇女在1957年的总和生育率是6.21，到1961年降到3.28，下降幅度为47.2%。同期城镇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为49.3%，农村妇女为46.7%，城乡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从1962年开始，总和生育率大幅度回升，到1963年总和生育率超过1957年水平，反映出饥荒过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

困难时期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推迟，也是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因素之一。虽然没有全国的资料，但是从湖南的情况看，1960年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比1957年推迟了1.3岁，晚育自然会降低生育水平。

除了结婚年龄的推迟，就是结了婚的妇女也推迟了初育。1957年初婚的妇女有24.75%在12个月内生了第一胎，然而1960年这一比例只有11.62%，下降了53.1%。当时可以说是不得不晚婚晚育。

四、妇女健康与生育

在困难时期，许多妇女因营养不良而暂时闭经，暂时失去了生育能力，影响了生育水平。

广东省的惠州市在1959年下半年，物资供应紧张，部分女工每天的粮食供应量只有4两左右，1960年3月对惠州26间工厂的1071名女工进行检查，查出息子宫下垂52人，闭经96人，患病率是13.8%。当时能够保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城镇的情况都如此严重，农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河南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河南的沁阳县是河南为数不多的没有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县，在这个县出现了严重的妇女病，在情况最为严重的1960年各类妇女病人6.7万人，相当于当年全县妇女的29%。如果把妇女中的儿童除去，那么患妇女病的妇女可能占成年妇女总数的40—50%。

云南风庆县在1960年查出患浮肿、干瘦、其他病的有3.7万人，1961年患浮肿、干瘦、脱宫、闭经和其他病的有1.9万人，分别约占当年人口的15.8%和8.1%。风庆县1961年患脱宫和闭经的妇女有7758人，相当于当年女性人口的6.4%，如果考虑到女性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儿童和老年妇女，那么患脱宫和闭经的妇女占育龄妇女的比重要超过10%。广东紫金县在1959年有3819名妇女子宫下垂，占全县妇女的2.4%。1960年该县有6567名妇女子宫下垂。

非正常闭经 8591 人，两者合计占全县妇女的 9.6%（11），估计占育龄妇女的 20%左右。广东兴宁县在 1959 年的妇女科病普查中发现患病率为 4.91%，在 1960 年发现 2.9 万闭经病人，相当于全县妇女的 9.1 %。如果不考虑未成年和老年妇女的话，实际上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大约 20%是闭经病人（12）。

有的研究认为：在饥饿刚开始时，在初期的兴奋状态下，饥饿能增加性欲要求，但是随后就到了下降 阶段，甚至丧失了生殖的本能。也有研究认为对于性欲方面的影响，慢性饥饿和急性饥饿完全不同。慢性饥饿使经常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中的人性欲容易冲动，性欲起了从感情上来补偿食欲品的作用。如果这种观点正确，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贫困地区会越穷越多生孩子。急性饥饿则使性欲减退（13）。在困难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二种急性饥饿，特别是对城镇人口来讲，一下子从基本保障供给变成要人民挨饿，这样的突然转变使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如果上述观点成立，或许可以解释城镇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略高于农村的原因。

营养不良的另一个 后果是怀孕的成功率下降，1957 年 95.31%的怀孕结果是活产，1961 年这一比例只有 92.04%。1961 年是困难时期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一年，恰好是这年，自发流产和人工流产占怀孕的比例也是困难时期最高的。

困难时期妇女的死产率和自然流产率均明显提高。1960 年的死产率比 1957 年增加了 26.4%，1961 年的自然流产率比 1957 年上升了 88.9%。到了困难时期结束，死产率和自然流产率才恢复正常。从死产率和自然流产率的变化，不难看出饥荒对怀孕妇女健康带来不良影响，进一步又影响了胎儿，导致一些原来可能生存 的生命夭折，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

回顾一下 1949 年以来的人口出生率是有必要的。1949—1954 年中国的人 D 出生率极高，平均人口出生率为 3.71%……这么高的出生率明显带有战争结束后生育补偿的特征。如果以时间计算，从 1949 年到 1954 年延续了 6 年。1955—1957 年的出生率比 50 年代初期有一定的下降，这一时期属于比较正常的阶段，可以用这期间的人口出生率作为计算标准。1954—1957 年间平均人口出生率是 32.9%。，如果把高于标准的出生率机为补偿性生育的话，那么 1962—1970 年都有补偿性生育，不过参照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延续 6 年的情况，这里也只考虑 1962—1967 年的补偿生育。

以 32.9%。的人口出生率为标准，1962—1967 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别高出标准 4.1、10.5、6.2、5.0、2.1 和 0.11%……由此可计算得出这期间的补偿生育人数为 273、716、433、358、154 和 83 万，累计为 2017 万人。这个数字与用政府公布数字估计的因饥荒死亡人数巧合（14），虽然这种巧合并不足以说明估计的准确程度高，但是足以说明因饥荒而少生的人口在饥荒结束以后都补偿回来。有一种论点，认为饥荒 对后来中国人口总量的减少有较大的影响。从当时死亡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死亡主要影响老人和婴儿，对老人来说是一个提前死亡的问题，对长期的人口总量影响不大。补偿生育数量之大，这个事实可以证明饥荒时期少生和夭折的婴儿的数量基本上在饥荒过后都在数量上补偿了。

注释：

《信阳地区志》，三联书店，1992 年，33 页。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126 页。

《甘肃省志（审判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494 页。

《咸阳市民政志》，156 页。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345 页。

《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283 页。

《禹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76 页。

《中国国情丛书。营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370 页。

尹兰河、蓝兆浪：《惠州市劳动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年，113 页。

《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21 页。

(11)《紫金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31 页、803 页。

(12)《百市县调查。兴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507 页。

(13) 约瑟·理·卡斯特罗：《饥饿地理》，i 联书店，1959 年，64 一刀页。

(14)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4.

李若建：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吴铭

胡平：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今年，2008 年，是中国大饥荒 50 周年。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在中国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场大饥荒。上海大学教授金辉指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四千零四十万。”纵观中国历史，1949 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至少相当于二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三年大饥荒，过去中共官方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然而中央气象局的统计材料显示，那三年的中国气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1962 年初，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大饥荒的深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

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书名是《人祸》，作者是旅美学者丁抒先生，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于 1991 年出版，是有关中国大饥荒的第一部专著，堪称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后来，作者又对此书做了增订再版。作者从合作化运动讲起，讲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吹牛皮放卫星大刮共产风；再讲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变本加厉，最后讲到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了几乎当时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并予以细心的归纳整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既描述了这场大饥荒的状况，又分析了它的成因与后果。每一个想认真了解和深入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应该错过《人祸》这本书。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森指出的那样：“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我们知道，共产党开大会发布公告，总爱说什么“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但事实上，共产党却往往是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从罪恶走向更大的罪恶。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大饥荒的罪魁祸首。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好心办坏事”。是的，李志绥也说过：“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制止那场大灾难。”当然了。我也这么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治者乐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走向崩溃，正如同没有一个统帅乐于自己的军队打败仗。可是，一旦纠正错误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至尊无上的权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完全相信毛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真相。谁说暴君不喜欢听真话呢？他只是不喜欢讲真话

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话假话，所以暴君常常被谎言所包围。我同样相信毛是愿意纠正自己错误的，只要这种纠正无损於自己的英明形象。然而，除非事态恶化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毛才有可能完全了解真相；此时再出面制止已经谈不上“及时”，那势必会损害到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暴君宁可将错就错，甚而变本加厉。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先於自己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因为那在暴君看来便有谋反夺权的重大嫌疑。五九年庐山会议就是明证。尽管说到后来(六一年六二年)，毛不得不作出让步，那么他从此便对那些比自己正确的同僚怀下了不可原谅的忌恨。在很大程度上，毛发动文革正是为了对当年的退让进行报复。无怪乎彭德怀、刘少奇会成为文革中在劫难逃的牺牲者。

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早就指出，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因为极权主义的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当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它那套理念时，势必导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毛泽东和中共所做之事，纵然说在一开始还可能有好心办坏事的成分，那么很显然，越到后来，好心的成分越少，越到后来，越是坏心办坏事。

由此可见，唯有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些错误与罪恶。这就是我们在大饥荒 50 年后应该得出的结论。 胡平：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 ——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右派写的关于右派的文字似乎已经很多了，我也读过不少。但当我读到周素子女士这本《右派情踪》，仍不禁生起一种特殊的感动。

周素子女士现旅居新西兰。五七年反右时她还在上大学，就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陈朗先生也是右派。夫妻双双被发配大西北，后来陈朗被送去青海的劳改农场，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周素子则独自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先是在兰州，后来一路流浪到杭州，靠打零工，甚至捡破烂维生。二十年后右派改正，夫妻始得团圆。凭着周素子的坚强与远见，一家人历经艰辛磨难而不散，而且三个女儿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周素子出身名门，擅长诗词音乐戏曲。她的文字沧桑厚重，朴素典雅，简洁含蓄。

堪与《往事并不如烟》相媲美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文坛解冻，出现了一大批激动人心的作品，包括许多关于右派的作品，包括许多右派写的关于右派的作品，在社会上造成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则发现，这些作品大多已经失去昔日的魅力。在自由社会，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发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受到特别的珍爱。在专制社会，几乎不可能产生什么杰作，因此，略有价值者都格外引人注目。生活在专制社会中的作家们，一方面固然因为不能畅所欲言而苦闷，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可以从数目庞大的读者群的热烈反响那里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和安慰。於是很多作家便尽量约束自己不要突破官方给定的界限，以求得自己的作品能在国内官方媒体公开发表。但这样一来，作家们也就自我阉割，难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涌上第一波浪头的东西多半只是第二等的货色。早在二十年前，我便期待而且相信，会有这样一些作家，也许现在他们名气还不小，有的甚至默默无闻，正在悄悄地从事真正自由的写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周素子这本书就正属于我期待的那种作品。

读周素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章诒和。两人同是大家闺秀，一代才女，都具有刚毅柔韧的个性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很多方面，《右派情踪》都堪与《往事并不如烟》相媲美。如果说章诒和的笔下人物多是「最后的贵族」，那么，周素子写的则更贴近底层，更具平民精神（其实，章诒和也曾深深地堕入社会最底层，只不过她还没有把那段经历写下来而已）。

遭遇更悲惨的窝囊右派

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相比，周素子记？的右派们没有那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作为右派也不是那么大名鼎鼎。他们被打成右派往往更无辜，其遭遇也往往更悲惨。就以作者 本人为例，被打成右派时还是个学生，仅二十二岁。周素子自称是最窝囊的右派，因为当时的她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政治见解，遑论「反党反社会主义」。只因作者才华出众，又出身名门。在讲到原北大学生沉元为何被打成右派时，史学家黎澍说是「妒忌」。在那个时代，才华就是原罪。如果你再有个坏出身，打右派不打你打谁？在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周素子在被打成右派后还天真地问校方拉下的功课什么时候补。很多人还把「右派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些说法来安慰自己。殊不料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丝毫不比「地富反坏」轻，且一戴就是二十年。有的右派早早摘了帽，哪知道摘了帽竟和没摘差不多，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受的罪并不比不摘的少。从五七年到七七年，右派分子们前十年就已是备尝艰辛，后十年更是雪上加霜，这中间还遭逢大饥荒。右派分子不仅自己陷入苦难，而且还殃及配偶和子女。在右派分子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等到七七年七八年右派改正，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无可挽回。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右派情踪》一书收录了七十多篇文章，实际上是七十多位右派的小传。在简要地？述了各自的生平和遭际之余，作者还通过一两个故事或细小的情节，写到了他们的情——爱情，亲情或友情，故取名「情踪」。情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是最坚韧的，也可以是很脆弱的。它可以是巨大黑暗中的最大亮点，也可以是巨大悲剧中的最伤心处。正是在爱情、亲情或友情的问题上，我们最能透视到人的灵魂与性格；也正是在爱情、亲情或友情的问题上，我们最能感受到命运的垂青或残忍。严酷的政治迫害本身就是对爱情、亲情或友情的沉重打击，更可恶的是，共产党还一边搞株连，一边搞划清界限。这就使当事人陷入深深的道德与感情的双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几乎做不到两全其美，无论你有对都有错，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定，在有所坚守的同时都不能不有所放弃，从而无法避免良心上的负疚和感情上的亏欠。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对那些右派夫妻的离异，子女的隔膜和朋友的背弃简单地进行道义谴责。毕竟，圆满的道德和情感只属于幸运者，不幸者的道德与感情不能不是残缺的。而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好人几乎不可能是幸运的。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时穷节乃见」，人世间最崇高的道德与最圣洁的感情，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无可规避的冲突与分裂之中显示出来的吗？正是在那种有取也有舍，有保全也有牺牲的迫不得已的情境中，人性的伟大才得到最充分也最凄美的体现。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著名的右派作家王蒙曾经对人讲：「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 better than the worst.」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比最坏的要好，今天中国的一切都不算太坏。王蒙这话固然讲的是一个事实，但言外之意却流露出一种苟且的心态。正像古人说的，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偏偏是一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容易在现状面前知足，最容易苟且。他们明明知道现实中还有很多很多罪恶，遇到政治环境宽松时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追求的冲动，但只要见到势头不对就立刻收心，放弃抗争，然后自我解嘲道：其实现在这样也就不错啦，再坏也比过去好吧。岂止是右派！今天，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讲出一段又一段悲伤的历史。全中国究竟有几家几户没有枉死饿死的冤魂？在中国，一党专制依然故我，那不是因为有太多人还在支持，那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人坚持反抗。我承认，面对强权，我们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们切切不可把忍受变成接受，变成认同。只要我们始终心存一念，或多或少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饱经患难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我坚信，对反右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激发起我们的正义感和勇气而奋起抗争，否则，我们不要说对不起历史，

对不起后代子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 — — — —

注：周素子《右派情踪》已由香港田园书屋於二〇〇八年三月出版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 2008 年 6 月号

两篇文章看民国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民国与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百废代兴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战乱，一个是内乱。

下面，我们用两篇文章对比一下两个时期的生活水平吧。

酸梅汤与糖葫芦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各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吕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拂拭得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一，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十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十刹海会贤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们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尽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一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粮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甸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儿（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佳，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桔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裹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

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由客携去。

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自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

在北平，芙蓉鸡片是东兴楼的拿手菜。请先说说东兴楼。东兴楼在东华门大街路北，名为楼其实是平房，三进又两个跨院，房子不算大，可是间架特高，简直不成比例，据说其间还有个故事。当初兴建的时候，一切木料都已购妥，原是预备建筑楼房的，经人指点，靠近皇城根儿盖楼房有窥视大内的嫌疑，罪不在小，于是利用已有的木材改造平房，间架特高了。据说东兴楼的厨师来自御膳房，所以烹调颇有一手，这已不可考。其手艺属于烟台一派，格调很高。在北京山东馆子里，东兴楼无疑的当首屈一指。

一九二六年夏，时昭瀛自美国回来，要设筵邀请同学一叙，只我提调，我即建议席设东兴楼。彼此燕翅席一桌不过十六元，小学教师月薪仅三十余元，昭瀛坚持要三十元一桌。我到东兴楼吃饭，顺便订席。柜上闻言一惊，曰：“十六元足矣，何必多费？”我不听。开筵之日，珍错杂陈，丰美自不待言。最满意者，其酒特佳。我吩咐茶房打电话到长发叫酒，茶房说不必了，柜上已经备好。原来柜上藏有花雕埋在地下已逾十年，取取一坛，麝以新酒，斟在大口浅底的细瓷酒碗里，色泽光润，醇香扑鼻，生平品酒此为第一。似此佳酿，酒店所无。而其开价并不特昂，专为留待佳宾。当年北京大馆风范如此。预宴者吴文藻、谢冰心、瞿菊农、谢奋程、孙国华等。

北京饭馆跑堂都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剥蒜剥葱剥虾仁的小利巴，熬到独当一面的跑堂，至少要到三十岁左右的光景。对待客人，亲切周到而有分寸。在这一方面东兴楼规矩特严。我幼时侍先君饮于东兴楼，因上菜稍慢，我用牙箸在盘碗的沿上轻轻敲了叮当两响，先君急止我曰：“千万不可敲盘作响，这是外乡客粗卤的表现。你可以高声喊人，但是敲盘碗表示你要掀桌子。在这里，若是被柜上听到，就会立刻有人出面赔不是，而且那位当值的跑堂就要卷铺盖，真个的卷铺盖，有人把门帘高高掀起，让你亲见那个跑堂扛着铺盖卷儿从你门前急驰而过。不过这是表演性质，等一下他会从后门又转回来的。”跑堂待客要殷勤，客也要有相当的风度。

现在说到芙蓉鸡片。芙蓉大概是蛋白的意思，原因不明，“芙蓉虾仁”、“芙蓉干贝”、“芙蓉青蛤”皆曰芙蓉，料想是忌讳蛋字。取鸡胸肉，细切细斩，使成泥。然后以蛋白搅和之，搅到融和成为一体，略无渣滓，入温油锅中摊成一片片状。片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起锅时加嫩豆苗数茎，取其翠绿之色以为点缀。如洒上数滴鸡油，亦甚佳妙。制作过程简单，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处则见功夫。东兴楼的菜概用中小盘，菜仅盖满碟心，与湘菜馆之长箸大盘迥异其趣。或病其量过小，殊不知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

抗战期间，东兴楼被日寇盘据为队部。胜利后我返回故都。据闻东兴楼移帅府园营业，访问之后大失所望。盖已名存实亡，无复当年手艺。菜用大盘，粗劣庸俗。

=====

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

民国十八年陕西旱灾与 60 年代初的赈灾
西风寒剑

我是陕西人，小时候常听贫农忆苦思甜，在他们讲的事情中，印象较深是民国十八年关中旱灾及三年自然灾害，这二个事件都给上一辈的陕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可怕记忆。过去了几十年，对老一辈人讲这些故事的神情已经有点慢慢淡忘了，但最近东南亚海啸的赈灾，又让我重新想起了小时听忆苦思甜的时情景。我感觉到，在对待灾害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表现其实是很俗套的，而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却曾经表现了空前绝后的创造性。这一点是永远值得名留青史的。

先谈灾情，根据宝鸡县志，“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旱，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按以上说法，民国十八年的灾难实际上开始于民国十七年，由于旱灾，在连续二季没有收获的情况下，发生了饥荒，演成了一场大灾难。至于 60 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起因一直有些不明不白。在我问起是什么灾害时，我的老一辈也说不清，按他们的说法，地里也丰收，但是吃不到嘴里去。小时候总也没搞明白，既然地里有粮食怎么可能吃不到嘴里去，也搞成个大饥荒出来。其实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别的不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灾难引起的反应。差别之大，好象一个在人间，一个在鬼域一般。

灾难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以下的资料可以提供部分证明。根据中国金融史资料，民国十八年 1 月 8 日南京政府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 1 0 0 0 万元，利率月息八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1 0 年内还清本息。上行下效，陕西省政府，县政府也忙起赈灾，《同官县志》“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政府一忙起来，小民也起劲，文艺，体育，宗教各界都投入了赈灾活动，从以下几例中，可见一斑。据扶风法门寺文件，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立即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呼吁各界。如果我们想了解更多，只要输入“民国十八年赈灾”关键词，可以搜出文艺、体育各届的赈灾活动。那个热闹、热烈简直与前不久全球的东南亚海啸不相上下。反正给人的印象，国民政府的确是很落俗套，根本没有什么创新意识。

再看 60 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的表现出的英

明、果敢，创造性与想象力，如果老蒋能知道一定惭愧得要哭死了。首先，我们政府英明盖世的一点是，将有关消息 封个滴水不漏，我们的报纸上还是亩产上万斤，形势大好的消息。这样一来，苏修、美帝等国际敌对势力还以为我们真地富得流油哩，这样他们就无法看我们的笑话，他们想假惺惺作态似的提供援助的美梦也就彻底破产了。仅这一点，民国政府就做不到，也不会做。民国十八年时，虽然没有电视，但陕西部分地区大灾的消息还是通过报纸等落后的媒体，传得天下闻名。其次，我们党和政府加大了出口的力度，灾后的年出口比灾前还提高了百分之四十，还提前还了欠苏修的债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其三，我们政府也不象几千年前中国的封建皇帝那样，在灾荒之年要求临国提供粮食援助，不仅是这样，在大灾年还无私的援助朝鲜、越南，阿尔马尼亚等其它友好国家。将中国人民助人为乐的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四，我们大造声势地发动了全国的反满产运动，让广大人民自动自愿地把家里的余粮拿出来交给国家。其五，我们为了保证机密，派民兵把守路口，让那些饥饿的人不得外逃，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要说国民政府没有这想的想象力，创造力，执行力，这也是全世界几千年都没有过的事情，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都想到了，做到了，这种创造力与执行力有谁可比？我真是感叹，有这样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中国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干不到呢？

铺天盖地谴责 共产党就这样推翻了民国政府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发刊词。1942年9月起该报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7年3月27日停刊。新华社发

抗日时共产党民主言论摘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直宣扬民主，到抗日战争中，偏居一隅延安，更是利用国民党民主政体中的不足开动宣传机器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大讲特讲民主、自由，赞扬美国的民主治国，揭露、批评、抨击中华民国执政的国民党不民主、自由，推介出中国共产党民主的执政理念。摘录如下的一小部分精彩的片断：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 GCD 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 --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周恩来一直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蒋介石的战略不高明，这也是确切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战略思想的确高超，他们打中国的“民主之牌”，在抗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他们在毛泽东的指引下笃悠悠看戏，写作，自从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还动员写作班子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并由他署名公开发表，以后这张民主牌成了拿手好戏，随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致到四四年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社”各种论说民主的文章和广播日益升温，以上这种铺天盖地谴责国民党不允许民众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信誓旦旦承诺共产党人提倡民主建国，给民众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各种自由……。赢得了民主党派的普遍喝彩，“赢得”人民的拥护！

对照以往比较现在，受骗者死者已矣，而生者，何为？

新华网一篇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文章 内容摘要：

编者按：只要共产党不乱搞，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清官。而有了这样的清官，只能说明当时的社会成了问题。而有了这样的问题，一两个这样的官员根本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还是

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反过来证明那三年是人祸。

“三年大饥荒”未饿死一人的山东“落后县”

2007-04-14 来源: 人民网(北京) 网友评论 71 条

1962 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 1700 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 3471 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250 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 1959 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

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一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 18 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 1960 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 20 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 20 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 5% 至 7% 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 7% 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

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 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楼”，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 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1964 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 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 1000 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 91 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 年春节后

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

事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 ——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粮食关纪念碑》（图片截取自北京之春杂志(总第187期)）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事后连刘少奇都说要“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为了这句话，刘少奇在文革中死无葬身之地。50年过去了，大饥荒的碑没有立，却立起了毛泽东纪念堂，至今仍雄踞于天安门广场。倘若人死后有知，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如何能够瞑目？一代暴君毛泽东该以怎样的冷笑蔑视那些认贼作父的人们？

这里，我们不能不感谢吴晔，这位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农民的儿子，他用自己的钱，委托村里的人，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大跃进期间饿死、冤死的村民立下两块纪念碑，为那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留下了最有力的见证。

在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放映了他拍摄的《粮食关纪念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纪录片通过对吴晔的父亲吴永宽等人的访谈，

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反映了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在大跃进期间的悲惨故事。

吴永宽说，1959 年本来是个丰收年，但是由于县委书记马龙山浮夸虚报，逼迫农民把绝大部分收成上缴国库。这还不罢休，后来又以“反瞒产”的名义进一步搜刮掠夺，导致村民断粮 50 多天。村民没有粮食吃，只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在死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个 130 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 71 个人，许多家庭甚至全家死光。因此当地人称之为“粮食关”。吴永宽告诉我们，那时候，从上到下都说大话、说假话，谁要说实话就给你扣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就批你、斗你、打你、把你用绳子吊起来。吴永宽说，他的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就因为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就遭到队长批斗，连气带饿于 11 月 3 日死去。

除了立碑纪念，吴晔还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凡是全家死光的，后面都注明“绝户”；凡是死者还有亲属在世的，都注明死者和家属的关系，譬如某某是某某的祖父、某某是某某的弟弟，等等。

这两座小小的“粮食关纪念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这两座碑就立在村子里，碑上铭刻着全村每一个死者的名字，可见它的真实性是得到村民的承认的；

2、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毛泽东纪念堂仍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而中共当局却并没有禁止或破坏这两座碑的建立，可见它的真实性是连共产党也无法否认的。

3、吴围子村饿死这么多人，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固然，吴围子村的情况可能属于特别恶劣的一种，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既然这里的人祸并非仅仅是个别坏人的恣意妄为，它首先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而这个政府又是最集权的，整个国家又是最高度一元化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在当时的中国，饿死人的事情一定是相当广泛、相当普遍的。

胡杰是中国著名的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他拍摄的反映“反右”与“文革”悲剧的纪录片《寻找林昭》、《我虽死去》，曾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我虽死去》一片获得第四届 REELCHINA 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大奖。

50 年前，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远比今天更严厉，老百姓有照相机的都少得很，饿死人的事情又基本上都发生在农村，所以几乎没有照片留下来。近些年来，由于摄像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公民记者，也出现了一批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有的是现场直击，有的是往事回顾，为历史和现实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音像记录。他们是突破新闻封锁的英雄，是历史真相的守护者。在中国，该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些题目，再一拍就拍不成了。我们向独立制片人致敬，也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期望，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工作。

“大饥荒”时期“人吃人”的考证

章 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大饥荒”，官方虽然承认“大饥荒”存在饿死人的事件，但是一直不敢正面承认出现“人吃人”的事件，然而我们仍然能从官方的报导中侧面了解到一些“人吃人”的事实。

由共产党官方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一九六零年第三零三二期报导：据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贵州等地十一个县市的统计，今年以来，发现“吃人肉”案件十七起。其中甘肃十一起，宁夏、贵州各三起。在这十七起案件中。惨遭杀害的有十五人（内小孩十三人），掘吃尸体十六具。从作案的二十二人的身份来看，地富反坏分子十一人，反动道徒二人，中农二人，贫农三人，小商一人，家庭妇女三人。

他们为什么吃人肉？据初步了解，原因错综复杂。有的是发生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吃人肉”的野蛮恶习，如宁夏吴忠公社丁明礼、丁秀英夫妇，竟将自己的七岁女儿杀了吃肉。在审讯中，丁秀英供认：以前在娘家就吃过人肉，早知“人肉香”。还有的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长生不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富反坏分子敌意趁春荒的机会，煽动吃人肉，制造恐慌，借以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贵州赤水县一名叫黄金安的地主（曾判过两次徒刑，释放后仍不悔改），去冬以来连续偷盗了三具尸体，到处散布他要吃人肉，其实他并没有吃。甘肃张掖市坏分子于兴发企图拉拢邻居祁桂香共同挖尸，并造谣说：“把人肉拿来吃了再说，这个坏年成，是饭堆里饿死人，火堆上冻死人，大小娃子都饿死了，你还想活吗？”

从新华社编的这封“不打自招”自供中，虽然记者是在为当时出现的“人吃人”惨案的现象进行辩护，但可以知道，“人吃人”惨案在当时是一个不争事实。

“人相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最严重时期的恶果。而我们翻开许多省的省志和县志，对一九六零年多有“人相食”的表述。诸如这类惨案，在三年大饥荒的时期许多地方都发生过。中国有句古话叫“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由于饥饿对人们生命和生存造成的威胁，使人间的礼仪廉耻丧失殆尽，人们几乎经常看到一些衣不遮体的饥民抢夺别人手中少得可怜的一点食品，不少饥荒严重的地区卖儿卖女成为风气，抛弃父母子女的现象更习以为常，由于饥饿，成千上万的农户家破人亡。

那些“大跃进”苦日子的过来人，那些吃过“稻草淀粉”知道，人饿极了就会什么都吃的。那时候，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汤寡水，见不到几粒米，漂着几片野菜。大人都饿的受不了，小孩子饿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条！野菜、草根、树皮、树叶、水藻、观音土、苔藓，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什么不吃！小孩子逮个老鼠都是好东西！挖到条蚯蚓，逮个毛虫，放到嘴巴里就吃了。真惨哪！那个稻草淀粉怎么吃？我告诉你，食堂把草纸浆挤出水，捏成粑粑，放在蒸笼上蒸一下，当成饭发下来，一餐大人两个小孩一个。比野草还要难吃多了，满嘴发涩，满嘴草，咽不下，卡喉咙，就着水往下冲，到了肚子里更难受，烧心烧胃，肚子疼。还得吃，什么都吃！尽有吃死人的，人都饿疯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创新坟，挖出死人来吃。后来人死了就扔在路边，也没人埋了，就会有人去弄了吃了。也有的是自己家里人刚死，亲人就吃了他。你说？不惨！你问到吃人肉是什么感觉？这个话我们可不好说，以前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说是吃了人肉长丁疮。不过对饿得快死的人了说，人肉也是肉哇，吃了人肉还是有补养的吧？反正我们这里就有人活下来了。

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却永远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话题。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都听说过关于吃人肉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当时，它被视为反政府的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一经查处将被处以极刑，散布此类传闻也有相当风险，因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地进行。孙二娘式的勾当极为少见，多半是在死人身上打主意，他们本无杀人之心，只是饿极了而已。同样的原因，在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连“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在四川泸州专区曾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到肉香，又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踪影，回到学校便疯了。

吃人案由公安部门秘密侦破，判处情况绝对保密，因此尽管广为流传，却难以掌握准确的例证。为了不致让人感到它不过是流播和言传，作者引用当时记录在案的两件事，这是灌县一天之内同时发生的。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四十一岁，地主成分……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群众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篋等物，把坟墓挖开，

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一点五元一斤，共卖了十一斤十二两……事为食堂事务长黄荣太觉察，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此毒手，为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丈夫死了，妻子将尸体挖出来吃，这本是饥荒造成的惨剧。但因为妻子曾是地主的寡妇，丈夫是贫农，就成为有计划、有步骤的阶级报复，这是当时流行的推理方式：阶级成分决定行为动机。似乎除此以外他们连人的基本需要都不存在。因此，他们若有不轨行为，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反过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这使作者想起这年大肆宣扬的合江县著名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一个叫王文学的前地主在地里偷辣椒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将王带到公社，王最后掐死了他。无论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王一旦被送到公社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成分不算坏，就从思想上挂靠，总之，吃死人肉之类的事决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干得出来的。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解放前男人外出当兵病死，解放后在四大运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统购统销后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下，该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该队社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因为能找到政治原因，县委才可能向地委报告。可以肯定，大量“政治影响不好”的事已经永远石沉大海。

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一九六零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一九五一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麼。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麼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了；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赵夕珍和陈章英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八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作家王立新八十年代中赴凤阳采访，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犁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一九六零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作者金辉写的《安徽省凤阳县一九五八 至一九六二年灾难实录》也纪录安徽凤阳“人相食”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 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一九六一、八、九)

一九六零年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一九六一、一、。)

一九六零年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六十三人,关死三十三人。(一九六一、一、。)

一九六零年 ……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一九六一、二、一、,)人相食这种人间惨剧,并非安徽凤阳所独有。三年灾难时期,至少在中原大地河南、在黄土高原上,也有过同样骇人的悲惨。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报》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是近几年来北京文坛上比较活跃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他在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写了一段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故事: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一九五八年到 一九六二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呢?

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

在甘肃六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人相食现象。甘肃省委一九六零年底在逼迫向西北局做出的检查报告中,就反映一九六零年元月在甘肃发生了十一起人相食的事件,报告这样说:“今年元

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十一一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

在甘肃省的静宁县，有一山村的奶奶吃掉了自己的孙子，老妇人先被拘留，后在纠正“左倾”路线时被释放，同时在这个县还发生过一起贫下中农子女吃掉富农子女肉的惨剧。历史应当永远记住人相食是人类的最大耻辱，但这种耻辱在极端饥饿状态下往往会现出，人类要消除人相食，必须首先消除极端的饥饿现象。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因“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三十五页。李景膺，一九五九年 至一九六五年为贵州省委书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为内务部副部长。）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零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金沙县一九六零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零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零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有些人家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六十年代在全国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也曾发生过人相食的惨像。高晓岩在《民族大浩劫的前奏》一文中曾记述了刘少奇为人相食而痛心的事例。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毛泽东通知刘少奇见面，主要是要谴责刘少奇坚持包产到户的问题，刘少奇走到中南海游泳池，热情地问候毛泽东，毛泽东却声色俱厉地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激愤地说“饿死了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当时饿死人的，不仅仅是甘肃、贵州、安徽等省出现人相食的惨景，在其他省份也有。

魏紫丹：半世纪后的回答 作者：魏紫丹 内容摘要：反右是违法的，犯罪主体是毛、邓，一个首犯、一个主要帮凶。正如奴才有时比主子还凶，邓在反右中是无比凶恶的。在历史法庭上，邓应坐在被告席听候审判。为了让没读过上篇的读者先读上篇（好在篇幅很短），摸清大头小尾后再读下篇。兹将上篇拷贝于下：

我的朋友 张先痴先生，在普林斯顿纪念反右 50 周年大会上说，当初他并不反党，即不是

右派，却划了他右派；如今党“教育”得他真反党了，即真成了右派，却又给他改正了。当然，有此体会的不止他一人。人们的直感是“荒唐”；深思之则会发现，其来有自、一点也不“不”荒唐。这就使我产生了事后的一孔之明、一得之见，对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发出反右号令、由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自鸣得意地提出“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要提供一个新思路指导下的、迟到的答案。

毛问：“这是为什么？”

我答：“因为你要反右。”

的确是这样。如果他要反你右，并不总是因为你右了他才反你。而是因为他要反你，才把你說成右。丁玲提供了极其鲜明的例证，她左得很，即便当了 20 多年右派之后，依然故左，左性不改。当时是周扬按毛泽东给他的名单，划她右派的。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1]

的确是这样。只要他想反你，你就是在劫难逃。后来的事态就更彰明昭著了，他反你右，但你不但右，而且比丁玲还左，左得出奇，左得登峰造极、堪称天下第一人；他反不反你“右”了？照反不误。如，我们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活、最活、最活、最活的林副统帅，按共产党的定义，应该叫做“极左”。眼皮儿最活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就是提出反他“极左”的，结果触犯了龙颜！上疏支持总理意见的哲学家王若水，也碰了一鼻子灰、在文革中倒了台！天知道，毛泽东要批的、是林彪的“极右”!!! 这就是说，他要反右，而你是极左，也可把你說成极右。陈沂、陈涌、姚雪垠不都是划了右派的极左分子吗？

毛泽东是只管“予取予求”，不管“事实”的。他不管历史上你曾经如何树立他（林彪、刘少奇）、支持他（张闻天、陆定一）、爱过他（杨开慧、贺子珍）、保卫他（彭德怀、罗瑞卿）、追随他（陈伯达、关王威）。。。。。。他要反你、厌弃你，马上就是翻脸不认。若果他想利用你呢，即便他明知你是汉奸（陈永贵）、叛徒（张春桥）、走资派（邓小平），也是照用不误。

总之，就像狼吃小羊的理由是它需要吃那样；他需要“马”，或需要反“马”，可你不是“马”而是“鹿”，那也无妨，他可以“指鹿为马”。

这是我回答“这是为什么”的又一补充答案；顺藤摸瓜，再深一层的问题是：毛“予取予求”，又是在反右中“取、求”个什么呢？

我在拙著《还原 1957》的第一篇《反右探源篇》里，已从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制度原因和个人原因，作了说明。这里旧话就不重提了，再说些新话作为旧话的补充。

话说曹操，因为军粮不足，为安军心，遂令发粮官按小斗发。结果造成军心哗乱。又是为安军心，就又把发粮官杀了。发粮官和曹操谁都心知肚明，是他下令要用小斗发的。这出“借头”戏，是丞相为解一时之需而设的“阳谋”！

毛泽东要“取、求”的，也是右派的头，所以说，反右也是一出“借头”戏。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一眼就看穿了：“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2]

国家当时面临的是什么困难呢？国际上，反苏反共之势风吹树、风满楼、风起云涌！连美国著名作家法斯特都宣布退了党。国内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知识分子闻听苏联“解冻”之声，声声入耳；“中国的蚂蚁”蠢蠢欲动。毛泽东以退为进，提出党内整风，消除“三害” [3]。怪（！）就怪在毛一向口口声声要依靠工人、农民，而这次却不让他们来帮助党整风，反而厚爱这般他往日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诚恳（！）地请他们来帮助党整风。有幸听到毛讲话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

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 [4]

干脆让我把傅先生受骗的事说到底:翻着<<傅雷家书>>往下看,再一封信,就是说:“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 [5]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 [6]这信说的是,傅先生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后,在作家协会上接受“帮助”的情形。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文革中,夫妻双双自杀,同归于尽。盖棺论定,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傅雷的经历就是浓缩了的一部反右史,也是毛反右的借头史。真正在反右当中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中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 70 人,其中 13 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矣。然而当年《人民日报》等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很可能那位御用文人就是看了此类报道,才抱着政府大腿、“有根有据”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论的。

小匈牙利事件虽然改正,但“借头”的效应,已彪史册。利用反右“借头”,这一招真灵,毛泽东取得了远比曹操还大得多的胜利;吾等过来人都知道,当时所有的“不安定”因素,全于瞬息间被镇压下去了;收效如神。

“下篇”正文:

现在轮到说邓小平的“改正”了。人家张先痴住了你们 23 年的监狱,已经被你们改造得真正反党了,你们却反而又给人家“改正”了。你们干了人家认为、前后两种都是错误的事情。

“这又是为什么?”

老作家萧军在改正、平反后说的那句话:“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车、马、炮拼光了,现在用着我们这些卒子了,所以才把我们搬出来。”事实上,毛泽东建国后掌权二十七年,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把一批批知识分子打了下去,“十年文革”又毁了一代人,把经济搞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四小龙”都发展起来了,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中国的确是大大的落后了,再不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事业,中国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这一点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因此“文革”后他掌了权,提出了大搞“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当然是英明正确的。但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而“文革”中又毁了一代人,知识分子出现了“断代”现象,因此他才决定给当年的“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把这帮人又请出来了,这大概也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论吧! [7]

“猫论”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标志物。但是他还有理论形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他坚持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8]“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9]。大家，有的已经、有的正在认透毛牌“实事求是”是个什么货色。但对邓小平的猫牌“实事求是”，却一直让他瞒天过海。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让别人说他是“不实事求是”的。可见，“不实事求是”的名誉是很坏的。但为什么还会有“不实事求是”呢？这，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利欲熏心。我想不出别的原因了。比如说，人们研究历史总是要精益求精、务求其细，但，邓小平竟说，宜粗不宜细。这不是 很明显的硬要人们学打马虎眼吗？邓小平止不住内心里暗叮咛：予岂好“粗”哉？予不得已也。----“解决历史问题要粗，不要太细，太细了要伤到我们自己头上，伤到我们党的机体，伤到我们国家的机体。”[10]

再比如，成为邓小平奇耻大辱的、那段臭名昭著之谈：“1957年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1957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得分量也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11]让我们稍加分析：

1、你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前进的还是倒退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小错还是大错而特错？你们后来的、至今仍在进行的实际行动，是不是如群众所说：“一夜退到解放前”？当然你们现在还在继续退着。就是说，你们的行动远比右派猖狂地、要你们不要铸成历史大错的言论，更杀气腾腾得多！如果你们当年听了右派的话；还用现在把拉出的臭屎再坐回去吗？

2、再说“杀气腾腾”。最明显的标志是葛佩琦“杀你们共产党人”的言论。即便加上你们的编造，也是在你们决定反右（毛泽东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半个月、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既然你说是“因为”：“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那又怎么能结果（反击）在先，而作为原因、被反击的对象“杀气腾腾”，却姗姗来迟达半个月之久呢？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即令脸皮再厚，能说得过去吗？这只能有唯一的解释：反右出师无名，纯属不义之战。所谓“正确的、必要的”云云，全是强词夺理、无稽之谈。

3、至于“扩大化”。“扩大”作为数学的术语是与“增加”倍数相关联的概念。 a 扩大3倍即为 $3a$ ；而增加3倍则为 $4a$ 。在百万右派中，未改正的据说是几百个。那么，“反右扩大化”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扩大了一千多倍。这里有个假定，这“几百个”确实不属于冤假错案。但这个假定是与事实不符的。又据解密档案透露，划右派是三、四百万（其中很多并非知识分子）。这么一来，扩大化就是几十万倍了。

4、所谓“打击面宽了，打击得分量也太重。”难道轻飘飘地说一声“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就可以对造成血淋淋的、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交代过去了吗？邓小平说：“反右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你还是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啊！不仅你硬逼各单位多划右派，而且是你火上浇油、大批温情主义的呀！1957年9月，你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你说你有责任，不错，但你没说，对如此重大的罪责，你该怎么负责？该当何罪？

这些问题不弄清，你算什么“实事求是派”？你说过：“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12]原来你是有条件的“实事求是派”。你要用“恰如其分”来限制实事求是。猫论指导下的“恰如其分”，就是恰（卡）到好处，即，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能卡到好处，就实是求是；不能卡到好处，就不实事求是。实

事求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时候能卡到好处，就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时候实是求是。就以你“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来说吧！你心里完全明白是不实事求是的。你却硬要拍板（赵紫阳说你特别爱“拍板”）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你曾这样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这的。”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一代先不实事求是，你们死后让下一代再实事求是；但是，下一代和你们一样，都是出于卡到好处、利欲熏心，于是就下代复下代、下代何其多；中共不亡，实事求是别想。

还是回到对右派的改正这个话题。毛泽东用最无耻的流氓手段，把两个冤家对头硬是拉郎配、打成“章罗联盟”；中共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存在组织上的联盟。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说老毛要借他的头。现在，邓小平也要借他的头。他的女儿章诒和说，中共中央统战部找她母亲（由她陪同）谈话：“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13]

这样豁七除六，章先生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就划不成了。反右的“正确性、必要性”，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反右扩大化”竟然成为以O作分母了！但在数学上，O是不能作分母的呀！而毛不管这一套。他要借头，就要划右派；同理，邓要借头，就要留几个不予改正。共产党为了一己、一党的私利，已经到了予取予求、抓住鼻子不顾腮的地步了。

如果说，反右借头是杀鸡儆猴，杀的是鸡头；那么，邓搞改正为自己的政治需要，既要作婊子、又要树牌坊，挂羊头卖狗肉，借的就是羊头。正如他为了政治需要反对两个凡是，是挂羊头、是树牌坊；而实行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则是卖狗肉、作婊子一样，他对右派“改正”而不“平反”，则是既要… …又要… …而随后的镇压民主墙、反对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直到露出青面獠牙、血洗天安门，则完全是他卖狗肉、作婊子顺理成章的发展。

即以“改正”一说而论，也非他之独出心裁，而是搞的“凡是”。根据如下：

中央统战部早在1962年7月26日，曾经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份《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打算给一些右派分子甄别平反。不料，8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的“批复”指出：

不应当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

表现不好的再把帽子给他们戴上；

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14]

现在，不论是我这篇文章，还是国人的一些议论，都把大前提弄颠倒了。大前提是，反右是违法的，犯罪主体是毛、邓，一个首犯、一个主要帮凶。正如奴才 有时比主子还凶，邓在反右中是无比凶恶的。在历史法庭上，邓应坐在被告席听候审判。所谓“颠倒”也者，是他却冒充起审判长，胡诌什么正确的、必要的、扩大化、改正… …这既可恶、又可怒、又可悲、又可笑。这就如同把秦香莲的冤假错案交陈世美处理；怎么能这样呢？后者本是被告、是该开铡问斩的罪犯呀！

注释：

[1] 郭罗基《周扬按名单抓右派》《动向》2003 年 11 月号

[2]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第 352 页。

[3] 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4] 《傅雷家书》第 158 页

[5] 同上，第 163 页

[6] 同上第 167 页

[7] 陈奉孝《反思反右运动》

[8] 《邓小平文选》二卷页 109。

[9] 《邓小平文选》三卷页 209。

[10] 邓小平 1980 年 1 月 16 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段讲话在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时被删掉了。

[11] 《邓小平文选》二卷页 207。

[12] 《邓小平文选》二卷页 273。

[13] 《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 页 438。

[14] 中发〔62〕429 号文件

魏紫丹：非我也，岁也 ——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二

作者：魏紫丹

从这篇开始，我要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作一番归因的研究。首先说明，这个归因，不单指起因，而是包括了从发动到失败的原因。其次要说明，从所归的原因来分，有个人的原因和制度的原因，内因和外因；从归因者来分，有官方的归因和民间的归因，国内的归因和海外的归因。而这几种因素又往往是重叠、交错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所以只好撮总地加以论述，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其归因类别。

官方的归因，基本上是一个中心：坚持维护党和党的领袖的威信；两个基本点：第一个是“良好愿望”论。第二个是“天灾人祸”论。

关于第一个论点，我在上篇已提到过，据说是出于共产党、毛泽东的好心眼，急切地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官方在这一点上坚持撒谎，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以贯之的。1957 年反右期间，毛泽东就撒谎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五卷，页 456）对被事实击得粉碎的这篇谎言，邓小平在整整 20 年后，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又重提之，并说：“毛泽东同志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二卷，页 41）撒谎成性的他，连对迫害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忍痛撒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

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同上，页 139）难道他真的认为毛发动文革不是污秽的权力之争而是要实现一种纯洁的革命理想吗？张显扬说得一针见血：“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 2006 年 5 月号）可见，毛邓两人在撒谎骗人上，实在是难兄难弟！鬼才相信毛泽东、共产党反右、大跃进、以至于文革，都是出于“良好愿望”呢！实际上，连鬼都不会相信。难道数以千万计的饿死鬼、冤死鬼会相信这些鬼话吗？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 1961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37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回马枪，把这种比较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批为“黑暗风”。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提“人祸”了。从此，“全国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成为对高举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舆论一律的说辞。直至今今，与人谈话时，每每仍能听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何如何……”悲矣哉！欺骗对人的毒害，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说到这里，少不得要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继承和发扬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我想，读者若与三面红旗下的相食的惨景相对照，对此，我就无需再置一词了。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基本精神是恢复了刘少奇的论断。

而民间的归因，则是与此针锋相对。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 V I I 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转引自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我们再看与 1959~1961 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 年、1962~1964 年。这 6 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 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 1959~1961 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 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 1998 年 3 期）。

1998 年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 1958 年气候很好，1959 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 58 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 2 月 27 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四川省饿死 1000 多万人，居全国之首，可是所有有关调查研究的报告，都否认天灾说，众口一词：那三年“风调雨顺”。

所有活着的右派，都有资格做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当时在黄泛区五二农场劳动教养：年景好得很！五谷丰登，连红薯、花生、瓜果都是大丰收。红薯片晒得到处都是，晒干后堆积如山。我们挨饿、浮肿、甚至有的饿死，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制度规定的低指标所致。听说信阳的确遇到了自然灾害。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余德宏（他是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二人都是体制内、由于抵制浮夸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这样说：“1959 年的旱灾虽然是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天灾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1959 年的夏粮因降水量偏丰而歉收，秋季因严重的伏旱而减产，但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近 15 亿公斤，按 800 万农业人口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以后，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在 150 公斤以上。虽然偏少，但比 1949 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级领导重视灾情，及时动手，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饿死人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严重的灾害是发生在连续丰收之后，不仅社队及群众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区国库中尚储粮 5.5 亿公斤左右，万一在生活上出了一点问题，请示上级批准，动用一点库存，相信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页 474-475）

同样的事，也是发生在河南省。“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转引自《饥饿的三年，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2》八卦人生网）

正面与反面，两相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所谓“自然灾害”，完全是毛泽东、共产党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伤天害理，一至于此！官方的

目的是尽量误导人们远离大跃进的政治本质。大跃进的政治本质，离开人祸则无处追寻。关于人祸，官方和民间也是莫衷一是。这正是下文要加以探讨的。魏紫丹：爱之愈深 害之愈惨 ——读高尔品的小说《妈妈的爱》有感——

魏紫丹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长，以精取胜。“精”的要义，浓缩二字：蜂采百花、量中求质、酝酿成蜜。

一个两千多字的短篇小说，竟能从日常生活中摘取一件随机小事——失手摔坏一件小东西（这次碰巧是个石膏塑像，并且是个非同一般的石膏像），即小见大、从小孔里掏出了大螃蟹；掀起一场与人生、命运攸关的轩然大波。从中表达出难以想象的广博、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其对生活的广度、深度之反映，表情达意、感人之至深，对于发挥短篇小说的功能来说，其笔力之雄劲，简直是掠夺性地、强小说之所难地，加之以超负荷的承载、超容积的容量、超饱和的浓度。

一、爱，置她/他于死地

好的小说，必然令人想起生活，即便是《聊斋志异》志牛鬼蛇神、《西游记》记妖魔鬼怪。我所谓的该小说令人想起的生活面之“广博”，就在于在这样的社会里，这类现象睁眼一看满目皆是、伸手一抓满把皆是，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还在于“妈妈”这个可见其面、可闻其声的形象、她的命运为她安排的生活道路，所具有的广泛的、普遍规律性的典型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的遭遇，从本质上说，是成千上万、数以亿计人的缩影。大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等。他们不都是死于他们的“爱”吗？爱之愈深，死之愈惨。这是人们从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中，悟出的一条含血滴泪的规律。尤其是彭大将军临死还念念不忘“要见主席一面”。你是顽童，还是元帅？呜呼！何其不幸！何其蒙昧！

中间一层的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们也是如此。关于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报人邓拓，胡绩伟说：“令人深感痛心的是，在邓拓同志的绝命书中，仍然充满着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对毛主席的忠诚热爱之情。他在绝命书的结尾中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看来，他当时还没有认识和觉悟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置他于死地的一场大阴谋，而他仍然忠诚地呼喊置他于死地的人‘万岁’！中国知识分子的呆气和傻气，怎能不令人刻骨铭心！[1]”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些高官、硕儒尚且如此，对于饿死4600万、而仍照喊“大救星”的农民，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要说底层的干部和学生们，那更是喝足了迷魂汤。四川右派周居正，是与江竹筠江姐、罗广斌一起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江姐绣红旗的原型故事主人翁是周居正；1949年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四岁孩子；1957年周居正成为右派后，1958年在沙坪劳改场被以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判处死刑。周居正被共产党枪毙前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这种麻醉、麻木至死不悟，死到临头还要遗嘱后人继续走、致他死地的“爱党”之路。

北大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中共党员，1958年被枪毙。

黄宗羲有八年中共党龄，贫雇农出身，根正苗红。反右时是北大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因反对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被认为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让其在—间屋里反省。黄因细故与监视者口角继而动手互殴。黄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右派杀人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黄赴刑场前，法院让其见了妻儿。黄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黄的这番话被法院作了记录。

那时的中国人（现在呢？），“妈妈”现象是常规；不是“妈妈”的，倒成凤毛麟角。“妈妈”爱的是她“娘”，不过，她却没有什么机会像王蒙、丁玲者辈—样，说：“娘错打了孩子！”相同的意思，恐怕只能是在另一场合——向马克思报到时，万鬼齐号：“是娘错杀了孩子！”

小说叫“妈妈”承担的，是如此巨大无比的社会悲剧、民族悲剧啊！然而具体体现出来的毕竟是妈妈的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妈妈是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你在万般小心下失手摔坏那块石膏，就算真心自责，又何必到革委会去出卖自己；是否想向领导表明你这份真心呢？再则，已经受到了处分，还不吃—堑、长—智，人家都不敢读报，你还要头拱着去淌地雷。当然，有表现欲也不是甚么罪过，而是人性之常；在此反常的社会，那些没有个性的木雕泥塑、甚至疯子傻子，遭遇牢狱之灾、杀头之祸的，也比比皆是。

有人把“妈妈”的悲剧与祥林嫂比。但是，无论就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普遍性或人物遭遇的悲惨性，还是就环境的残酷无情、人际关系反人性或政治上的统治如罐头、如蛛网、群众专政、遍地虎狼、冤狱布满全中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在在不可相比的呀！如是说来，祥林嫂在“妈妈”面前，难道能够称得起是“小巫”吗？

又有人把高尔基的《妈妈的爱》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相比。对此，小说中的那位万恶之源，会踌躇满志、坦诚相告：

“你们说这是悲惨的世界，我们—概承认。问题是还需要我们加以补充。雨果写的那算什么《悲惨的世界》？我们是它的100倍！”

掩卷而思，气愤有加，拍案而起，捶胸顿脚，“此人罪恶，罄竹难书！”然而作者却以不动声色、侃侃而谈、引而不发、置核弹于未爆；而让笔下的人物顺理成章地、说着蠢话、办着蠢事、无辜受害、卒致亡命。吁夫！“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胡适语）者，其是之谓乎！

二、至死方悟，悔不当初

我所谓的小说立意“深刻”，是指小说的主题思想、如—根火柴划破黑暗，如—根金针刺穿虚皮；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提出思想启蒙的新课题，为历史的进程竖起—座里程碑（望小里说，也堪称—块“记里石”。公路、铁路旁边的小石碑，叫“记里石”）。

它的出世，比推翻“两个凡是”，更具历史的高度。谁也不会怀疑、妈妈把“两个凡是”奉若神明；小说引人深思：为什么偏偏是“两个凡是”害死了她？那些冤枉“妈妈”、说她反对毛主席的人，心里比谁都清楚，妈妈真心热爱毛主席、自己却是在昧着良心说假话。同时彼此都知道、任谁也都是在讲假话。好像全社会订了攻守同盟似的，谁也不许戳破那层窗户纸。小说的石破天惊之处在于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就像小孩喊出皇帝是裸体。这里揭示出，一切都是假的，看谁能假过谁？华国锋打出“两个凡是”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就应该对四人帮不要着急、慢慢来；今年问题不能解决到明年，明年不能解决到后年；谁叫你搞“—举粉碎”来？信手拈来，皆成例证：那具不曾被焚掉、作为“两个凡是”之主体的尸体，内心就不忿劲儿：“我是带头签名要火化的呀！”尸体无言，却在日日夜夜揭穿着“两个凡是”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假相和华国锋其人是貌似忠厚、内藏奸诈。

华国锋推出“两个凡是”是假的；邓小平推翻“两个凡是”是真的吗？凡信以为真的人，特别是那些锋芒毕露的人，都被赶到了海外。他们感到大大地被诱奸了！原来邓是以毛的“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代替对毛的“两个凡是”。他要这个“朝二暮四”的花招，并不是

要解放思想，而是要“解决”华国锋。刚才说过，“看谁能假过谁？”现在证明，华国锋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对手。邓小平是“幼吾幼、以杀人之幼”的刽子手。现在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整个社会，“骗”字弥之六合：党骗人、人骗人、人骗党、党骗党，一至于此。民谣为证：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骗得全国团团转。文艺沙皇周扬（我称之为口悔了的左派）看穿这一点，才对呼吁思想解放的本小说和本作者采取保护措施；作者所在市的市委书记也心知肚明：推翻“两个凡是”纯属男借题发挥，也才咬牙咯咯地说：“写这样的小说是要杀头的呀！”

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如此，小说简直是号召国人起来造反。共产党怎么说、怎么做，都是在骗人；你怎么说、怎么做都逃脱不了遍布全国的、一步一陷阱。总之，在这个奉“你死我活”为生活准则的社会，谁也别幻想有好下场（包括害人者）。小说的结尾说出“甲”，让读者想到“乙”：抛弃它吧！再也别对这架具有剧毒性的“鸡肋”、感到“弃之可惜”了。天快亮的时候，妈妈忽然挣扎着要起身，我忙扶着她下了床。不知她哪来的力气（紫丹也和她女儿一样惊奇：“不知她哪来的力气”！），竟突然推开了我，向对面的墙上扑去。妈妈扑到墙壁上，仰脸望着墙上镜框里的毛主席象，双手紧紧地抓着别满象章的红绸，全身颤栗……

我扑过去扶住她，也禁不住全身颤栗。

妈妈虚肿的脸在抽搐，嘴巴歪曲着，两只眼睛湿津津地闪着怕人的光。（紫丹不解：怎么这样虔诚的一个信徒，会对她的上帝露出这么一幅凶相？）

“妈妈，妈妈……”我叫喊着。

妈妈象绷紧的琴弦突然断了一样，松开了手，瘫痪了，两只眼大睁着，盯住墙上，眼珠发直，一动不动，白发披散在脸上。

“妈妈！妈妈！……”我嘶叫着，摇晃着她。

她已经死了。

读完小说，一位全国皆知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际，很久、很久也没消逝：

吴晗，一位响当当的左派人物，著名的明史专家，反右时充当党的一只警犬、疯狂地助纣为虐、参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此前，曾对中华民国政府狂吠，赢得中共青睐、以北京市副市长封官。1968年初，他被关进监狱，满头白发被揪光、大口吐血；临死之前，咬破舌头、蘸血写下四字：“悔不当初”。

那位《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先生加的“光明的尾巴”，一则蒙蔽了上级，二则误导了读者。我这样做才是正本清源。如以妈妈在监狱里写的“明信片”，还要女儿热爱毛主席、与她划清界限，就认定妈妈不可能作此突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则根据我的经验得知，犯人写的信首先是让“政府”（劳改对干部的称呼）看的，其次才是（也才能是）让家人看的；二则，是否妈妈的“爱”已经“暗渡陈仓”、转向了女儿？这就是说，她觉醒了，她要保护女儿。因为监狱并未限定、写信必须用“明信片”，而是限定信封不许封口。作者用“明信”二字，在写作技巧上就是明示“明修栈道”，或暗示“暗渡陈仓”。这是最顺畅的解释。那个“光明的尾巴”，我未见过，但我猜想，它可能会是很牵强的。无怪作者出专集时，就把它去掉了。

所以我设想，以“悔不当初”为起点，本世纪末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历史学家，会根据起码是老本行吴晗的遭遇（包括害人与被害），为历史作证：“从20世纪下半叶起始，中国大陆变成一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谎言王国；露出利牙、同类相残的野兽王国；垂涎三尺、不识人伦、猪狗蚊蝇不如的动物世界。”这就是这篇小说不是通过逻辑说理、条分缕析，而是通过直感、顿悟而发出的预言：“好在人们利用了上天赋予的、恢复本性的能力；又要感谢毛泽东这个反面教员尽职尽责；这才历经血呀、泪呀的炼狱，完成‘从兽到人’的巨变，为21世纪的中国历史开创了美好的向往。”

附：妈妈的爱

《北京文学》1979年4月号 《新华文摘》1979年5月号等

（《北京文学》发表时曾将题目改为：我的妈妈）

高尔品

1

一九七〇年的国庆节刚过，那种羞怯的甜蜜正荡漾在我的心头：他对我说出来了。

我决定告诉妈妈。可是，妈妈会同意他吗？我心里象揣着一头小鹿，推开了妈妈的房门。我傻了。妈妈站在我面前，一脸泪痕，双手捧着一块崭新的红绸子，那上面放着被打破的毛主席石膏象。

“妈，你要干什么？”我慌了。

“请罪去。”她说。

“不，妈妈，不能去……”我不敢相信她的话。“我不是有意的，失手打的。我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应当主动请罪。”妈妈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她没有管我，恭恭敬敬地捧着红绸子上被打破的石膏象，走了出去。

“妈妈——”我想冲过去拦住她，可是我没有，眼前却闪过昨儿在街上看到的事：一个来城里“请”毛主席象的农民，因为没有用双手捧着毛主席石膏象端端正正放在胸前，一出门就被“专政队”抓了起来……

我原来甜蜜幸福羞怯的心，只剩下一片惊恐和惶乱。

2

因为妈妈主动请罪，只剥夺了她上课与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另外规定她每天要打 扫两次厕所。

妈妈象在做着应该做的事那样认真。上课的时候，她偶尔也胆怯地站到她那个班的教室外面，偷偷地看一眼她的学生们。只有当大家要开始政治学习，而规定她又必须离开时，她的脸上才会涌出一种痛苦的表情，作为妈妈的同事，我的心感到羞辱，不愿抬脸看人，尤其是在他的面前，我会比别人有更多的苦涩和难堪。

因为妈妈的认罪态度好，三个月之后，她被宣布撤销了处分。“天天读”的早会上，我看见妈妈激动得噙满泪水，把“红宝书”紧紧地贴在胸前……

集体朗诵的“天天读”读完了，就接着读报。那张《人民日报》在老师们的手里推来推去，未了，竟推到了妈妈的手里。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忙用眼睛对她说：“你快推给别人。”可是，她红着脸，胆怯地看看同事们，怯怯地说：“我能读吗？”她的请求那么低微，那么虔诚……

妈妈太激动了，几乎是在用一种发颤的声音读着报纸，我根本没有听进去。

忽然，妈妈不吱声了，报纸在她的手中瑟瑟抖着，老师们全都变了脸，我突然明白过来：她把刘少奇读成了……

“我，我，我这是无意，我不是……”

报纸从妈妈的手中落了下来，她面色如土，两眼失神，浑身颤抖，我的心顿时象给火筷烫着了一样……

“你还不向毛主席请罪！”

“快，快请罪！”

妈妈惊慌失措地看着一张张愤怒的脸，慢慢地站起身，对着墙上的毛主席象，噗咚一声跪

了下去……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美萍！”

我也举起了手，抖颤着，我必须跟着喊，但却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嗓子眼，嘴巴是动了，声音却出不来……

3

妈妈被关进了小阅览室。学校领导宣布，马上要在全校掀起一场揭发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夏美萍的运动，并且要我揭发交代我母亲历来的反动言行。

中午，我给她送饭。隔着窗玻璃，看见妈妈泪水满面地跪在地板上，虔诚地仰望着毛主席象，哭诉着：“……毛主席呀，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我有罪，我该死……”

我的心哆嗦着，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妈妈！你就我这么个独生女儿，当我刚刚咿哑学语时，你就教我喊毛主席万岁；当我刚刚认字的时候，你就教我写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你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幸福的后半生，你总叮咛我，心中要永远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如海深恩。你每“请”到一枚毛主席象章，都要激动地戴上三天，然后再把它别到红绸子上珍藏起来；女儿串连从北京回来，你拉着我谈到深夜，问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脸上浮现出无限幸福的神情……

我心中一阵悸动，眼泪便簌簌地落了下来。

“什么感情？她反对毛主席你还哭！”

我猛一回脸，这不是我班上的红小兵排长吗？她戴着柳条帽，手中拿着棍子，向我呵斥。我忽然明白了：她是在看守现行反革命——我的妈妈。

我走了，跌跌踉踉地跑着，看见了他，可是他躲开了我，顿时，整个校园都象在天旋地转……

4

全校批斗大会就在操场上开。

天，阴沉着，寒风嗖嗖，我浑身颤栗着，站在我那个班的同学后面。

“……现行反革命分子夏美萍在黑板上做示范作文时，有意把刘少奇，打倒，和毛主席连成一条斜线，蓄意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夏美萍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我象被人打了一闷棍。

“……她在十月九日批改的作业上，竟写上十月十日，这决不是疏忽！十月十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双十节，她是想国民党卷土重来，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的眼前直冒金星。

“夏美萍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早就是一个漏网的右派……”

我目瞪口呆。

“……夏美萍在向同学讲解‘汤’这个字时，竟说什么：汤，就是我们吃的青菜萝卜汤的汤。她这是在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夏美萍，警告你，我们的青菜萝卜汤比你梦想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鱼汤、肉汤、鸡汤，就是好，就是好！……”

这竟是他揭发的！我的心痛苦地紧缩了。你瞧瞧，大家的脸是多么地怕人，他们的揭发又是多么令人恐怖！我正自万箭穿心，忽然听见台上有人叫我：“现在由夏蓉老师揭发！”

一千多双大大小小的眼睛，顿时象一千多支箭向我射来，我好象站在一个陡峭的斜面上，没有办法收脚。我不知怎么走到了台上，而妈妈就跪在我的脚旁。

我看着台下的鸦鸦头头，一张张激愤不已的脸，一双双躲闪的眼光，一排排稚气的却又充满仇恨的小脸蛋，我，我该揭发什么啊……

会场骚动起来了。

“夏蓉，你能不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革委会主任提醒我。

我惶悚地看看他，忽然看见他也在巴巴地瞧着我。我立即躲开他的目光，哆嗦着嘴。我鼓励着自己，说、说、说……也不知道究竟是说了还是没有说，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忽然觉得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5

妈妈被判了十年。

这天下班回来，刚进家门，就看见门后的地板上有一张明信片。

我软软地陷在那张破旧的沙发里，看着妈妈从监狱寄出来的信。

蓉儿：

妈妈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一定要和我划清界限，揭发我的罪行，永远热爱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象僵死了一样，呆呆地看着这张明信片，看着房间里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彩色画像，满壁的别在红绸子上面的毛主席象章，宝书台上许许多多红皮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泪水直朝肚里流……

有人在敲门。我惊慌地藏起明信片，站起身去开门——

却原来是他！

“夏蓉，我不是有意要那样揭发你的妈妈，他们知道我们好，越好越逼着你揭……”

他现在是唯一敢偷偷摸摸到我家来的人了。

后来，他拗不过他的妈妈，跟我撒手了。

6

七六年春天，妈妈出狱了，叫“保外就医”。当我看见她时，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也浮肿得厉害，泛着青光，眼睛发黄，毫无神色，话也不能说了。

惨淡的灯光伴着我们。

天快亮的时候，妈妈忽然挣扎着要起身，我忙扶着她下了床。不知她哪来的力气，竟突然推开了我，向对面的墙上扑去。

妈妈扑到墙壁上，仰脸望着墙上镜框里的毛主席象，双手紧紧地抓着别满象章的红绸，全身颤栗……

我扑过去扶住她，也禁不住全身颤栗。

妈妈虚肿的脸在抽搐，嘴巴歪曲着，两只眼睛湿津津地闪着怕人的光。

“妈妈，妈妈……”我叫喊着。

妈妈象绷紧的琴弦突然断了一样，松开了手，瘫痪了，两只眼大睁着，盯住墙上，眼珠发直，一动不动，白发披散在脸上。

“妈妈！妈妈！……”我嘶叫着，摇晃着她。

她已经死了。

作者附记：这篇小说在《北京文学》1979年4月号 and 《新华文摘》1979年5月号等其它刊物及小说选集上，均有《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先生为发表这篇小说而不得不在小说结尾加上的一段“光明尾巴”。1982年，作者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青春兮，归来》时，在征得李主编同意后，已经将这一段“光明尾巴”删去。

[1]胡绩伟：《文革风暴与邓拓之死》

“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东夫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在 20 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 1,000 万到 1,200 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 1949 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 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 1,200 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 2.36 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 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 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 5,336 万，耕地面积为 10,537 万亩，人均耕地不足 2 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 1 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 179 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

1949 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 60 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 50 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 年 1 月，200 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 1949 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 1949 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 年 1 月起才征收 1949 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 4 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 1949 年度公粮负担为 42.5 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 1,000 万，人均负担 42.5 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 10 公斤，实际达到 50 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 150 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 30% 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 30% 到 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

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8]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表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 1：1953—1962 年四川粮食征购、外调和留粮标准

粮食征购（万吨）			粮食外调（万吨）			农业人口人均年留粮（公斤）				
征购	占总产%		全国	四川		1953 年	390.4	30	52.5	233 216
1954 年	487.6	34	84.3	227	213	1955 年	43 5.0	29	157.0	250 230
1956 年	456.0	28	217.3	274	256	1957 年	498.1	31	290.3	268 238
1958 年	538.2	31	197.3	261	256	1959 年	601.2	49	238.7	189
139	1960 年	493.3	46	141.5	176 130	1961 年	365.2	39	31.6	199
128	1962 年	334.0	29	-17.9	216 179	说明：表中数字为按原粮折算的商品粮。四川调出粮食中包括调出省外和出口的粮食。征购和外调粮食均为细粮（大米、小麦），而农业人口留粮中则相当部分是杂粮。例如，1958 年到 1962 年的农民留粮中，细粮只占 30-40%				

资料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 年出版，页 559 表；许国璋，《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3 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 年 5 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这一拔擢拉开了李井泉与其他省委负责人的距离，使四川省委成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并不老练，理论水平也很低，毛泽东看重李井泉其人，无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粮食支援其他省市。这种看重对李井泉有如强烈的政治兴奋剂，自从在晋绥土改中犯极左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后，他的政治生涯还从未如此辉煌过，于是他对毛的崇拜和追随之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起来。

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 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 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 年 3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 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 1 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1、1959 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 1958 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庐山会议前半段

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

农家出生的毛泽东，其内心不可能相信万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标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产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临的真正压力是必须大量外调粮食。他深知自己

的地位是建立在粮食之上的，多外调就必须高征购，要高征购就必须高估产，而高估产则必须有高指标，高指标则只能依赖大干劲——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大志”。看似豪情万丈，实则残酷无比的“大跃进”，其简单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李井泉后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 [17]。

正因为如此，了解到毛泽东真实想法的李井泉，对 1958 年底、1959 年上半年中央有关“纠左”的决定不屑一顾。1959 年初，中央要求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整社、遏制浮夸平调风等。而李井泉却对省委其他负责人传话说，“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些问题（指浮夸风等）“大体上都解决了，做些自我批评就行了”。在 1959 年 2 月底到 3 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要求下放权利到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李井泉声称：不落实高产指标就不下放权利，什么都由你了，还要共产党干什么？4 月由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算账”运动，主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清理退赔平调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李井泉却将其变成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最为典型的是李井泉对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29 日党内通信（又称“六条指示”）的公开“对抗”。“文革”初期这是李井泉恶名昭彰的罪行之一。其实，这是一桩冤案。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其时，李井泉正在四川强制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实现千万亩万斤田，假话、高调、强迫命令猖獗一时。如果毛的这封信被传达下去，对他相当不利。然而李井泉却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级对毛的这些指示“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以免产生“消极情绪”；虽然毛泽东要求将信一直发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却自行规定只准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随后把文件全部收回。他坚称，省委强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没有问题，1,000 万亩万斤田不仅要继续推行，今后每年还要增加 500 万亩。 [18] 经过李井泉“统一思想”后的一些省委干部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了。省委书记廖志高 5 月 16 日在传达毛泽东“六条指示”的全省电话会议上说，“主席提出的六个问题，大家必须好好看看，才能正确领会。……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单看他的某一句话，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气了。不是，他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他逐条对毛泽东的话做“积极理解”：关于密植，毛泽东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是不对的”。廖志高解释说：“这是不是主席反对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对密植的。”关于生产指标，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讲现实可能性。……去年实际只有 300 斤的，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 800 斤、1,000 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廖志高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指标呢？实际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讲指标的。他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300 斤的，今年能够增产 100 斤、200 斤就很好了，这不 是指标？”“他的指标幅度还不低，300 斤增产 100 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 200 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六十几，这是多大的增产？” [19]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在 5 月 16 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廖志高更是公开讲：“现在一些省份，增产不多的，为什么增产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气的侵袭，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

气一来，他们就抵挡不住，或是错误地领会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亲信，他的这些话当然是从李井泉那里听来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层的反对声音和毛泽东的被动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标干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干部明白这一点：“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毛猪调出去，对那些关了食堂闹粮的，“饿死都不要管他”。[20]李井泉对中央的“纠左”指示置若罔闻，坚决抵制。例如，5月7日，中央发出“农业五条紧急指示”，要求将大部分猪下放给生产队和个人饲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将口粮分配到户，社员参加公共食堂自愿。全国许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而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将粮食分到户，强迫农民留在公共食堂。6月11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允许社员自养家畜家禽并归个人所有，恢复自留地，其产品属个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给农民留一线生机。

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1958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1959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5、6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9月6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难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1959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6,750万吨，按30%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2,000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1,582万吨[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年粮食征购

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601万吨，占总产量的49%（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70%。（见表2）1959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139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为42公斤（见表2）；1960年人均留粮为130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仅38公斤（见表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说，1959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2、3两（16进位旧秤，不到100克），“没有细粮了”。[28]

表 2：1953—1961 年四川省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年度	产量 (万吨)	征购量 (万吨)	占产量 %	农业人口 (万人)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 (公斤)
1953 年	1143.0	448.8	39.3	5,839.0	119
1954 年	1225.5	534.8	43.6	5,894.3	117
1955 年	1189.0	463.7	39.0	6,008.9	121
1956 年	1316.5	464.7	35.3	6,096.1	140
1957 年	1256.0	528.4	42.1	6,188.5	116
1958 年	1209.5	543.1	44.9	6,038.6	110
1959 年	822.0	576	70.1	5,814.2	42
1960 年	632.0	418.2	66.2	5,552.3	38
1961 年	576.5	321.3	55.7	5,487.4	46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页 561 表；《四川省志·农业志》表 1-2、3-4。

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

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要有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29]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30]。

3、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谨死人之灾

1960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谨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

罪”；但到了 1972 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 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 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 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1960 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 年，四川粮食外调达 238.7 万吨（见表 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 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 年 4 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 140 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 100 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 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 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 1958 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 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 1960 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 15 万吨粮食，前 10 天只到位 1.5 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 月 22 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

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 28 亿斤，最多不超过 32 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 [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 31 亿斤。

1960 年 8 月 15 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 月 17 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

到了 1960 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 1 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 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 月 13 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 150 万“劳动力”，用 3 个月时间把 160 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 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 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 1961 年 11 月至 1962 年 2 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 12,247 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 1 千人；这 4 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 7,660 人。[39]1962 年 3 月 31 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 6 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

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 6 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 5,000 万斤粮食。 [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四川省粮食减产 50%，1961 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 1932 年的 57%。 [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

【注释】

-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 年，第 25 页。
-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战乱，全省人口一度降至 60 万左右。清代康熙年间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动员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导致长达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 4,800 万，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1949 年达到 5,730 万。见《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8 年，第 53—62 页。
- [3]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 年，第 20 页、116 页。
-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关于 1949 年公粮负担重不重问题的研究》，1950 年 7 月 10 日。
- [5]《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 44 页。
-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年，第 41 页。
-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 年，第 619 页。
- [8]建国初四川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划。1952 年底合为四川省。
- [9]见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川南行政公署 6 月份工作简报》（1950 年 7 月 5 日）。
- [10]出处同上。
- [11]邓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有多年交往。但邓在主政西南期间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 [12]1952 年以前只征收公粮，称为征收；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国家还要强制性购买他们的“余粮”，合称为征购。
- [13]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 年 8 月 1 日）。
- [14]见《李井泉的检讨》（1967 年 10—12 月）。
- [15]《李政委电话要点》（1959 年 2 月 2 日）。
- [16]《当代四川大事纪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 年，第 135 页。
- [17]原话为，“因为实行高指标，随之而来就是实行高征购。实际上我们要搞高征购，非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不可。”出处同注 14。
- [18]《七个地委书记重庆座谈会记录》（1959 年 5 月 5 日）。
- [19]廖志高，《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 5 月 16 日）。
- [20]“李政委 5 月 18 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 5 月 21 日）。
-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编印，《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1967 年 9 月），第 48 页。
- [22]即先将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信给到会者看，对“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不赞成”四项选择表态，以此划定左、中、右，然后才传达庐山会议决议。
- [23]出处同注 14。
- [24]出处同注 19。

[25]出处同注 3，第 108 页。

[26]出处同注 14。

[27]稻谷因品种、成熟程度、水分、杂质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为 65-75%，本文取平均值 70%。

[28]“省委 12 月 30 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 年）。

[29]出处同注 14。

[30]出处同注 14。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第 484 页。

[32]出处同注 14。

[33]“李井泉同志 5 月 11 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的信”（1961 年 5 月 16 日）。

[34]李井泉，“声明和更正”（1972 年 9 月 30 日）。

[35]同注 14。

[36]陈振寰 1954—1963 年和 1975—1977 年两次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秘书，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37]“转发李井泉同志给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 年 7 月 28 日）。

[38]出处同注 14。

[39]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 年 3 月 20 日）。

[40]李聚奎，“关于三个省粮食汇报的情况”（1962 年 4 月 2 日）。

[41]《四川省志·农业志》，第 112 页，第 117 页。

“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谨的特殊成因

东夫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在 20 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 1,000 万到 1,200 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 1949 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 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 1,200 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 2.36 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 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 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 5,336 万，耕地面积为 10,537 万亩，人均耕地不足 2 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 1 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 179 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

1949 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 60 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 50 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 年 1 月，200 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 1949 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 1949 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 年 1 月起才征收 1949 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 4 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 1949 年度公粮负担为 42.5 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 1,000 万，人均负担 42.5 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 10 公斤，实际达到 50 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 150 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 30% 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 30% 到 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 1950 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 200 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 1,000 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 200 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 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 41.4% [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60% 以上 [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 1950 年春夏之交，川南区 [8] 全区饥民达 200 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 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 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 [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 年 3 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 20 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 6 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 1949 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 年达到 389.2 万吨，比 1950 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 2,000 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 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 1953 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 1954 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 487 万吨（见表 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 1950 年到 1957 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 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 1949 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 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 120 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 1953 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 1953 年的 52 万吨增加到 1957 年的 290 万吨，7 年间增加了 5.8 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 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 1：1953—1962 年四川粮食征购、外调和留粮标准

征购	粮食征购（万吨）		粮食外调（万吨）		农业人口人均年留粮（公斤）				
	占总产%		全国	四川	1953 年	390.4	30	52.5	233 216
1954 年	487.6	34	84.3	227 213	1955 年	435.0	29	157.0	250 230
1956 年	456.0	28	217.3	274 256	1957 年	498.1	31	290.3	268 238
	1958 年	538.2	31	197.3	261 256	1959 年	601.2	49	238.7 189
139	1960 年	493.3	46	141.5	176 130	1961 年	365.2	39	31.6 199
128	1962 年	334.0	29	-17.9	216 179	说明：表中数字为按原粮折算的商品粮。四川调出粮食中包括调出省外和出口的粮食。征购和外调粮食均为细粮（大米、小麦），而农业人口留粮中则相当部分是杂粮。例如，1958 年到 1962 年的农民留粮中，细粮只占 30-40%			

资料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 年出版，页 559 表；许国璋，《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3 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 年 5 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这一拔擢拉开了李井泉与其他省委负责人的距离，使四川省委成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并不老练，理论水平也很低，毛泽东看重李井泉其人，无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粮食支援其他省市。这种看重对李井泉有如强烈的政治兴奋剂，自从在晋绥土改中犯极左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后，他的政治生涯还从未如此辉煌过，于是他对毛的崇拜

和追随之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起来。

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1、1959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

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

农家出生的毛泽东，其内心不可能相信万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标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产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临的真正压力是必须大量外调粮食。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粮食之上的，多外调就必须高征购，要高征购就必须高估产，而高估产则必须有高指标，高指标则只能依赖大干劲——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壮志”。看似豪情万丈，实则残酷无比的“大跃进”，其简单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李井泉后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17]。

正因为如此，了解到毛泽东真实想法的李井泉，对1958年底、1959年上半年中央有关“纠左”的决定不屑一顾。1959年初，中央要求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整社、遏制浮夸平调风等。而李井泉却对省委其他负责人传话说，“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些问题（指浮夸风等）“大体上都解决了，做些自我批评就行了”。在1959年2月底到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要求下放权利到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李井泉声称：不落实高产指标就不下放权利，什么都由你了，还要共产党干什么？4月由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算账”运动，主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清理退赔平调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李井泉却将其变成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最为典型的是李井泉对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又称“六条指示”）的公开“对抗”。“文革”初期这是李井泉恶名昭彰的罪行之一。其实，这是一桩冤案。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其时，李井泉正在四川强制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实现千万亩万斤田，假话、高调、强迫命令猖獗一时。如果毛的这封信被传达下去，对他相当不利。然而李井泉却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级对毛的这些指示“从积极的方面

去理解”，以免产生“消极情绪”；虽然毛泽东要求将信一直发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却自行规定只准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随后把文件全部收回。他坚称，省委强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没有问题，1,000 万亩万斤田不仅要继续推行，今后每年还要增加 500 万亩。[18]经过李井泉“统一思想”后的一些省委干部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了。省委书记廖志高 5 月 16 日在传达毛泽东“六条指示”的全省电话会议上说，“主席提出的六个问题，大家必须好好看，才能正确领会。……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单看他的某一句话，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气了。不是，他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他逐条对毛泽东的话做“积极理解”：关于密植，毛泽东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是不对的”。廖志高解释说：“这是不是主席反对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对密植的。”关于生产指标，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讲现实可能性。……去年实际只有 300 斤的，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 800 斤、1,000 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廖志高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指标呢？实际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讲指标的。他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300 斤的，今年能够增产 100 斤、200 斤就很好了，这不是指标？”“他的指标幅度还不低，300 斤增产 100 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 200 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六十几，这是多大的增产？”[19]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在 5 月 16 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廖志高更是公开讲：“现在一些省份，增产不多的，为什么增产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气的侵袭，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气一来，他们就抵挡不住，或是错误地领会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亲信，他的这些话当然是从李井泉那里听来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层的反对声音和毛泽东的被动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标干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干部明白这一点：“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毛猪调出去，对那些关了食堂闹粮的，“饿死都不要管他”。[20]李井泉对中央的“纠左”指示置若罔闻，坚决抵制。例如，5 月 7 日，中央发出“农业五条紧急指示”，要求将大部分猪下放给生产队和个人饲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 月 26 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将口粮分配到户，社员参加公共食堂自愿。全国许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而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将粮食分到户，强迫农民留在公共食堂。6 月 11 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允许社员自养家畜家禽并归个人所有，恢复自留地，其产品属个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给农民留一线生机。

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 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 1958 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 1959 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 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 5、6 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

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 [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 [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 9 月 6 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 [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难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 [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 1959 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 6,750 万吨，按 30% 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 2,000 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 1,582 万吨 [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 年粮食征购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 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 [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 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 601 万吨，占总产量的 49%（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 60% 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 1957 年到 1961 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 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 70%。（见表 2）1959 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 139 公斤（见表 1），其中稻谷为 42 公斤（见表 2）；1960 年人均留粮为 130 公斤（见表 1），其中稻谷仅 38 公斤（见表 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 29.4 和 26.6 公斤 [27]。也就是说，1959 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 80 克大米，1960 年平均每天只有 73 克大米。1959 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 2、3 两（16 进位旧秤，不到 100 克），“没有细粮了”。 [28]

表 2：1953—1961 年四川省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年度	产量	征购量	占产量	农业人口
	(万吨)		(万吨)	%

(万人)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									
(公斤)	1953 年	1143.0	448.8	39.3	5,839.0	119	1954 年	1225.5		
	534.8	43.6	5,894.3	117	1955 年	1189.0	463.7	39.0	6,008.9	121
	1956 年	1316.5	464.7	35.3	6,096.1	140	1957 年	1256.0	528.4	42.1
	6,188.5	116	1958 年	1209.5	543.1	44.9	6,038.6	110	1959 年	822.0
	576	70.1	5,814.2	42	1960 年	632.0	418.2	66.2	5,552.3	38
	576.5	321.3	55.7	5,487.4	46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页 561 表；《四川省志·农业志》表 1-2、3-4。

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 1959 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29 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 年冬季 he 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 20 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 10 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 12 亿斤。[29]这 12 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 1960 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 [30]。

3、 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馑死人之灾

1960 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 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 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 年 5 月 6 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 [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

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馑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三、四川农民成为 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1960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达238.7万吨（见表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年4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100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1958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

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1960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15万吨粮食，前10天只到位1.5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月22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31亿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

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1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150万“劳动力”，用3个月时间把160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

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这4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6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6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5,000万斤粮食。[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减产50%，1961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25页。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战乱，全省人口一度降至60万左右。清代康熙年间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动员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导致长达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4,800万，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1949年达到5,730万。见《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3—62页。

[3]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年，第20页、116页。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关于1949年公粮负担重不重问题的研究》，1950年7月10日。

[5]《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44页。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41页。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第619页。

[8]建国初四川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划。1952年底

合为四川省。

[9]见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川南行政公署6月份工作简报》（1950年7月5日）。

[10]出处同上。

[11]邓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有多年交往。但邓在主政西南期间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12]1952年以前只征收公粮，称为征收；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国家还要强制性购买他们的“余粮”，合称为征购。

[13]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年8月1日）。

[14]见《李井泉的检讨》（1967年10—12月）。

[15]《李政委电话要点》（1959年2月2日）。

[16]《当代四川大事纪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年，第135页。

[17]原话为，“因为实行高指标，随之而来就是实行高征购。实际上我们要搞高征购，非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不可。”出处同注14。

[18]《七个地委书记重庆座谈会记录》（1959年5月5日）。

[19]廖志高，《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6日）。

[20]“李政委5月18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21日）。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编印，《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1967年9月），第48页。

[22]即先将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信给到会者看，对“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不赞成”四项选择表态，以此划定左、中、右，然后才传达庐山会议决议。

[23]出处同注14。

[24]出处同注19。

[25]出处同注3，第108页。

[26]出处同注14。

[27]稻谷因品种、成熟程度、水分、杂质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为65-75%，本文取平均值70%。

[28]“省委12月30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年）。

[29]出处同注14。

[30]出处同注14。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84页。

[32]出处同注14。

[33]“李井泉同志5月11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的信”（1961年5月16日）。

[34]李井泉，“声明和更正”（1972年9月30日）。

[35]同注14。

[36]陈振寰1954—1963年和1975—1977年两次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秘书，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37]“转发李井泉同志给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年7月28日）。

[38]出处同注14。

[39]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年3月20日）。

[40]李聚奎，“关于三个省粮食汇报的情况”（1962年4月2日）。

[41]《四川省志·农业志》，第112页，第117页。

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 作者：魏紫丹

2008和2009分别是大跃进和大饥荒50周年祭。那一场受害者数以亿计、死亡者数以千万计的大饥荒，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历史就会重演。更何况疮疤尚未好、

化脓菌仍在体内肇祸，而却硬要强迫你忘记呢？

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

我的上一篇文章，《大跃进是践踏人权的产物》，发表以来，读者评论纷纷，说好、坏、不好不坏的都有。现各择其一，以观全豹。一家《德国实用信息网》从《》网转载本文后，有的评论是严责作者的："人权---等着侵略者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也跟 侵略者说人权去。国破家亡都不懂！"也有的评论是宽宥毛泽东的：说毛"不过是一个农民，犯些错误也很正常。那个一个人忽悠上亿人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使我感到欢欣和慰藉的是：本文之"砖"确曾引出了"玉"。当代民主、自由、人权理论家胡平先生的来信，以其一贯的思维深邃、说理透辟，使笔者蒙受教益，因而，甚愿将其中要旨与读者分享；同时这也是本文的主题思想。

大饥荒的发生当然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我在《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里专门讲到这一点。其中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胡先生讲得实在好。我在下面的论述，将是对此"科学的抽象"，予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实证，同时冀期，一触即跳的愤青止愤、少安毋躁。

研究大跃进而不提反右运动，则会只见"流"而不见"源"。反右运动并不是反击右派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而是反击"言论"，所谓"右派言论"；毛泽东蛮横无理地宣布："言者无罪"不适用于右派---以自食其言而使自己的语录成为夫子自道："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677 页）反右运动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以言治罪，严重地糟蹋了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这就使中国的列车开上了发疯的轨道--以大跃进的速度坠入崖谷--大饥荒，用几千万人的鲜血，写出了一条冷酷的真理："大饥荒的发生当然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我记得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曾经说过，"大跃进"让中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广西的右派分子罗翼群，1957 年在鸣放中就提醒中共："农民处于饿死的边缘！"其实这时广西已经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只是他作为政协委员，共产党让他无法"视察"到真情而已。所以他只是从能够视察到的农民啼饥号寒的惨景中，发出相对轻度的"边缘"云云的警告。就这，就立即受到共产党死命地打击不说，广大农民竟也跟着起哄，对他到处"喊打"，令他成为"过街老鼠"，无地自容。结果便是，欲拯救农民、喊出"悬崖勒马"的右派分子被打倒，在扑杀所有（包括彭德怀的）抗议声中，4600 万人被共产党从"饿死的边缘"上，狠狠地、统统地推下饥饿的死海。中国人民应该警觉到："剥夺言论自由，竟然能导致如此可怕的严重后果啊！"

一、大跃进是一场无硝烟的人海战争

老毛不把人当作人，不把人命当作人命，象驱赶牲畜一样驱赶着千军万马的奴隶，到处都是黑压压的蚁群。无论是兴修水利，无论是田间劳动，无论是大炼钢铁，都是大兵团作战，毛泽东的说法是“几个大办”，战争年代的说法是“人海战术”。国军将领回忆内战时共军就是凭着人、迎着猛烈的炮火，一群群滚疙瘩成蛋，蜂拥而上，前仆后继，国军机枪手打着打着手都发软了，不忍继续打下去。共军一位师长说，打天津时，过河不用过桥，都是踏着填满河的、战友们的尸体冲过去的。战争啊战争！实在残酷。

和平时期的大跃进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我们是过来人，本来可以直接诉说目击、身受，但是，如果经过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之口，由他们来诉说亲历，不就更是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了吗？李井泉在四川，学着老毛反右“引蛇出洞”的阴谋（大跃进和反右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把从庐山带来的反面材料，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的发言，让省里的高干阅读和各抒己见。凡是佩服彭总了解下情和实事求是精神的，都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惩。上行下效，层层大鸣大放，直到公社、大队。“引蛇”的态度和老毛当年一样“诚恳”、信誓旦旦。基层干部就放心、大胆地发言了：

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时间太短，成立小社还学习四十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更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圆，坝起通铺睡，有娃娃的妇女请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里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我们上山炼铁，点二十五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子还投价。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

共产党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谷子栽稀了，打一 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进经验；栽得密，打一百斤还是受表扬。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整社查瞒产，摆余粮，哪来的余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屁眼儿白。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对高征购的抵触反抗情绪，发展到把“政府”和过去地主相提并论。

每亩才五百斤，就征购五百斤，叫我们吃啥子！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像逼地主退押一样。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屁股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什么也没有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我有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像干猴儿一样，像这个样子就叫毛主席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

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逗起好长，咋个办啊……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不作今昔对比，不对政策乃至政府产生怀疑是不可能的。

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四川方言，长工。——编者），当长年都吃得饱。我硬想去帮人。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很难相信这些话是出自社队干部之口。原来他们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他们在反复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的话吐出来，没想到上面是在罗织蛛网，诱其入围。（摘自东夫《麦苗儿青菜 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饿死也不要管他》——这一节的题目所以命名：“饿死也不要管他”，是因为李井泉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

这时候，四川尚未大量饿死人，只是这样侵害人权、财权、地权和物权，人身归公，财产归公，生活的集中营方式和强迫劳动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连饿了吃饭、累了休息，都不可得，任何选择的自由都被剥夺，实际上已是没有了活命的余地，故而，如此发展的结果，仅四川一省（经杨尚昆验证的）就饿死了1000多万人！

四川当然不是孤例，在全国比比皆是。在贵州：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谁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

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饥饿：一个基层教师的"大跃进"记忆》 转自：2008年09月29日《炎黄春秋网》）毛泽东一向大搞愚民政策，大搞运动群众，大搞人海战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的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页3）

二、大跃进是一场率兽而食人的兽性大发作

右派分子罗翼群对广西发出的"饿死的边缘"的"无耻谰言"被击碎之后，事态又是个怎么发展状况呢？让我们靠资料说话：一分资料一分话，十分资料说不差。作家郑义告诉我们：

广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命令全县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打死。龙岩公社有个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将他按到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打成重伤，三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有数十人之多。据事后统计，当时刑法计有六十余种之多，铁丝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当大批死人开始之后，洪华要求"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还若无其事地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走投无路的饥民开始逃荒。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救民於水火，反而动用公安和民政部门四处追捕。

饿死的人也有罪：洪华只要见到死人就大骂。死在县城中心的，骂："大年初一来这裏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风邪气上升！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骂"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死到无人埋尸时，他还骂："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郑义《从"环江右派集团"之复灭解读反右》）

全国的"跃进"典型安徽亳县，在59、60两年中饿死30%的人口，两万多家庭绝户，人吃人现象发生於多处，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万间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当地民谣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应该说，对反右派与大跃进的关系，这个民谣道出了浸透了血泪的民间理解。

在云南陆良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省委监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群众，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363）

打人是那个时代农村的特色，几乎每个运动都有人难免皮肉之苦。从打地主、打富农、打

反革命、打"老虎"、打右派，到打落后分子、打有右派言论的，打代表"富裕农民思想"的，打不听话的……从"敌我矛盾"打到"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敌人打到思想敌人，干部打群众，群众有机会就打干部。形形色色、三天两的群众会、辩论会、斗争会发展到顶峰便是打。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褰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泼粪、淹水、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万人算账大会期间，金堂县人和公社大批社员揭露控诉的干部打人情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五八年春天，公社总支书记李义和，他是提倡打人的。"干部不要打，社员打两下没来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 外伤"。三月，全乡召开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每个被判的人都当场遭到毒打，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打成残废，从此拉开大规模打人的序幕。打完这些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打一般群众。

一九五八年初，农村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反浪费，是针对农民说粮食不够吃，认为农民把粮食"浪费"了。反保守，是针对农民对高产指标和生产上的乱指挥不满，认为是保守思想作祟。各地情况惊人相似，五月，人和乡许多农户断粮，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这本来是统购时的承诺）。同时在种大春中，不少农民反对乡上的高产指标和所谓新的耕作技术。于是乡上掀起大规模"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粮食的定为"浪费分子"，反对乡上生产指令的定为"保守分子"，并要求全乡党员团员群众人人按态度划为四类，规定性质最严重的"四类"分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三类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乡长唐××的名言是"强迫命令就是左派，'辩论'不起来就是右倾"。他亲自参加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三十三人，被罚跪瓦片、跪板凳的更多，并在会上传达了总支书记李义和"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

有两个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相打，唐××就让两队互换 打手，终于打了起来。总支委员萧××在一个耕区"掌握会场"时，见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动手，骂他们"同情坏人"亲自调人来打。社员刘少明反抗，劳训队长张××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守荣看到到处都在开会打人，说了"打人怕不对吧"之类的话，立刻被抓起来打了一顿。社员唐正康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队长李××请求开证明买糠，李说他"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耳朵被打聋。六十多岁的社员唐朝福口粮困难，在地上捡了几颗抛撒的包谷，李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会打过，又把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集中到乡上"训练"，训练方法是打、骂、跪。总支委员萧××把人关起门进行毒打，其中一个社员险些被当场打死，一个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先是"评游"，每七天评一次上游、中游、下游，下游的比例定为百分之十五。"评游"的办法是自报公议，先由大队评比，张榜公布上、中、下游名单，然后送乡总支圈定斗争对象，根据总支统一布置，各耕作区召开斗争大会，口号是"二十天消灭下游"。

会上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干部故意发问："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下面的违法 乱纪分子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全乡召开跃进誓师大会，各耕区社员列队前往。上游走前面，中游走中间，下游扫尾。前面的举红纸写的牌子，画飞机、火箭之类，列上游人员名单；中间的绿纸牌子，画鸡公车、自行车之类，列中游名单；后面白纸牌子，画小脚女人、乌龟之类，列下游名单。进入会场，上、中、下游分开席地而坐，乡干部带头高呼“彻底批判中游”，“坚决消灭下游”，“下游”个个勾头缩脑，心惊胆颤。

誓师大会后，全乡办起九所“马列主义学校”，集中被打斗过的人“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听干部训话：“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最大”，“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子”，坦白交待，挨打，服劳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脚都泡烂了。妇女生病的最多，支持不了经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学校有治安委员背着枪看守。

比“马列主义学校”档次更高的是“劳训队”，队员包括地主、说怪话的“反革命”，外乡的“流窜犯”，评类评出的“四类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摸者，给干部提意见的。更恶劣的是为了霸占别人妻子而把男人送进去的。“劳训”内容是采石头、挨打、饿饭。除了三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打吊外，其余四十八人皆未幸免，其中四人致死。他们除吊打人外，还发明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罚。一种是要受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伸直，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脚放在四条凳腿上，手脚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

公社成立后，这帮恶棍打得更顺手，打人的口实更充足了。“打得起来”的干部被称之为“有干劲，有能力”，“打不起来”的叫没干劲、能力弱。公社把一些场镇居民赶到乡下，将他们的房子“充公”。公社书记李义和蓄意霸占乡政府隔壁一个寡妇许秀德（中农）的房屋，借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许不答应，李便责令乡干部朱××先后对其全家及女婿进行十余次“辩论”毒打，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九十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有一次赶场时当着群众向他跪下磕头求饶，李骂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群众骂李是“活阎王”。

据省委检查团统计，人和公社一九五八年以来被吊打者达一百五十五人，被打致死十五人，打伤残者十六人。群众有五怕：怕开会、怕辩论、怕排队、怕挨打、怕劳役。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完成上交任务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裏至少隐藏有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一鸣惊人，扬名天下”，不顾灾后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民谚就说：“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的"点",是全县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竟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此楼被人们视为是好上难下的"黄鹤楼",全社的企业干部和农村主干,多数在此挨斗。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占全县死亡总数的一半。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952人中,有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徵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著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道地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3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XX根本听不进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等置若罔闻,不予制止,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摘自寿阳县志办公室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寿阳事件》)

"擒贼先擒王"。这个率兽而食人的"兽王"是谁呢？毛泽东承认自己是这场大跃进 的"始作俑者"。他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页290）

三、总之，大跃进是一场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大残杀

综上所述，对号入座，难道你能找出人权项目中的任何一条没遭到残酷践踏吗？在中国的各朝各代，在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你总找不到把人权践踏到至于此极的。比如，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见死不救者有之，而运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广大民众逃活命者，只有共产极权能够做到。如果 说以上我用的是现成资料，下面的这个资料却是我听自当时信阳地区光山县委书记的弟弟亲口说的：为防止群众逃活命，几家人组成互助组，如有一人逃了活命，切结各户均遭连作，拉到大队受审。民谣为证："大队是个阎王殿，干部都是活阎王，只见活人进，不见活人还。"为堵截和追查写信向外求援或信访，邮局也变成了绞肉机，有一件怪事也是发生在光山县：

当时光山县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定要设法查出来。邮电局的人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 "地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计，50 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 25 万人之多）。1960 年夏李先 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 17000 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 寰！（朱健国《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我听到有些人把这些惨绝人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地方上胡来；也有的说这些地方多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不管说这话的动机，只管陈述事实。

国际闻名的大都市上海，你总不能说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吧！请看：

上海郊区各县遂掀起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运动中普遍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党员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有的基层党员干部以不给饭吃惩罚没有完成劳动任务的社员；有的滥扣社员工分；有的批斗不经常出工的社员；有的甚至私设公堂，拷打群众。1959 年 1 月，市监委对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检查，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副书记等人，在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大跃进"中，不顾群众疾苦，提出错误口号和措施，强制干部执行，造成基层干部发生乱关乱斗乱罚、捆绑吊打群众、烧毁房子、逼死人命等一系列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市委决定开除县委书记、副书记党籍，重组县委领导班子。

1960 年 12 月，市委监委会同市委农委、市委政法部、各县县委，对人民公社干部的作风问题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1960 年 1~11 月，各县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案件 2474 件，犯错误干部 2964 人，占农村干部总数的 2.52%，其中党员干部 1783 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的 2.6%。（《中共上海党志》第七篇纪律检查：第一章检查和处理违纪案件）

至于说这 些违法乱纪是地方上胡来，我看也不尽然。在《王光美回忆：1959 年庐山会议》

中，就有如此纪录：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这可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参加的最高层会议呀！当"少奇同志"要被"打倒"时，就再没人来"喝住"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拳打彭老总、卫生部长刘湘屏甩谭震林耳光了。至于"少奇同志"本人，他也和彭总得到同样下场。请看刘军医偷偷写下的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这里只摘录两点，其余就略而不赘了。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点，他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有一片瘀血。

这就说明：一，人权具有整体性，糟蹋其一，祸及全体，犹如癌细胞一经扩散便会危及整个生命。土改、镇反糟蹋人权，随后就有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无一例外地糟蹋人权；糟蹋地主的人权，便会糟蹋贫农的人权，便会无一例外地糟蹋所有人，包括国家元首、内阁大臣、元帅将军……的人权。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如下一则评论：

不戒 [22 0.172.67.*] @ 2008-11-16 17:57:07

有一次和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聊天，当我跟他提起大饥荒的时候，他很真诚的说道："其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饿死那么多人不一定对中国没有好处，否则的话，中国的人口肯定会更多，计划生育更难做"。

这样的看法在年轻一代里不是少数，他们没有人性。

这句评语不是批判和斥责，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老百姓所说的"人味儿"，这样的人已经异化为另一种动物了。

这是教育的结果。

更有读者，由于"教育的结果"，也或许是"五毛党"，破口咒骂作者：

你还活着？？？一个被劳动教养的什么东西还能活着？你每天吃的是不是是屎？是贫下中农的屎？还是狗屎？不要在这里放屁了，没人相信你的鬼话，一个恬不知耻的家伙。

这就使我意识到：一、本文的确不是无病呻吟、无的放矢，而是有非写不可的必要性的；二、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格自尊，人权觉悟，着手抵消中共的负面“教育”即“灌输狼奶”的影响，已属当务之急。读者先生：您以为如何呢？请继续评论。 魏紫丹：大跃进的发生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 —— 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一

作者：魏紫丹

一个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大概不会把大跃进只归结为经济问题。有人说，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毛泽东不懂经济所致。这话固然有点道理。可是，同理可问：难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毛泽东不懂文化所致吗？所以，假如我们说这里面也含有某些正确的因素，那么，正好是这个正确的因素被居心骗人的政客、御用学者扩大为主导因素，才掩盖、模糊、曲解了大跃进的政治本质特征，从而误导人们认为：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出于急切摆脱贫穷落后，才发动了大跃进，问题只是出在急于求成、缺乏经验上。

例如，李锐先生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无限感叹地写道：“我们都感觉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页 46)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如果不是他到前台，大跃进就根本不会发生；这就把问题凸现出来了：他到底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地把别人（特别是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等）批倒、排除在外，自己跑到前台来直接指挥呢？大跃进的政治本质就隐藏在这个问题中。让我们从它的发生谈起。

毛泽东 1958 年 9 月 5 日在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里通畅不通畅，先肯定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的确是反右派的结果。他们大事宣扬大跃进是反右的胜利的果实，是反右正确性的确证。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1958 年 4 月 5 日，毛针对各行其是、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现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规律。

右派言论的共同点，就是对“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抨击。1958 年呈现的另一个规律，正是，远非一般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头一尺；代表“魔”的“三害”，却气焰万丈，成了精。所谓“成精”，是指“三害”变成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作出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兴妖作怪，兴风作浪，刮得神州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实际上不全是“载道”，因为不准离家，所以绝大部分是“在家”）。而所谓“淋漓尽致”，是因为都是上面压下来的，全是正帅和副帅压下来的。所以下面执行得特别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穷凶极恶，而这个“上面”表现出的这个“三害”变成“五风”的狰狞面目也是明目张胆，豪不掩饰的。不像 1957 年那时右派所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载《陕西日报》6 月 12 日。）现在不用“挖”了，已经跳出来、不打自招了！正帅和副帅就是“三害”的化身，正帅每天一跳八丈高，兹以赶超为例以明之：“1958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 15 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 20

年到 30 年赶上美国；5 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 7 年超过英国、16 年赶上美国的口号；6 月，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纲》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9 月 2 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为 5 年接近美国，7 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关于人民公社，1958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对“一大二公”做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的决议说：“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给制，导致穷富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贸易、小商小贩统统做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公社化运动刮起了“共产风”。我再举副帅的一例：邓小平麾下之中央书记处屡次麾军前进，规定高指标的进度。1958 年 9 月 5 日，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 月 24 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要求要达到日产钢 6 万吨、铁 10 万吨。（以上引自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 140-141，）他们以“一天等于 20 年”的速度在发疯发狂，毛陶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并“谦逊”得让人喷饭：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

指出这些倒行逆施，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指出反右派与大跃进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运动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历史的反动性，也就说明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反动派。例如我要指出土法炼钢，不是仅仅指责他们是一群疯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顽不化、反科学的家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我在这里要指责他们的是，反右派以后，把知识分子打倒在地，胡说什么“外行领导内行，这是客观规律”，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又如在“大跃进”中号召：不要迷信科学家，不要怕教授，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没有学问的人胜过有学问的人，结果把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

总之，反右派与大跃进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反右派越厉害的地方，大跃进越狂热，恶果越惨重，饿死的人也越多。反右派，河南省居全国之首。大跃进又是河南省一马当先。人民公社、农业卫星等都是河南省打头炮。省长吴芝圃弹着发疯的钢琴，写出对大跃进的哲学论证《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结果，河南省在遭受大跃进的灾难上，也是最为惨重，仅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人 105 万，当时全区总人口是 850 万。这个“饿死人 105 万”的数目，是大有来历的：1960 年，“董必武同志随即派李坚、李振海（李振海同志后来在信阳担任了一段地委副书记）进一步调查了解。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 105 万的数字。”（余德宏〈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叶落潇潇 江流滚滚》页 486）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个数字太小，问题不在调查者，而在被调查者。“理由是，在 1960 年的生产救灾中，粮款是按人头多少发的，人多则多发，人少则少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不少社员为了多打饭菜，故将死人报成了活人。我岳母赵王氏、我堂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长时间还在领取粮款的。在信阳事件中，我虽然职务不高，但我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秘书，负责文牍暨农村工作等），除经常随专员、副专员们一起

下乡外，自己也不断带几个同志一起下去检查农林水利方面的情况，在 1959 年内我曾先后向地委、专署写过 10 份反映情况的报告（在批斗我时，揭发我写了 16 份），所以我既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也了解不少典型情况。”（同上，页 470）

1980 年，《河南日报》记者站站长鲁嘉宾写了题为《信阳事件应当重视》的建议文章，因为这在当时还是“禁区”，故登在内参上，领导上一直无一人置可否，总编说，不要再提此事了。时间又过 20 年，鲁先生才又“作为一个亲历者”，重提此事：“为什么会发生‘人相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惨剧呢？反右斗争的后果人所共知。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灾区，划的右派占全国 15% 以上。信阳是河南省的‘重中之重’。信阳地区反右派中，反映真实情况，敢讲真话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戴上了‘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类的帽子。1926 年入党，1948 年深入虎穴策动敌军一个旅起义，建国后历任县委副书记、信阳地直机关党委书记的老红军李华轩，因为反映农村真实情况也被划为右派；忠诚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风，反右时不忍把无错误干部划成右派的信阳地委党校副校长董玉宝，也被划成了右派，他被划右派的过程竟是由于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的一句话：‘地委党校划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而被带上右派帽子的。确山县县长张遵道，党性强、作风好，是山东老区南下来的老党员，因为没有阻止报社记者揭露县委组织部长私自拘留亲自动手殴打乡党委书记王好平的违法乱纪行为，‘给确山县摸了黑’，伤了县委书记的尊严，也被划为右派。荒唐可笑的划右理由，随心所欲的划右手段，不胜枚举，全区竟划了一万多人！

“信阳地区作为执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在反右中，不仅随意滥划右派，在极左闻名的河南省创造了最高纪录；而且在惩治右派中又惨绝人寰，使这批无辜者大批在绝境中伤生，抛骨荒山，更多的妻离子散，家破身残未尽天年。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场反右，谁不毛骨悚然！因此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两个严重恶果。其一便是真话从此完全绝迹，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其二则是权力意志，违反科学蛮干的极左路线恶性膨胀，泛滥成灾。”（同上，页 497-498）这就是本文的主旨：“大跃进的发生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在本文开始引用的李锐的话，说毛“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其实应改为“不搞反右派就好了。”但这全是假设。归根结底应改为：“历史如果能够假设就好了。”魏紫丹：非我也，岁也——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二

从这篇开始，我要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作一番归因的研究。首先说明，这个归因，不单指起因，而是包括了从发动到失败的原因。其次要说明，从所归的原因来分，有个人的原因和制度的原因，内因和外因；从归因者来分，有官方的归因和民间的归因，国内的归因和海外的归因。而这几种因素又往往是重叠、交错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所以只好撮总地加以论述，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其归因类别。

官方的归因，基本上是一个中心：坚持维护党和党的领袖的威信；两个基本点：第一个是“良好愿望”论。第二个是“天灾人祸”论。

关于第一个论点，我在上篇已提到过，据说是出于共产党、毛泽东的好心眼，急切地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官方在这一点上坚持撒谎，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以贯之的。1957 年反右期间，毛泽东就撒谎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五卷，页 456）对被事实击得粉碎的这篇谎言，邓小平在整整 20 年后，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又重提之，并说：“毛泽东同志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

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二卷，页 41）撒谎成性的他，连对迫害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忍痛撒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同上，页 139）难道他真的认为毛发动文革不是污秽的权力之争而是要实现一种纯洁的革命理想吗？张显扬说得一针见血：“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 2006 年 5 月号）可见，毛邓两人在撒谎骗人上，实在是难兄难弟！鬼才相信毛泽东、共产党反右、大跃进、以至于文革，都是出于“良好愿望”呢！实际上，连鬼都不会相信。难道数以千万计的饿死鬼、冤死鬼会相信这些鬼话吗？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 1961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37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回马枪，把这种比较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批为“黑暗风”。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提“人祸”了。从此，“全国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成为对高举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舆论一律的说辞。直至今日，与人谈话时，每每仍能听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何如何……”悲矣哉！欺骗对人的毒害，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说到这里，少不得要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继承和发扬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我想，读者若与三面红旗下的惨景相对照，对此，我就无需再置一词了。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基本精神是恢复了刘少奇的论断。

而民间的归因，则是与此针锋相对。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

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ⅤⅠⅠ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转引自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我们再 看与 1959～1961 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 年、1962～1964 年。这 6 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 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 1959～1961 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 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 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 1998 年 3 期）。

1998 年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 1958 年气候很好，1959 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 58 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 2 月 27 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四川省饿死 1000 多万人，居全国之首，可是所有有关调查研究的报告，都否认天灾说，众口一词：那三年“风调雨顺”。

所有活 着的右派，都有资格做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当时在黄泛区五二农场劳动教养：年景好得很！五谷丰登，连红薯、花生、瓜果都是大丰收。红薯片晒得到处都是，晒干后堆积如山。我们挨饿、浮肿、甚至有的饿死，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制度规定的低指标所致。听说信阳的确遇到了自然灾害。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余德宏（他是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二人都是体制内、由于抵制浮夸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这样说：“1959 年的旱灾虽然是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 显然不是天灾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1959 年的夏粮因降水量偏丰而歉收，秋季因严重的伏旱而减产，但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近 15 亿公斤，按 800 万农业人口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以后，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在 150 公斤以上。虽然偏少，但比 1949 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级领导重视灾情，及时动手，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饿死人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严重的灾害是发生在连续丰收之后，不仅社队及群众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区国库中尚储粮 5.5 亿公斤左右，万一在生活上出了一点问题，请 示上级批准，动用一点库存，相信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页 474-475）

同样的事，也是发生在河南省。“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转引自《饥饿的三年，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2》八卦人生网）

正面与反面，两相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所谓“自然灾害”，完全是毛泽东、共产党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伤天害理，一至于此！官方的目的是尽量误导人们远离大跃进的政治本质。大跃进的政治本质，离开人祸则无处追寻。关于人祸，官方和民间也是莫衷一是。这正是下文要加以探讨的。 魏紫丹：大跃进中的另类民谣 ———— 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三

为纪念中共发动大跃进 50 周年，很多媒体重又发表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当年的民谣。其中，代表作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勒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倒是可以作为吹牛皮、放大炮、荒诞不经、为满足一人野心而充当炮灰的百丑图，进入历史纪录。可不是么，竟有 4600 万个“玉皇”和“龙王”活活的被饿死了（参看拙文《大跃进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民谣代表民意，所以古代有“民谣为证”的说法。大跃进中的民谣，则代表官意，或者说是被“愚民化”了的民意、被强奸了的民意。代表真正民意的民谣有没有呢？有倒是有，但当时立即就被就地消灭，甚至连作者也被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了。因为彭德怀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被打倒，而彰显出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这应该说是在郭沫若、周扬编辑的《红旗歌谣》（“官谣”）之外的真正民谣。

我还能记得的几首真正的民谣，是我当时在黄泛区“五二农场”劳动教养时，亲耳听到当地群众亲口说出的。不过，需加说明的是，这里远没有邻近的信阳地区境况悲惨。

一日三餐

清早的馍，两口嚼。中午的面条 捞不着。晚上的稀饭照月亮；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床；一巴掌打到街门上：毛主席您想一想，群众的生活怎么样？

哪管百姓死活

大干部，大吃二喝；小干部，小偷小摸；社员们草根、树皮捞不着；毛主席坐北京，哪管百姓死活！

照相馆

端起碗，照相馆；要想全队照合影，所有社员围着锅台往里看。

社会主义优越性

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拉犁就拉耙；社会主义好！天天吃不饱；社会主义优越性，吃不饱还不敢吭，吭吭就是反革命。

另外，我在一些人的回忆录里，也有所发现，例如：张大军先生写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安徽亳县，在 59、60 两年中饿死 30% 人口，两万多家庭绝户，人吃人现象发生于多处，60% 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万间以上，80% 的林木被砍光。当地有民谣：

“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四川民谣有：“说大话，使小钱，卖勾子，过大年”。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策有变化，领导说话不算话。

河南有民谣：“毛主席爱儿童，儿童饿得走不动。”

江苏有民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

非常可惜！这些“为人民鼓与呼”的民谣，绝大多数都已经散失、遗落、销声匿迹；加以抢救、收集、整理是很有必要和刻不容缓的，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群众对“官谣”的民间理解。例如，为当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头禅：“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群众把“桥梁”理解为“瞧粮”，说：“人民公社是瞧粮一瞧着粮食不能吃；到不了共产主义就早都上了天堂。”这可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物论啊！谓予不信，请看信阳事件饿死了 105 万农民的真情实况：当时因同情农民、被划为右倾主义分子的地区专员张树藩、生前为历史留下了第一手珍贵资料：“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愿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页 466）农民在上天堂前，可都是大眼瞪小眼、眼巴巴地在瞧着粮满仓啊！

“一天等于 20 年！”的口号是够豪迈的，但群众理解为：“旧社会日子不好过；度日如年。新社会，大跃进，一天等于 20 年！”更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成绩是基本上的，但有缺点，这是必然的。”怒气冲冲地篡改为：“成绩是鸡巴上的！”消消气才接着调侃下去：“蛋有缺点，这是 X 染的。”

这不是在说下流话，而是蔑视、怒骂下流人，怒骂视人命为蝼蚁、浮夸成绩、荒淫无道的暴君。魏紫丹：不可思议的“大救星”-唯恐人民不穷 作者：魏紫丹

—— 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四

当时人们确信，毛主席搞大跃进是为了要提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美满的日子。这也正是老百姓的愿望，所以就喊出“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口号。

“苦战”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幸福”。

与人民的愿望相反，毛泽东置人民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苦难之中，走共同贫困的道路。这便是他心目中“革命”的真谛，这个真谛充分体现在大跃进中提出“不断革命”、到了文革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中。对此，肯定会有可爱的左派站出来，一跳三丈高，指责我：“你这个人，右派本质未变，继续放毒，恶意丑化毛主席！”请听我说，如果我能用可靠的事实，说明“大救星”是居心要人民“穷”、是一意要人民保持“穷”、是惟恐人民“不穷”、唯恐人民“富裕”的话，那么，你该相信“吾言不谬”了吧！你又可能质问我：“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哪有领袖会居心（！）让他治下的百姓保持‘穷’而且

还怕‘富’呢？简直是不可思议！”“是的，除非你认清了毛的‘穷革命论’，否则就只有“不可思议”了。其实，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连‘穷革命论’本身，也仍是不可思议的。总而言之，要说毛是‘大救星’，的确是 不可思议的。”

请看他的“穷革命”哲学——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标明“高等教育哲学教材”，由郭建宁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纲要》第114页上的“1，穷社会主义”。无需我指明，这个在最高学府讲台上宣讲的言论，是具有官方的性质的。再说，其中内容都是援引自毛的原话。

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明确地否定了列宁的上述观点。他写道：“列宁说过‘国家愈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就愈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正确。实际上，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越要革命。”毛泽东这段话，反映了他越落后越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一穷二白”的赞赏上。

毛泽东最早论述“一穷二白”的意思，是在1956年2月，当时还叫“一穷二白”，是他在2月14日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的插话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中国的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是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末尾，他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1958年6月1日，《红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里，毛泽东看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但却忽略了一张白纸也是没有基础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只是白纸更利于他笔意纵横、肆意挥毫。他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可见不简单即不白，就要戴紧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赞赏“一穷二白”的同时，毛泽东对“富”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水准，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

据此，他对农村中富裕中农不敢冒富大加赞赏，认为是好事。他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已在政治上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他还对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的观点表示赞赏，认为这话讲得好，因为穷就有压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断进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不仅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富”的担忧，同时也表示了对修正主义“富”的担忧。他说“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

腐化 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高薪阶层，先出现在文艺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以穷为荣的思想发展得更为严重。1973 年 6 月，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 年 9 月，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

从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穷是光荣，穷要革命，穷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贯彻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

抄书至此，喟然兴叹：就算是历史上的暴君加昏君、再加上是个大混蛋，也只能是暴虐无道、骄奢淫逸，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无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谁像毛一样，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让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以保持其所谓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穷、不白，他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想当初，人民跟他闹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时光吗？现在成了屎壳螂撵屁扑了空：“目的是没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价值观！”

因为我出狱后又在农村监督劳动十六、七年，所以对农村、农民比较了解。农民把这种饥饿政策理解为“饿鹰策略”。他们说：“打鱼人只有让渔鹰总是饿着肚子，它才肯被驱使、有下河逮鱼的积极性，一旦吃饱，它就懒了，不想动了。”他们还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只有文盲才会有的说法：“社会主义制肚（度）——社会主义是专门制人民的肚皮的”；“社会主义肿（总）路线——社会主义是一条叫全民浮肿的路线”；“社会主义高潮——农民听干部宣讲毛主席编写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说：“合作化前，从没见过田间的草长这么高；特别是大炼钢铁，把劳力都抽走了，田地荒芜，草深及腰，原来这就是主席说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草’呀！”。

穷到了极点，无非是进“天堂”，无非是穷死。穷死中之最，不是掏不起医疗费，病死；也不是衣不足以裹体，冻死；而是面苍苍、口张张、眼巴巴、腹空空、骨嶙嶙、气奄奄、筋暴暴、两眼一闭、两腿一蹬——饿死！大跃进中活生生地饿死了 4600 万人！

当然，像《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说的“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毛还大讲死人的使用价值。1958 年 12 月 9 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是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页 383）……就更令人不可思议了。《东方红》的歌词如果勾去“大救星”，改为：“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灾星（或勾命鬼）。 ”那样，就实事求是了，也就是可以思议的了。

亲历中共教育：尼克松要来 我们学校的谎言培训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达北京

沈睿

从我睁着眼睛看世界开始，到我上大学——小学，中学和高中，学校里天天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他们生活得水深火热，特别是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而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而且中国人民总是受西方人欺负。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受欺负的历史。中国人都如小受气包，在外国人的大皮靴下挨踹挨踢。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美国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要来中国了。为了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我们学校给我们进行培训教育。如果美国记者问你们你们每天吃什么？告诉他们我们每天吃鱼和肉。我们使劲地点头。那时我的肚子想到鱼和肉都高兴得得咕咕叫，因为我们并不每天吃肉和鱼。吃肉是我们生活中值得庆幸的一件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一个月每个人有半斤油，一年每个人有半斤花生，二两瓜子。我们想象的最好的生活就是每天吃肉。我们要告诉那些吃不饱的美国人，我们天天吃肉，还吃鱼。大鱼大肉。

尼克松来的那几天，我们必须穿最好的衣服。可是那时我一年只有一件新衣服，还是新年时才买，所以我没有。老师说，没有新衣服的人就一定早早地来到学校，免得路上遇到美国记者，让他们看到你穿的带补丁的衣服。我看看自己的补丁连天的衣服，我怕美国人看到我，我早早地到学校。等尼克松走了以后，我才恢复正常时间上学。学校里为尼克松来鸡犬不宁，我们都等待美国人问我们吃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遇到过美国记者。

于是老师开始在课上给我们讲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人民是多么给中国争脸的故事。比如，在西单菜场，一个美国记者看到一个老太太，跟老太太说话。老太太听不懂，可是立刻走到鱼摊子前，买了一条最大的鱼，拿着鱼照相，显示中国人民能吃得起鱼。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热血沸腾地鼓掌。多么爱国的老太太！能吃得起那么大的鱼，让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看，中国人生活多好啊！还有就是一些老科学家被访问。他们住的房子里有沙发！沙发那时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家具。他们有沙发的家都给中国人争面子啊！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见零星的外国人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很少看见外国人，一见到白人，我们就把他们团团地围住，围得水泄不通。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在中国被围的水泄不通。因为很少见到外国人，我们以为外国人是天外来客，忍不住围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莫名其妙地说什么话，我们也听不懂。我那时天天看报纸，报纸上只要有一个外国人来，就报道他何等热爱中国。他们热爱中国都热爱得来这里看看了。报纸上常常报道世界各国热爱中国的故事。我那时坚决相信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首都。我为自己出生和生活在中国而无比自豪。

所有这一切我所被告知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都如一座破房子一样纷纷倒塌了。第一，我知道在中国人民都生活得幸福无比吃一斤棒子面也要粮票的时候，美国人民天天吃黄油面包各种鱼各种肉而不需要粮票肉票油票。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票是什么。而且，他们家家户户都有沙发！第二，原来中国人幸福生活的时候，同时有很多中国人自杀而死，流放而死，饿死——四千万人（40,000,000）在三年之内被饿死。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导致的人口死亡发生在中国的1959-1962。我查资料，从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中查出，1962年中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第三，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并非是西方欺负中国的历史，而是中西互相不了解理解而逐渐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所谓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中国人签了字画了押，同意的，清政府并非是在刀架在脖子上才画押的。而且所有的暴力冲突最初都是由没受到过教育的中国人挑起来的。这是一个吃惊的发现。我才明白中国的历史教育里几乎全是谎言。凡是涉及中国与外国关系的，中国的教育的几乎都是从害怕恐惧外国人的 xenophobia 出发。这种教育塑造中国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只要有问题就指责外国人。害怕外国人导致的是莫名其妙的崇拜外国人。崇洋媚外与自惭自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恨外国人，其实心里很向往外国人。永远不能平等地对待自己和外国人。

第四，北京不是世界的首都。实际上，哪里都不是世界的首都。世界没有首都，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与中国很多人都希望到北京生活和工作不一样，美国人大多不愿到首都华盛顿工作。华盛顿最大的优点就是所有的国家博物馆都免费，包括国家艺术美术馆，这让我最高兴。而且国家美术馆的餐厅的饭也挺好吃的，不过不是免费的。

以此文回应那些针对我的博文而在网上谩骂的人。

谎言、诺言和誓言

过去讲人有三魂七魄，是讲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些形式。这些与人体的脏腑经络等等一样，都是人在修炼状态下所体会到的人体内在结构的一部份。不是人现代科学表面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但是已经被中医、气功、心理、生理学等研究所逐步证实。作为人的魂魄来说，其中一魂被称为“信”。古人说，人无信则不立。就是说人没有这个东西，人就不能正常生存。民间一直存在一种“失魂症”，用现在的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是用传统的一些手段解决的。但是过后人们还是把它视为迷信。中医认为绝大多数疾病伤害其实是由于七情六欲损害身体所致。而所有的伤害当中首先是脏腑经络，严重则至心灵魂魄。

谎言，谎言对于人身体的影响现代的技术手段已经测到了一些，就是在人说谎的时候，人的生理电流、内分泌以及内脏器官反映都会发生一些异常的改变。测谎仪也是用这种道理。但是更深的人们还不知道，其实现代人的大多数疾病都与谎言有关。我们这里所说的谎言，就是指人们为了私利、私欲的欺骗行为。一切都是从心土上来的，关于真假的一些特殊情况也许不在其中。古人讲“轻诺必寡信”，是说如果不遵守诺言，就会对“信”带来伤害，更何况有意的谎言。疾病流行的地方往往是谎言盛行的地方。

诺言，古人讲“千金一诺”，千金尝不值一诺。答应人家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品格做保证，一定会做到。如果做不到，就会对自己的品格和生命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尤重于失去千金。可是如今，轻诺寡信的情况习以为常，生活当中总是听人说，好好好，我马上就……。然后就是好久没有音信，大家也都习惯了。还有很多的就是用诺言直接来换取金钱，不管是做生意或者做官，这种情况也是随处可见的。这些情况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不仅反映在身体疾病等方面，进一步就是反映在人生命的深层、转世轮回、子女后代等各个方面。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句话“迷信。”就可以无视的了的。

誓言，誓言就不仅仅是用人自己的品格良心来做保证的问题了。誓言，本来就是请天地神灵作证的承诺，其意义在于保证自己绝对遵守，不然就甘愿领受天地神灵的监督和惩罚。天地自然的规律造就了人的生命，生命就在这个造就了一切的规律当中，方方面面都是制约。现代人们对水的研究，人思想的念头在水的结构当中都有直接的呈现。人说水是生命之源。人对天地神灵的誓约怎么会不兑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孔子说，言行，君子是用来动天地的，能不谨慎吗？现代有的人自己随口发誓，不把誓言当一回事。特别是那些把一切奉献给邪恶的恶毒誓言。不就是把什么 天地神灵、自然规律、自己的生命等等一切都不当回事了嘛。最终受害的不就只能是自己吗？

人啊，实在是不该满口谎言，应该的是信守诺言，顶顶关键的是不可乱发誓言啊。

中共的谎言与蒙蔽失灵（刘青）

2010-06-11

大陆湖南永州六月一日又报杀官新闻。当地邮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身揣两支手枪和一支

冲锋枪，上午十点左右进入湖南永州零陵区法院。直上 4 楼，在一间法官办公室，大开杀戒。当场枪伤并追杀法官三人，枪伤法官、书记员和法警三人，朱军也随即饮弹而亡。随后中共的官方喉舌在网络上报道，说朱军这一案件是报复杀人，因对法院判决与妻子离婚的财产分配不满。又说朱军是因为身患绝症，对生命绝望，制造这一杀人案件是要拉几个垫背的。

这些对案件定性的说法无非是要说明朱军如何毫无理性、丧心病狂、滥杀无辜。但是与中共官方报道期望恰恰相反，短短一两个小时，数千上万的网民跟帖。不是谴责朱军杀人，而是一面倒地叫好。跟帖不是将朱军称为英雄、便是深表赞同地说：“当法律不再公正时，那只有自己去讨说法了。”、“没有无缘无故杀人，也没有无缘无故被杀。”，或是赞扬说：“报复者这回没有选择幼儿园做目标，凭这点，他就值得称赞。”

这种社会舆论一面倒地赞扬行凶者朱军，迫使中共当局紧急下令网络公司，数小时后便删除、封杀了所有跟帖。网络只要不是在中共的指示、控制中，一般而言能及时和真实反应社会。朱军枪杀法官一案在两、三小时内的网络跟帖，无疑是中国社会对此的真实情感。

中共对其抢夺政权和统治的手段十分洋洋自得，从枪杆子、笔杆子的表述，不难看出按捺不住的那份得意。而所谓的中共笔杆子究竟是什么呢？将千变万化的表皮剥去后，归纳起来不外乎谎言和蒙蔽两种。

谎言便是无中生有、生编硬造，以达到抹黑对手的政治目的。蒙蔽就是遮掩、扭曲真相，主要是将自己的邪恶和血腥藏起来。中共的笔杆子在与国民党抢夺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确实称得上中共的两大法宝之一，完全起到了遮掩自己的邪恶和血腥的目的。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笔杆子发挥的作用远超枪杆子。一时登峰造极，将亿万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上。例如大跃进，中共喉舌铺天盖地造谣，一天一遍说亩产万斤、十万斤、甚至二十万斤，结果造成饿死约四千万人的人类悲剧。

中共一方面将饿死人的惨状严密封锁，直到今天也只有零星资料让人们略知一二；一方面大肆造谣，将责任推给自然和苏联。将那些年的风调雨顺编造成自然灾害，并说苏联的讨债，加剧了饿死人的困难，而一字不提中共经济上的倒行逆施；而且以政治上的迫害、甚至杀人，推行这种倒行逆施，才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量饿死的惨剧。

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六十多年日子里，没有一天不是大肆编造谎言和遮掩事实。大者如土改、正反肃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六四屠城，等等；小的如社会关注的一人一事，如近年来的杨佳、邓玉娇审判，等等。

客观地说，中共笔杆子早期的谎言和蒙蔽还是相当有用的。没有资讯来源的大陆人，甚至相信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与日本勾勾搭搭、专打中共。然而一旦资讯多方面出现，人们才知道正是中共在抗日时期，遵照毛的旨意，大搞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今天，大陆的绝大多数人显然不接受中共的谎言和蒙蔽了。目前朱军一案在网络上的反应、还有前两年的杨佳案、邓玉娇案在网络上 的类似反应，都充分说明中共的谎言、蒙蔽显已失灵。

谎言不攻自破的史料:苏联对东北共军的支援明细 作者: 论语 1972.2

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失守，原因很复杂，我认为主要有三：

- A、 美苏地缘政治战略的较量结果，美国为了日本（和台湾）而放弃了中国；
- B、 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敏感性不足，而戴笠的过早殉难加深了这种恶果；
- C、 蒋介石过于忠于三民宪政，在现实军政条件尚未具备的前提下仓促行宪。

因此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应该对某社团设置三大疑问：

- A、 苏俄军援，还是“小米加步枪”？
- B、 间谍渗透，还是“蒋光头无能”？
- C、 金融暗战，还是“国民党腐败”？

第一条在杨奎松和沈志华的努力下，已经逐渐曝光；第二点其实是第一点的延伸；第三点的讨论尚非其时，研究结果也没有发表条件。如果这三点都被草民知道了真相，那么“民心向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和“因贪腐而丧失政权”这 20 世纪东亚三大谎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内战前夕，东北林罗军取得之的外援，分“人”和“物”两端。我们分别简单讨论一下：

一、人

所谓“人”，不是指普通兵员，因此我们这里先不讨论那些被八路收编的 40 万伪满洲军（详见后文），而是指援助林罗军作战的外军之专业技术、战术人才，这方面，似乎有前关东军、苏俄（东欧）军人和北韩军人 3 部分来源：

1、 日军：苏军向出关八路总共移交战俘（含妇孺）59.4 万名，具体留用人员有以下几个说法：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 1943 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 38 军 112 师 335 团。他透露日本有个 38 军战友会，大概 10000 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 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 10 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 60 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

有官方报道表明，近万名医护人员在林罗军中服役。

1948 年 9 月 28 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 14 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军中服役，或滞留在××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 6 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

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

2、至于苏俄（东欧）将士，以坦克、飞机和火炮操作员为主，其来源主要是当时军统之情报和事后国军参战人员之口述回忆，不过白种人参与之人数不多；

3、还有说有北韩将士参与南满之征战的，但是至今仍有是北韩朝鲜人还是中国朝鲜族之争，因此存而不论；

二、物

所谓“物”，是指大规模之枪械弹药供应，主要有以下物品：

1、关东军仓库中的战备枪械弹药，目前完全可以确证的1945年10月之前交付之具体明细如下：

野战炮：2662 门

机关枪：13825 挺

步枪：30 万 支

弹药及补给库：742 所

手榴弹：11052 颗

2、苏俄缴获的日军之飞机、坦克、汽车、战马等等以及军需物资：

飞机：920 架

坦克：360 辆

装甲车：350 辆

卡车：3078 辆

战马：10.4777 万 匹

补给车：21084 辆

特种车：815 部

指挥车：287 辆

汽车：2300 部

拖车：125 部

骡马：17497 匹

无线电机：133 座

（由于战舰未见使用于内战，因此忽略不计）

3、大连等地源源不断地武器弹药生产；

4、苏俄、捷克等国制造之军械；

5、苏俄剩余之二战美援战略物资；

三、史料来源

以上枪械弹药之提供，数据各异，因为各方的回忆和档案各有不同，现罗列如下：

1、最早是中国政府外交部在东北之调查报告；

2、前线作战国军普通士兵之见证；

3、安东火车站之铁路运输详单和工作人员见证；

4、前线军统特工之调查报告；

- 5、 美国 1950 年代之国会调查报告；
- 6、 联合国 1952 年认可之调查报告；
- 7、 林罗军高层将军之回忆录；
- 8、 苏俄 1971 年之解密档案；
- 9、 毛×东和米高扬 1949 年之会谈记录。

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 북한 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 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

我仅仅是在做一个历史研究，既非对这一边定罪，也非为另一边宣传；诚如很多网友所言，革命军北伐和抗日也有苏俄的襄助，因此彼邦之军械并非生来邪恶，只看使用者之目的以及最终结果，而这便是价值判断问题，和历史无关了。我只要求“慎终追远、正本清源”，仅此而已。

我们民族、国家和个人目前的种种境遇，其基本原因便是 60 年前南京政府输掉了那一场战争，因此输掉的原因我想海峡两岸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去 探索究竟。任何战争，饷械供应永远是最为关键之因素，相信大家也认可，而国军崩溃的原点便是东北，因此，东北交战方之军械弹药之供给问题极为重要，这也是我开这个并不成熟的帖子以激发讨论的唯一动机。

四、 关东军

关于日本关东军，有人认为：“关东军顶峰时期的精锐在 45 年已经被抽调一空，剩下的都是一些临时组建的垃圾师团，番号如下：39、63、79、107、108、112、117、119、122、123、124、125、126、127、128、134、135、136、138、139、148、149 师团。”

——但 我觉得，这些番号罗列得不太专业，比如，如果上面将 79 师团算是关东军序列，那么就是将下辖 79 师团的 17 方面军北韩驻守部队也算作了关东军序列，因此可别遗漏了 101 混成联队。到了 8 月苏军正式进兵，17 方面军的南韩（和济州岛）驻守部队也划做关东军序列，于是，我上面所说的“24 个师团和 9 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 75 万人”还必须加上 17 方面军、34 军和直属 120 师团。内蒙守备部队（蒙疆晋绥）还有两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警备大队；库页岛地区还有 88、89、91 师团和 129 旅团，他们也都算作向苏俄投降的日军。

关 东军的巅峰时期是 1943 年下半年，而并非上面所言的 1941 年，到 1944 年夏季最为衰弱，但到了 1945 年 6 月重新充实建制。这些师团并非都是“临时组建”，像 39、69、117 师团都是 1945 年 6、7 月份从中国派遣军调来满洲，既非临时整编，也绝非“垃圾”，还有，和这三个师团同时调防满洲的还有 59 师团，直属于关东军部，驻防咸兴，不料被遗漏了。59 师团原本驻守汉口，为冈村宁次手里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这次为防止苏俄在南满的进攻，跟随 34 军司令部来到咸境南道。该师团作战任务除了保卫平壤，还承担起训练新组建的 137 师团和 133 旅团的任务。很奇怪的是，以上番号罗列又缺了这两支部队。

大本营计划中还将充实关东军，下一步就是征调 10 个师团和 10 个旅团进入满洲对抗美苏，以确保南满的持久抗战；再加上刚才我们罗列的番号，此时关东军仓库中存有 70 万枝步枪绝非不可思议。

五、 伪军

关于伪军问题,根据老东北军军官王铁汉的估计,满洲国正规军是 30 万人,地方部队是 15-20 万人。国军进入东北以后事实上基本没有收编到伪军,因为没那个条件,根据我的资料(今后有时间我会陆续写出),满洲国伪军主要是由苏俄红军远东方面军 88 旅负责收编的,一个月之内就吸纳了 7 万人,至于“红军远东方面军 88 旅”的另外一个番号,相信大家也一定很清楚吧。

当时东北伪军的中下层军官有句俗语:“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老爷投八路”——这很能反应此时的乱象和实情;而高层军官则普遍有“明八路,暗中央”的想法,因此很多投共的伪军后来又陆续反叛,大概有 10 万人之多吧,后来这 10 万人有部分编列进了国军序列。

总之,抗战末期,满洲有至少 40 万伪军是可信的,其中基本被共军收编也是可信的,但后来又又有几万人投向国军,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我们谈论这个问题,至少要考察 1945-19 47 年这两年多的变迁,一时一地的数据当不得真。

“原伪满洲国军在光复后被改编为东北保安部队的 4 个保安总队”是对的。根据军政部 1946 年 3 月的训令《东北部队整编办法》,每个总队下辖 3 个团,也就是一共国军改编了 12 个团的伪军,这几乎就是国军在满洲的全部收获了。当然,这仅仅是南满,至于北满等地,抱歉,国府势力完全无法到达,最多就是派人秘密给那些尚在犹豫,共军也没来得及收编的伪军将领送去个番号笼络一番而已。

到 1946 年 10 月,国军中被认为是前伪满军的,共有 15 万人,“并在其后的 1947 年被陆续改编为正规军,有 14 个暂编师”——问题是,这 15 万人中的军官或许还是老伪军,但兵员早已是新入伍的民间青年了。比如有人所说的“长春伪陆军军官学校及长春周围伪军编为东北保安第 4 总队”其实在 1946 年 4 月就被共军在长春歼灭,后来国府在 10 月重组,除了军官以外,士兵全是当地青年,改番号为独 9 师,明年 7 月改称暂 58 师,师长王家善。由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这 15 万人真的属于 1945 年 8 月前伪军的,实在只有那“4 个保安总队”而已。

冈村宁次给何应钦的备忘录认为,满洲国伪军“装备精良,战力与关东军一样坚强”,因为苏俄占领以前伪满所有档案都付之一炬,因此其具体人数目前只有各方估计。戴笠认为伪军共有 50 万人,而王铁汉认为满洲正规军是 24 个师(和特种部队)共 30 万人,在国军出关时,至少有 16 个师被共军收编。而陈家骥认为,一万名精锐伪满军就足以保卫如沈阳这种大城市,而如此精锐的满军共有 16 个旅,其中被共军收编了 14 个。

中共为斯大林过生日

毛江婚事轶闻 江青才一到延安 毛泽东就看上她 卢沟事起,乱世更加是乱世。老蒋已无退路,把吴钩看了,光头摸了,说了声娘希匹,就上了庐山,昭告全民抗战。而老毛端坐窑洞,神闲气定,把辣子吃了,电报看了,说:“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叶子

龙回忆录》，页 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果然是乱得好。僻处一隅的延安，安静而又端庄，好像是自外于乱世的桃花源，又仿佛是滔滔洪水中的诺亚方舟。怀着各种想法和欲望的年轻人，纯洁的革命者，爱国的愤青，压抑的贵族青年，还有失意穷愁的文人，失学无路的学生，以及形形色色的失业流浪者，一时间络绎于道，涌向古老而破败的延安城。此时的延安，固然是“革命的圣地”，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个艺名“蓝苹”或“蓝？”的李云鹤，出了“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又一头撞进了延安城。信仰革命，民族大义，压抑失意，苦闷彷徨，穷愁潦倒，这个小明星身上都有一点。这一点又一点，汇聚成一种巨大的欲望，配合着天性里的不安分，驱策着这匹小烈马上路了。向西，向西。延河在呼唤，宝塔在眺望。心口啊，不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啊，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到了，到了。1937 年 8 月下旬，李云鹤到了延安城。

8 月的延安城，估计还在围绕毛的风流韵事飞短流长。贺子珍正在谋划出走，吴丽丽则正在收拾行装。稍后，她们就要各自走路。两个女人，一片过时的风景，李云鹤来了，仿佛又是一个吴丽丽从天而降。张国焘回忆说，李云鹤的到来，“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关注”（《江青同志》，页 148）。此是比较客观的描述。而江青日后对维特克说，中央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和我打招呼”，“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同上，页 145）。自然是在自我吹嘘，却也有些事实的影子。还是在西安办事处，李云鹤结识了朱仲芷，遂结伴而行。（朱仲芷《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 7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到了洛川，朱仲芷见到了丈夫萧劲光。萧已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属于高级首长，正出席著名的“洛川会议”。小影星蓝苹见了萧劲光，似乎是颇逗萧司令喜欢，他逢人就介绍，蓝苹也就顺便见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洛川会议结束了，江青一行，同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一道，乘卡车回到延安。（《叶子龙回忆录》，页 64--65）据江青回忆，她乘坐的卡车的前面就是毛的卡车。多少年后，她向维特克说起这个巧合，仍然很陶醉的样子。（《江青同志》，页 146）

毛的秘书叶子龙，也被萧劲光介绍给了蓝苹。他清楚地记得，返回延安的那一天，蓝苹坐在车厢前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叶子龙回忆录》，页 65）。叶子龙还回忆起蓝苹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同上，页 65）朱仲芷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姐姐，朱氏姐妹的父亲，与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交情。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叫朱仲芷捎给毛泽东。朱仲芷前去给毛送腊肉，蓝苹要求一块去。据朱仲芷转述的朱仲芷回忆：

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朱仲芷《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 74）

朱仲芷还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好精干的人。”精干的江青，就这样轻易地走向了毛泽东。毛江的首次碰面，表面看去，并未碰出什么大火花，但较起真来，没准儿毛心里会咯噔一下，

或许还会默念一句：“这妹妹，我在哪里见过？”

为了与延安的新世界相般配，蓝苹改了名曰“江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命名，意味着这个小女子又要超越自我，在广阔的红色天地里大干一场了。命名即新生，新生的江青同志还没怎么动作开来，便很快发现处处掣肘。首先的一关是审查，江青就不好过关。扔掉了“蓝苹”，却扔不掉上海滩的复杂历史。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表面上说上就上，大家一哄而上，实则革命讲究资格，要不，怎么连老阿 Q 都会说一句“不准革命”呢？眼下的革命延安，全中国都在大动乱，它却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那全延安唯一的小车给谁坐，谁的窑洞可以点蜡烛，谁可以用心培养自己的“八字胡”，谁可以蹬皮靴使文明棍放狼狗，谁进什么学校的哪一班，谁的什么情趣要克服，这些都是革命规定好了的，一点都不能乱。

江青好不容易过了革命的审查关，进了为延安人所不齿的党校 12 班，那里充满了待改造分子。熬了几个月，秋去冬来，鲁艺要在来年春天正式成立了，江青看到机会来了，便去争取上鲁艺。这一次，她豁出去了，提了铺盖卷，去找组织部部长陈云，陈看她一个演戏的，就顺手开了绿灯。可是，革命又找上门来了，中央保卫委员会相中了这个小女子，由该委员会三巨头之一的许建国出面，单独找了江青密谈，要她做他们的网 员，也就是秘密情报工作者。她的革命任务主要不是演戏，而是在鲁艺潜伏下来，密查学院中混入的各色“坏人”。由于身份特殊，江青只与许建国单线联系，并要求她定期汇报。到了鲁艺，江青如鱼得水，大演其戏，潜伏工作几乎没有怎么做。许建国大怒，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潜伏工作放在首位。（杜超《许建国：一个调查江青的人的悲剧》，《文史精华》2007 年第 8 期）

江青能演戏了，在革命的延安继续搞昔日“蓝苹”的勾当。江青这才理顺了自己与革命的关系。与革命的关系顺了，与革命领袖的关系也随之一天天近了。那些日子，江青很出风头，直把爱看戏的罗曼蒂克的毛泽东吸引得流连忘返。

在延安窑洞孤寂地思考、写作的毛泽东，不得不注意上了江青。海伦 “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欣赏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贞。他不畏惧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拒绝口红和卷发。”（见《江青同志》，页 162）海伦 丝合缝呢？

所以，维特克说：“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她了。”（同上，页 163）按照江青自己的讲述，抵达延安后不久，毛发现她就是女演员蓝苹，然后给了她一张他在马列学院演讲的票。出于震惊和敬畏，她不敢要，但很快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收下了票，去听他讲演。（同上，页 152）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到延安后，也曾听同伴议论道：“蓝苹很漂亮，而且会演戏。她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她非常着迷，为她的表演大声鼓掌”（同上，页 163）

那些深入红区的洋人，一般都能一睹江青的风采。若干年后，毛 夫人的惊采绝艳，还让他们回味不已。斯诺眼里，江青是一个身材修长且吸引人的年青女人，会打一手好桥牌。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尽管对延安颇有不满，但他的日记仍旧记下了江青特有的美好：身材削瘦，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 “能找到杰出中国美女的品质”。美国“迪克西使团”的巴大维上校这样写道，“她的举手投足带有一个女演员应有的所有优雅”，“她看起来比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要漂亮优雅得多”。“迪克西使团”的另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索性一言以蔽之曰：江青“不是美人，但

很迷人”。罗伯特 1945 年才造访延安，见了毛夫人，他感到她“比蒋介石的太太更美丽，表情更丰富”。日后，他还很诗意地记了一笔：“她的身上还带着在山地采集的野花的香味”。（《江青同志》170—174）

研究了有关江青的中西资料，罗斯“不是普通女子蓝苹选中了毛泽东，而是这座小城最有威望的人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中了蓝苹。”（《江青传》，页 114）这个结论，许多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辩称，江青那样一个戏子，那样一个声名狼藉的“骚货”，从来以勾引男人为天职，毛必是在被动的状态下拉下了水。江青前夫唐纳就曾经说过：“我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我想蓝苹是用对我的办法对付他。她有吸引力，而且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两方面一结合就欺骗了毛泽东。”（同上，页 114）杨子烈甚至说：“蓝苹是个放荡女人！”“她就是没有男人活不成。”（同上，页 109）还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编在党校 12 班的江青，在教室里等候“领导同志”讲话。那天的“领导同志”正是毛，他走上讲台，大家都站起来欢呼鼓掌。江青为引起毛的注意，特意对着他大声指点，并且比别人多鼓了几秒钟的掌。接下来，事情更进一步。当夜，江青给毛写信，谈了对他的印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诉说自己理论水平太差，必须当面求教。毛尚未回信，江青就闯进毛的窑洞，跟警卫就像老朋友一样开玩笑，不获允许就大声向毛问好。据说，那一次毛对她很冷淡，一面看文件，一面听她提问题，而且只就她“理论水平太差”说出了几本书名和文章题目。（同上，页 110）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像叶子龙的回忆，在讲述了毛江首次碰面之后，紧接着写道：“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叶子龙回忆录》，页 65）也似是在暗示江青勾引在先。毛为江青的《打渔杀家》高声鼓掌，是延安人所共知的事实，江青主动邀请，也很可能是事实，但事情发生的时间链条，却是很难说清楚。

毛江情事，谁比谁更加主动一点点，这其实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毛江二人，都是多情多欲之人，都是罗曼蒂克的革命者，都喜欢打破常规，最大限度实现自我。烈马对烈马，当是互为主动吧。

1938 年 8 月，江青得到调令，从鲁艺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是与毛住在一起了。既已同居，就要张罗结婚。众所周知，毛江要结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

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主席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刘英自述》，页 123，人民出版社，2005）

杨尚昆也有近似的回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陈云当时也是毛江婚事的“反对派”之一，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告诉了毛，毛打电话给陈云，说，

“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 1986 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 年第 3 期）

毛如此一意孤行，冲破阻力，毅然决然与江青结婚，也足可反过来证明：江青确真是迷倒了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残酷迫害张中晓致死？——巴金的“一颗泪珠”——读《清园文存》有感 “（1993 年）三月二十八日 雨止转多云。校阅抄写稿。午后访巴金。谈及中晓事，见他眼中噙一颗泪珠，由颊边徐徐滚落下来。”（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166 页）

对于前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1920 年 11 月 30 日—2008 年 5 月 9 日)，笔者以往虽闻其名，却从未读过他的著作。直到最近偶然看到三卷本的《清园文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才知道自己实在孤陋寡闻。

查阅网上资料，对王元化有如下的介绍：

“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2001 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4 年 12 月 14 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 51 幅书法作品。……钱钟书与王元化两位学界泰斗素有‘北钱南王’的称号。…”（百度百科）

将钱、王并称，大概主要源于其博学，其实二人之生平际遇颇相径庭。钱（1910 年 11 月 21 日—1998 年 12 月 19 日）较王年长十岁，而且世故得多。中共建政后小心翼翼，处事圆滑，明哲保身，从不触犯逆鳞，遂得保无虞。王却生性耿直，1955 年即在胡风案中栽了大跟斗，直到 1979 年 11 月 9 日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方得平反，历时 24 载。

但同案不少人未能熬过这将近四分一世纪的漫长岁月，例如罹祸时年仅 25 岁的张中晓（1930—1966/1967），即文首所引王氏日记中提到的“中晓”，此际便早已长眠地下了。而且，张氏之获昭雪乃 1980 年 9 月的事，晚了将近一年。

说起来，在胡风案中受清查的 2100 余人里，张中晓并非最年轻的一个（据报道有 16 岁的中学生）；但在被“正式认定为‘胡风分子’”的 78 人中，却属于小字辈。而在列入“骨干”的 23 人名单上，他更属至为瞩目者。因为，“今上”在御笔亲撰的“按语”里一再点了张的名。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明察秋毫，对张写给胡的一封私人书信，他老人家不吝笔墨洋洋洒洒地批道：“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67 页）张中晓何许人也？据

“百度百科”介绍：“张中晓(1930~1966/1967)，男，浙江绍兴昌安门外恂兴北人。……小时家贫不能入学，随父绍贤学习《古文观止》、《左氏春秋》等书。12 岁读了一学期小学；十三四岁读了一年初中，后得英语教师之助，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书刊，并自学英语，挣钱买书，同时开始习作新诗与散文。16 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1946 年，考入重庆相辉学院农艺系，翌年，转学重庆大学中文系。1949 年初，因肺病急性发作而辍学，返浙就医，自学依然不断。读书时受到鲁迅、胡风等人影响。1950 年经人介绍与胡风通信。1951 年 5 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1953 年 7 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 60 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激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这位鲁迅的小同乡生性爱好文学，却在

中共建政后因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通信种下了祸根。而他和王元化的结缘，是由于其在文坛崭露头角。王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爱才如命，遂于1952年将之调入麾下任编辑。不料3年后同遭厄运。对此，《清园文存》中所收《谈张中晓和他的著作两篇》这样写道：“一九五五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一九五六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453页）不料毛1958年搞“大跃进”导致大饥荒，1959至1961年大陆饿殍遍野，死者不下3700万人（2009年水稻专家袁隆平语）。张中晓自然处于饿死边缘。万般无奈中他写信给昔日的上司、老党员高干王元化求援：“他不知道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他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之责。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然。……”（同上，453-454页）然而王元化当时正处于困厄，自身难保，“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辞，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初，我在隔离时期，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淳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的严厉呵斥。后来我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现在手里拿着中晓的这封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把信搁了下来。”（454页）可是，资讯闭塞而又濒临绝境的张别无求生之门，遂再次来信望施援手。“…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转给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也包括其他受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是一样。…多亏在那可怕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了。”（454-455页）王元化在文中坦承此过程中“自己的懦弱”和“经过剧烈的心灵交战”，这种磊落的襟怀难能可贵。而他将张信转达石西民竟获意外收获。石西民（1912-1987）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资深党员，1955年至上海，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等职，思想较为开明。此前他与王元化素不相识，能主动向正受审查的王作上述表示，可谓天良未泯。不过，张当时没有饿死却未必值得庆幸。该文紧接着写道：“现在已没有人说得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要经历‘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遍历人世的磨难？那时他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去的时候，他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挣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455页）该文对张中晓有这样的评价：“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做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可是他在荆棘丛生的思想征程上起步不久，才三十多岁，还可以工作许多年，就夭折了。”（400页）另有论者把张中晓和鲁迅、顾准相提并论称：“文革时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顾准的文字和张中晓的文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达到的坚强和高贵。”“我觉得张中晓就是耶稣，他就是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摩罗《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

到张中晓》)此外,有人把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比作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指出:“尼采留下了‘上帝死了’的名言,而张中晓的言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间的上帝死了’。”(陈坚《人间的上帝死了--“伟大领袖”为何痛恨张中晓?》)该论者分析“伟大领袖”对张中晓格外垂注的因由,为此引述其友人、研究胡风问题的专家胡铸的话称:“他把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作是‘图腾’,毛泽东当然对他恨了。”也就是说,张氏“触犯了‘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神经,以致‘龙颜大怒’”。由此可见张中晓“还真不简单,他比赫鲁晓夫还要早了将近一年就看出了‘个人迷信’这个妖孽,尽管还只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具体的小册子而言的。”(同上)不过,上述论者的概括未免失之粗疏。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并非以批“个人迷信”为重点。该书约十余万字,是语录体,共有300条。其中《文史杂抄》199条,《拾荒集》101条。它“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因咯血被允许保外就医至一九六三年间所写下的札记”,其第一部分“文史杂抄”小序自云:“他将这些札记汇编成集,曾‘五易寒暑,三经修订’,足见煞费苦心。小序又云:“因客观群书,遂抄摘斯篇。掇拾贯穿,无所不记……”“似乎作者全是摘抄他人著作,而未参入己见”。其实编者所编选的这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作者自己撰写的文字……其中有一些直接针砭时弊的文字,这是容易辨认的。”(457-458页)王元化特别举出以下几节:“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第二十二节)“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和人性共存,那么,他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时刻,毁灭自己。……”(第七十三节)“……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第八十节)“当世俗的权利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第一百一十一节)“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第一百一十二节)“是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地学舌?”(第一百一十六节)王元化在文中指出:张中晓“是十分重视这些札记的”,根据为《无梦楼随笔》编后记,其中“记述了作者于一九六六年离家时,垂泪向父母和弟弟说道:‘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今年我三十六岁,光身一条,只有两箱的书和十年中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吉凶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457页)张中晓所言不虚,他的札记确实有用。或者可以将之比喻为几粒优质的燧石,“石在,火种是不灭的。”王元化文中形容张中晓当时的心态,指其“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这团不灭的火焰正跟这几粒优质燧石密切攸关。王元化《谈张中晓和他的著作两篇》,前者题为《〈无梦楼随笔〉序》,写于1992年除夕。他跟巴金“谈及中晓事”是在此文完稿后不久。巴金对张中晓并不陌生,他的“一颗泪珠”耐人寻味。后者为该书的台湾版序,写于1997年6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归之前一个月。正如不久前论者所称,“张中晓是谁?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年老的参加过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的人才会知道。”(陈坚《在迷惘中探索的张中晓——读《无梦楼随笔》和王元化先生为它作的序》)时下港人恐怕更没几个知情的了。“座中眼泪谁为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巴金、王元化均已仙逝,还有人为张中晓洒泪吗?(2010-3-22)修订

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被组织安排的同居生活

野坂参三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892年生于日本著名旅游城市山口。在神户商校读书期间,因1911年发生企图谋杀明治天皇的“大逆事件”,青年野坂思想上受

到很大震动，他写了《论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心中萌芽。1919年7月，作为“友爱会”（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前身）特派员，27岁的野坂参三第一次迈出国门，来到英国。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野坂参三是最早的党员，说他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点也不为过。可不久，他就因参加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被捕并被驱逐出境。野坂参三和另一位日共元老片山潜等人一起在1922年创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此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野坂参三丢下患难16年的夫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努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但安顿下来不久，野坂就发现：在不远的将来，他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潜回日本，共产党的根据地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包围着。这种情况下，野坂只得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经中共中央研究，由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他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野坂参三欣然从命。他放弃了共产国际高官的优厚生活（据说当时月收入高达1600卢布），只带了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了延安王家坪附近一座一进两孔的套窑，与朱德住地相邻。从那时起，野坂参三有了中国名字：“林哲”（1943年使用共产国际期间的姓名“冈野进”，1946年回到日本后又恢复“野坂参三”本名）。

1940~1945年，野坂参三“蜗居”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反战和反法西斯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据1989年出版的野坂参三回忆录《风雪岁月》载：“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当时，野坂参三提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建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日本工农学校校长。他也是抗战期间常驻延安的唯一国外兄弟党领导人。1945年4月至6月，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正如赵安博（时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所言：“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作出了独特重大的贡献。”卡萝尔·卡特说：“冈野进是在中国的3个著名日本革命家之一，他致力于宣传和情报工作。”（《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符合事实的。

野坂参三在延安的5年中，与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延安期间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毛泽东对此一点都不吝惜自己的赞美。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之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天就向他致函：“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极高规格为野坂参三举行了延迟3年之久的盛大欢迎会。鲜为人知的是，野坂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泽东过目，并经毛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改。

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此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参三，1962年野坂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野坂与庄涛：昙花一现的恋情

据当年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披露：野坂参三当初随周恩来奔赴延安时，把妻子野坂龙留在了莫斯科。1896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的野坂龙，比野坂参三小4岁，长期从事日本妇女运动，1927年便和山内米那、田岛英等人建立关东妇女同盟，还曾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算得上是妇女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了。野坂龙曾随野坂参三亡命国外16年，助夫婿打天下。1931年3月，日共中央任命因病假释出狱的野坂参三为中央委员，并把他秘密派往共产国际。他同妻子野坂龙一起秘密从神户出发，在妻子的协助下，野坂参三藏身于货车的蒸汽机车内，越过了“满洲”的东部国境——如此看来，他们算是一对患难结发夫妻了。

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然而，“萋萋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衣不如新”；而当与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的“薄情寡义”并非没有前兆，他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他拟绕道苏联回国，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与还在莫斯科的野坂龙重修旧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9月9日，当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庄涛的整个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迹天涯、踏上归程的游子野坂透过飞机舷窗，满怀眷恋地望着在蓝天白云里渐渐远去的延安，“别了，美丽的黄土地！”“别了，美丽的庄涛……”野坂参三一走了之，庄涛烧成了一锅爱情“夹生饭”，独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涛心意难平的是，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延安的几对跨国婚姻中，庄涛、肖月华（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肖月华、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毕

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庄涛却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离开延安后，野坂参三一行辗转中国东北进入苏联，于 1946 年从苏联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在离开中国之前，他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我和几个日本同志，经过张家口等地，到了辽宁。我们准备从这里向日本出发。现在，我快要离开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抗日根据地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如何表现我对于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感谢，尤其是表现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们的宏大的友情援助和激励的感谢。日本共产党现在已由 18 年长期在监狱里英勇斗争过的同志们合力重新建设起来了。我想我作为这个党的一个战士，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来贡献一切，这就是答谢你们的友谊援助的最好方法。

返国后的野坂及日后的庄涛

离开中国后，野坂参三公开访问中国只有一次，那是 1959 年来中国出席国庆 10 周年庆祝活动。此前，野坂曾乘专机由北京飞抵延安访问，他两次参观了曾住过的窑洞，桌凳和用具仍照原样陈设。故地重游的野坂参三在窑洞里动情地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野坂参三坐了很久，想起了近 20 年前的峥嵘岁月，不知是否想起了庄涛？他与庄涛的那段“窑洞情”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

1950 年 6 月 6 日，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日本吉田政府“整肃”日共中央委员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 24 人，次日又下令吉田政府“整肃”日共机关报《赤旗报》职员和日共众议员听涛克己等 17 人，并在日本各地逮捕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据报道，8 日，50 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对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和《赤旗报》市中心区办事处联合使用的办公处，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搜查，是谓“赤色整肃”。当时，野坂参三等日共中央委员一起被非法禁止进行政治活动。笔者查阅了 1950~1955 年间中国的《人民日报》：自 1950 年 5 月 30 日野坂参三在东京皇官前广场参加了民主民族战线东京筹备会所主办的“五三〇人民大会”之后，到 1955 年 7 月 27~29 日举行“六大”，整整 5 年没有野坂参三的任何消息（1955 年 8 月 11 日下午，野坂参三等 3 名日共领导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庆祝日共“六大”演讲会后被日本警方逮捕，16 日野坂参三等获释）。

据赵安博披露：“赤色整肃”时，野坂等人曾到北京居住、工作。当时，野坂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庄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庄涛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见他。（孙金科《关于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 1 期）也许，年届花甲的野坂参三秘密亡命中国，旧情难忘的他又想起了庄涛……

离开野坂参三后的庄涛，后来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走到了一起。据陈叔亮（曾任我国驻柬埔寨、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康岱沙回忆：“在延安时我喜欢和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像黄兴的儿子黄乃、庄涛这些人一起打桥牌。他们两人都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康岱沙口述《从延安到金边》）黄乃的同事、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的夫人马宪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回忆：“我们中央统战部三室第二处有一位领导黄鼐，后来他把‘鼐’改成了‘乃’，他是黄兴的儿子。黄鼐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什么都会啊！可以两个口琴一起吹，而且吹得很好。他的爱人叫庄涛。庄涛原来在延安时，跟日本共产党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居。大概那个时候，冈野进没有妻子在

身边，就要找个老婆。当时也不知道党内怎么安排的，反正就是让庄涛跟冈野进结婚，也不算什么正式结婚。庄涛就跟了冈野进了，还向他学日文，学得很好。庄涛也就研究日本问题，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周总理很重视她。抗日战争结束后，冈野进就回国了，他跟庄涛没有孩子。后来庄涛跟黄鼐结婚，生了个儿子。现在那个儿子经常上电视，因为是黄兴的后代嘛。”但由于种种原因，黄乃与庄涛也未能白头偕老，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解体。

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纪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届八中全会以自觉参与陷害山本悬藏等日本共产主义者和60年代日苏两党关系中断后仍里通苏共为由，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野坂参三于翌年11月14日逝世，终年101岁。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的后记 作者：高华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一九六六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一九六三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一九六四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一九六四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一九六三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

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一九六七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一九六七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一九七〇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一九五八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一九七一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一九七五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一九九五年八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一九七六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九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一九七九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

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一九七九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一九九五 年夏——一九九六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一九九六年十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于一九九八年底，全书杀青。一九九九年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

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一九九二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 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 20 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

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一九九八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全书六十万字)

附该书目录：

前言

上 编：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 2、毛泽东在"肃 AB 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 3、1931-1935 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 3、让步与等待：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
-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 3、初战告捷：1941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轫

- 1、动员"思想 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镣铐"？
-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 次改组
-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 1、康生机关与 1937 年后延安的"肃托"
- 2、1940 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 反奸（肃反）"
-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 AB 团"、"肃托"到"抢救"
-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 2、中直机关的"抢救"

- 3、军直机关的"抢救"
-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 5、中央党校的"抢救"
- 6、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抢救"
-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延安整风：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用不着多说，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很多了。

“延安整风”尤其是后期的“抢救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延安整风”运动与先前的中央苏区“肃 AB 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一样，都免不了严重的扩大化。中共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无一能免扩大化，成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名单：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

处。这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

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老毛无疑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最大受益人，但是，老毛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老毛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接着要说的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老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是不是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

彭真的秘书曾回忆说：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所谓的“道歉”和老毛的“行脱帽礼”一样，从来不是“认错”，只是承认“整过火了”、“整重了”。从来不承认“整错了”，尽管事实上是整了根本不该整的人。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这些人。

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老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老毛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任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受到陶铸的打击，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其实，

这种私心不少办案的人都有：整人的时候雷厉风行，澄清事实、平反甄别的时候往往推三阻四、一拖再拖。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老毛的军权，被任是王明路线的执行人，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老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文革初期老毛要整刘少奇对抗的时候，开始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

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老毛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绝对不止王实味一个人。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纠正。

毛泽东在延安大种鸦片的内幕 摘自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6章

「革命的鸦片战争」1937~1945年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

共产党很不利的。」接著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喜」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 看各共区鸦片史 内容摘要

1、“老三篇”的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

2、漫谈“土特产”对“革命”的贡献

3、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区鸦片种植

北京学者张耀杰最近揭露，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时，窑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在最近一篇批评中共篡改历史的文章中披露上述真相。中共在延安时期为经济自救，曾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五六十年代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因此脍炙人口，而使南泥湾精神深入人心，还成为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最大政治资本。

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图：“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

张耀杰还说，据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知，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毛泽东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实际上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在此之前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 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披露张思德是炼鸦片至窑塌活埋则是第一次。

据官方说法，张思德是毛身边的中央警卫营士兵，在一九四四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窑垮被活埋。毛泽东写了《为人民服务》文章追悼他，六十年代被捧为“老三篇”之一，迫令全国人民背诵。中共至今仍维持这个人造神话，捧张思德为英雄。

漫谈“土特产”对革命的贡献

一、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

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地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积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档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二、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

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三、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〇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

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档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五、国民政府档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档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 “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 “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

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就事论事，面对以上曾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回想过去传统教科书里经常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云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附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

一、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

1、进行烟土经营之行户（以下简称行户），须按期向烟土总行呈请登记交纳营业税，领取营业许可证，在烟土总行监督与管理下进行营业。

2、烟土总行将根据实际情形在其他集市设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员，分别负责各集市烟土税收与营业管理事宜。

3、烟土总行得根据集市交易情形，规定一定行户额数，超过规定额数时，由县政府在呈请行户中指定之，其余可作为候补行户。

4、合法经营之烟土行户，可取得下列收入：

（一）介绍成交，可按买卖各给三分红利。

（二）可按代收烟土税总收入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5、总行得考核各行户营业收税及执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适当奖惩，必要时并可撤消其营业权限，由其他候补行户的补之。

三、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

1、购买烟土人须首先向烟土总行或其代办机关举行登记，并取得许可证始得购买烟土。

2、购买烟土后，即由经手交货之行户收纳烟土税后始准出口。

3、不经买卖，而系直接出口之烟土，应先到纳税机关缴纳税款领取税单，始准出口。

四、税率

1、烟土税率暂定征收按售价百分之十五征收之。

2、购买烟土人如以银元黄金购烟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只准在总行或其指定机关兑换。

五、罚 则：

1、烟土行户买卖烟土后，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

2、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不经买卖关系走私漏税者，其处罚适用于购货走私办法。

3、通过非法行户（即未领取营业许可证之行户）买卖烟土，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纳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四的罚金，非法行户，依情节轻重，处五千元到两万元的罚金。

4、不经烟土行户，私人买卖烟土者，查获后卖主处相当于烟土售价十分之一的罚金，买主除照章补税外，处相当于烟土购价十分之五的罚金。

六、提成：

1、缉私人员及脱离生产之其他工作人员，查获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者，应按所得罚金百分之十奖励查获人；但每人每次不超过一千元。

2、商民行户群众发现有漏税或私行买卖烟土事项者，有向烟土总行报告之权，因报告而查获者，以所得罚金百分之二十作为提奖。

3、处罚权限属于县政府或烟土总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自行处罚。

七、本办法经水东办事处批准后公布施行。

（按：“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本办法第七条所称水东办事处，即指此而言。这个录自印发之油印原件，是当年解放区种植鸦片的铁证之一）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区鸦片种植

在1993年8月黑龙江省伊春县政协出版的<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有原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元兴商店稽查员王锡富的口述回忆,元兴商店的主要商品就是烟土。

王锡富对烟土十分熟悉,他写道:"在东北只有紫花大青筋,白花大青筋,小白花三种.紫,白花大

青筋原产南欧,茎高2米多,烟桃(果实)中,出烟率高,一个烟桃多则可割25~28刀.小白花茎高1米上下,烟桃小,出烟率低.凡私种大烟者均播用小白花品种,他的优点是开刀早,可在秋后播种,第二年农历五月节可以割烟.私种者一般割2~3刀即毁掉逃走,以防官方查禁或飞机发现.公种小白花割8~10刀".

王锡富原来在东北 政委会辽东办事处工作,1947年5月他被分配到元兴商店,这个商店规模大,有总店与分店,业务机密,王锡富调入时并不知道工作内容.一直到报到后才被告知:

"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作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我(指王锡富)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我的任务就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预定数量".

王锡富继续回忆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 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持前线,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4个分店,每县设1分店,当时的总店总理由宁省公安总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副总经理有王瑞平,萧华香二人.总店只有一个总务科,科长叫于琳.临江分店与总店在一起办公,总店设在临江县(今为浑江市临江镇)内的一个二层楼(路南围子很近的一条东西街道上).在这工作人员全为供给制,领导干部多为关里来的老干部,老八路.在下边 基层工作的大部份是新出院的伤病员".

"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翻身的农民都说"共产党有福,八路军走运儿.过去种大烟从来没有像今年长的这么好".这里讲"过去"有两种意思,一是在清政府和旧中国时期没有种过这么好的烟,二是伪满时代私种大烟更是提不起来.所以烟农喜气洋洋,都说"这都是共产党带来的福气呀".凡种大烟的村屯几乎天天要杀猪,以改善翻身后的农民生活".

王锡富也描述了催征的标准,基本上烟户的收成必需完全上缴,而且催缴的方式很传统:

"确定亩产 烟量后,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或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有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个别户隐瞒留用,只交部份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因为当时驻在所的人员也很杂,有的是从国民党部队中被解放过来的解放兵,这些人当中有一部份人对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搞不清,动不动就来 武的.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对烟户偷烟的方法很熟悉:"烟户为了少向公家上交烟土,拟私自留烟自用,出卖,其赚留的方法主要有:用瓶装,用罐装,用白桦树皮包,但都埋藏于土中,等待时机再取出变卖或自用".

除烟户外,王锡富回忆机关部队也投入了大烟生产:

"种大烟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

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

元兴商店干部的伙食标准比其它供给制单位强二三倍,每月发一双胶底皮鞋,待遇很高.可能与工作内容的机密程度有关.因为王锡富只是一个复查员,所以他只知道烟土熬膏之后 50 两一包包好,以后卖往何方就不得而知了.

王锡富也谈到一些有趣的风俗,如烟农一般称罌粟主干上长出 Y 形分叉,叉顶各长出烟桃为"烟王".在他的记忆中四县的生产曾出现过两次,烟农发现烟王,必需用红带系住(很像挖人蔘的风俗).烟王不能割浆,若任烟王自然干枯,这块地里的烟就能割到深秋.据王锡富的说法,这点已经科学检查证明.割烟时烟户要雇用很多任务人,大家都喜欢用大姑娘或小媳妇,据说这能多出烟浆.烟户对雇用人严格监视,但雇用人偷烟也很常见:"偷烟的主要方法有,头上包有毛巾,防烈日,蚊叮和擦汗,恰恰就将烟浆涂抹在毛巾上,收工回家洗后再熬成烟土.也有往来夹肢里抹的".

这篇文章文末附注是由该县美溪区政协供稿.文中所提到的大烟种植广达四县,而且似乎仍使用传统的劳动模式,并没有将烟田列入土改(所以才会有烟户与雇工之分),这都是很罕见的.这在当时是最高机密,拜文史资料工作求实求真的精神,我们得以了解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网友评论:

- 1 我就是原热河省的,那个地方大部分地区在日本人来以前就种大烟
- 2 日本人把鸦片作为经济作物强制种植,许多地区的经济结构就是种大烟,然后换钱买粮食,种粮食的技能和组织都退化了
- 3 共产党在没有控制铁路系统和大部分地区以前强行禁止种大烟,唯一的结果是鸦片种植地区爆发大饥荒,死人以百万计并不夸张,共产党到了这些地区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 4 共产党解放后用铁路调运粮食,1个月禁烟,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其他中央政府没做到这一点

花篮里花儿香原来是罌粟 南泥湾种鸦片秘闻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赞颂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词曲作者贺敬之、马可皆为革命圣地的红色艺人,花篮里什么花儿香,理应十分清楚。半个世纪后,不断有文章质疑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是种植鸦片进行经济自救。这让世人大惑不解,开始怀疑花篮里飘香的是艳丽的罌粟花。

瞭望东方报道,当下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源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的揭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他批评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关于三五九旅种鸦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报导,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罌粟花 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后来引发中共党史好事者一系列的探讨追问,支持者说有,反对者说无,这中间,未见过任何来自官方的史实澄清,甚至听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时期的老人发出一丝愤然之音。英国散文家黎里说:“没有

火就不会有烟，没有重重疑惑，就不会有纷纷谣言”。烟火正在熏染曾经神圣的南泥湾精神，今天谁将站出来辟谣解惑呢？

对南泥湾种鸦片的种种风传，大多依据几本著名的日记。

抗战时期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当时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则以自己的日记提供了佐证。谢觉哉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说“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记，“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可见，经营“特货”的收入，不仅足够使用，减去开支，还有不下两亿元顺差。“特货”作为边区政府的大宗收入来源，显然成了GCD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不仅延安，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下发《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征收鸦片烟土税，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

另据《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记载，从延安去东北，许多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范元甄信中说，“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李锐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延安的鸦片就是这样流通到东北解放区的，“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真富的不像话”。（1947年4月30日范元甄信）。

延安地区早有生产鸦片的历史。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当年南泥湾种植大片的鸦片一点也不稀奇古怪，用不着张耀杰先生千里迢迢跑去实地考察。其实，八路军对鸦片本不陌生，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中共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抗日持久战”

中共一直宣传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其真实情况是种鸦片。

《谁是新中国》下卷-第四章第四节

中共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抗日持久战”

中国现代史辨

作者：辛灏年著

(<http://www.epochtimes.com>)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

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项“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⁶¹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入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⁶²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⁶³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著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著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

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著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

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⁶⁶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 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⁶⁷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 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著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⁶⁸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著国民政府，背著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 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⁶⁹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⁷⁰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⁷¹。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最终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编注：文章标题“中共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抗日持久战””为编者所加。)(

红太阳靠邪恶升起——一本关于中共延安整风的好书 作者：樸石 红太阳靠邪恶升起

——一本关于中共延安整风的好书

樸石

高华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在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再现了当年这场运动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穿了中共编造的党史谎言和套在毛泽东身上的虚假光环。

高华先生的书，从中共内部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毛泽东的丑恶行径，揭穿了隐藏在历史中的毛泽东神话，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恶与疯狂。而张戎女士所著新书：《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则主要从外部揭穿了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的神话。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伟大工程，不把这些共产党长期以来散布的谎言戳穿，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要想把中共及其党魁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衷心地感谢这些学者的卓越努力。

我们还要在思想理论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等各个方面全面地清算共产主义理论的虚假与荒谬，批判共产主义理论血腥与专制的本质与历史，揭示共产党蒙骗人民的一切谎言。

共产主义运动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虚伪、狡诈、专制与邪恶。共产主义理论不以人类的善良、平等、博爱为基本出发点，而是宣扬阶级斗争，煽动暴力革命，主张专制极权。为了在理论上更具有欺骗性，共产主义的鼻祖和走狗们用各种虚伪的言辞与承诺蒙骗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在它们非法建立的各种权力机构和垄断组织上打上“人民”的标签。然而，戕害社会者，难免自戕；作恶者难免不遭报应。看看各国共产党内部几乎无一例外的各种血腥内斗与屠杀，人们不难理解这一切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

考察国际共运史，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专制运动中的专制主义者，大多数都没有太好的下场。从本书所反映的一个典型人物是刘少奇。他在延安整风时期迫害他人，然而，二十多年后，他又成为了别人迫害的对象，没有得到一个“好死”；另一个恶魔康生，主要是死得早，让他捡了一个“便宜”，否则他同样也不会得到“好死”。毛泽东倒是得了个“好死”，然而象斯大林一样，这只是极少的最高极权统治者。他们生前处心积虑所要达到的目标：做全人类至高无上的领袖，名垂青史、永远辉煌，专制暴政永驻的幻想只不过是一个痴心妄想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丑恶将逐渐地被揭露，他们的名声只能随着他们的僵尸的腐烂和毁灭而永远发臭，再好的水晶棺和纪念堂也阻止不了这一必然结局。

在此，我们再来粗略地回忆一下其他共产党国家历史上内部相残的杀戮：

苏联共产党的内部屠杀，更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苏共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98 人，即占 70% 的人（主要是在 1937--1938 年）被逮捕和遭枪决；大多数代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 1966 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有 1108 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在 1937 年至 1941 年期间，斯大林下令枪杀了很多军队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镇压了大批军队干部，从连、营指挥官直到最高的将领。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取得了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在 1937--1938 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 3 万 5 千名红军指挥员；红军总参谋部有近一半的军官被处死或被投进了监狱；近 80% 的高级军官被杀。其中有 5 名元帅中的 3 名、15 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3 名、85 名方面军司令中的 57 名、195 名师长中的 110 名、406 名旅长中的 220 名，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被杀。（引自《狂飙突进 悲歌未绝----20 世纪国际共运重大事件纪实》，于风 编选 P135）

苏共的地方干部也受到了大规模的清洗。每个州和共和国都有几十、几百名干部被捕。列宁格勒基洛夫在世时的干部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经济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也受到了迫害。几年中有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工作者死于非命。

积极参与镇压的内务机构、法院、检察院本身，也有成百上千名干部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中有的是因刚直不阿、秉公执法而被清洗和处决，也有许多是为了杀人灭口而被处死的。

就普通党员而言，在当时的 280 万党员中，至少有 122 万党员被清除出党，实际上就是被逮捕和杀害，或被流放。

30 年代中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住在莫斯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未能逃脱本来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大清洗和屠杀。（以上引自《苏联十大历史公案》李忠杰著）

1949~1951 年间的“列宁格勒案件”。列宁格勒的全部主要领导人，及其州党委几乎全体

成员都被逮捕。随后，又对州执委会干部、共青团州委干部、党团区委干部、各企业经济管理人员、科学工作者以及高校师生进行了大规模镇压，逮捕了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人。其中许多人都在囚禁中死去。而且还牵连到中央党政机关的一些领导人……

斯大林豢养的凶残政治杀手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最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雅哥达和叶若夫是直接被斯大林所枪决，而贝利亚是斯大林死后，被苏共其他领导人所消灭。

1948年，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建）总书记拉科西的策划下，匈牙利成为二战后东欧共产党国家中第一个展开大规模逮捕、审讯、杀戮“铁托分子”、“帝国主义间谍”、实行恐怖政策的国家。1949年，匈共的主要领导人拉伊克·拉斯洛被绞死；同时被捕并遭到迫害的还有国防部副部长帕尔菲，党中央委员、干部部部长瑟尼·蒂博尔，党中央干部部副部长绍洛伊·安德拉什，他们的罪名全是编造的——这就是“布达佩斯审判案”。

然而，这只是拉开了东欧共产党国家一系列政治迫害悲剧的序幕。此后，匈牙利又有一些领导人（其中包括卡达尔——这个把前苏联军队引入匈牙利，镇压了匈牙利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党员、干部遭到清洗、逮捕和监禁，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东欧国家从那以后被清洗的有三位党的总书记、一位国家主席、几位副总理、几十名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人、一百多名将军。至于被监禁和杀害的普通党员、干部更是不计其数。（引自《狂飙突进 悲歌未绝——20世纪国际共运重大事件纪实》，于风 编选 P68）

共产党的专制、暴力本质，决定了它的领导权的更替，必然是以虚伪、狡诈、欺骗、奴性和残杀为主要的方式；它的最高统治权的维护和稳定，是以谎言、个人迷信、屠杀和镇压为主要手段，以放任腐败为辅助手段。更多的共产党内斗丑恶之剧现在很多还被捂着、盖着，没有被完全公开揭露。总有一天，这些肮脏的历史都会展现在人们面前。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宗教恐怖主义，是世界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最邪恶、最暴虐、最荒谬、最无耻的三股反动势力，而共产主义则在虚伪和欺骗性方面比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更胜一筹。

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组织，在他侵害他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时，他不但侵害了这一具体的人，更重要的是，他首先侵害了整个社会的公正和人之间的平等与善良的社会关系基础，如果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必然使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豺狼社会，这样在他有朝一日也成为弱者或少数的时候，他也同样有可能成为他人非法侵害的目标。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不咽气不放权，就是怕自己成为弱者，怕自己失去最高权力而成为他人的侵害对象。这些杀人魔王永远都生活在他们自己营造的恐怖社会中，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应得报应。

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不铲除现行的这两股反动势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民主运动，要实现的是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民主、法制社会形态，而不是要向共产专制复仇；是要实现人的信仰自由，而不是要用一种信仰强制取代另一种信仰。共产专制罪犯对其所犯罪行，应该在公正的法律制度面前，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用一种邪恶来战胜另一种邪恶——这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改朝换代革命的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任何人或者任何组织，无论他做过多少好事，对社会有多大贡献，都不能使其成为剥夺他人合法权益的资本和理由。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动它垄断的一切宣传机器，吹嘘自己对人民“做了多少好事”、“涌现了多少英雄、好人”、“坚持了多少真理”。我们且不去探究这些令人作呕的吹嘘是否真实——即便全部都是真实的，也不能成为中共剥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的理由和资本；即便共产党的所谓共产主义确是“真理”，也没有权力剥夺公民信仰其他理念的自由。共产党的强盗逻辑也实在让人恶心。上帝要叫它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共产党的末世疯狂无论其再延续多少年，这个邪灵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05年8月8日

珍稀照片:毛泽东延安时期女友吴莉莉 据说,她虽然没做毛泽东夫人,却一生都在怀恋毛泽东!她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人民网刊文称,在延安,史沫特莱鼓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

有一个晚上,史沫特莱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待史沫特莱跑到隔壁窑洞,就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后来,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彻底破灭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苏联去了。

延安时期的吴莉莉(左一)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至于吴莉莉的下场,中华网刊文说,经过贺子珍大闹窑洞这件事,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被国民党拘捕。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延安10年 为何革命队伍离婚率高达80%

1937年6月,朱德、毛泽东和史沫特在延安合影

导读:在交际舞盛行之前,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强悍女“英雄”们没构成什么威胁。但偏偏有了叛逆的史沫特莱及年轻漂亮时尚新潮的女大学生们。她们以民主的名义起舞,越来越多的人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这不仅为延安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赢得有了反封建,争自由的美誉。“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描述了在抗大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路历程。

经朱鸿召查证多种资料后,终于在《历史的脸谱》里找到了详尽地描述延安10年的历史细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余秋雨先生在本书简介上写下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伪精英的主要姿态是反对巨俗、鄙视流行、抗拒沟通、抗拒传媒,而真精英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倒这一切界限,为民众承担责任。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在讨论,我们今天在人文坚持上究竟要坚持些什么?是儒家学说中的哪几条教诲,还是西方文明的哪几条原则?是高雅的情操风度,还是传

统的处世哲学？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有意义的，可惜常常流于学究式的逻辑归纳，与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接受可能隔了一层。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别有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景象。

延安10年（1937-1947）的业余时间里，其前五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队伍里刮过美丽的风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倡导了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她们被称为“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

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人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肯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

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遭到革命女将们的反对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行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

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

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遭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

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他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异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

由观念矛盾到肢体冲突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

……

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

遏制不住的"热情"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

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

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

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妆舞会。

交际舞促成了革命婚姻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

“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

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姚铁《快乐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甜蜜的回忆。（梅剑主编《延安秘事》）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投奔“圣地”延安 为何热血青年被中共砍死？——认清毛泽东——中共延安整风和王实味之死

王实味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9集。这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在中共延安整风和王实味之死。本次节目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二十三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的前半部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苏联是他的资助人、他的希望，一个被削弱的、自顾不暇的苏联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多少天来，毛都睡不着觉。

首先，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而又打不赢的话，毛不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他马上命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触犯。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即使如此，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给刘覆电："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坚持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对部队毛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 万党员。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

特别重要。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而这批年轻的志愿者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党，这批青年首当其冲。

集中在延安的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延安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还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曾经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孩子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也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皆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两个江西佬回答说"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书。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不舒服。为什么呢？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 and 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马上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口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 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黄埔将校军官亲历：中共不抗日 专背后偷袭国军 ——张弩揭露共产党抗战时期真相 八年抗战，是谁在抗日？当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七 七卢沟桥事变”73 周年到来之际，曾参加抗战的一位前国军团长讲述当年，揭露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趁机壮大自己，并且尽做破坏抗战的事情。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CK 的报道

美国旧金山湾区居住着许多国军的退役将校军官，有的曾参加过抗日战争，退役团长张弩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每年“七 七事变”纪念日，张弩都非常感慨，他都要对人们说，不要忘记国民党在抗战中建立的功勋，是国军在“七 七卢沟桥事变”中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他说：“这是日本的挑衅行为，他想打中国。当时全国沸腾，要抗日，不 能阻止的，这种耻辱我们不能接受。”

张弩 1941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就投入了抗日战争，参加过无数次战斗。他说。国军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而共产党却躲在后方趁机壮大自己：“他很有一套，地方组织做得很好，这样他把部队搞起来了。因为政府要抗日嘛，全部的军队都在打日本，无暇顾及共产党，共产党就坐大起来了。”

张弩说，令人愤恨的是，共产党不但不抗日，还专门在背后偷袭国军，尽干些不光彩的事，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说道：“山东济南有个周村，村子很大，我们刚刚到那里 24 小时，我们把工事全部做好了，还没休息呢，他们来偷袭 我们。从这点可以证明，他们专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张弩表示，国共战争自不必说，即使在抗日战争，共产党也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处心积虑的消灭国军。“当时我在的部队，我们那个师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怎么知道他是卧底呢？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国防部作战次长吴实这个人，把所有的作战计划送给毛泽东，这个仗怎么打？”

张弩已经 90 岁，仍参加他的居住地美国圣何塞市国民党分部的活动。当地还有一个华人组织“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张弩也是积极参与者。

蔡孝干忆中共苏区的性关系：高层如何共妻 作者：蔡孝干 前台中共委

一 饶有趣味的一夕谈

我们在“胜利”县工作时间虽很短促，但“胜利”县扩红突击队长金维映却很满意我们给她的支援。事实上这多半还是得力于杨秀珍在红军家属中优异的活动。她在中共“胜利”县召开的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以“红属”的身分现身说法，把她在瑞金和兴国的“先进经验”，以及有关红军家属切身的问题，用生动活泼的实例和富于热情的话语感动了所有与会的红军家属，当场就有许多红属响应了中共“党”和苏维埃的号召，互相写下了“挑战书”。保证开小差回家的“老公”回到红军中去。“胜利”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获得完满成果，扩红突击计画也 超额完成了。后来，金维映还获得了“扩大红军模范”的奖旗。

我们在“胜利”县的任务已经完成，第二天就要转到宁都去了，那天，金维映高高兴兴地杀了一只鸡请我们吃饭，一方面表示“酬劳”，另一方面表示饯行的意思。

在苏区“红白”交界的地区买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杀了鸡，没有盐调味，实在是大杀风景。原来向苏区农民买鸡，只要表示“以盐交换”，这个“交易”立即可成；如果是用苏币，鸡

就难买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金维映是拿出了二两盐交给杨秀珍在红军家属中买到的。在盐的问题上显示了两点：第一，由于国军严密封锁，使苏区农民过著没有盐吃的生活达四年之久；第二，苏区农民普遍地抵制“苏币”，这种现象在“红白”交界地区特别严重。

第二任 金维映

邓小平二人老婆金维映

那天晚上，我们和金维映痛痛快快地谈了好几个钟头。我们的话题从扩红突击开始，随即转为大谈特谈红军家属问题，其中最中心的一点，就是苏维埃政府对于红军家属要求离婚采取干涉和压制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杨秀珍率真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她激动地说，苏维埃政府干么要过份干涉红军家属离婚自由，结果引起了红军家属普遍的反感，做出许多“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许多的红军家属老公长期在部队中，家里的农活自己干，农忙的时候，不免要雇人做活；耕田队来了，对年轻的红属又要勾引，这样红军家属和“男同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说实在的，“守规矩”的红军家属能有几个呢？

金维映也感叹的说：连我也有些莫名其妙，苏维埃的《离婚条例》明明规定，苏维埃公民离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也可以离婚。为什么非红军家属离婚可以自由、而红属就没有这种自由呢？但红军家属在地下乱搞，年轻的红军家属没有“秘密老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这不就是对红军家属过份的压制所造成的恶果吗？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开腔的张荣对着杨秀珍开玩笑的说：“秀珍，妳有几个‘秘密老公’吗？”说得杨秀珍满脸通红，好久不能自适。她只是举起拳头作揍人状，要不是在金维映的面前，恐怕就要打起来了。“好了，好了，妳们在一起办公，天天见面。有无还能瞒过大家吗？”金维映以老大姐的口气，解围的说。

因为明天我们还要赶路，这一场饶有趣味的漫谈至此结束了。

金维映和杨秀珍的对话，在当时不免引起了我无限的感慨：也许是由于某种神秘感吸引了我，我进入苏区之后，那奇妙的、混乱的男女关系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二 性的解放

我又想起了李伯钊、杨尚昆和王观澜的三角关系。李伯钊和杨尚昆是在莫斯科结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在这里，无所谓“结婚”的形式，也不问是否到乡苏政府登记（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男女结婚或离婚，都应到乡苏或市苏登记）。但共产党是讲求事实的。在苏区，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实的存在。苏维埃的法律——《婚姻条例》就承认是“夫妻关系”，登记不登记是无所谓的。李伯钊是“有夫之妇”，她在苏区和王观澜同居，并没有受到苏维埃法律的约束，可是谁都得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又弃王而就杨。李、杨、王的三角关系，只是苏区男女关系的一个典型。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区男女关系混乱到了何等程度！

在观念上说，苏区的男女关系，只能解释为“性的解放”的象征。是的：首先是经济上的“解放”，苏区的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一个女子出嫁了，她可以把自己分得的土地带到丈夫那边去（苏维埃的《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各自的田地、财产各自处理”），苏区妇女的经济独立了，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靠丈夫了。随着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便是“性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的妇女确实是被“解放”了。离婚、结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只要男女的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就随时可以离婚。结果是一个女子结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见惯。而这里所说的，还是指公开的婚姻关系而言，至于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类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三 另一种方式的典型

在谈到苏区男女关系的时候，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又是另一种方式的典型。

不过，金维映的遭遇，似乎比李伯钊要“惨”些。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人，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此时李维汉（化名罗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金维映与邓小平分离的同时，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中共江西省委会（设于宁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嗣被派到“胜利”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她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担任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一九三四—三五年，金维映随红军西窜到了陕北，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设立“抗日军政大学”，金维映任该校女生队队长：这一段时间她与李维汉的关系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另有新欢，金维映成了黄脸婆，她和贺子贞（毛泽东妻）、刘群先（博古妻）同样的命运：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遗弃了。

以上是“公开结婚”的几个显著的例子。还有“秘密结婚”的方式，也不乏其例。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闻天与刘伯坚之妻王淑贞的暧昧关系。张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时曾与一俄女结婚。入江西苏区后即鳏居，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报委员会书记。刘伯坚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长期在前线。刘伯坚的妻子王淑贞初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后调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任秘书。不久，王淑贞就成了张闻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成了公开的秘密。

红军西窜，刘伯坚留江西苏区被俘后遭枪毙。王淑贞也留在江西，刘伯坚死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一九三五年红军西窜到四川省松潘之毛儿盖，张闻天复与刘英同居了。提到刘英，她是中共男女关系中应予大书特书的另一个典型。

刘英，湖南籍，在中学时即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恋爱结婚不久，被送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另与人同居。入江西苏区后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经人撮合与伍修权（当时任教瑞金红军学校，兼任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结婚，仅同衾两夜，即宣布离婚，成为中共内部婚姻史中之趣闻，亦为“一杯水主义”之典型。抗战初期，刘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学”去了，张闻天复与刘英之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怀孕，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产”，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乃为取名曰“鸿声”，以影射“闻天”。此一趣闻，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几乎无一不知。

四 柯仑泰女士“自由恋爱”的流毒

以上，我把江西苏区的男女关系、特别是把中共高级干部婚姻关系的几种类型予以简要介绍。中共在江西苏区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冲击了赣、闽、湘、粤等边境广大的落后地区，破坏了这些地区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换言之，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它的中心内容足以苏联的婚姻制度为依据的）和中共高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家庭生活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在这里，我想再回忆一下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窜到陕北苏区之后，将流毒于江西苏区的、标榜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极端紊乱的男女关系带到陕北苏区的情况。

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流窜到了陕北苏区之陵，情形就大变了，那表现著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时笔者任该部部长）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

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显然这两个高潮严重地破坏了陕北苏区原有的淳朴的家庭生活。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笔者按，这是当时陕北干部对中央红军表面恭维的话，实际上并不如此），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说，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中共在江西苏区以及在陕北苏区所推行的“自由婚姻”制度，显然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婚姻观念而来的，而他们在江西苏区所颁布的《婚姻条例》（一九三一年）和《婚姻法》（一九三四年），不外是苏联《新婚姻法》的翻版。那么，苏联《新婚姻法》所依据的是什么呢？所谓共产主义的婚姻观念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想用不着详细叙述苏联新婚姻制度 或所谓共产主义婚姻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只要指出把“一杯水主义”的婚姻观念带进江西苏区的几个留俄干部之间所表演的几桩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自由恋爱故事就够了。

依我在江西苏区（一九三二—三四年）所看到的一些典型例子（前面已叙述），足以证明当时中共内部“一杯水主义”男女关系的盛行，显然是柯仑泰女士“自由恋爱”的流毒所使然。柯仑泰女士（Kollontay）是早期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性关系”与婚姻关系上，主张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之说，她以所谓“波格达诺夫主义”（Bogdanovism）研究男女关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应在各种目的下，自由与异性结合，并提出所谓“性本能”说。虽然这种“学说”曾受到列宁的批评，惟由于她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三年间担任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先后担任苏联驻挪威大使和瑞典大使，遂使她的“自由恋爱”理论普遍流行于各国共党团里，严重地破坏了旧式家庭。中共在其统治下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盛行“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关系，同样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

方影竹：亲历 1949 中共进城干部大抢亲 一、城里有酒和女人，冲啊！

1949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 时，解放军进驻北平。以此为标杆，中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夺权大业。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狂热地讴歌革命，投入中共怀抱。像我这样 17 岁的男青年参军，决心是拿起枪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女青年呢，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鼓舞士气的文艺工作者，都是她们的用武之地。谁想到，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懵懂间成为了进城干部的猎物。在“坚决服从分配”的誓词下，她们的婚姻就被分配了。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团长看中一个姑娘，团政委去做动员，政委看中谁，团长动员，政治工作的力量一发挥，天真的少女上哪里逃脱？再加上爱好虚荣的人性弱点，成为高干夫人，一夜之间光环缭绕，何乐不为？

昔日彼得大帝攻城略地，阵前喊一句：“城里有酒和女人，冲啊！”将士无不赴汤蹈火。这蛮性十足的话是不能道破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49 的抢亲老风景线，以及与时俱进到目前官场包养二奶的新风景线，都是彼得大帝口号的生动再现。

二、精心设计的高栏与滑梯

对待这批蜂拥而来穿上军衣的青年知识分子，男军人面前是难以跨越的婚姻高栏。在思想上，号召你成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马特洛索夫是 苏德战争中用胸膛堵德军碉堡枪眼的苏方士兵，是黄继光 and 所有革命军人的榜样。在政策上更有严格规定。有一次跟组织部门的人聊天，他告诉我：你若是营级干部，有六年军龄可以结婚；若是连级干部，有十年军龄才可结婚；像你这排级干部呢，到三十岁就有结婚资格啦！

相形之下，女军人面前是精心打造的坡度极大的滑梯，结婚年龄全无限制，让她们迅速而直接地领略了党的亲爱。那时尚未制定正规的婚姻法，没有十八岁才能结婚的限制，谈年龄还用虚岁，即在周岁上加一岁。实际上许多十五、六岁的少女就同高干入洞房了。

几十年后，放眼元老家庭，几乎都是遗孀 当家，权势不缺，但孤雁哀鸣的滋味，难以启齿；

相反的，鳏夫则寥寥无几。

以我熟悉的两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为例，女的嫁给了一个“三八式”（1938年前参军的老干部），男方则和我一样，无权结婚。他发牢骚说，他的女同学是“航空路线”，指她只找官儿大的嫁。这句怪话到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列入“反革命言论”，挨了一顿整。

另有一对本是恋人的青年同时参军，女方被老干部挖走，在结婚典礼上，男方愤然说了一通不在道儿的话，使尴尬的新人快意全消。不久，此人被做转业处理了事。

三、一个司机的故事

前面有车，后面才有辙。列宁有过齐人之福，他下面有过杯水主义；毛泽东不用说了，进城之前的中共高干，喜新厌旧之风早就刮起来了，只是轮不到中层罢了。这里举一个河北石家庄地区运输公司司机的寻父故事为例。

有一天母亲把他叫到身边，打开一张红色文书，上面有两个大字：“婚书”。这位司机吃惊地听妈妈细说原委：妈妈不到二十岁嫁给了一个农民，很快怀孕，但没等孩子出生，丈夫就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走了。妈妈等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文革”过后，听同村的人告诉她，丈夫已经是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而且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又成为军队知名人物。妈妈嘱托儿子，去看看你的爸爸吧！

他带了父母的婚书，找到北京军区。接待人员打量眼前的中年男子，看了他的工作证，不像是冒认官亲的无赖汉，就逐级汇报上去。最后，一位很负责的干部出面同他谈话。双方相当坦诚。他说，我并非为钱而来，因为我工作稳定，生活不愁，我来只是想和父亲见见面。对方表示信任和理解，然后说，你要找的人现在身为党和军队高级干部，老婆孩子也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你们的会面，定会给这个平静的家庭掀起波澜，同时也给党和国家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老实巴交的开车的，怎对付得了中共政工干部！他怏怏而回，母亲死灰复燃的一点火星，此时彻底破灭，不久病逝。死前排尿困难，运输公司两名医生为她排尿，其中一名是笔者的妻子，另一名医生姓包。包医生说，看她排尿器官的外观，像个未曾结过婚的少女……。那个时代，落得这种命运的女人千千万万。这也就是为什么戏剧《秦香莲》常演不衰，陈世美遭人唾骂的潜在缘故吧！

但重组家庭的人总是振振有词地说：那是封建包办婚姻，反抗才是进步。我们要说：你们对糟糠之妻没有个交代，就是不折不扣的重婚罪！

1949前的此类实例，多发生在军级以上干部中。到1949年，自然是师、团、营级干部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在营、团级干部中，确实有初婚的。他们的老少配就更有理由。一名娶了个十六岁女兵的干部，在我面前大发神经地说：我们把青春献给了革命，今天老了，难道就非找寡妇不行！

四、反向抢亲的一个实例

我曾是军队学校的教员，学员都是前来学文化的老干部。我的一位同事，年轻英俊，是乒乓球队和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他打完球就在楼前自来水管前擦身、洗衣，此时就有一位女团级干部帮他涮衣服。女军人能成为团级干部，非同小可。在战场上是不兴走后门的，非智勇双全、神枪在手者莫属。如今春去秋来颜色故，婚姻上自有坎坷。但这位昔日的游击战女英雄，再萌春意，只略施小计，就成功导演了“新编井台会”，同她的男教员结婚了。

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近四十岁的新娘，一身黄呢子军服，两杠一星的中校金色肩章闪闪发光。须知当时军衔有金色和银色两种。金色为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银色为行政、后勤军官，新郎和我一样，是银色的少尉牌牌儿。我们自惭形秽，都穿了便服。新娘没带军帽，发髻上系了紫色绸结，将一把糖抓给我。我在她开朗的笑容面前，顿时感到心尖儿颤动。我，也在游击女英雄面前举手投降啦。

五、阶级路线上的吊诡

到 1955 年授军衔后，少女已被瓜分完毕。我辈男性知识青年也多二十五、六岁了，这才被打开结婚之门。但对知识分子，领导持有一种提防心态，特别强调阶级路线，不能同家庭有问题的女子结婚。我的战友郭东昆在天津北宁公园同学生联欢中，同一名女生有了恋情，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一调查，女方父亲是在“镇反”中镇压的，立即驳回。但男方坚持要结婚，被立即清除出军队。我另一位战友孙道明，曾任华北军区文工团舞蹈队队长，近四十岁认识了张家口一位演员，因她的前夫被关押，结婚申请自然被驳回。他为结婚也选择了离开军队的道路，落户在柴沟堡。

笔者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授军衔后，我不需要等到三十岁了，经过介绍准备和同事的妹妹结婚。她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中校军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坝上（内蒙高原）行医。我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不说明理由，只告诉我：另找吧！我坚持，也准备走郭东昆和孙道明的道路。但因我的业务部门首长顾炎替我说了话，才没有从钢丝上掉下来。

相反的情形是，姐妹二人，父亲是大局易帜前东北的一个省长，结果是妹妹嫁给中共高干，姐姐则在我的同事离开军队后才得以结婚。这正是：一条路线，两个账本！

应该说明，在古代，在今天世界某些角落，抢亲只是一种婚礼习俗，无可厚非。事实上，1949 大抢亲中，和谐相处一生的也非少数。笔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绝无意诋毁他们。但忘记过去，意味着怯懦和欺骗，写出亲历的那一场大戏，对关注历史的人，不是无益的吧！

史海钩沉——共产共妻在苏联的最初尝试与实践_渔樵闲话——刘苏:以革命的名义共产共妻- 中国报道周刊 史海钩沉——共产共妻在苏联的最初尝试与实践

2008-06-23 10:47

长辈们，尤其是见识过苏联红军进驻中国东北的人，都会心惊胆战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年的苏联红军，老辈人称他们为“老毛子”，或者是“大鼻子”，说他们一进来，就个个都跟发了情的公猪，见到女人，就追、就奸，所以凡是暴露在他们视野下的女人，几乎是没有人能够幸免，除非你躲得远远的。因为我老家就在东北，东北的老辈人，不是一个两个提起过这事，所以我对此深信不疑。那时我就想，也许外国人，天性就比较狂野，所以他们表达自己的性欲时本来就是那么肆无忌惮。后来我又在一部小说中，好像是《欧阳海之歌》吧，看到说，在共产党来到某地之前，当地的坏人向穷人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我当然会觉得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坏人的一种宣传，是对我们的一种可笑的诽谤。今天我又在张妮大姐的一篇博文里看到一些内容，大姐的父辈应该是我军的级别不低的干部，大姐本人以生活在那个圈中的亲眼所见，叙述了解放以后，我党的相当一部分高干，抛弃糟糠之妻，而由组织采取拉郎配的形式，为那些高干们重新配备年青貌美的娇妻的故事。把这些事件都联系起来，我明白了苏联红军当年在我国东北，为什么可以那么地肆无忌惮，原来这并不全是他们的天性使然，而是我们所谓的共产主义里面，本身就包含着的一些内容。

本文来源：中国历史网以及史鉴网。

1917 年 11 月 7 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曙光，也迎来了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男人们“共产共妻”的黄金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辉煌一时的前苏联瞬间解体，大量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如今许多媒体都在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给当时的苏联妇女带来的严重的肉体上摧残和心灵的创伤。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

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 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共妻

深入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 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

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一九九零年第十期的俄国《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 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于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于党的这个思想。

1902 年，女革命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庭与共产主义国》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革命将革命者强暴女性合法化

1918 年 3 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

（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有许多资料表明，当时苏联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 1902 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

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这是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

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即俄国内战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十六岁。

二战后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不要结婚的礼仪。克朗黛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广他们的性观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 难有好工作，存在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到处都有，区别在于，俄国从不处理*案。

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联想：私生活规范不明确，以及权力几乎等于性特权的现象，除了社会失序这个导因之外，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也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

其实，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 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十月革命(资料图) 苏联十月革命后荒唐的“共妻”实录 十月革命史料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权利，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在笔者移居俄国后，才了解到共产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的现象。

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共妻

深入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 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 **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

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一九九零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于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

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于党的这个思想。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一九二零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革命将革命者强暴女性合法化

一九一八年叁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一九二零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叁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国内战

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十六岁。

二战后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

笔者还了解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不要结婚的礼仪。克朗黛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广他们的性观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难有好工作，存在

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性骚扰到处都有，区别在于，俄国从不处理性骚扰案。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联想：私生活规范不明确，以及权力几乎等于性特权的现象，除了社会失序这个导因之外，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的老传统，也有内在的联系？

1949年后的中国地下文学 中国 20 世纪的地下文学构成了另一个文学传统，已终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存在。

（一）地下文学的起源和产生背景

严格地讲，一九四九年后仍渐渐出现的中国地下文学主要地呈现为地下的诗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诗歌刊物、地下的诗歌出版物及不断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及朗诵会，诗人，担当了地下文学历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见证。

地下文学最初的发端应该是在六〇年代初，但几乎已难以找到可供考证的文学作品，只留下了当事人——那些青年诗人及作家对悲惨遭遇的回忆。从年龄上，现已流亡美国的贵州诗人黄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长的地下诗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诗中的两句构成了对那一个时代象征般的见证：「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六〇年代初，在北京的两个最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是以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为核心的「X 社」（1962—1963 年），以及另一个地下文学沙龙团体「太阳纵队」（1963—1966 年），它的主要组织者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左翼画家张仃之子）。但是，两个文学团体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此付出了悲惨的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在北京女大学校园，郭世英被反绑着从三楼的窗口中「飞」了出来，肝脑涂地，当即死亡，时年二十六岁。张郎郎、周七月则以「里通外国」罪及「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坐了十年监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许多文学青年秘密地阅读流散到民间的禁书，特别是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形成了地下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区，六〇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悬、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中成都的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最著名的地下诗人是二十岁的北京中学毕业生郭路生（食指），他写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性诗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诗〈相信未来〉曾在成千上万的前往边疆落户的「知识青年」们中传颂一时。而在上海，也有一些地下文学沙龙在活动，如现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陈建华博士，曾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写了大约三十四首象征主义风格的诗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作家高行健为了生存曾焚烧了他早期秘密写作留下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记。政治恐怖对作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七〇年代初，地下写作及地下诗歌的兴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许多地方的地下文艺沙龙和传阅禁书作为它的精神温床，地下诗人依群（齐云）在一九七〇年前后写下了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一百周年为主题的数首政治抒情长诗。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中，三位青年诗人写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从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三年写出了〈三月与末日〉、〈深渊上的桥〉、〈白洋淀〉等八首长诗，芒克（姜世伟）则写出了诗

集《绿色中的绿》，代表作为组诗〈天空〉和〈十月的献诗〉、多多（栗世征）则写下了带有叛逆及强烈见证色彩的诗作，代表作为〈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同时，在北京的青年诗人方含（孙康）、江河（于友泽）、严力、林莽、北岛（赵振开）等许多人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以石默、艾珊为笔名，北岛在文革后期写作的中篇小说《波动》，以类似电影中蒙太奇式的镜头切换，塑造了几位具有小资产情调强烈时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们在如此压抑和暗淡的红色政治恐怖下仍旧闪现的情感光亮和对政治环境的独立思考成为小说的主题，我认为，《波动》是当时地下小说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义色彩和异化情调的文学作品。另外，当时在地下流传的情色小说《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金观涛和刘青峰的思想性书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

所有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学生及下乡落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传抄并广为流传，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呈现，它奠定了地下文学最初的传统，形成和发展出了一种和讴歌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怀疑乃至色情的审美风格和文学表现形式，并为一九七八年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现做好了文学和作者的双重准备。

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九八〇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学资料」，每期约印刷一千册。作为地下文学在北方中国最重要的呈现：它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诗人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北岛的小说集《波动》以及诗人白魔（多多）、顾城、舒婷、杨炼、严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诗作，万之（陈迈平）、王力雄、甘铁生、史铁生（金水）、石涛等人的短篇小说。

（三）八〇年代地下诗歌高潮期

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经过了五年左右地下文学的潜沈期和文化控制的严酷期之后，从一九八五年前后开始，地下诗歌以全国性运动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辐射状展开，构成了围绕北京地区、四川地区和上海地区的三大文学重镇，并形成了地下诗歌的又一高潮，这一时期重要的地下诗人和地下刊物编辑有：北京地区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贝岭、马高明、雪迪等，重要的地下诗歌出版人和编辑老木于一九八五年编辑出版了地下诗歌的完整收集本《新诗潮诗集》上、下册。在上海地区重要的诗人有孟浪、陈东东、陆忆敏、王寅、默默、刘漫流、韩东（南京）、吕德安（福建）等，他们创办了数本地下诗歌刊物、如《海上》（1985—1990年，共出版四期）、《大陆》（1985—1988年，共出版十三期）、《他们》（1985—1997年，共出版九期）等。在四川地区的重要诗人有柏桦、黄翔（贵州省）、翟永明、廖亦武、杨黎、周伦佑、蓝马、欧阳江河、万夏、胡冬、唐亚平（贵州省）等。他们出版有《非非》（1986年）、《中国当代实验诗歌》（1987年）《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7年）等刊物及集刊。

在八〇年代后期，有两份重要的诗歌刊物在北京创刊，一批美学趣味相近的青年诗人陈东东、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倾向》诗刊（1988年），在它的发刊词「倾向的倾向」上写道：「以严肃的态度发现并有所发现。这就是倾向的倾向……是基于诗人的理想主义信

念和知识分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现在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上。」由北京诗人芒克、杨炼、林莽、多多、雪迪及诗评专家唐晓渡等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创办的诗刊《幸存者》（1988年）。这些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随即便会被各地的公安局以出版非法刊物的名义勒令停刊。

八〇年代末的一个重要地下文学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学杂志在刚刚从欧洲居留归来的原主编北岛主持下，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创刊十周年，停刊八周年之际），在北京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予了诗人多多，授奖词说：「自七〇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许多同时代的诗人。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时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今天》为此特别地下出版了油印本的多多诗选《里程——1972--1988》，并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举行由几十位诗人及文化界人士参加的授奖仪式。

1989年后，《新诗潮诗集》主编，也是《倾向》诗刊创办人之一的老木去了法国；诗人江河、贝岭去了美国；诗人多多飞往英国；杨炼、顾城滞留新西兰；诗人北岛去了欧洲等，这些诗人和已在法国的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以及作家苏晓康、郑义、苏炜、张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万之、杨小滨、赵毅衡、孔捷生、石涛、宋琳、张真、张亮、张枣、虹影、刘再复、胡冬、马建、严歌苓、严力、阿城等人，成为日后成形的海外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

（四）九〇年代的地下文学刊物与作家群

从一九九〇年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文学刊物再度出现，并形成更为专业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动。在更多的地区，而不仅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从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〇年十年中，先后已有逾一百种不同的地下文学刊物、集刊及书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仅限于诗歌刊物，还包括小说刊物、摄影专辑、现代音乐刊物、艺术刊物等，在文学领域，已形成和国家的文学刊物及只在官方的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抗衡的地下文学刊物及地下作家群。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学刊物影响了许多地下作家，一九九〇年，上海的小说家南方创办了一份在三年内仅出版了两期的以小说为主的地下文学刊物《异乡人》，《异乡人》上的小说在风格上更为独特，完全迥异于官方主流文学刊物上的小说，从一开始便确定了自身的小说美学，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地下文学刊物中甚少出现小说的空白。

由三十多位中国各地的诗人共同担任名义编委的地下诗刊《现代汉诗》，在芒克、唐晓渡、孟浪、默默主持下，于一九九一年春在北京创刊，前后共出版了九期。《现代汉诗》曾颁发独立的诗歌奖「现代汉诗奖」，此奖获奖人为孟浪（1992年）和西川（1994年），这份刊物每期印刷二百五十册，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诗人中流传，后来由于孟浪，默默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九六年停刊。

一九九七年四月，由四川诗人廖亦武和蒋浩等人创办了极富人文色彩的文学刊物《知识分子》，刊发小说、诗歌及思想性论文，占相当篇幅的译文全部转载自在海外出版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重点发表了异议知识分子作家哈维尔的许多文章，以及纳粹反犹大屠杀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埃利·维塞尔的散文等，它的思想性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下文学刊物，此刊物只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约印刷两百本，随后

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流亡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在由美国布朗大学主办的以「写作与自由」为主题的国际作家会议上，将首届倾向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上海的地下作家王一梁，并由贝岭代表《倾向》宣布了授奖理由：「十多年来，王一梁以罕有的坚持与努力，写下了相当数量的与我们所处的残酷时代息息相关的文学与文化批评作品，作为一个从美学趣味到文学理念均回异于中国大陆主流文化的个人作家，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地下文学的传统，彰显了写作自由与独立思考的价值力量。」王一梁无法前来参加此一会议及授奖仪式，包括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美国小说家罗伯特·库佛及布朗大学校长格里高里及国际笔会写作自由委员会主任及五百多位布朗大学学生参加了这一授奖仪式。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首届「刘丽安诗奖」在北京颁奖，此奖项是由华裔美国公民、文学赞助人刘丽安女士为赞助有才华的中国诗人设立的，评委由五位中国诗人黄灿然、陈东东、萧开愚、藏棣、吕德安组成。每年选出十位获奖者，每人给予一万人民币的「扶贫」奖励，并编选地下出版的获奖诗人诗选，此项文学奖的颁奖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开始改为「安高诗歌奖」，获奖者包括了多多、张枣等四十多位诗人。

一九九九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诗人群的论战和对峙是地下诗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由于现代诗歌在文化领域日益边缘化，构成了地下诗人群体性的焦虑和对知名度的强烈敏感，由一九八八年创刊的《倾向》诗刊及《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前后提出并予以阐释的「知识分子精神」后来被异化为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唐晓渡、张曙光、程光炜强调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伊沙、沉浩波、杨克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群体之间在诗歌作为事件、文学的功能、诗歌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诗在这一时代中的角色及话语权力的争论，随后演化为谁在通过写诗和论说获取名利的相互攻击性质的、颇为情绪化的笔战。一九九八年由诗人中岛创办的《诗参考》杂志详细收集了以上争论中发表的文章及背景资料。

一九九六年创刊的综合性地下艺术刊物《文化与道德》是由在广州的艺术家苟红冰、赵大勇及在上海的地下作家阿钟创办并出版的地下刊物，但每一期的出版周期都颇长，迄今已出版了四期、最新的一期出版于二〇〇〇年十月。这份刊物的设计和美学趣味受到了海外《倾向》杂志的启发，集中刊发国内地下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和现代艺术评论。

纵观中国的地下文学，可以这样讲，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是地下出身，并始终游离于官方主流文学刊物之外。中国大陆的现代诗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地下诗歌发展史。而在小说等文学领域，地下文学则相对较为薄弱，中国大陆的小说家几乎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协、在官方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寻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来呈现其水准和成就。在这里，我要谈到一个几乎是唯一的特例，小说家康赫，他刚刚完成了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斯巴达，一个南方生活的样版》，带有《尤利西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依斯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式的恢宏，甚至艰涩，在文体上充满创新，并呈现了个人风格，它向世人展现了粗俗的资本主义商业性变化中，中国南方沉沦扭曲的现实画面。他的小说从未获准在官方的文学杂志上刊发，也不被认可，可他无疑将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他是地下文学传统中的一员，他作品的价值终会被后人认识到。

九〇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商业化，许多地下诗人进入经商领域，同时，官方出版

社面对市场化的压力，为了赚钱竟然出售国际书号（ISBN），使地下文学开始了地上化的势头，许多原来无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诗集、回忆录、文选，通过买书号及书商和二渠道的发行，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些由地下诗人或作家编辑，在官方出版社买了书号自费出版发行的书籍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地下文学出版物的内容但弱化了精神形式，值得研究的是，这种地下文学地上化现象有别于前苏联及东欧地下文学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大陆特殊的出版审查制度下的新特点和新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本书籍有，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地下诗人、个体书商万夏、潇潇主编并出资买书号分为上、下卷，厚达一千多页的《后朦胧诗全集》。由地下诗人廖亦武编选，以买书号及书商出资印刷，系统介绍七〇年代地下诗歌历史的回忆录《沉沦的圣殿》（199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许多地下诗人也通过买书号，自费出版诗集。

地下文学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景观，地下文学随着出版体制的商业化，特别是由于网络文学与网上文学刊物的兴起，彼此已互为渗透，地下文学的内在精神、独立的价值尺度和美学趣味仍然将不断地面对专制制度和商业社会的多重挑战，它的未来正在变化之中，但它已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历史中独特的一个部份。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将密切关注它的发展。毛泽东治下 雷人的延安生活 如何共产“美女”——读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7-1947》

兄妹开荒

说起延安，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宝塔山、蜿蜒的延河、陕北小调、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和一大群坐着纺线和织毛衣的大老爷们。但这不是真正雷人的革命延安生活。

一 财政

这个时期延安政府的财政来源大部分是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经费中的一部分。1939年，全边区年收入是880万元，其中790万来自国民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给钱了，这才有了大生产运动。难怪历史上一提“皖南事变”就气愤，敢情是不给钱！还说不给就不过，搞得一帮大老爷们忙着纺线，至于“皖南事变”国民党害死的人，那是小数目，远不如咱自己整死得多。

二 时间

延安最初没有钟表，更缺少时间观念。重要活动用焚香算时间。开会和集会什么更没有一个准时间，来早的就唱歌打发时间。有时两小时的一个会要等上两小时才能等到。等会正式开始时，与会者早等累了。闹钟很珍贵，手表更稀罕，于是大家做沙漏，最后索性复古做日晷。

三 爱情

星期六晚上，女的提议：“我们上城头看月亮去吧！”“月亮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在家里吃花生”男的回答。这是一对延安革命夫妇的雷人生活对白。

为解决抗大校长林彪同志的婚姻问题，一抗大女生未经任何提示就被带到林彪面前。林彪开口就问：“我们结婚吧？”女生傻眼，缓过劲后哭着跑出门，还边喊“我不干、不干！”能这样大叫着跑掉还算是幸运。悲惨的是那些跑不掉而死于非命的和被迫屈服的女生。女生刘茜因拒绝红军干部黄克功的求爱而被枪杀在延河边。因组织出面，一个女生不得不接受了一桩革命婚姻，怀孕5个月时，她被遗弃。他说“MD....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这次组织没再出面。

很可悲的是，来到延安的热血女青年，成为了干部们的“福利”。延安时期有舞会，师级以上军官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在这个时期解决了婚姻问题。毛与延安名美女翻译吴光伟谈诗歌和爱情观。朱德与史沫特莱很小资的跳舞。麻烦的是，延安不仅有男老革命，也有女老革命。党爱情疑似泛滥，女老革命会奋起反击保护革命成果。于是，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丁玲有感于延安妇女的生活状况写了《三八节有感》。文章没有引起对女性权力的重视，倒让丁玲倒足了霉。

四 狼和虱子的命运

延安狼很多，虱子更多。狼偶尔伤人。有枪有子弹打狼很容易。于是，狼成了敌人的“代表”而被杀死。

虱子天天在人身上爬，还会传染疾病。可延安生活和卫生条件差，虱子怎么也弄不掉。虱子于是被很阿Q地被称为“革命虫”、“抗日虫”用来检验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打成一片的程度。

五 整人和上当

国民党不给钱了，延安就急需开发劳动力资源。延安有很多二流子。为把二流子改造成劳动力，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1.制定每村二流子的比例和二流子的程度，分成：二流子、半二流子和“民选二流子”（相对于“民选二流子”，“二流子”实为“官定二流子”）。

2.召开大会深入揭批二流子，领导发言，群众跟进，大家一起骂。

3：二流子自我批评和表示悔过，找出担保人，并制定工作计划。

4.二流子在群众监督下工作和生活。

与此同时，ZF用社会舆论，甚至主旋律秧歌来营造气氛，如信天游版的《笑话二流子》和《二流子英雄》。《兄妹开荒》也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的。二流子运动的工作流程是我D非常经典的“运动”流程。

整风运动开始。美女李凝被认为是特务的理由是“你长的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显然在延安干部眼中，美色是当特务的首要条件。换句话说，干部们最容易被美色诱惑。为让更多人承认是特务，谁认特务就有面吃。有人感觉面的味道好，还想认第二回。随着整风

运动的深入，恐怖和死亡开始蔓延。王实味被砍头，陈毅妻子冤死，李锐妻子被趁虚而入到组织 都拦不住。运动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鞠躬道歉结束，害人和杀人者都不再担心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我实很困惑，那些人怎么不还品种么还会相信组织？经历过延安山寨革命，亲眼见识了整人运动，那些革命者怎么没反思事情发生的根源，没想过通过完善 XXXXXX 来阻止惨剧重演。相反，他们选择了每当必上，于是又有了后来的反右、文革。整完人鞠躬就能拉倒吗？如果我去银行抢笔巨款，打了保安后向银行鞠躬，银行肯定不会买账放我离开的。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07 月

鲜为人知：延安的福尔摩斯的悲惨下场 ——延安的福尔摩斯/倪匡 忽然有此感叹，是想到了当年，49 年中共建政初期，任职广东省公安厅长的陈泊。陈泊厅长长期担任公安工作，在延安时期，因为逢案必破，声名大噪，被毛主席御封为“延安的福尔摩斯”。这封号虽然有些不伦不类，倒也可表示他办案能力之强。在广东省公安厅任上，据称也功绩彪炳。然而，不知怎地，远在北京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他过不去，将他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妻子吕璜和两个孩子，以及一直跟陈泊工作的副手陈坤一家（妻子高华和三个小孩。都是整家逮捕，恐怖绝伦。）

两陈被控的罪名，包括“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丧失革命立场”种种。受军法审判，陈泊被判十年徒刑，陈坤八年。判时，陈坤已死，当然不知是怎么死的了。陈泊案牵连被捕的广东公安厅官员超过七百人。

1961 年陈泊刑满，并没有恢复自由，仍被禁于劳改农场，1972 年，死在劳改农场。1982 年，陈泊平反了，追悼大会上颂辞动人。

罗瑞卿为什么一定要整陈泊，无人能知，更怪在陈泊被整时，完全没人替他说一句公道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和恐怖，想像力再好，都难以想像。

找出陈年旧事来说，是想提醒当下努力卖身投靠的一些懵佬：这共营的差，是难当得很的啊！

果然，后来罗瑞卿贵为大将，一样也被整了，是天理循环吗？

延安红色“福尔摩斯”屈死狱中（图）<http://www.chengxin110.com/yjb> 发表时间：2009-06-16 01:19:51 来源：金鹰报 我要评论 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

延安红色“福尔摩斯”屈死狱中

陈泊

他是延安潜伏特务们的克星；他识破了假旅长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他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是，这位 16 岁就投身革命，在其后 47 年的人生当中，竟然在敌人和自己人的监狱里度过了 24 个春秋的谍报高手，最后却冤死狱中。这是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

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毛泽东的 61 座行宫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那些行宫，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邓小平 1980 年 8 月 18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曾说：“1958 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彭德怀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

别墅，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一进城就选择了帝王的住所中南海。从 58 年开始，各省市为毛造行宫，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河南郑州的省委第三招待所修建于 60 年，在远离市区的黄河附近。当时正值河南省内饿殍遍野，但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这个宫殿群永远将铭刻在这些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墓碑上。这个行宫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毛别墅最为宽大考究。毛的卧室里专门修了一条秘密地道，用以毛遭遇万一情况时逃跑。当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如今已经改为达官显贵下榻的黄河迎宾馆，或许将其改为纪念无数河南饿死鬼的大跃进纪念馆更为合适。

414 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 1133 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 1960 年 9 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100 多人常年为它服务。20 年间，毛泽东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 100 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泽东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 1959 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泽东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芦林一号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 5 倍，而美庐也归毛泽东使用。济南南郊宾馆建于 60 年代初，占地面积 1160 亩，建筑面积 115800 平方米，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金华西郊一片树林里，有幢 500 多平方米的 601 别墅建于 1961 年。主房子设有一处地下指挥部，入口处设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型铁路站台，并铺设了投资 36.2 万元的 601 铁路专线，火车可直达毛的行宫后门。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绝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

在饿殍遍野的 1960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 203 工程。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工到 1962 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 3638.62 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在此期间，全国有四千多万人死于大饥荒，创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死亡记录。

与滴水洞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岭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 601 别墅、上海西郊宾馆等 61 处奢华行宫，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从 1962 年竣工到 80 年代末期开放，毛泽东仅于 1966 年 6 月 18 日至 28 日在此居住过 11 天，真是一日千万金。1986 年滴水洞终于水滴石穿，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芦林一号

梅岭一号

滴水洞别墅

杭州刘庄别墅

广州松园一号

毛泽东大败蒋介石的诀窍 震惊?! ——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点击查看大图](#)

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 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借苏的力量，谈何容易，代价是什么？）”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注：本节来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

毛泽东：“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

1964 年 7 月 10 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 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

面一段对话

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 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 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 谢谢。

毛 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注：本节来源：《田中角荣传》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533 至 534 页

毛泽东提出的最神圣口号 竟是从蒋介石那抄来的——“为人民服务”竟是蒋介石首先提出的 “为人民服务”竟是蒋介石首先提出的

“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几十年来没有比这更让人熟悉的了，也没有比这更神圣的了。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公权力机构，都堂而皇之地大写着，镌刻着这五个大字。它几乎成为全体公职人员的座右铭。

那么“为人民服务”一词在中国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呢？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说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并指出最早公开发表此词语的是 1944 年，在悼念张思德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演讲，于是他的“为人民服务”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流传。但是这一说法有人在网上提出异议。认为文选中最早公开报道 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应是在 1953 年。（见附录《是谁最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

现在网上又有文章说 1939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提到了“为人民服务”。但此信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并不为人所知。即使就按这样算，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最早是 1939 年。

那么中国在 1939 年以前就真的无人说过“为人民服务”吗？

最近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教授披露的珍贵史实。

“为人民服务”是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比蒋介石晚了几年。

据《潇湘 晨报》副刊《湖湘江地理》第 031 期（2010.06.29 星期二出版）报导：2010 年 6 月 21 日受晨报大讲堂之邀，做客长沙的杨天石，与湖湘地理记者，谈论蒋介石与山的情缘。标题为“历史学家杨天石讲述：蒋介石的大山地理”一文所披露的珍贵史实：“上世纪 30 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目的是培养剿共干部，他在《暑期训练精神要旨》中提到‘为人民报务’——‘国民党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毛泽东提到‘为人民服务’是 40 年代”。

关于国民党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单纯指 1933 年 7~9 月中国国

国民党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广义的则除了1933年军官训练团外，还包括1934年到1937年，在庐山举行的各期军训团。1934年蒋介石决定在庐山海会寺继续举办训练团，并正式命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庐山军训团继续举办了两届。因为都在暑期举行，故又名“庐山暑期训练团”。其中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开办综合性的“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特别是华北事变，打破了蒋介石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抗日，成为全国人民无法回避的现实主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该年开办了二期训练团，其任务是为抗日军队培训军官，学员也多来自各抗日军队。7月1日，第一期开学。第二期仍于7月26日开学，8月下旬毕业后，因77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各学员归队，马上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此后国民党再未在庐山举办过军训团。由此可见，蒋介石说“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在1933年到1937年之间，最迟不会超过1937年8月。而且是公开发表的，而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最早是1939年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到的，而且此信并未公开发表，就是这样来比较，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也比蒋介石晚了2年时间。由此可见中国首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是拾蒋介石的牙慧，是抄袭蒋介石的。

蒋介石提出“为人民服务”后，国民党的报刊就此曾广泛报道和宣传过。并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宣传实施过。如国民党主政西北的高干胡宗南在攻下延安后曾在延安城设立“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等。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

（附录）是谁最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

世界上最先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在葛底斯堡前线宣称“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亡”。

林肯的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为孙中山所接受，成为旧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

思德死了以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现场演说只字未提到为人民服务，延安新华日报即时发表了这篇现场演说，也只字未提到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经多次转载，每次转载均只字未提到为人民服务。最初见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样的是53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直到那时才将纪念张思德这篇演说的题目定为《为人民服务》，至此毛执政4年之久，红宝书中终于出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字样。

苏联红军为什么愿意出兵东北？冠冕堂皇的背后 作者：信力建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忽然袭击。对苏军的这次行动，我们一般认为是苏联在尽国际主义义务，是在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东北。客观上看，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苏联出兵的动机和企图，就会觉得这种说法未免简单——甚至不乏一相情愿的因素。就苏联出兵东北的主观意图而言，起码有下面三条。

首先，是对过去日俄战争失败的报复。1904年2月8日，日军向旅顺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10日，日俄正式宣战。经过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沙俄军队战败向北败退。日俄战争历时19个月，俄军参战兵力约120万人；日军参战兵力为110万。战争中，俄军伤亡、被俘约27万人，损失舰船98艘，军费支出20亿卢布。日军伤亡、被俘21万，损失舰船91艘，军费支出17.2亿日元。1905年8月9日，日、俄两国代表开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和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于1905年9月5日，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和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国“承

认日本于韩国(朝鲜)之政事、军事、经济上均有特别之利益”，俄国不得阻碍干涉日本“对于韩国行指导保护及监理之必要处置”。和约还规定，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移交给日本政府，包括租界地内一切公共建筑及财产；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和一切支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等等都移交给日本，还要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包括附近一切岛屿及其公共建筑和财产)的主权永远交给日本。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

也就是出于这个报复心态，苏联在出兵东北后，将近60万日军俘虏尽数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其中十分之一死在西伯利亚。

其二，是为了攫取苏联在华——尤其是在东北——利益。当时美国为了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离东北最近的美军还在千里之外的冲绳地区)，同时不愿意看到陆战造成大量美国士兵伤亡，希望苏联能帮助消灭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日军加伪军大约有150万)，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对国民政府施压，允许外蒙古独立和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力。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聚集于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秘密会谈时，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10日，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达成正式文本。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但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了字。

当年沙皇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位英国人曾这样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合理的愿望。……拥有一个不冻港就意味着，这条铁路直达那个港口穿过的那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俄国的了。”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这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丘吉尔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雅尔塔会议使斯大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

苏联。

雅尔塔会议距今已经 60 年，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那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向莫洛托夫描绘苏联的边界线：“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其三，是出于对东北丰富物产的垂涎三尺。当时的伪满洲国乃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就工业而言，到 1945 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6.9% 增加到 59.3%，而中国 2003 年才达到 57.5%。1938 年，伪满洲国共发电 16.3 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 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 22 亿度，而到了 1949 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 43 亿度。1943 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 49.4% 的煤，87.7% 的生铁，93% 的钢材，93.3% 的电，69% 的硫酸，60% 的苏打灰，66% 的水泥，95% 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 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 85%，台湾占 10%，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 5%。因此，苏联人很想对东北这块肥肉吃上一口——事实上，他也吃上了一口：根据 1946 年国民政府有关考查团调查，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 8.58 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的部份，约达 20 亿美元。工厂、矿山设备被拆卸了，运走了。有的是整座工厂、整座矿山的拆卸、运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据日本产经新闻出版的《蒋总统秘录》称：“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拆运而走，此外，鞍山、宫原(即本溪)、本溪(今本溪湖)等钢铁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美国国务院一份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8 月 28 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满洲币 7 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 75 亿元，黄金 36 公斤，白金 31 公斤，白银 66 公斤，钻石 3705 克拉。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都要。有的老人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东北重工业基地成了空壳子。

前苏联“永不开启”的密件骇人听闻——卡廷惨案 波兰摆不脱的梦魇

卡廷森林万人墓中被苏军杀害的万名波兰战俘的累累尸骨（资料图片）

2005 年，莱赫卡钦斯基在公寓中和他最喜欢的猫在一起 CFP 供图

2005 年 10 月 9 日，波兰华沙，时任华沙市长、法律与公正党总统候选人卡钦斯基抱着孙女参加总统大选投票

卡钦斯基兄弟出演《偷月亮的人》成波兰童星

1988 年，莱赫卡钦斯基（右）和哥哥参加集会 人民图片供图

2006年7月10日，哥哥(右)从孪生弟弟手中接过总理职务的任命书

70年前，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被集体杀害；70年后，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率大批政府要员前去俄罗斯出席“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坠机身亡。

俄罗斯卡廷，已经注定成为波兰人不能摆脱的梦魇。

2.2 万人被杀前苏联曾嫁祸于纳粹

“卡廷惨案”又被称为“卡廷森林大屠杀”。1940年春，前苏联政府将关押在科泽尔斯克战俘营的波兰军民押往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廷，在森林中分三批进行枪决，据称遇害者达到2.2万人。

根据英国独立报后来的报道，此次屠杀行动由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亲自下令，由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实施，共有21587名波兰陆军后备役军人在屠杀中丧生，前苏联当局指称这些军人与苏联政府顽固对抗。

1941年德军占领卡廷，随后1943年德方揭发了这一惨案，使前苏联与当时位于英国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关系恶化。但前苏联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这一屠杀行为，并将责任转嫁于纳粹德国。

二战结束后，苏联一直未承认卡廷事件由其造成，并拒绝解密相关文件。因此，卡廷事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难解的历史谜团，成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历史空白”。

看到屠杀档案波兰总统“全身颤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也包括前苏联和波兰的关系。1987年，在前苏联的倡议下成立了苏波历史研究会，以消除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但是，就卡廷事件的调查一直没有出现进展，直到90年代。

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戈尔巴乔夫承认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秘密档案第一卷解密面世，真相得以被披露，令波兰举国震惊。当天在华沙举行的文件转交仪式上，俄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国家档案馆馆长皮霍亚将档案副本递交时任波兰总统瓦文萨。据称瓦文萨当时“全身颤抖”。

真相大白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曾两次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此后，这一事件又被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伊达搬上银幕，拍成电影《卡廷惨案》，这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惨案的真相。2007年，波兰众议院决定每年4月13日为“卡廷惨案”遇难者纪念日。

关于卡廷大屠杀 卡钦斯基和普京的“最后对话”

2009年

卡钦斯基：卡廷事件需要我们的反思

俄罗斯拒绝宣布卡廷森林惨案为战争犯罪，这一直激怒着波兰。苏联档案中关于卡廷森林惨案的文件仍然保持机密。很多俄罗斯人仍然相信是德国纳粹制造了卡廷森林惨案。波兰对于历史上这个强大邻国的不断压制以及二战中苏联的做法耿耿于怀，并且一直想讨个说法。

去年在二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上，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说：“卡廷事件需要我们的反思，但是在反思中需要的不只是认识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认识事件的原因。”

普京：卡廷悲剧“不道德”

俄罗斯则主张放下历史的负担，共同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去年，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的主流媒体《选举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历史是互相讨伐的理由还是 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直面俄波两国历史上的争议事件，力图从“二战盟友关系”出发修复双边关系。普京写道：“过去的阴影绝不能笼罩目前的俄波

关系，更不能笼罩未来的双边关系。”

普京讲述自己对卡廷悲剧的认识时，称其“不道德”。俄罗斯人民“完全理解波兰人民对于卡廷森林惨案问题的敏感……我们一定会牢记这个罪行的受害者”。

苏联一手制造的卡廷大屠杀始末（史东） 最近波兰总统和夫人、以及波兰国家政府与军队首脑，因飞机失事，在俄国西部斯摩棱斯克附近遇难。历史的悲剧性巧合在于正好在飞机失事地点附近的一个俄国村庄，在整整 70 年前，一桩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斯大林亲自批准下，由苏联秘密警察执行，惨无人道地残杀了 2 万 2 千名波兰的军官和社会精英人士，这桩巨大的历史悲剧叫做卡廷森林大屠杀。

卡廷是一个村庄，离斯摩棱斯克只有 20 公里远。1939 年 9 月 1 号，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之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和希特勒沆瀣一气，签定了友好条约，成为盟国。而希特勒从西部入侵波兰 的时候，斯大林趁火打劫，命令苏联红军从东面入侵波兰，不但占领了大片土地，并有大约 30 万波兰人沦为苏联战俘。

针对如此之多的战俘，斯大林感到很头痛。他命令苏联红军将大部分战俘缴械之后，放回波兰。但是将大约 12 万剩下的战俘交给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管理。贝利亚是一个杀人魔王，他将这些波兰的战俘登记审查之后，把好几万波兰战俘中的所有军官、以及被俘的所有预备役军官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分别关进包括卡廷在内的几个集中营里面。于 1940 年初，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将这一批波兰的军政精英人士全部枪杀。

1940 年 3 月 5 号，斯大林和其他三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和米高杨，在屠杀令上正式签字，决定让贝利亚秘密处决 25,700 名波兰战俘中的所谓民族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一个月之后，从 1940 年 4 月 3 号开始，贝利亚下令在卡廷等战俘营中，每天晚上处决大批波兰战俘军官，遭到屠杀的人数共达 21857 人。仅在卡廷一个地方被屠杀的就包括 1 名波兰海军上将、2 名陆军上将、24 名上校、79 名中校、258 名少校、654 名上尉、17 名海军少校、3420 名军士、20 名大学教授、300 名医生、以及好几百名波兰律师、工 程师、作家和记者。

枪杀的过程是一个一个地进行的。先由苏联特工将受害者验明身份、然后将其带上手铐、引到一个封闭的房间，从脑袋后面用手枪射杀。枪毙之后将尸体从后门拖进在外面等待的卡车，装满之后开到万人坑，将尸体集体掩埋。

为了让活着的人产生错觉，整个屠杀过程在夜间进行，并在机房将所有的机器开到最大的噪音程度来淹没枪声。唯一没有杀人的一个晚上，是 1940 年五一劳动节那一天。卡廷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瞒天过海、声称这大批波兰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

但是 1941 年 6 月 22 号，希特勒突然翻脸不认人、向盟友 苏联发起了突然袭击，占领了包括卡廷在内的苏联大片土地。1943 年 4 月，德国占领军发现了卡廷的万人坑，将这一罪行进行大肆宣传，希望在苏联和盟国之间制造矛盾。为了不得罪战时的盟友苏联，邱吉尔和罗斯福用尽各种手段，封杀卡廷大屠杀的所有报道。

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认真调查。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以无可辩驳的证据确认了苏联犯下的卡廷罪行。可是苏联政府一直坚持否认，直到 1990 年，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才正式承

认苏联确实是卡廷大屠杀的祸首，并公布了斯大林亲自签署的大屠杀手令。整整 20 年以前、也就是 1990 年 4 月 13 号，莫斯科正式向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表示深刻的道歉，并表示苏联秘密警察对这一大屠杀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

老东北人回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阴谋与暴行 日本这个强悍的大和民族，国土小，资源少，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觊觎着中国的土地和财富。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大规模开采东北的煤、铁等矿产，掠夺粮食、棉花、大豆等农产品，然后开设工厂，利用中国的劳工生产大量飞机坦克、枪炮子弹等各种军需品和民用产品。有些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有些则偷运回日本(例如，把铁矿石运回本国炼钢，用不完的煤则倾倒在海湾里使海湾变成一座露天煤矿，留作以后用)。他们将这些生产资料和成品，囤积在沈阳铁西区以西的仓库里。当年，铁西以西有十公里路长、由数百座仓库组成的仓库群，储存着难以计数的军用、民用物资，成为日本侵略军最大的供需补给基地。那里重兵把守，岗哨林立，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座仓库，也不知道储存了多少物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仓库群里储藏的巨大财富，理应归还中国，等待国民政府来接收。但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来不及到东北接收。这批不明品种、不知数量的巨额财富，被近在咫尺的“老毛子”用阴谋手段悉数抢劫了。

事情的经过是：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借势对日宣战。早已集结在中国边境的四十万红军，兵分四路，以闪电般的速度抢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由北朝南向中国挺进。苏联红军只打了四天仗，便将关东军全部缴械，并抢占了哈尔滨、新京（长春）、沈阳、大连等四座大城市和整个东北铁路网。

“老毛子”（因为俄罗斯人胸毛、腿毛又长又浓密，东三省的老百姓都这样称呼他们）发现这样一座庞大的仓库群，喜不自胜，急于想把这些巨额财富运到苏联去。但是，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抢运，担心国际舆论和中国政府追究。于是，老谋深算的“老毛子”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日本投降后，绝大多数日本军人被“老毛子”抓到西北利亚，关押在劳改营，这个仓库群暂时失去了看守者。日本兵投降前，把每座仓库的大门用大型铁锁，结结实实地锁起来。“老毛子”们使用斧头劈开铁锁，将一些民用品仓库的大门打开。他们以为，中国老百姓看到大门洞开，发现仓库里有大量的布匹、衣物、棉被和其它日用品，一定会进去偷抢……哪里知道中国老百姓生性老实，被日本人杀害、欺压怕了，谁也不敢到“皇军的仓库里”偷东西。所以，大门洞开后好几天，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老毛子”们着急了，这样拖下去怎么行呢？他们就是希望中国人去偷抢这批物资啊！看到老百姓不上钩，于是，“老毛子”们便将仓库里的民用品，装满一卡车一卡车，趁夜晚开进中国的村庄，将这些物资“送给”村民。许多村民不敢开门接受，他们便将东西堆在老百姓家门前，并通过翻译喊话：乡亲们，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你们去拿就行了，明天将打开更多的仓库……

通过这样“发动群众”，第二天一实际是哄抢开始的第一天，便有许多胆大的村民跑到打开

的仓库去看，果然，仓库里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没人管……几个不怕死的流氓、地痞，平日里偷扒抢劫搞惯了，便趁机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带头冲进去，抱的抱，背的背，抱了背了往家里跑……“老毛子”们站在路边看，都哈哈笑着，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赫拉所（俄语“好”的音译），赫拉所……”

那时候，老百姓头脑简单，哪里知道是“老毛子”的诡计？只要有人带了头，许多人便跟着跑进仓库。眼见胆大的人，平白无故得了那么多财物，于是胆小的人也不甘落后，大家蜂拥而上，开始哄抢仓库里的物资。

“快去‘捡洋捞’啊！”

“快去‘发洋财’呀！”

人们纷纷喊着，叫着，笑着，兴奋地肩挑手提，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跑着，往家里运送“洋捞”……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由近至远，去仓库哄抢物资的人，越来越多。

到哄抢的第二天，大批大批村民，成群结队，跑到仓库去拿东西。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拿白不拿。更有一些村民，套上牲口，赶着大车前去抢运物资……打开大门的几个仓库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黑压压的一片。人们兴高采烈，兴奋至极，人山人海，挤挤攘攘，比“赶场”还热闹！

这时，老毛子们眉开眼笑了。这种人山人海的哄抢场面，正是他们非常想见到的。于是，“老毛子”士兵，一队队站在路旁，纷纷拍手欢呼，称赞中国人：

“干得好，赫拉所！”

“多拿点，赫拉所！”

据到过现场村民后来说，一些苏联军人，拿着闪光照相机，笑咪咪地不断拍照；还有人说，看到“老毛子”在拍电影……

这时，不仅附近的村民，就是几十里路以外的各县农民，包括许多城市人，都被“发动”了。大批大批的人马，络绎不绝向仓库群进发……但是由于乱糟糟的，大家拼命往前挤，都被仓库大门卡住了。进了仓库拿了东西的，出不了门；大门外的，无法挤进去，大家都挤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卡在那里，动弹不得……因此，哄抢的“效率”极不高。只有一些力气大的年轻人抢了些许东西，大多数人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哄抢了两天，许多大门洞开的仓库，还只搬动一个角落……这，也许在“老毛子”们的算计之内。

到哄抢的第三天，一大早，数以万计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向仓库群进发。哪里知道，当大批人马蜂拥而至时，从乱糟糟的队伍前头传话过来：“已经戒严了！不准拿东西了。”

“老毛子”们在仓库前划了警戒线。一个牛高马大、满脸横肉的“老毛子”军官，瞪着眼睛，凶相毕露，站在警戒线内，呜哩哇啦直叫唤。通过翻译，前面的人听到：

“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任何人抢东西了！谁敢越过警戒线，格杀勿论！”

跑在前面的人，看见一队队的“老毛子”士兵，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当然停住脚步，不敢越过警戒线。但是，后面的人群，根本没看见，没听见，像潮水般的继续往前涌。于是，

前面的人站不住，被推挤着，越过了警戒线……

“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

一霎时，机关枪、转轮枪，响成一片，“老毛子”们对准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了。跑在前面的村民，纷纷中弹倒了下去，血流成河……

“不好了，打死人啦！”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

后面的人，见大势不妙，像倒柴一样，纷纷往后退。喊爹叫娘的，喊救命的，受伤后“哎哟、哎哟”哭叫的，乱成一片……

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平时总是告诫我们：“不义之财，苟非我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是绝对不允许哥哥和我去仓库拿东西的，我和哥哥也没有这样的念头。不过，当时我是个九岁的孩子，虽然不想往家里拿东西，但是爱看热闹。到哄抢的第三天，邻居一位大哥搀掇我去仓库看热闹，我便瞒着父亲，偷偷跟他上路了。

我们离仓库还很远，便听到“嗒嗒嗒嗒……”的机关枪像“连珠炮”一样响着，足足响了十来分钟，很吓人。机关枪响后不久，便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村民往回跑，人们的脸吓得惨白，纷纷往回逃命。一些人边跑边喊：“不得了，杀人了，杀人了！”一位村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告诉我们：“‘老毛子’……开枪，打死了……几百人！”

接着，我们便看见扶着的、抬着的、用大车拉着的受伤的村民，回村里去。有的人打断了腿，有的人打伤了胳膊，鲜血纷纷往下流。还有打中了胸、腹部的人，被乡亲们抬着，闭着眼睛像死去一样，衣服和盖着的被单被鲜血染得通红……

打死一些中国人，把其余的吓回去后，“老毛子”们便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项是：把所有的仓库门砸开，用部队的卡车，一卡车一卡车地抢运物资。往北开的，送上火车，一火车一火车往苏联境内拉；往南的，运到海港，装上大型海轮，一海轮一海轮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贵重物资，便装上飞机……他们使用“海陆空”，不分昼夜，开足马力，疯狂地抢运物资，整整抢运了两个多月，把仓库里储存的物资抢得精光。

第二项是：把拍到中国村民哄抢物资的照片，送给正在搬迁回南京的中国政府，用这些照片作为“铁证”：日本人的剩余物资都被你们中国农民抢光了，我们苏联军人无法制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照片寄给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莫斯科的《真理报》和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中国村民哄抢日军剩余物资的“图文并茂”的新闻……

在做这两项工作的同时，“老毛子”们将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里的所有机器设备，只要能够拆卸的，通通拆下来，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落，抢运回苏联。只剩下一些笨重的、无法拆卸的高炉、炼钢炉……这就是鞍山钢铁公司的前身。

自1931年始，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14年多，成建制的千百座工厂、成套成套的工业设备，都被“老毛子”抢劫一空……

抢了这么多财富，“老毛子”们还不满足，他们的目光又盯住富裕的农民。开着卡车，端着

当年先进的转盘枪，到村民家门前，一脚把大门踹开，见马牵马，见牛牵牛，赶猪赶羊，捉鸡捉鸭……

当年我家有一匹马，我父亲听见“老毛子”来了，动作迅速，赶紧把马从前院马厩牵到后院（东北农家马厩都在前院）藏起来，就没有被抢走。一头来不及掩藏的肥猪，被“老毛子”抢去了。比我家富裕的邻居，抢走了三匹马……

抢了那么多用的、吃的，“老毛子”们还要发泄他们的兽欲，见了年轻的女人就强奸。光是我们村，被“老毛子”强奸的妇女，就达一百多人……

从1945年8月到翌年2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6个多月，名义上是“代中国政府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以上就是少年的我，亲见亲闻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老大哥”，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东北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苏联红军“大鼻子”强奸东北妇女 我的家在东北，在行政区划上隶属内蒙古自治区。我的奶奶已经去世多年了，她生于1921年，属鸡，只在建国后的“扫盲班”读过几天书，只能勉强认识自己的名字。

也许是老年人爱回忆，小的时候，常听奶奶给我讲她过去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因为听一个老人讲自己的故事总是很生动，比较起来，书里的儿童故事就显得多少有点不那么吸引人了。而且，现在想找个老人给我讲那个时代的故事已经很难了，我的母亲也快做祖母了，但是她的故事就没那么久远了。

奶奶的故事讲的很杂，常常是想起点什么就给我讲点什么，以家庭琐事为多，但是有一个话题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跑大鼻子”的故事。那个时候，我老问她什么是“大鼻子”？她就说：“就是老毛子！”我再问什么是“老毛子”？她就有点说不清楚了，我就问：“是不是日本人啊？”她说：“不是，日本人是小鼻子”说的时候还用手指把自己的鼻子按扁了一块。后来的一天，我突然想到了，就问她是不是苏联人啊？她说：“对！苏联。”等上了高中的时候我才彻底弄明白，奶奶所说的“大鼻子”其实就是1945年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奶奶对“大鼻子”的印象极差，我没见过她一辈子恨谁恨过“大鼻子”的。不过她给我讲“跑大鼻子”的故事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她脸上还有仇恨的表情了，也许是对我这个小孩子讲、也许是事情过的太久了，她讲的时候反而带着一些戏谑的语调。

奶奶讲：“大鼻子”挨家的抢东西，见到什么好就拿什么，有的抢了东西就拿枪上的刺刀挑着。不过他们好像经常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连枕头套他们都抢，真是不知道好赖。（当时，东北的普通人家的枕头套都是丝绸上面手绣的美丽图案，放在现在都是民间工艺品，大概“大鼻子”就是以为遇到了艺术品了吧。）但是“大鼻子”有个毛病，因为他们是挨着家的抢东西，拿不了那么多，就把从这家抢到的扔到拿就，再抢了那家的东西去下一家，就象熊瞎子劈苞米（玉米）似的，最后就剩下手里的一根苞米棒子了，有的人家被抢了之后，“大鼻子”扔下的东西比被抢的还多还值钱。很快大家发现了他们的这个毛病，在被洗劫过后，就去下游的人家去找自己家的东西，居然经常能够找到。

最可恶的是，“大鼻子”糟蹋妇女，吓的女人们都不敢出门。长的稍微有点姿色的都剃了和男人一样的头发，还得把锅底黑涂满脸。就这样，一听到外面有人喊：“跑大鼻子了！”女人们还得跑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等到有人告诉他们：“大鼻子走了！”才敢出来。后来，有的“大鼻子”学会点中国话，他们就假装中国人喊：“大鼻子走了！”然后坐等自投罗网的人出来。跑“大鼻子”的人们后来也学的乖了，要先排个男人出来先看看才敢回家。我问奶奶：“他们怎么学会的中国话？”奶奶说：“中国人教的呗！有些中国人坏，专门害人。”奶奶又讲：“大鼻子”爱喝酒，他们管酒叫“寒气儿”（应该是俄语的音译，我没考证过。）那里有

酒他们就抢，有的中国人为了害别人，就告诉“大鼻子”谁家“有寒气儿”，还给带路，于是那家就倒霉了。

“大鼻子”喝酒没命，不把酒喝光了绝不罢休。喝完了酒，就倒在大马路上睡觉，枪就在一边扔着，大冬天的也不怕冷。经常能看到街上横五竖六的倒着好几个“大鼻子”。我问奶奶：“他们也不怕有人抢他们的枪，在杀了他？”奶奶瞪着眼睛说：“谁敢啊？”我又问奶奶：“他们可是苏联红军啊，就没人管他们？”奶奶说：“有啊，他们有值班的，带着袖箍，专管干坏事的。不过那也不行，他们是轮流值班，谁值班的时候谁就不干坏事了，还管别人，但是等轮到别人值班了，他还照样抢。”

我又问：“他们待了多长时间？”奶奶说：“好像就那几个月，那就把老百姓祸祸够呛，要是时间长了，那还了得？”

我一直很喜欢历史课，不过历史课上的苏联红军和奶奶记忆里的差别太大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今天的我当然能够明白。历史原因造就了不同的历史，怀念奶奶的同时，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回忆里不会再有可怕的历史，更希望我们了解的都是真的历史。

苏联红军为什么愿意出兵东北？冠冕堂皇的背后 作者：信力建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忽然袭击。对苏军的这次行动，我们一般认为是苏联在尽国际主义义务，是在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东北。客观上看，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苏联出兵的动机和企图，就会觉得这种说法未免简单——甚至不乏一相情愿的因素。就苏联出兵东北的主观意图而言，起码有下面三条。

首先，是对过去日俄战争失败的报复。1904年2月8日，日军向旅顺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10日，日俄正式宣战。经过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沙俄军队战败向北败退。日俄战争历时19个月，俄军参战兵力约120万人；日军参战兵力为110万。战争中，俄军伤亡、被俘约27万人，损失舰船98艘，军费支出20亿卢布。日军伤亡、被俘21万，损失舰船91艘，军费支出17.2亿日元。1905年8月9日，日、俄两国代表开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和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于1905年9月5日，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和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国“承认日本于韩国(朝鲜)之政事、军事、经济上均有特别之利益”，俄国不得阻碍干涉日本“对于韩国行指导保护及监理之必要处置”。和约还规定，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移交给日本政府，包括租界地内一切公共建筑及财产；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和一切支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等等都移交给日本，还要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包括附近一切岛屿及其公共建筑和财产)的主权永远交给日本。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

也就是出于这个报复心态，苏联在出兵东北后，将近60万日军俘虏尽数运到西伯利亚做

苦工，其中十分之一死在西伯利亚。

其二，是为了攫取苏联在华——尤其是在东北——利益。当时美国为了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离东北最近的美军还在千里之外的冲绳地区），同时不愿意看到陆战造成大量美国士兵伤亡，希望苏联能帮助消灭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日军加伪军大约有 150 万），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对国民政府施压，允许外蒙古独立和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力。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聚集于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 1943 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2 月 8 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秘密会谈时，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10 日，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达成正式文本。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但 2 月 11 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了字。

当年沙皇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位英国人曾这样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合理的愿望。……拥有一个不冻港就意味着，这条铁路直达那个港口穿过的那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俄国的了。”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这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丘吉尔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雅尔塔会议使斯大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 1904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雅尔塔会议距今已经 60 年，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那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向莫洛托夫描绘苏联的边界线：“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其三，是出于对东北丰富物产的垂涎三尺。当时的伪满洲国乃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就工业而言，到 1945 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 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6.9%增加到 59.3%，而中国 2003 年才达到 57.5%。1938 年，伪满洲国共发电 16.3 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 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 22 亿度，而到了 1949 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 43 亿度。1943 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 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 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 85%，台湾

占 10%，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 5%。

因此，苏联人很想对东北这块肥肉吃上一口——事实上，他也吃上了一口：根据 1946 年国民政府有关考查团调查，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 8.58 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的部份，约达 20 亿美元。工厂、矿山设备被拆卸了，运走了。有的是整座工厂、整座矿山的拆卸、运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据日本产经新闻出版的《蒋总统秘录》称：“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拆运而走，此外，鞍山、宫原(即本溪)、本溪(今本溪湖)等钢铁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美国国务院一份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8 月 28 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满洲币 7 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 75 亿元，黄金 36 公斤，白金 31 公斤，白银 66 公斤，钻石 3705 克拉。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都要。有的老人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东北重工业基地成了空壳子。

红军反攻柏林时罪行：大肆洗劫 恣意强暴妇女 2005 年，在纪念前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60 周年前夕，俄国学者、莫斯科首任民选市长波波夫，在国内外几乎是同时发表了一部关于前苏联卫国战争历史真相的历史著作《1941—1945 战争杂论》，从而使一批珍贵史料和历史数据重见天日，并由此引起了一些史学争论。

在这部史料详尽、数据繁多的战争历史杂论中，俄国学者、莫斯科首任民选市长波波夫，以惊人的翔实数据首次披露了前苏军元帅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疯狂抢掠战利品的史实：1948 年 1 月，前苏联国家安全部派员到朱可夫家中搜查，查抄各式名贵家具 7 车厢，貂皮 323 件、水貂皮 160 件、丝料和呢料 4000 米、名贵画毯 44 张、古典名贵油画 55 张、水晶和名贵餐具共 7 大箱，等等。

波波夫解释称，纪念战胜法西斯 60 周年，对这段历史需要新的思考，真实的、民主的考量：从德国运回来的战争赔偿，并没有用来发展苏联的民生和经济，而是用来苏联扩大军备，发展军事力量，但这一切却把苏联引上了一条死胡同。

波波夫披露，苏军攻占东欧期间曾出现了抢掠当地居民财物的恶劣现象，苏方当时曾下令严厉追究。仅 1945 年头三个月，就已有 4000 多名苏军军官受到检控。但在苏军进入德国后，在苏军高层的默许下，开始了大肆洗劫德国居民财物的活动，直到 1945 年 6 月才停止掠夺。苏军向来重视战利品的缴获，原本在苏军总部就设有战利品总局，负责各项战利品的收缴登记和发放工作。该局在战后公布的资料是：60000 台钢琴、46 万架收音机、19 万幅地毯、94 万件家具、26.5 万台座钟和挂钟，以及 186 车皮名酒，等等。在这场劫掠中，苏军官兵的“待遇”也分等级。士兵可拥有以准许邮寄为限的小件物品。将领的“战利品”标准则由斯大林钦定：每人一部奔驰轿车，中下级军官每人一部摩托车或自行车，可低价购买钢琴、收音机、猎枪、手表、若干地毯、裘皮、全套餐具、照相机等。

1948 年，斯大林下令逮捕杰列金将军。苏军方面从这个担任朱可夫元帅副手的将军家中，共计搜出 16 公斤银首饰、218 块呢绒和丝料、21 枝猎枪、大量名贵的法国和佛拉德斯画毯，等等。从内务部西德涅夫少将家搜出近百件黄金和铂金制品、从帝国银行里偷来的全金坤包、32 件裘皮衣、1500 米毛料、405 双丝袜、78 双皮鞋、296 件衣服等。

波波夫还披露，苏军反攻进入德国以后，像法西斯占领军一样大量强暴战败国妇女。波波夫教授指出，苏军占领柏林以后，仅仅是德国首都柏林一地，就有近 10 万名德国妇女在被强暴后去看医生含垢忍辱，不敢声张者更是不计其数。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其回忆录里说：

“苏军的所作作为，特别是对妇女的态度，令人发指。”

波波夫指出，苏军对德国的掠夺是苏联官僚体制和贪婪的本质所决定的。正像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不信上帝的话，就可以无法无天。”

据波波夫披露，苏军从德国运回数不清的战利品。据战利品总局统计，仅仅是 1945 一年，

就从德国运回 74000 车皮的建筑材料、120 万件男女大衣及 100 万顶帽子等，总共 40 万车皮的物品；230 万吨粮食，50 万吨奶油、鱼、动物油脂，50 万吨食糖，100 万吨马铃薯和蔬菜，2000 万升 酒精。

到 1948 年 1 月止，55 万头牛、24 万头羊；2800 座工厂的设备，等等。除此，还有 200 万德军战俘在苏联无偿劳动。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大量征用德国先进科学技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院士受苏联政府指派，于 1945 年到达德国，负责研究布劳恩火箭中心的人员和技术进展情况，拟订掳走德国科学家的名单，同时运走大量德国火箭、远程导弹发动机和实验设备。苏联原子能专家库尔恰托夫院士说，苏联政府曾派遣专门小组到德国寻找氧化铀，找到后运往苏联三百吨，从而大大加快了苏联研发制造原子弹的进程。

何清涟：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中国 2009 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信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质量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进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 30 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

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 GDP 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 10 年大学学费占人均 GDP 的 7—8% 左右，美国约为 15—20%。中国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的 2000 年，人均 GDP 约 6,500 元，大学学费 3000 元，占人均 GDP 的 46.15%，2001 年人均 GDP 增到 7,543 元，学费约 5,000—6,000 元，占人均 GDP 的比重为 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质量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

人均 GDP 的 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 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 2007 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 110 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四年大学费用 48,000 元，需要母亲卖 96 万个烧饼；110 户农户中，11 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 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 30 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 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产出”直至“不产出”：以青海省为例，四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 35 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 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进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 1,000 万历届大学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游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 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竞争。早在 2005 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 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 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 、个体工商户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 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 1996 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者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的社会进步

高等教育的进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

识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识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进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血缘”关系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 160 余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进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揭秘最有福气的 10 处痣相

究竟痣需不需要点掉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般人想把痣点掉，无非是为了增加自信心并改善厄运，而点痣这种行为从命理学的角度看也的确能改善三分的运势，如果你觉得某些痣的确给你带来了身心上的困扰，不妨考虑找个可靠的医师点掉它吧！所谓“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其实只要试着改变你的人生观，以平常心面对你的生活，那些恶痣自会在你的心中消弭。

开运痣相一太阳穴

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上称做“迁移宫”，也称之为“驿马宫”，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远行、旅游、升迁及移民等讯息，这个部位如有恶痣，表示出门旅行或在外做生意时会很不顺遂，如果有善痣，那表示你有旅途得益或远方获利的喜兆。

开运痣相一两眉间

两眉间在相学上又称“事业宫”，象征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及职位的升迁，从这个部位的气色可以断出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这个部位如有善痣，表示你将来会拥有庞大的事业，如果是一颗灰黯的恶痣，28 岁前后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婚姻或感情问题。

开运痣相一眉毛后部

眉毛的后半部在相学上称之为“彩霞”，象征着一个人的理智与才能，眉尾如果有善痣，可谓“喜上眉梢”，表示你的人际关系很好，做生意很有一套，如果是灰黯的恶痣，表示你的亲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中，会有一位遭致不幸，要不就是自己容易四肢受伤或被婚外情所困，这些现象在你 33、34 岁时尤其要特别注意。

开运痣相一鼻头鼻翼

鼻子在面相十二宫中称为“财帛宫”，鼻头越丰隆，收入就越多，鼻翼越饱满，积储也越多，鼻头突然出现痣表示你最近会进点小财，女性则夫运较差，总是会为了另一半而操劳烦心，疾病方面则小心得到痔疮，尤其四十八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鼻翼上若有痣，就好像保险柜有个漏洞似的，使钱财容易流失而留不住，尤其是虚岁 44、45 或 49、50 岁要特别注意！

开运痣相一上唇

上唇有痣在相学上是一种福相，表示一生将不愁吃穿，除了经常有人请吃饭外，同时也是个美食主义者，人际关系经营得很不错，缺点是有时候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命中忌水，一生中多多少少会遭遇到一次水难。

开运痣相一下巴

下巴附近的痣，主的是田地基址、屋宅奴仆，此处有善痣表示你老来必置华屋田产等不动产，另一方面，你也会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

开运痣相—颧骨

颧骨上如果有善痣，表示你在职场上有一定的权势与地位，如果是恶痣，显示你太过相信别人，很容易被他人出卖，在恋爱时常会遭到第三者横刀夺爱，好事也容易被别人捷足先登，此外你的心脏及血液循环方面会有潜在的病变，平时要注意预防保养。

开运痣相—胸部

胸部有痣代表你有一个富贵命，在家中也会掌握经济大权，姑且不论是“胸怀大志”，也或是“双龙抢珠”，你永远都是幸运的宠儿！

开运痣相—手心

手心有痣代表你是一个聪明而不缺钱用的人，老年会很有成就，手背有痣则表示你颇善于理财，且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

开运痣相—脚底

脚底有痣的人驿马通常很重，有很多机会云游四海或出外旅游，在职场上也能够呼风唤雨，脚指里有痣，显示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颇能获得部属、朋友之拥护及帮助，将来在事业上必也会有一番作为。

乔新生：中国教育罪孽深重

[评] 好文，值得一读。

——网路文摘编者 2009-11-14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教育部长撤换，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一些高校教师甚至准备鸣放鞭炮，大肆庆祝。教育部长何以成为众矢之的？新的教育部长能否平息公众的怨气？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近些年来，中国教育改革措施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瞎折腾。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一名教员，笔者深深地知道，所有这些改革不

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宪法上的受教育权，而是为了巩固少数人的行政权力。

不少人把中国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扩大招生规模，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不实行教育领域的大跃进，那么，中国的教育界也不会乱作一团。但在笔者看来，扩大招生规模是大势所趋，综观世界各国，从精英文化教育转向平民化教育，必然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但问题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在缺乏民主的前提下强制推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教育，而是为了满足少数特殊集团的利益。

还有人把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教育产业化，认为正是实施了产业化改革，才导致高等教育认钱不认人，把教育办得像个商业机构。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机构已经沦落成为商业公司，中小学实行“班外班”，教师在正常的上课时间无精打采，可是却把课堂教学内容放在课外从事有偿家教。高等教育机构是彻头彻尾商业交易机构，学生走进校门的第一天，就饱受高等教育机构后勤集团盘剥，高等教育机构的每一项服务，都明码标价，高等教育机构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收取费用。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就是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实行高度垄断的经营体制，不允许民营企业正大光明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从而使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了少数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工具。

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打着发展教育的幌子，借口发展市场经济，把高等教育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奴役百姓，维持稳定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在评价教育改革成果的时候，把问题归咎于八个方面，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但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概括总结的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从深层次来看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是走民主化的道路而是走专制集权的道路。教育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过程，教育也是一个知识积累的手段，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可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被一些根本不懂教育的人所把持，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非但没有促进教育的发展，反而使中国的教育面临空前困难。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同时也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全是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制定出来的。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教育部负责人有一次出外游览，在寺庙门前遇到了几个削发为尼的小孩子，大清早起来读书，聊起天来才知道他们是落榜生，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只好到深山老林苦读。这一位教育部负责人感慨万端，回去之后立即扩大招生规模，要求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必须敞开大门，让那些喜欢读书的孩子进入高等院校。从情感上来分析，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可是，如果

联系中国教育的现状，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的决策。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高等教育机构人满为患，许多教师不是教书育人，而是疲于奔命，教育完全变成了一种体力劳动。这项改革带来的恶果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急剧下降，许多大学为了应付汹涌而来的人潮，不得不四处举债，大兴楼堂馆所。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不受约束，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现象。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以扩大规模为发端，以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纷纷落马为结局，高等教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跃进。

第二，为了强行推广教育负责人的改革方针，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力，而是拼命地缩小高等教育的自主权。从表面上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放权政策，但为了牢牢地控制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教育部把大量的司局级干部派往全国各个高等院校，从而使高等院校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政府衙门。高等教育机构的一切改革，非但没有调动高等教育机构职工的积极性，反而由于实行严格的行政强制措施，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师生感到空前的压抑，高等教育机构各种极端案件频频发生。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变成了思想的禁锢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批牺牲品。

第三，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混乱现象，教育部推出了所谓的本科评估制度，希望通过评估来分出好坏，并且实行优胜劣汰。但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由于不尊重教育规律，实行一刀切政策，在评估的时候实行党同伐异，结果导致高等教育本科评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教育部派往各个高等院校评估的负责人，成为教育机构行贿的对象。高等教育机构评估变成了教育部进一步控制权力，强化对高等教育机构钳制的手段和工具。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教育改革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调动教育机构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是为了进一步牢牢地控制教育机构，从而为教育主管部门强制推行各项政策提供保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的教育改革几乎成为一场灾难，绝大多数师生怨声载道，教育水平直线下降。

其次，中国教育改革不是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服务，而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由于一些自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根本没有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所以，在制定教育改革目标的时候，不是从长远着手，提高国民素质，而是热衷于迎合市场经济，把教育变成了加官进爵的敲门砖。中国教育历来缺乏自治传统，教育的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应该破除这一现象，真正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为了配合主要决策者发展生产力的口号，要求教育机构脱离教育规律，盲目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果把教育体制改革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使教育成为依附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组成

部分。

自从进入工业化社会，教育始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是，各国教育发展历史表明，教育为经济服务，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时时刻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各种配套性人才。教育发展的规律是，必须从基础做起，逐步建立一种人才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发展教育服务经济，并且通过服务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可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把经济和教育直接对接起来，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设置了许多非常奇怪的专业，这些专业为了适应就业的需要，起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使教育服务于经济变成了教育与经济相互欺骗的游戏。

教育改革不能揠苗助长，而应当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可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教育决策部门负责人为了在短时期内做出成绩，鼓励教育机构打开校门，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业，把教育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许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把 90% 的精力用于赚钱，把 10% 的精力用于改善自己的福利；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则通过改换门庭对外从事各种服务，结果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熙熙攘攘，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曾经有人考察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机构，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可以数十年如一日从事数据的积累和科学研究，而中国的教育机构缺乏必要的数据库，更缺乏长期的研究项目。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机构负责人热衷于出政绩，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者希望教育服务经济，结果导致中国的教育机构既不像是企业的实验室，也不像是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像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依靠鼠窃狗偷获取科研经费的乞丐。这样的教育发展模式，怎么能够提高国民的素质呢？

第三，教育机构不是自由思想的圣地，而是奴役百姓的集中营。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政策，要求教育机构必须增加政治学习。而所谓政治学习，只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之外，增加一些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东西。现在高等教育机构开设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课程，所有这些内容，不是扩大学生的视野，尊重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这些庸俗的教条去思考和判断。这样的教育机构，根本不是在提倡自由的思想，而是在强行灌输执政者的庸俗口号。

坦率地说，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已经彻底变成某些政党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具有建设性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思想体系。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自从移入马克思主义之后，很快把它变成了夺取政权的工

具。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思想，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让许多思想单纯的农民兄弟跟着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建国之后，他们很快剥夺了刚刚分给农民兄弟的土地，以所谓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们以城市化为借口，不断地以政府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变成了失去土地的真正无产者。这些农民兄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没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他们没有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手中的选票，可是，由于执政者制定了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利，结果导致他们在改革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

可是，在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无论是第一代领导人还是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口头上表示了对农民的足够尊重，可是，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却毫无例外把农民作为压榨的对象。这样的所谓理论怎么能够说服中国当代大学生呢？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深层次矛盾，教育主管部门拼命地增加有关政治宣传的内容，试图通过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接受他们的理论或者他们的改革逻辑。为了征服这些年轻气盛的学生们，他们一方面通过增加有关课程的学分，迫使大学生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则不断地设置机构，在大学里豢养一大批尸位素餐，依靠讲授所谓当代马克思理论谋生的教员。这些人不仅浪费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而且更主要的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负面典型，他们的春风得意，反衬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落魄惆怅。所谓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能否深入人心，不在于是否增加有关的教学内容，而在于马克思是否能够揭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曾经有一些新闻媒体记者对西方国家《资本论》的热销感到迷惑不解，诚恳地约请笔者作出解释。我认为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兴盛与危机，看到了人类文明未来的前景。但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几乎所有声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只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从来没有意识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他们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在分析了公有制之后，曾经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公有制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府的腐败。为了防止政府腐败蔓延，马克思设计了人民代表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约束政府，确保政府必须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妥善的保管国家的财富。可是，几乎所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没有解决政府腐败问题。中国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橡皮图章，根本无法监督政府。所以，中国的公有制，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最好的制度基础。一些学者一怒之下，把结果当成原因，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是真正 的出路。

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从而重新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教育主管当局钳制思想，不允许在高等教育机构从事这样的讨论，结果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成为真正愚弄百姓的教育。那些本来可以通过提高国民的素质，不断强化公众的监督，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而避免或者减少的腐败现象，由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讳疾忌医，不允许大学教员进行公开讨论，结果使得中国贪污腐败盛行，改革正在逐渐地走向它的反面，改革越深入，公众的反弹情绪就越大。现在全国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充分表明，中国的这场改革早已不得人心。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

第四，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成为社区自治的典范，成为自我管理的榜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高等教育机构成为政府的附属物，非但不能实现自我管理，反而变成了一切社会乱象的滋生地。早期的高等教育脱胎于教会，是西方教会为了培养传教士而建立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博雅之士。工业化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些专业化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已经不再承担传道的责任，而是扮演受业者的角色，他们把那些在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数学等领域成绩卓著的专家聘为大学教授，然后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从而确保工业化社会拥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到了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深切地意识到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他们很快建立了一套所谓后续教育体系，为那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们提供继续学习的平台。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相互分离、互相配合的教育体制，不仅可以有效的利用国家资源，提高教育的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借助于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手段，通过教育的产业化，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可是在我国，教育部根本不了解教育的发展历史，不了解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他们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忽左忽右，一方面认为应该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发展高等教育，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高等教育变成了出售大学文凭的机构；另一方面又害怕公众批评教育产业化，所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改革措施，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便成了无头苍蝇，不知如何发展。

高等教育不是孤立的存在，高等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国家都规定，未成年人的教育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应该由教育机构、家庭和社区负责。他们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机构经常与家庭、社区教育服务部门沟通，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教堂、乃至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过，学生一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

教育机构必须完全尊重学生的选择，包括他们的政治选择、宗教选择。这些国家绝对不会允许教育机构成为左右或者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机构。在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甚至规定，中小学教育机构严禁政府官员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那样做就是在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进行政治推销，这是一种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

可是在我国，教育机构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党的接班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或许不知道，假如把党的思想强加在学生的脑海之中，那么，不仅会增加他们的逆反心理，从而促使他们更快地走向执政者的反面，而且会浪费他们的宝贵时光，让他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学习科学的机会，接受执政者的政治教条。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的教育模式。执政党完全可以利用家庭、利用社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其他资源，进行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学生，绝对不能在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浪费资源，进行所谓的政治宣传。这样做既违反了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同时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这些所谓政治理论的时候，丝毫没有喜悦感或者创新意识，他们只不过把执政党的一些理论学习当作争取学分和学位的敲门砖而已。

高等教育机构自治，首先要求在教育内容上高度自治。执政党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在高等教育机构，执政党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张或者政治理论是否能够得以普及，关键不在于是否增加相关的课程，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东拼西凑，变成所谓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试图用前言不搭后语来解释改革开放的错误政策，那么，这样的政治宣传只会招人反感。

高等教育机构自治，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机构，并且以民主的方式选举管理者。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都有行政级别，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是行政负责人。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僚衙门，许多教师不得不听命于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在他们制定的各种表格中转来转去。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中国的教员没有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听取行政官员的命令。为了确保高等教育机构贯彻教育部的指令，教育部隔三差五召开教育机构负责人会议，不断地向高等教育机构派出负责人，防止教师犯上作乱，以高压手段确保高等教育太平无事。

这不是在进行高等教育机构改革，这是在扼杀中国的高等教育。假如不尽快改弦更张，不彻底实现高等教育自治，允许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选举自己的管理者，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必死无疑。事实上，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是一条条僵尸，表面上看来人模狗样，实际上早已腐烂肮脏。

第五，中国教育腐败丛生，教育早已成为权钱交易的系统。近些年来，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有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为各种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育机构本身早已沦落成为权钱交易的机构。

不了解中国教育系统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投入产出极端不成比例的系统。在教育系统既有各种各样的财政拨款，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教育机构自身的收入。可是，在中国居然没有独立的财政教育预算，教育机构也不需要公开的财政预算。按照国家预算法的规定，在公共财政预算之内，只需要编制教育部门预算，而不需要编制教育机构投入产出预算，教育部只负责每年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教育部门自己的财政预算即可。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换句话说，教育主管部门不需要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具体财政教育预算的使用情况。获得国家教育拨款之后，他们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执行规则，按照亲疏远近，把教育经费分配给各个教育机构，从而使整个中国的教育预算成为一笔糊涂账。

举例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确定了教育预算比例之后，中央财政每年都会向教育部转移财政预算。教育部该如何支配教育预算呢？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教育部既不需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每一笔预算的使用情况，也不需要向全国教育系统报告财政预算分配情况，教育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把这些财政预算资金分配给项目负责人。不仅如此，为了迎合中央某些领导的需要，做大做强教育机构，他们还会向少数教育机构增加拨付教育预算。通俗地说，教育部得到财政经费之后，只需要召开系统内部的会议，由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使用方案，那么，就可以将全国的教育经费分配下去。当然，科技部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把国家的科技预算瓜分完毕。

在这样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下，即使想要洁身自好，长期的耳濡目染，也会逐渐变得贪婪。这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只需要编造理由使用经费的系统。在这样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下人们就会发现，极少数高等教育机构占用了国家绝大多数高等教育资源，一个微不足道的课题，可以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财政预算资金。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大学校长和建筑承包商沆瀣一气，通过工程承包收取贿赂，简直就是愚蠢之极。和那些社会不法分子进行往来，早晚有一天会折戟沉沙。果不其然，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腐败分子中箭落马，都不是因为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铺张浪费，而是与建筑工程承包商相互勾结，收受他人贿赂被举报而锒铛入狱。现在大学校长如果没有数百万或者数十万的科研经费，简直就是清廉到家。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都通过承担科研课题，获得了支配高等教育机构资源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教育系统内部可以自己设立项

目，自己审批项目，自己评估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表示异议。如果大学校长和外边的人相互勾结，牟取不法利益，那么，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真正的腐败分子就是把整个大学的资源通过科学研究课题转给自己。

不要对大学的反腐倡廉抱有任何希望，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掌握各种行政权力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处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虽然官职不大，却可以通过申报科研课题，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要能够骗取科研经费，如何支配完全依靠自己。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这是一种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权钱交易。假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为什么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群体。这是一个必然导致腐败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脱离现有法律约束的一个个独立的封建割据王国。在某个大学举行校庆的时候，不少校友纷纷捐款，希望能资助学校的科研项目。可是，他们刚一转身，学校领导就把这些捐款交给出版社，然后，把已经出版的论文重新结集出版，由出版社把校友的捐款，以稿费的方式支付给这些领导。假如那些捐款者知道这些交易内幕，不知道他们该作何感想。在这样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下，资金越多贪污腐败就越多；社会各界的捐款越多，资源浪费的现象就越严重。

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早已深入骨髓，不少资金就是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落入个人的囊中。现在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为了鼓励撰写学术论文，实行奖励制度。奖励金额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元。不少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为了发表所谓学术论文，不断地邀请核心期刊的编辑到大学里进行讲学，然后以讲课费的方式，向这些编辑支付大量的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换取学术论文的发表。看一看现在主要学术期刊的论文作者，人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易产业链——大学的负责人利用公款宴请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刊发大学领导的所谓学术论文，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学术论文向大学领导发放各种各样的科研津贴，学术论文非常可怜的成为了权钱交易的中介。

早在多年前笔者就曾经提出，中国的大学论文应该全部刊登互联网络，接受世界各国同行的评判。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大学把学生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公开发表之外，绝大多数所谓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都还没有真正大白于天下。那些价值数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所谓学术论文，究竟是什么货色，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涉嫌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由于没有在互联网上公开，人们很难作出判断。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一些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之后，只寄给少数单位和个人，只要在小圈子内能够充分保密，那么，即使涉嫌侵权，以无关宏旨。

从基础设施建设腐败，到科学研究领域腐败，中国教育腐败已经从头到脚充满着肮脏的东西。在分析和讨论中国教育腐败问题的时候，让

人有一种恶心的感觉。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发展教育的幌子，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在一些衣冠楚楚的所谓学者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学术的气息，只能闻到一股铜臭味。

中国教育系统早已病入膏肓，华佗再世也是回天乏力。自从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不折腾之后，中国的教育界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可是，人们尚未兴奋起来，接二连三出台的改革政策又将人们带入黑暗之中。中国人事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所谓绩效工资改革，似乎是在有意地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开玩笑，把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当成了工业化流水线上的工作，通过所谓绩效评估，重新调整教育系统的分配结构。按照现行的分配方案，那些在教育机构里吆三喝四、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们，可以更加高高在上，对教师指手划脚。因为他们掌握着绩效评估的行政大权，他们可以利用这项制度，首先为自己谋取利益。果不其然，这项制度刚刚出台，各个高等教育机构就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处长、科长的工资水平直线上升，而绝大多数老师的工资收入却原地踏步。中国的教育机构“校长一走廊、处长满操场”，如果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向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教育资源早晚会被这些官老爷们挥霍殆尽。

中国教育部长下台，很多人欢呼雀跃。表面上大家是表达对这个教育部长的不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发泄对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愤怒。可怜这位教育部长，对上唯唯诺诺，只是因为出生在第三代领导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而被推上了这个领导岗位。在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之下，他的每一次表态几乎都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他所进行的一些技术性的改革，比如本科教育评估、制定样板戏进课堂的计划、推广体操标准等，都只不过是迎合某些群体的需要，但现在看来他是两头不落好。那些曾经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出议案或者建议、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育部政策落实情况并不满意，而那些深受教育之害的家长 and 考生，则更是对教育部的改革深恶痛绝。在这种天怨人怒的大背景下，他的辞职走人，似乎是一个无奈的结局。只不过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他不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看一看他前任最后的归宿，那么，他应该欣喜地意识到自己是平安落地。只不过中国的教育能否东山再起，只是不知道中国国民还有多大的怨气？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公民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决策者，那么，相信他们绝对不会任由中国教育腐败现象持续下去。可能到那个时候，教育问题已经不是执政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大力发展民主政治，那么，执政者早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根基。这一点甚至连执政者自己都不表示怀疑。

回顾中国教育改革有一种令人悲怆的感觉。每一次改革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每一次改革都让中国的教育步入悬崖边缘。假如不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教育体制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现代国民，如果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那么，中国

的教育机构将会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发源地。而这样一来，似乎又背离了改革者的初衷，他们不愿意被觉醒的现代公民推着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可以设想，假如中国教育机构真正实行民主决策，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集思广益，并且允许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通过良性竞争，实行多元化的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领域一定会出现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只不过到那个时候，教育再也不能成为少数人或者团体党同伐异的工具，教育再也不会成为少数官僚相互勾结谋取利益的园地，教育再也不会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我们期待着真正的教育改革，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决策者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读巫宁坤的教授《一滴泪》 反思中共洗脑术 ——读巫宁坤教授《一滴泪》的迫害史，反思中共的洗脑术 巫宁坤教授的《一滴泪》写的是三十年的家庭史，也是中共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的统治史，更是中共政府对人民的三十年洗脑史和迫害史。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他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了燕京大学刚刚六个星期，刚成为燕京大学最年轻教授、三十岁刚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时他才初尝了脑子是怎么个洗法和被随意扭曲的滋味。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总理的冗长的政治报告，七个小时。回到学校后便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随后而来的“十一”国庆大游行更是激动人心的心脑大洗礼，那令人心旌动荡的红海洋，爱国知识分子的热血沸腾，热浪般人潮的呼声“毛主席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这群情激荡的红海洋中，哪个“爱国青年”不被感染？

紧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结合“三反”运动，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燕京大学就变成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运动。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到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于是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当初邀请巫宁坤返中的陆志伟校长这会儿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教授们一改温文尔雅的气质，满嘴党八股地上台批判校长。连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地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判完校长，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系主任，再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被批的教授、讲师中，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地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们都痛心地检讨，他也如法炮制，痛骂自己，深挖自己的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等等。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的男生跳了起来给了他当头一棒，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著书皮，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个男学生早前从巫宁坤教授处借去的。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

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 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 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翦伯赞居高临下的无礼态度让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翦伯赞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地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还有真正的动机吗？”巫宁坤传记里写道：“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尽苦难。

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于是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都留在了北京，巫宁坤却被发配到天津南开大学。这种毫不尊重个人意志的“组织分配”给在自由美国呆了八年的巫宁坤教授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节“服从组织分配”的洗脑课。

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落后贫瘠，一到南开大学巫宁坤便被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巫宁坤不在乎生活的贫苦和枯燥，但是他不能忍受那不断的洗脑，还有那由上级审查决定后把要 教授的课程硬加进马列主义的枯燥。

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他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这突然袭击使他瘫在椅子上乖乖地接受“帮助”。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揭发，把巫宁坤一年半来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了会后，许多以前经常交往的同事都远离他了。巫宁坤对那些落井下石的行为感到气愤，他更气愤自己在与人交往中竟那么天真幼稚。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些毒化着宁坤心灵的对洗脑和教师之间互相攻讦的怨愤，使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的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全校召开了“肃反”运动的动员大会，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教职员一百多人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地拍桌子，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开场狂吠过后，便开始盘问巫宁坤的历史。提的问题都按时间顺序，目的很明显，要证明他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中，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进他家。他们自称

是公安人员，声势汹汹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答话时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话，笔比剑厉害。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 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开了几天的批斗大会，目的是帮助直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的巫宁坤，而他们帮助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委员会的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 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一月开始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接着又开始“大鸣大放”的夏天。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引蛇出洞”了，随之而来的打“蛇”运动如疾风骤雨。

党不断地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整肃迫害运动，可耻的是那些与党同谋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中国知分子的软骨头和良知泯灭就是在这个时候塑造成型。下面是巫宁坤书中描写的反右运动中多数暴政的特有景观：“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 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 先生揭发 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是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不自由，毋宁死！巫宁坤面对的却是生不如死的残酷。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他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了，关进了“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 的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

以后的三年劳动教养的苦难以言表，又赶上三年的大饥荒，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边际游走。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就会死在劳改营。三年劳改出来后，他只作为临时工在安徽大学教书。巫宁坤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中共统治下的好景总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他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独自被下放，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被另行下放到几十里路外的村子。他们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全家离开农村，来到安徽师范大学。至此，他家的近三十年苦难才算结束。

《一滴泪》作者的文笔流畅幽默，书中看不到一丝作者被洗脑的党八股。他以作者应有的高度、头脑和眼光去描写三十年来共产党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和知识分子被洗脑扭曲的过程。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

读完《一滴泪》后，我的思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不禁发问，巫宁坤一家的苦难结束了，

是不是中国所有百姓人家的苦难也都一并结束了？巫宁坤经历的那些门类繁多的整人运动都过去了，是不是中共就再也不搞别的整人运动了？党对巫宁坤那一代进行了三十年的洗脑，是不是对下一代或下两代、下三代、下四代就不搞洗脑了？答案显然是“非也”。

巫宁坤一家苦难的结束并不说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中共一次次的不同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暴政史证明，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

巫宁坤家庭苦难结束回到城里工作后，中共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整肃“法轮功”运动，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苦难。搞运动中中共可以一举两得，既整掉了它要整的假想敌，又给没受整的“被团结的大多数革命群众”洗了脑。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法轮功百姓的运动，凸显了这个整肃加洗脑的过程：先是媒体铺天盖地、狂轰乱炸的妖魔化宣传，海外中共喉舌媒体助纣为虐地跟进；然后是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登峰造极的非法残酷迫害。

就像当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宁坤和众多“右派”一样，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也被押走。他们只因信仰法轮功，没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审判，就被非法押送劳改和抓进监狱。而且他们家庭中的许多家长是被双双抓走。法轮功家庭的孩子不准上学，孩子只能失学流浪在街头。电刑以及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也在整肃法轮功运动中普遍出现和使用。无以数计的法轮功百姓家庭被中共非法迫害，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致死。这场整人运动比中共统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运动都残酷和长久。

虽然西方的自由人权思想已在世界普及，但中国的这场迫害运动还是得到海内外广大中国人的拥护，可见中共的洗脑术并没有失效。

有人说，李政道所说的“洗脑子”和巫宁坤经历的政治学习大批判的洗脑方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没有洗脑了。非也。由于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百姓都是来自共产党不喜欢的、有一定新闻和言论自由度的“旧社会”，所以共产党使用了政治学习大批判式的洗脑方式，以此把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建立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都洗干净。但是，对“新社会”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中共政府只需利用幼儿园和小学的洗脑教学方式就可以轻易达到同等的洗脑目的，洗脑在小学就可以成功完成。对那些经过了小学洗脑教育的后生，政府只要全方位地严密封锁新闻，那些被洗的脑子便会顺其自然地接受官方媒体的单向输入，中共的维稳杀人等套话说辞就会根深蒂固地箝入人们的脑中。在每个大事件和整人运动前，中共都是以此方式轻易地取得了单向输入的成功，而且屡试屡爽，被洗过的脑子还能死硬到经久不变。

法轮功被迫害十年后，党云亦云的无脑之言到现在仍不绝于耳：什么法轮功是邪教啊，什么法轮功自焚啊，什么法轮功做坏事害人啊，不一而足，被洗过的脑子就是想不到中共是在搞非法群体迫害。六四屠杀二十年后，维稳杀人有理的共产党逻辑到现在仍不绝于耳，说这话的人好像自己就是那执掌生杀权力的中共屠夫，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中共治下的臣民。显而易见，越是奴性大的就越是愤愤地不承认自己被洗脑，越不意识到自己被洗脑的就越没有是非观。哪个大陆中国人能躲过中共的洗脑？着文“亩产万斤”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在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下，他在大跃进和反右运动中均做了丢人的事情，给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点。直到十年前，在他八十八岁时，他才终于明白了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了中共上层要他讲话污蔑法轮功的要求。中国人都是被中共玩耍愚弄的臣民，唯独不同的是，有人意识到了中共的洗脑而自觉地进行了反洗脑，而有人（多数）没意识到中共洗脑仍继续用中共洗过的脑子思维。那被洗过的脑子如同无脑一样的空洞可笑，可笑到丧失了价值判断和是非对错判断的最低本能，尤其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本能。他们一系列混乱思维中最混乱的是对权力的认识，权力才是摧残压制生命和人权的本源。

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待权力本应以苛求批判态度对之，对民主政权如此，对极权杀人政权就更是如此，因为权力导致腐败，权力趋于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和摧残。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个人的自由选择本应以宽容理解态度对之，因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人类生来俱有的天赋人权。被洗脑的知分子的思维却截然相反，他们对执掌权力的中共政府滥用公权力、甚至杀人百般维护，对不看病（看病问题属于可讨论的复杂议题）的无权无势的法轮功个体的自由选择却大喊生命价高。难怪我的朋友、学者朱学渊说：“怕糊涂虫，更怕自以为是的糊涂虫。”糊涂虫当然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说错话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蔑视生命和个人权利的错话太丢自己的面子，太丢我们中国人的民族面子。我年年在旅游团遇到各种美国人、澳洲人、新西兰人……，他们谨慎地告诉我，大陆中国人人格不独立，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基本概念。听到这种对中国人的评价，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咯！我本来简单地认为，如果没有通畅的信息，被洗过脑的人就不可能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可如今的现实是，即便把那些被洗过脑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放在信息通畅的自由世界里，哪怕放一辈子，他们如不自觉地进行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那被洗僵化的脑子也不会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在美国生活了一、二十年仍然满脑子党文化的大陆知分子，你就会惊叹中共洗脑术的精湛和对国民洗脑的成功。

中共虽然整人、洗脑六十年屡试屡爽，虽然扭曲奴化了整个国民，它却在今天终于遇到拼死的抵抗，法轮功百姓一反中国人的奴性反抗了。他们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杜绝中共的洗脑，给六十年受尽苦难和奴化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和前途。

巫宁坤的《一滴泪》所描述的中共迫害和洗脑的苦难历史是共产极权制度造成的，只要这个极权制度存在，迫害就不会结束，洗脑也不会停止。中共统治越长，人民的灾难就越大。铲除共产极权，铲除共产党则是国人不被奴化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进行自我反扭曲和反洗脑是维护自我尊严的当务之急，这才是巫宁坤三十年的家庭苦难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十年砍柴：废校纪事 / 中国大陆教育 我发蒙的那所小学，十年前就成了废校了，这是让我伤心的一件事。

知道此事时，我正在首都一家媒体做记者，我知道，在乡村青壮年大批携儿女外出、本地适龄儿童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形下，调整教育布局、撤并办学条件差的村小，是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

然而，理智总是代替不了情感。大约八年前我回乡，特意跑到那所小学前，此时学校已卖与一位村民做了养猪场。废校成猪圈，也算是盘活存量吧。我于细雨中伫立在废校前许久，闻污秽之气，听嗷叫之声。心情真如几千年中《诗经》中那位回到故土的老兵，“昔我往矣；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学校修建于“文革”晚期。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原来在公社读小学哥哥，和同生产大队一帮孩子欢天喜地搬回新建的学校。校舍和大队部，是全大队当时仅有的三幢完全用红砖房砌成的房屋，在土砖黑瓦的农舍中，鹤立鸡群。刚建成的校舍，哥哥和同学只能以砖头上架一长条木板做课桌，而凳子则是从学生家中搬来，高低不一。

一年后，哥哥升学去了公社读初中，姐姐仍在小学中就读。我那时说话尚不利落，可爱跟随姐姐去上学，而农家女带弟弟妹妹上小学，在彼时亦属正常。在刚有记忆的我心中，学校是个大游戏场，因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很少正儿八经地坐在教室里听课，动不动就在老师带领下，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地游行在大队的土路上、田埂上，呼喊各类口号，唱着各类红歌。我记得一句：“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若干年后考证此事，那时候正当“批邓”高峰，反击右倾翻案，举国上下，从北京的黄帅，到偏僻湘中山村的姐姐，孩子们都成了一场运动的群众演员。

1976年的秋季，我嚷着要去上学，但当时我才五岁，离规定发蒙的七岁尚远，母亲好说歹

说许诺我明年一定送我读书。就在那个九月，高音喇叭里传来几乎所有农夫村妇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一位本家奶奶大惑不解地说，毛主席不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么、。怎么说走了就走了？这下子谁来管我们呀。

八亿神州尽缟素后不久，突然北京城又传来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是“王、张、江、姚”四人，三男一女，江还是毛主席的婆娘。老人们大惑不解地议论，毛主席那样厉害，何的就管不住自己的婆娘呢？而有见多识广、听过《封神演义》故事的老人说，那姓江的就是苏妲己转世。-----那个时代的人单纯，没人往深里寻思，若将江比喻成苏妲己，那谁是商纣王呀？

打倒“四人帮”，小学校又闹热起来了。未能入学的我，徒有羡鱼之情，跑到学校看那些小学生们演戏。四个孩子扮演成“王、张、江、姚”四人，老师和其他同学仿照斗地主的批斗会。老师大喊一声某人的名字，扮演者乖乖地佝偻着背站到讲台前，等四人站齐了，老师就带领其他同学振臂呼喊口号：“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四人帮，生产大胜利”等等。何谓“粉碎”？我回家问哥哥，哥哥拿一个土坷拉，用手一捏，碎了，然后告诉我说，这就叫“粉碎”。我更是迷惑，四个人，一下子这样将他们粉碎，哪得多高的武功呀？

某夜，生产队社员们被叫醒，去接“宝像”，我也从床上爬起来跟着看热闹。宝像有两张，一张是熟悉的毛主席像，另一张宝像上的人物看起来年轻英俊，理着平头，大人说这是接毛主席班的华主席，毛主席生前对他说过：“你办事，我放心。”

好不容易盼到了1977年秋季开学，我终于能拿着母亲手缝的书包和2元5角钱，去小学校报名了。一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其他几位老师多是沾亲带故的。最年长的邓老师是本家婶娘，校长张老师退伍军人，是本家姑父，另一位高中毕业不久的李老师，是本家叔父。有个女蒋老师，我姐姐的班主任，和另一位男陈老师不算是亲戚。几位老师，无一不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全部是队上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只是他们在穿着、举止上比一般的农民稍微洋气一些。

等我入学时，砖头搭木板的课桌被淘汰了，全是大队的木匠一张张做出来的新课桌，大多是松木，还散发着好闻的松香。班上的同学，多来自大队三大姓：李、张、孙，多是同族兄弟或叔侄，其他还有陈、蒋、何、银、隆、黄等大队的小姓。

上学第一天，拿了书本回家后，母亲问老师今天叫你认什么字呀？我回答：就认了个“男厕所”、“女厕所”。确是如此，当新同学们排定座位后，陈老师带着我们走到校舍背后一栋矮房子，对我们说，这就是厕所，这边是男厕所，那边是女厕所。你们现在是学生了，不是放牛、打猪草的伢子、妹子了，不能随地解手，一定要上这个厕所里来，男的只能进男厕所，女的只能进女厕所。千万不能搞错。

知道解手要上厕所，知道男女之大防，这大约是中国传统的文明教化之始。虽经前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一点是不变的。

可能是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打倒这场大的变故发生还不久，我们拿到的语文课本，除了前两张彩页，分别是毛、华的彩像，其他的课文还沿袭“文革”时期的内容。比如第十课是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插图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分子，去生产队的牛圈里投毒；还有一课是：“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最后两课是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赤脚医生的，我感觉到大为亲切。因为我家就住在城里来的知青，我叫她“小飞”姐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等我弟弟开蒙上学时，语文课本内容几乎全变了。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大队里的知青都回城了，他们留下的战天斗地痕迹，便是将几座长满茶树和松林的山头剃光，变成红薯地。就在我入学后的那个冬天，学校少了两位老师。本家叔叔的李老师，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那年当兵去广西了；而陈老师，在1977年冬天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那年开始，山村的老人

都知道，读书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读书总比做田有出息。十数年的斯文扫地，并不能改变这个古老民族对读书人的尊重。而当兵和读书，也成为农家孩子跃出农门，改换身份的两条羊肠小道。而去当兵的李老师，更是演绎了一段传奇。1979年他参加了跨出南疆进入他国的一场战争，大军回国后，此人不见了。都以为死在枪林弹雨的亚热带丛林里，他的母亲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可几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两国战俘交换的名录中。不久后他复员回到了家乡，而一只耳朵因在战俘营的虐待已经失聪。

那位在恢复高考后首届考上大学的陈老师，他家的满妹陈柳青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班到高中三年级，两人的成绩一直难分胜负，只是在1989年的高考中，我发挥超常，高她30余分，有了一重点本科一大专的差别。陈家有四兄妹，四兄妹所创造的学业成绩团体记录，恐怕全县甚至全市至今无人能打破。

我上一年级时，柳青的三哥陈前辉正好是四年级。一入校，他的大名就被老师一次次灌到耳朵中来，这人几乎过目不忘，而且思维能力极强，老师解不出的难题，就让他解，以他的答案为标准。-----在一个全部是民办教师担纲的小村校，这并不奇怪，但他这种“神奇”一直保持着初中、高中。私下里，我们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的绰号“憨爷”。这个绰号，我想大约取其“憨厚”之意，这人总是微笑着，待人温和，调皮孩子的劣习他一点都没有，穿着朴素，在家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在那个年代，书中所说的“德才兼备”，憨爷就是我们眼前的活标本。因为他的过于优秀，我等这类成绩还算不错的孩子，就黯然失色了。他的母亲是大队妇联主任，我的母亲是赤脚医生；他的父亲在县里另一个区委当国家干部，我父亲是公社卫生院长，两家都是“半边户”。-----那个年代特殊的称谓，即父母一方绝大多数是父亲吃国家粮，母亲带着孩子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母亲多半是女强人，由于家中没有男劳力挣工分，因此生产队的给这种家庭的口粮标准定得很低，到年底必定“超支”-----即拿钱给生产队，算是买回自家的口粮。“半边户”的孩子，因为父亲在外面工作，所要承担的农活更重，但由于父母较村里其他孩子的父母，眼界更为开阔，更重视子女教育，由于父亲挣工资，相对而言子女的学习条件更好一些。憨爷的母亲萧阿姨和我母亲，在那个闭塞的山村，算是农妇中受过一定教育的少数人，因此她俩有共同语言，相当投缘，这种友情一直维系到现在。因此我母亲，在责骂我顽皮的时候，总要将他拿出来做比较，让我幼小的自尊心备受打击。我常常借口上茅厕，拿一本《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闲书，蹲在茅坑上津津有味能看一个小时，全然不顾苍蝇的飞舞和屎尿的恶臭。母亲很熟悉我这种逃避劳作的伎俩，往往忍不住走来将我抡出来，没收手中的书，还会痛心疾首地加上几句：你要是不把功夫花在读这种没用的闲书上，像陈前辉那样，用在读课文、做作业上，你的成绩保险不会比他的差。-----然而我天生爱看闲书，至今犹然，母亲的叮嘱起不了什么作用。

在我和柳青读初二那年，陈前辉一举成名。他那年16岁，是县一中最后一拨两年制高中毕业生-----此后全地区已实行三年制。而陈前辉参加高考的1984年，湖南部分地市已是三年制高中。也就是说，他和那些多读了一年高中的考生一起参加考试，竟然考取了湖南省全省理科第一名，被北京大学录取。记者闻讯前来采访时，他还在田里一身泥、一身水地搞“双抢”。-----1984年，是我记忆中分田到户的第三个年头，为自家的田地干活，农民们暴发了空前的劳作热情，真是男女老少其上阵，连刚上小学的儿童，也去田里给踩打谷机的大人递禾，像陈前辉这样的高中生，自然是主要劳动力了。那几年，因为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哥哥，柳青在我面前显得很自豪。再过了一年，我和柳青又进了一所高中，成为同班同学，她的二哥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学校的团委书记。再后来，陈前辉去了美国留学，他出国前我见到他最后的一面，是我和柳青高考上线，他当时是北大遥感所的研究生，回到家中，给他妹妹填志愿出主意。而此前，那个举世瞩目的劫难之夏刚刚过去，家乡曾流传他在北大读书时人身安全的种种谣言。就在我们上大学后不久，他去了美国，现在和妻儿定居在大洋彼岸，过着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柳青和他的二哥，不满足于在老家沉闷的生活，工作多年后

先后考上广州高校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定居了羊城。不知道，在美国的陈前辉，是否知道当年开蒙那所小学，已经成了废校，他会不会想起学校操场前，两棵常用来挂露天电影幕布的大樟树？樟树十来年前就砍伐掉了。

学校后面有一口大池塘，清澈的水面，常有水鸟飞来，岸边山丘上长着蓊郁的松树林，坐在窗前的我，常常望着那片水面，心思漫游天地，把那里当成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感觉到时光是那样的漫长，不知道自己何时能长大，能离开这个山乡。夏天的课余，总有孩子偷偷下水游泳，而我从小受父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庭训，不敢跟着他们下水，连去公社过马路，也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车过来才敢迈步。因此这种“惜命”被当成胆小而讥笑，但我从来都不气恼，一个内心丰富、爱幻想的小孩，往往对现实中的际遇不太在意，因为他相信未来的世界会更美好。

就在我升入五年级的那个秋天，“大锅饭”散伙了，生产队的田、土、山林、耕牛、农具被分得一干二净，而我的爷爷，就在那个冬天过世。第二年秋季开学，我升入到公社的初中，学校在四华里之外，那时候觉得步行去上学，好远好远。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章。

那所废弃的小学存续也就二十来年，其学生来源于一个800多人的行政村，其师资从未有过师范科班出身的公办教师，教学条件更是简陋得无以复加。然而，从这个学校走出了不下40位大学生，其中包括我在文中提到的省高考理科状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教育课题。或许要归功于敝村的尊文重教的风气？或许要归功于那些土生土长民办教师的纯朴良善？或许要归功于那所废校的风水？

废校的全名是“新邵县言栗公社了田小学”，后改为“言栗乡了田小学”，再后来小学被撤了，而言栗乡因“撤区并乡”并入了小塘乡，业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注：在一段时期里，县和乡（公社）之间还有一级行政设置：区，每个区管辖若干个乡。那时候从中央政府，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或州、专区，再到县、区、乡，共有六级行政机构，是中国历史上行政层级最多的。确有叠床架屋、增加行政成本的弊病。县、乡之间的区顺利撤除了，现在中国面临的行政改革难题就是省直管县，废除地级市管县。]但我而言，这所小学和两株绿荫婆娑的香樟树，一直长存在我的记忆中。

何嘉峪：“教育暴力”扭曲学生人格 作者：何嘉峪 中国教育积弊之深并未能因教育部长易人而稍有改观，回观二〇〇九年教育新闻，最有影响的有两件：其一，上海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因贫羞交迫，无奈地自杀了，留下“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的警世哀言；其二，山东初中生张继鑫因翻校墙外出买食品被巡夜教师拿获，接受罚站后冻死在零下十度的户外。相较而言，后者造成社会的冲击波远强于前者，因为张继鑫是未成年人，并且被教师的施暴权力迫害致死。

对于张继鑫事件，知名评论家单士兵先生痛指为“教育杀人”，并对奴化教育进行了深度反思，称曰：“学生在长期粗暴简单的奴化教育下，就越发被驯服得更加顺从。”更令整个国家蒙羞的是，对张继鑫迫害致死的巡夜教师自事件发生后就受到校方的保护，校方辩称“两位教师并没有在处罚张继鑫后去喝酒”。

教育行业名列“缺德第二”

张继鑫事件至今尚未调查清楚，巡夜教师处罚完学生去喝酒的惯例继续被改写，校方甚至暗示张继鑫逃离了罚站现场导致隐蔽地死亡。校方声称：“二十一点二十分左右，他们还在宿舍外巡视过，并没有发现张继鑫。”这样的谎言无法应对常识：第一，巡夜教师拿获翻墙者张继鑫，自然会问明班级与宿舍所在；第二，既然被罚者逃离，巡夜教师理应去其宿舍查看。

缺乏常识逻辑的谎言其代价是一条未成年性命，张继鑫最后冻死在宿舍后面的一条沟里。校方的报告不仅说张继鑫“仰面躺着，死得很舒坦”，而且说：“张继鑫所处的排水沟有九十釐米深，五十釐米宽，虽然校园里面有很亮的灯，但是很难发现有人在里面。”

无论如何，整个事件将教育缺德的顽疾全面地刻画出来，使之成为继政法行业之后的第二大缺德行业。早在事件发生前的九个月，二〇〇九年三月份，一份民间职业负面评价调查就表明：在中国，最缺德的职业，政法名列第一，教育名列第二，医疗名列第三。被调查群体对教育行业的职业道德满意率不足百分之七，认为“行为与职德严重相悖”的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二。后一项仅比政法职业低百分之三。

“教育暴力”早已普遍化

尽管张继鑫本身并未遭受教师直接施加的肉体暴力，但是教师的随意处罚权却是比肉体暴力更厉害的精神暴力。精神暴力源於传统的师道尊严，即教师作为学生的道德楷模有权对学生作出精神与（或）肉体的惩罚；精神暴力也源於中共建政后移植来的苏联体制，即称之为“政教”的教育政治化机制。后者最重要功能是对学生的洗脑，而后才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就张继鑫事件本身而论，他完全可以采取再次翻墙的行为，逃离校园，找到避寒的去处，如藏身镇边的柴草堆（其校在山东省临朐县的五井镇）；或者，干脆跑回宿舍，等待教师的二度处罚；最次，也可破窗而入，躲进教室而不致在寒天冻地中丧生。但是，张继鑫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性的反抗意识已经被“教育暴力”所剥夺。这也正是单士兵先生痛指教育为杀人的根本原因。

张继鑫被“教育暴力”夺命固然可悲，但那些受此伤害而未丢命的学生们早已构成了一个新的受难者群体。受害群体涵盖了小学、中学、大学。仅以媒体报道的事件证明如下：二〇〇九年十月份，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双龙乡双龙中心小学的三名小学生，因未按学校规定带清洁工具而被教师处以裸体罚站，孩子们的 心理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十二月份，湖北武汉二十中高中一年级的四名同学，因上课说话而被教师处以十小时罚站，其中一名不堪承受而病倒；十一月份，杭州广播电视大学一位潘姓女生因与同室女同学稍生争执，被对方痛打十七巴掌，而后裸跪并高唱国歌……

“暴力遗传”泛滥成灾

上指女大学生施暴行为显然是长时间耳濡目染“教育暴力”即模仿教师施暴权力的结果，甚至说此种行为是广义的“教育暴力”构成元素之一。同样，张继鑫事件最初肇因 是受到同宿舍强势同学的逼迫，以致於半夜翻墙、自己出钱为前者买方便麵。前者的逼迫行为也是对教师权势的模仿。

中国的教育挟传统之弊，与苏俄体制之恶相交，造出怪胎杂种，几乎是一种文化宿命。九十多多年前，胡适先生曾有“教育亡国”之歎，现在大有成为事实的趋势，而“教育 亡国”与“教育杀人”、“教育暴力”也必将成为中国教育史的三大关键词。

在“新中国”教育微观史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似乎早已被“控诉性话语”所覆盖：在文革后期，一些从被迫害境地获得当局启用的教师几近疯狂地将自己受害的细节複製到学生身上，尤其在邓小平复出主张教育质量提高的时期（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四人帮”称之为“右倾回潮”），那些教师往往以“飞机式”、“头顶 墙”、“脖挂牌”等方式惩罚学生。特殊时期的教师兼具受虐者与施虐者的双重身份，揭示了“教育暴力”顽固存在的遗传基因。因此，中国大陆一位民间知名学者在其网络随笔集里面描述他少年时亲历此事时，深表感慨，并希望那些为人师表的老教师进行深度反省。

暴力与腐败相伴滋生

“教育暴力”作为一种特权，其另一面是腐败。二〇〇九年度内，国家审计报告显示“违规收取的择校费高达三点八四亿”，此类违规资金或被退还学生家长，或是上缴国库，云云。但是，据审计专业人士称：“该数据只是一管窥豹，林林总总择校费或冠名为赞助的收费绝不低於 三十亿”。

学校作为官场的一部分（如校长由教育局任命），其挥霍程度远比社会想像的要高。华北地区一家省级重点高中，二〇〇九年度招待费竟高达三百七十万元，超过日均一万的水平。当

然，其中招待费并非完全用于吃喝，而是给省教育厅与教育部来校检查工作的官员送购物卡。“一卡三万等闲事”，这家中学以教古文闻名全国的语文教师，对外界公开透露了招待费的秘密。

社科院公开发行的《社会蓝皮书——二〇一〇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由最高检学者提供的部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不再是“清水衙门”；由于学费昂贵，平常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学”已经成为社会极度不公的标志之一。

“你办事，我放心”的背后

[新浪 BLOG 每日排行第 24]

当年，“你办事，我放心”这张纸条，曾被宣传成为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曾是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最大的党规法理依据。

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则对这张纸条的来历及其真正含义，作了最新披露：

1976 年 4 月 30 日，毛主席会内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说在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民大会堂等候。

当时，毛主席的健康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

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藏起来了。”他说会见完外宾后，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

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

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法、意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华国锋向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回国后，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不接他的电话。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建国以来,我们有多少外援打了水漂? (附详单)

建国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

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 76 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 200 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对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 200 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 80 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 10 亿美元。当时（乃至今日），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瓢，无声的水瓢！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 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 90 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 200 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 4000 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 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未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 11.6 万支，大炮 4,639 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 1,100 位（也有资料说是 2,000 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 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 30 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 1978 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年长一些朋友兴许会想起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更加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是狼心狗肺的越南人把俘虏的 70 多名中国女兵在疯狂进行长时间的轮奸之后把她们全部一个个肢解成海豹人（斩掉四肢），除了个别烈性女兵被杀以外，几乎全部被俘女兵都活着并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交换战俘而交还给了中国。在战争期间这些被俘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 63 亿元的战争费用，560 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

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

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

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3、“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

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

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 600 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 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要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 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 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

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

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

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

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 1/4 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 100 多位的排序，再加上 9 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

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 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

中国的农民 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 1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 5 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 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 10 年后，到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 18.4 亿元。区区之数呀！

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 18 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間，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 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

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 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在 2001 年 11 月 12 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 30 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 3,000 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 1.1318 亿元和 270 万美元的到期债务。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不明白：我们的援外决策是如何敲定的，要不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方面的批准步骤。在今年初的一则新闻中，我知道了一个细节：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豁免俄罗斯的部分债务时，事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我们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要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地拉；我们对卢 旺达免债，是整亿整亿地免。

作为真正的富有者，慷慨助人是美德；可是，作为一个穷苦的人，作为在一个穷国、在一个

穷苦群落中的长大的一个自然人，应知道贫穷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所以，我对国家高层的这种举动不理解、不安、充满疑惑。

OM 我们的农民要挣回每一个硬币、每一个铜板，每一毛钱，在“锄禾日当午”的一类的原始劳动里，要付出怎样的血汗。

有一次我们给朝鲜 15 万吨粮食，美国也援了 17 万吨。作一个粗略的核算：在我国平原的粮食主产区产量，及普通农户土地的拥有规模，一家在一年里大致可以出余粮 0.75 吨。凑足这些粮食需要 20 万户农民、60 万个家庭成员，要通过体力肉搏的劳动，忙上几个月才能获得，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劳务量；而美国人凑足那么多的粮食，几家农场主、花费极少量的劳动工时就可以轻松搞定。

为了援建阿富汗，我国送了 1.5 亿美元、3000 万元的物资，以此作为给阿临时政府的礼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如果今后 5 年，阿富汗得不到 100 多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很悲惨……可是，阿国临时主席卡尔扎伊不同意安南先生的这个估值，他说，至少要 450 亿，才能够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太悲惨”

为什么阿国的领导人能如此尽力地为 自己正在遭难的人民谋利益？而建国初的我们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深，我们做了什么？

还有，他们的人口才两千多万，我们的当年人口是他们的 20 倍，按秘书长先生的“保守”口径测算，我们至少需要 2,00 亿美元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不太惨”的生活。可是，我们得不到一分钱的援助，这倒算了，我们认命。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外人呢？

为什么别人遭难时，要得到援助？别人贫血时，可以得到血液的输入？而我们的人民非但得不到，我们的当家人反而作出违背常理的决定，要在贫血之躯上大剂量地抽取血液，然后，再去救助别人？！

难道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人在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是不是说，中国人能够吃苦，善于吃苦，那么，干脆就让他们去吃吧！新政权已经建立 50 多年了。扪心自问，我们仍是一个“贫血的中国”。那些为塑造朝气蓬勃的“少年之中国”，为实现“可爱的中国”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先贤、先烈见了此景，九泉有知，他们能瞑目吗？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血的中国，一个红润的中国，一个健壮的中国？因为只有健壮成为了中国的常态，我们才有与别人、与他国竞争的实力，才有在竞技场胜出的可能。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人民有权对自己劳动的所得进行处置，有权对此发话的话，人民同意这么做吗？假定我们的援外决策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生效，人大常委会里有 60% 的农民代表，农民们会在这种“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拯救他人”的决议案里投票赞同吗？大家联想一下：如果没有如此令国民难以承受的外援负担，国库空虚，我们中国当年会稀罕如今让日本人作为政治筹码而津津乐道的十多年来加起来总值折合 300 亿美元的日

元贷款吗？更何况这是连本带息要还的“贷款”而不是日本人给予中国的免费捐赠，如果中国当年的决策人不放弃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话，那么 3000 亿美元的赔款都不够！

关于海啸我们中国确实应该捐一点，但是，我们中央决策人的头脑应该听任不怀好意的美国媒体来左右吗？不错，美国的确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可是如今它的财政赤字却靠的是通过发行大量国债来填充国库，而中国却是它的除日本之外的第二大债权国。如果美国经济彻底崩溃，它甚至可以耍无赖翻脸不认它的国库之中的外债，那么，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债权国家就“手持”美国债券而欲哭无泪了。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美国就敢不讲道义去攻打伊拉克，而自古就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经过毛主席、周恩来……时至今日的诸多中国决策人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国际信誉能和美国、日本这些个无赖流氓国家相比吗？更何况当今中国并不富裕，不能同西方诸多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中国随手就捐出多少个亿，值吗？对于自己国内的诸多情况比如说有关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怎么没有这么慷慨而且还号召老百姓捐钱……？君不见：下岗工人在哭泣…失地农民在哭泣…失学儿童在哭泣…交不起学费的贫困大学生在哭泣…讨不到血汗钱而无法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农民工，这些繁华城市的建设者们在哭泣！白血病患者在哭泣！

以前产生的决策败笔，能不能警示中国以后的决策人：作出的某个决策，人民答不答应？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会不会有人挥着指头戳决策者的脊梁骨？最后的一句话，是壮着胆子对我们的权力阶呼号一句：终止一切对外援助，全力救助穷苦农民！请！！

对于这次印泥海啸：我国政府捐 6.68 亿人民币，民间捐 5.6 亿人民币！共计 12.28 亿人民币！作者：夏韵

转自

夏韵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xiayun3912>

夏韵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xiayun3912>

“1970 年 2 月至 11 月间，十个月里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 万名，逮捕 28 万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资深记者周海锋《尘封内幕》。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军代表说对照中央（70）3 号《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文件，我是重点打击对象，属“恶毒攻击”之列。大会上不止一次的点我的名，气氛异常恐怖。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不敢和我说话了，知交路迁也形同陌路，面如冰霜，转身扭头与我擦肩而过。我不断被拖出去批斗。

“……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你生存的社会，你“恶毒攻击”这个世界还是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人过的，何其毒也……”台正中，批判者手执讲稿声厉腔正吐字如吼；台边的我，千夫所指，低头恭立；台下阵阵口号此起彼伏，声声骂我“罪该万死”。——为这莫须有的一句话已经折腾到第五个年头了，不是文革过来人，谁会相信，谁能体会阶级斗争的残酷无情。

我死死盯着脚下水泥地面上的一个巴掌大的“伤疤”，越看越像那个女人的脸：狭窄的前额，

圆圆胖胖的下巴。我的泪一滴滴落下，滴在她的“脸上”。我已不敢恨她怨她了，只想求她良心发现，说句良心话，留我一条活路。

此时，身陷囹圄的我，尚不知她早已一推六二五，否定了当年对我揭发举报，来个一向三不知。可以想象，不远数千里外调的左派是何等的尴尬失望。但是，对阶级斗争已走火入魔的左派大爷大娘们，为了证实阶级斗争的尖锐，无风还会捕风捉影掀起三尺浪，怎么舍得放过我。他们警告我说：没有证据一样定你的案，别以为烧档案材料没你的事了，这笔账也要算。

人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脸？1966 年底给我平反，他们传达党委指示，给了我明确答复：“这个世界还叫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这句话是写在夫妻通信中的话，即使证据确凿，也只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何况证据不足。是他们当场动手烧掉了这份材料。当时我的平反公告还没出来，我是应他们招唤，以戴罪之身走进政治处的，怎么能红口白牙造舆论，给我强加上烧档案的罪名。

伪造我夫妻信件的人不认帐了。只能寄希望于逼供信，要我的口供，以造出一个“反革命”来。但是，我是共青团员，曾先后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从我几十万字的日记中挑不出一丝一毫对时政的任何微词，从我 200 多封夫妻友人来往信件中，找不到任何对时政不满的言论，我工作努力、热心助人口碑不错，就凭伪造的我给丈夫的信中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可以“压出”一个反革命来，实在是太难了。

军代表工宣队发话：不承认就不停地“斗”。于是：组里斗、室里斗、院里斗。我工作的机关的批斗还没结束，丈夫工作的科室排队等着斗我。如果他们不是打着毛主席的革命旗号，我真想和他拼了——我死你们也别想活。

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的“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形同虚设。一次次的面对粗俗、野蛮、辱骂；一次次的身临刻薄人、戏耍人、侮辱人的斗争会，花样翻新的折磨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终于身心崩溃，一次次晕倒。

丈夫一次次背我回家，俯在我身上痛哭。他劝我：认了吧，再挣抗下去我们全家都活不成了，难道你看不出，他们是想逼你死啊！为了能活下去，为了我们一双儿女，我咬牙认了那封信里的那句话。我承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攻击社会主义”、我“罪该万死”，令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历经数年为这一句话折腾，捧场的人也厌烦了，说可以交代过去了，同情我的人叹我能过“关”了。但是，居心叵测的人并不满足，令我必须交代出信的来龙去脉，挖出思想根源。那句孤零零的一句话本没有上下文，我编不出来龙去脉，又从何处能寻找到思想根源，批斗会又陷入僵局。

“你母亲死于三年困难时期，是怎么死的，想想看你当时……”那个长的人模人样的政工干事温和地启发我。像一股电流袭来，这声音入双耳穿心而过传到脚心，我不由一阵痉挛，心想，这不是在诱供吗？

“我母亲是 1962 年秋因病去世的，我家世代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河南“信阳事件”饿死人发生在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饿死的多是乡下农民，你们可以去核查。”我急切地申辩，想解释清楚一些，没想弄巧成拙，吐出“信阳事件”这个犯忌的词言。

“不许反革命分子……放毒！”

“不许……继续攻击社会主义！”

一阵狂轰乱炸，一个高大的女左派站起来，一巴掌死摁我的头，我跟踉欲倒，眼冒金花，脑子一片空白，头皮发麻。我知道我犯了大忌，眼前浮现出因汇报思想谈及饿死人而被斗自杀的同乡少年小伙伴蒋**，记起他叮咛过我的话：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信阳事件”。

我后悔极了，也紧张到极点。真该死，我应顺着政工干部的启示，把母亲去世原因按他们臆想的原因说出来，不就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了吗？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指出秃子头上的虱子样，抖搂出当局惟恐遮盖不严、动辄以“攻击”罪论处、令民众三缄其口、不准言“饿”的伤疤。

一阵恐惧袭来，我视线模糊思维支离破碎连不成串，眼前的人都突然变得有两张相似的面孔，我想说我不行了，却吐不出一个字。我想逃，我像是飞离了地球，又分明记得只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死，一条是疯，我没有疯我不会疯，难道我是死了吗，我听不清人们说些什么，继而便什么也不知到了。

第二天勒令上门，我必须到会继续接受批判。我看到人们一堆堆窃窃私语，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规划室陆工程师自杀了。吊死在江边小山上的凉亭里，模样惨不忍睹。

我第一时间想起1966年夏天劳改时，院长带着我们一起修的那条通往小山凉亭的石子路，如果不修路，陆工的步履会受阻，如果没有路，他脚下的杂草瓦砾也许会延迟他走向死神的时间，羁绊他迈向黄泉的脚步……他瘦瘦的身影，雅儒白净的面庞，浮现在我的眼前，听说他被列入“另册”仅仅因为与海外文化名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

一个左派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的所见，我不忍听下去，痛惜地自言自语“怎么没有看管好呢？”他瞪我一眼说：“他要自绝于人民，怎么能怪别人。”众人异口同声：死了活该，罪该万死。——我想起就在几天前，据说是走群众路线要革命群众讨论对反革命的判决，我听见每念到一个人名，大家都是异口同声地喊：杀！叹多少专制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行之，极权淫威震慑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不暇，只能隐匿良知，变得麻木自私残酷。

自杀是自己“杀”自己，怎么能怪别人，但是，好好的一个人能自杀吗？人死的太多了，人心也变得粗糙了，除了亲人，很少有人再为死者扼腕唏嘘，文革的悲剧本来都是独角戏，除了受害人，找不到谁是害人之人，没有人为死去的人承担责任。

源于厚重浩瀚的中国封建文化之海、和现代迷信之山的日旷持久的中国“文革”，象一条恶浪翻滚川流不息的河承载着过去，突出着现代，把血腥野蛮推向了极至。

“他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声音分明是从衣着得体，举手投足溢满正统之气的政工干部口中吐出，我却分明感到那声音象是野兽一样的嚎叫。我心里永远不能接受这种被时政倡导的判断事物的逻辑，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鲜血和死亡，只能一次次承受警魂掠魄的胆寒、恐惧，我不敢哭，更不能说一个不字。因为逼人自杀的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军代表工宣队行之有效的执政权力行为。

“自绝于人民”是比宗教法庭还要可怕的、对失去自由、在精神暴力逼迫下产生原罪感而绝

望的人、实施的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死亡判决，而且，这个判决在个体生命自己对自己执行杀戮后并没有了断。以“畏罪自杀”的罪名对死人的批斗才是“人民审判法庭”最拿手最得意的绝活。“人民审判法庭”的教义是阶级斗争，执行者不是三教九流，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正统权力阶层。要不为什么胡耀帮平反冤假错案，最大的阻力会来自各级组织部门。

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惺惺惜惺惺，劳改间隙我偷偷地沿着那条小路走上小山，放眼望去滚滚的江水浩浩荡荡，混混沌沌。我转身走进凉亭，抬头仰望不知是哪根画梁承接过一个雅儒文人因绝望而托付的生命。这卑微的生命曾经卑微的存在过挣扎过，终于带着原罪给他的伤害决然自裁，其苦其悲，何勘怜。

一阵颤栗，空气异常空阔寂寥，看着廊柱上一个缓缓向上爬去的小虫，我倏然泪下，同为生命，我们远不如能自由自在、迎风接露活着的昆虫啊。

血红的夕阳，红头涨脸，张着血盆大口注视着我，带着几分狰狞、几分得意。我不敢久留，匆匆对着亡灵魂归处说声：陆工，一路走好，转身飞快奔下小山。

又经历一年折腾，还是下不了地，1971年我们几十个工程师、技术员被下掉城市户口，发送农村当农民了，而且明确告知“不是一阵子，是一辈子”，“表现好了，可弄个小队会计当”。

文革历史是一面镜子，折射着时代的丑恶，人性的丑恶，好制度能使坏人向好，坏制度会使好人向坏。文革给人们留下伤口，也留下血的教训，我们不应忘记。一个民族没有勇气面对历史，是可悲的，一个执政党只能在审视历史中创造未来。对文革的清算不从制度性根源去发掘，不仅一代人的血泪变得毫无意义，后代人必然仍活在文革暴力随时降临的恐惧里。

宋君健 2009-11-04 17:24:36 [举报]

你老哥我就是那时入狱的。

淮南楚樵 2009-11-04 19:22:10 [举报]

君健兄不要对夏韵大姐称“老兄”，她可能比您年长。

博主回复：2009-11-05 10:46:59

论学识，你们都是我学习的兄长。请不吝指教。

淮南楚樵 2009-11-04 19:25:27 [举报]

那样的年月，被迫害者就是自杀，也会增加罪名，叫“抗拒改造，死不认罪”，有的地方甚至“斗尸”。

博主回复：2009-11-05 18:08:27

个体生命的命不是自己的，没有了断自己的权利，所以，批斗亡者屡见不鲜。

淮南楚樵 2009-11-04 19:29:41 [举报]

1970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时，实行歧视，凡被“专政对象”的子弟一律不招，我们知青有自杀的，有因为“现反”被杀的。

苍月 2009-11-05 01:16:36 [举报]

那段岁月实在是不堪回首的岁月，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恐怕我们的后代不太能看得懂那段历史的究竟了。问候您！

博主回复：2009-11-05 11:49:32

回忆文革的——不怀念文革、怕再来一次文革：

不回忆、不让回忆文革的——怀念文革、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不深究产生文革劫难的原因，无论是庙堂或民间都在文革的阴影下。刘少奇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会死的那么惨，他遭难曾高举宪法，晚了。

zhuchi38752009-11-05 15:15:36 [举报]

发去的电子邮件见到了吗？

博主回复：2009-11-05 17:42:59

谢谢。刚刚看到。

悟空 2009-11-05 16:05:25 [举报]

两次评论都被删了，不知你看到没有？

博主回复：2009-11-05 18:16:01

没看到。刚刚给你发了回复，被删。三中全会否定 文革，批判揭露文革是响应党的号召，老是删，删，删，中选部要干什么？

自由的鱼 2009-11-06 20:55:29 [举报]

拜读那惨痛的历史，绝不能忘却的记忆。

博主回复：2009-11-07 07:45:18

谢谢光顾。很喜欢读您的博文。欢迎常来。

迷津渡客 2009-11-07 04:16:39 [举报]

反思文革吗？ 文革究竟有没有向上的一面呢？

博主回复：2009-11-07 07:40:16

读过您的博客，您的博文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力主正义的人。所以我想讲一讲我的心里话。在 今日正直的年轻人看来，毛主席当年支持老百姓“四大”自由、号召惩治各级官员，是今日的中央不敢为之的。以为文革有好的、向上的一面。朋友，您知道吗，当年的青年人就是因为和您现在的想法一样，而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那短暂的不到一年的愤青岁月，叫他们终身背负着悔恨的十字架，因为他们的血统是平民。文革里的“四大”是毛主席恩赐的，你只能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反他要反的人，目的是更强化他一人的皇权。文革创党内斗争丑恶之最，我的看法是：要斗关起门来斗好了。干嘛把全国人民也拖进去，打得天昏地暗。文革有没有向上的一面，平民过来人 心中自有答案，也许这就是当局为什么封存文革的原因吧。

苍月 2009-11-07 05:12:33 [举报]

秋凉阵阵，勿忘添衣，朋友多保重！

博主回复：2009-11-07 06:41:58

谢谢朋友问候。欢迎常来坐坐。您也保重。

丁菱 2009-11-07 18:32:29 [举报]

博主很具体回忆了当年的情形。灾难，不堪回首啊！让人们记住吧，特殊年代是怎样把人变成魔鬼，去残杀另一部分人的。

博主回复：2009-11-07 19:01:02

是阶级斗争学说硬把人分成两类，让一部分人残害另一部分人，其实他们是无罪的。我对他们现在过的日子很同情，他们不是权贵，即令当年炙手可热，毕竟除了政治没有什么真本领，再加上子女大多不太成气，在竞争的年代，可想而知。

卢仗义 2009-11-15 13:05:15 [举报]

对于文革的受害者来说，那是一段痛切肺腑，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岁月！

三傻子 2009-11-17 11:20:48 [举报]

稀里糊涂的年代，全国人民都被那罪该万死的家伙搞疯了。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但这不是阶级斗争。这只不过是人性扭曲的人或者说那些以阶级斗争晃子下为达到卑鄙的个人目的而耍的把戏。这种事也不是文革的发明，历史上多得很，以

后也不会绝迹，但表现形式一定不一样了。

成天在网上打着高举毛主席思想旗帜，高叫文革正确、喊打喊杀的新世纪红卫兵们滚进来好好看下文章！

※※※※※

买不起房，住不起院，上不起学校，逛不起商店，打开邓选找到答案，原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翻到最后，我靠，一百年不变！ 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不顾受批判 呕心赈粮荒

(2008-1-26 14:50:55) 有 0 位读者读过此文 来源：新闻午报 打印本页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各地纷纷告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要决策，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陈粮食危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 1959 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加之从这年起，全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实际为 3073 亿斤，比 1957 年减产 21.2%，人均占有粮食为 433 斤，比 1957 年减少 170 斤。

一些干部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不敢讲真话、实话，粮食虚假的高产数字降不下来，1960 年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 6000 亿斤。这样就使中央原来确定的粮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坏，带来了粮食的高征购。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征购了农民的一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1960 年、1961 年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 1 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数量过高，征购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城市和工矿所需口粮也难以正常供应，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人们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树叶、挖观音土充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

1960 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不顾自己刚遭到错误批评，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提出解决意见。1 月 13 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4 月 16 日，他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截至 4 月 5 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 517 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 13 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

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

当时，李先念还亲自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1960年6月至7月，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他发现，饿死人比较多的光山县是信阳地区的一个重灾区，搞浮夸最严重，县里干部竟然宣称亩产高达万斤。李先念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这位负责人仍然不能面对现实，还滔滔不绝地说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

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河南信阳的情况。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李先念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共产风”严重而暴露较早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这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信阳地委积极开展了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阅后，于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将此报告发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随即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各地重视，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四项应急措施

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6个报告，在10次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 and 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第一项应急措施] 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

从1960年初开始，粮食缺口大已经显现，粮食调运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为保证完成粮食紧急调运任务，李先念提议，经中共中央于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并决定由李先念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

1960年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未解决。7月5日，李先念和谭震林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的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万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他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

李先念告急时，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地区。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李先念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第二项应急措施] 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

1960年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农村口粮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李先念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400斤；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320斤；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00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要从上年度的590亿斤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不能降低；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可以适当照顾，但要与远郊区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同年10月8日，李先念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

[第三项应急措施] 从国外进口粮食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度过灾荒大有好处。”

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1961年2月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当时，把船上的散装粮食卸

到火车厢里，开始是用铁抓斗，但撒漏多，后由沈鸿和粮食部科研所负责人傅立民研制出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轮船中吸出来，解决了装卸粮食遇到的这一难题。

由于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进口粮食43亿斤，首先调运给京、津、沪、辽和重灾区，避免了粮食脱销的危险。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平均进口为109.4亿斤；出口粮食127亿斤，年平均出口25.4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平均净进口84亿斤。这对于解决当时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项应急措施] 减少城镇人口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用于供应1.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陈云、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李先念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经过调查研究，他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

他在信中写道：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他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谈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万八千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

为吴芝圃平反对不起河南人民！

古彭万俟轩

1979年1月24日下午，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xxx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吴芝圃真的像悼词中说得这么崇高伟大吗？悼词中所说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究竟又是指的什么东西呢？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至今蒙在鼓里，被改革派“精英”们年复一年的继续忽悠着。为了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吴芝圃在大跃进年代亲手导演的“信阳事件”，以及他本人的多次忏悔吧。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大刮“浮夸风”和“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

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中央高层注意。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先后派人到信阳调查，毛主席还专门为此做了批示，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对信阳事件做出处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信阳事件”先后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出现大批非正常死亡，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期间，河南造反派把吴芝圃从四川抓回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

那么，吴芝圃本人对“信阳事件”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1962年以后，吴芝圃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每年都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还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档案资料还显示，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大跃进年代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在全党第一个站出来搞“浮夸”、“放卫星”。在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时，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主席根本不信，当场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毛主席还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但是，吴芝圃对毛主席的批评无动于衷，仍然顽固推行形“左”实右路线。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1958年夏收时，在嵯峨山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高产田。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亩产数字全是谎报的。当信阳地委发现正准备纠正时，《河南日报》已把亩产几千斤的消息刊登出来。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这一消息，还专门发了号外。河南省在下面吹，人民日报在上面捧，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全国各地趋之若鹜，“放卫星”成了时髦。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当年为高指标、“浮夸风”拼命呐喊唱赞歌的是《人民日报》，而中共中央负责宣传把关的主要负责人、统一《人民日报》宣传口径的就是SXP和彭真。他们的呐喊支持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吴芝圃是河南“信阳事件”的始作俑者，也是阻挠中央调查事实真相的主要支持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作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对此难辞其咎，也是不应该推卸责任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那段历史，再看看吴芝圃亲口说的话和检讨，就会明白当年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连吴芝圃本人都承认自己“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并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这样一个对河南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人，却在1979年非毛反毛的大环境、大气候下得以平反昭雪。改革“精英”们对毛主席多次纠“左”的努力故意视而不见，却偷天换日将极左帽子反扣在毛主席头上，并为大刮“浮夸风”、虚假产量、大“放卫星”造成“信阳事

件”的始作俑者、滔天罪人吴芝圃平反昭雪。这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历史是不容小人和伪君子随意打扮的，朗朗乾坤也不能容忍那些阴谋家们永远一手遮天。历史真相大白天下之日，就是小人、伪君子、阴谋家被钉上耻辱柱之时。其实人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为吴芝圃平反昭雪只是一个信号，也是改革“精英”们别有用心惯用的伎俩，其目的就是给毛主席抹黑。然而，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初衷事与愿违，因为人民总会觉醒，历史已经在人民心中定格，河南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谁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完全有理由作出如下结论：1979年给吴芝圃平反昭雪是改革“精英”和阴谋家们非毛反毛的阴谋，它愧对全体国人，更愧对河南人民。欠账总是要还的。总有一天，哪怕他们已经到了九泉，其灵魂也会向国人赎罪，不然永远都不会安宁！

（转载请署名并注明出处）

欢迎光临古彭万俟轩网易博客，并期待您的精彩点评！

<http://wangjiting88.blog.163.com>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文

1958年8月27日刘西瑞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

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他们的庄稼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是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脘”。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上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早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显然是有片面性的。

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半尺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象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苗，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个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

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帐，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

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

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

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

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高射炮：真不知道你脑袋装的是大粪还是感染三聚氰胺的炼乳，看看你自己16楼的自相矛盾的垃圾：“现在不是有的干部腐化堕落，。。这些的人行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干部搞腐化不是中央的号召，也不是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更不是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制度要求。而是人性没有在道德的轨道上行进的后果。”

吴芝莆时代不同，吴是老革命家，是中国高层官员在地方上执行中央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没有上级的指示和政治要求，他有十个脑袋也不敢执行饿死数百万老百姓的荒唐政策。他要负责任，但因执行上级的指示而出现了负面后果就要负完全责任，甚至受到了其它的政治迫害也不能为其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

掰开你脚趾头再加你这个猪头想想，按你的逻辑现在的贪腐官员是要个人负责的，而毛时代的吴芝圃犯得错就该毛主席和上级负责任，就你这号垃圾货色也好意思出来侃侃而谈？所转文章那么清楚指出吴本人多次就‘信阳事件’所做的检讨和认识，你文章都没看全，就跑来喷粪，什么玩意。

李庆刚

[关键词] “大跃进” 研究综述 1995 年以来

[中图分类号]D651.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1-0053-13

[收稿日期]2005—01—10

[作者简介]李庆刚，博士，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100091。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 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1]本文拟就 1995 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以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为主)的观点，不包括有关著作中涉及“大跃进”的相关内容。有的学者在 1999 年发表的文章中，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跃进”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述评，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大跃进”的提出；“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大跃进”运动中的教训与启示。[2]1995 年以来对“大跃进”研究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这几个方面，而且对这些经常探讨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深化。

(一)关于“跃进”或“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及演变

张志辉指出，一般认为，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以“跃进”代替“冒进”的开始。他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指出，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出现“跃进”一词，比 11 月 13 日早近 5 个月。[3]李丹慧对张志辉的考证进行了补充，主要说明了当时由于“反冒进”而反复检讨的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信中表达了不取居大禹之功，表明自己报告中的“跃进”一词，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精神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4]齐霁在研究综述中，对两人以上的观点进行了总结。[2]李庆刚对各种“跃进”词汇进行了考证，认为“大跃进”口号是 1957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这一社论中提出的。[5]鲁振祥考察了“跃进”一词从普通词语到赋予特定含义的过程，认为有三篇文章与此密切相关：一是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二是 1957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三是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考察了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的嬗变以及“继续大跃进”和“大跃进”一词的关系，考察了“调整”代替“大跃进”的过程以及直至 1979 年才发生的对“大跃进”从正面赞颂到批判否定的变化。[6]

(二)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原因

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探讨，是“大跃进”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

李向前探讨了促使“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因素：第一，中国当时的经济模式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内外部压力越大。“大跃进”的发生与此有关。第二，为了走自己的路。“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冲动”，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实验。第三，理论约束与现实矛盾。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尊重苏联某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创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政策。一方面，我们要争取高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苏联的

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临着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的现状。这些矛盾给发展战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四，造“因利制权”之势。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世界局势相对平稳，毛泽东有“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同这个时期内外环境特点以及我们试图加以利用它们的战略考虑有关。[7]曾红路[8]、黄爱军[9]、杭国芳[10]、王令金[11]、李成贵[12]、虞文清等人[13]与李向前的观点基本相同。王玉贵指出，对于1956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如此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14]王军正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及中国“赶超”战略，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观点的错误理解及宣传，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15]李知明指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二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三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关系，五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16]王萌硕指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所存在的急于求成、狂热个人崇拜的特殊社会心态为“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使发动这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压力。[17]何云峰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对革命经验的采借有关：以群众运动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导恢复供给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突出政治挂帅，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8]朱地也指出，“大跃进”的发动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渊源。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又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19]尹书博从政治体制层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动与持续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错误指责，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的错误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法制很不完备，以政代法，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20]李若建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他认为，不应该把个人或某个阶层对“大跃进”的影响因素夸大。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压力等三个方面，对“大跃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21]杨乃良通过分析，也认为个人和基层单位在“大跃进”发生过程中都担当了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责任。[22]李若建还指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体制等经济体制都对“大跃进”发生有影响。[23]此外，李若建还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大跃进”中的狂热行为，认为下放产生的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者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4]吴海红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5]齐卫平、王军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都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是一对并列的错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26]

对于导致“大跃进”发生的外部因素，特别是国际因素，学者们讨论的很多。

宋银桂指出，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共有一种抢速度的紧迫感，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迷信后，中苏之间的齟齬使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27]程重阳指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与抓时间搞建设，“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独立自主搞建设，这三方面是导致“大跃进”发生的国际因素。[28]刘际钢、林桂平指出，如果没有从50年代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会使中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也不会使中国党内“左”倾思想加速发展，导致“大跃进”的发生。[29]李安增、赵付科[30]、李晓勇[31]等人以上的综合观点基本相同。刘建国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是影响和推动“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因素。[32]陈冬生研究了中苏关系的演

变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包括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33]

对以上学者们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成果，高其荣进行了综述，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观点，即：“国际环境压力”论、“摆脱苏联模式”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论、“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论、“国际赶超热潮影响”论，“国民心态推动”说、“存在社会基础”说等。[34]

(三)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总体评价

李锐指出，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35]李付安指出，“大跃进”运动因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造成这场悲剧根源的因素在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方面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36]针对有人片面肯定“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就；郭德宏指出，对于“大跃进”期间取得的成就，当然不能否定。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远比成就大得多。“大跃进”除了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以外，还造成三个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人文环境造成严重破坏。[37]虞文清指出，“大跃进”运动不同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仍是一场生产建设运动；它虽是领导者轻率发动的，但还不是错误发动的，更没有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党在前进中犯的 error，是探索中的问题。再次，“大跃进”运动看起来也不应全盘否定，应该看到有失有得，只不过失大大超过了得，得不偿失罢了。[13]

对于“大跃进”的总体评价，涉及怎样认识“大跃进”运动本身和“大跃进”时期的问题。董志凯指出，“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时期不能等同，应该将两者加以区别，“大跃进”时期取得的成绩不是“大跃进”运动直接或必然的产物。[38]陈卫华指出，两者是不同的，当把“大跃进”运动本身与作为时间概念的“大跃进”时期分开时，就会发现虽然这场运动是错误的，但在这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39]

关于“大跃进”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董志凯指出，“大跃进”运动对我国工业建设作用基本上是负效应。它阻碍了工业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进程。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大跃进”运动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成绩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38]陈卫华指出，“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同时，“大跃进”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探索，开辟了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个认识的获得与“大跃进”中对现代化的探索分不开；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由于当时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资金、设备、投资，也由于党进行了几次纠“左”努力，仍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今天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反面经验。[39]杨大利指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把人们从农业激进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定思想和政治的基础。[40]

有的学者还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鲍素萍指出，“大跃进”的教训是：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培养一批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经济建设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的原则。[41]刘际钢、林桂平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发展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要力戒急躁情绪，虚心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建设中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能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当作教条，照搬套用到经济建设中去；必须从自身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9]虞文清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教训是：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尊重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必须继承而不能丢弃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必须正视错误而不能回避矛盾。[13]李付安总结的主要经验有：

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不能拘泥于旧有的经验、做法和模式搞建设；解放思想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42]

(四)关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口及相关问题

很多学者对“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损失问题进行了研究。

李成瑞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有关材料研究后，估算我国1958~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蒋正华教授经过研究，估算1958~1963年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李成瑞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200万(2158万)，科尔、蒋正华两人采取的方法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的科学性更高一些。[43]李若建根据有关计算，推算在困难时期中国损失的人口在3000万以上。[44]丁抒在有关文章中，认为死亡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45]造成人口死亡，粮食不足是一个关键因素。林毅夫、杨涛以经济计量方法对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46]李若建对“大跃进”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情况进行了研究。通过数据分析，他指出，虽然饥荒与粮食短缺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粮食的使用与分配。[47]

此外，李若建就“大跃进”时期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流动人口的构成、流动的成因以及流动人口的安置与归宿等情况进行了研究。[48]同时，他还对“大跃进”时期的人口迁移类型及遗留的问题进行了研究，[49]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家庭、婚姻与生育问题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其表现形式和规律。[50]

(五)关于与“大跃进”相关的“三年自然灾害”问题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有的学者却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金辉在分析有关数据后指出，1959~1961年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国气候可以说是天公作美。他指出，“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法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51]丁抒赞同金辉的观点。[45]王维洛指出，“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是宣传与强制性思想教育的结果。他根据有关数据，认为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52]

对于这种说法，有的学者也运用有关数据进行了反驳。陈东林指出，应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53]陈东林还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从农村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4]中国气象局的张海东、张尚印、李庆祥对我国1959~1961年期间的气候特点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总结，认为这三年期间的天气气候条件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严重年份。[55]

(六)关于领导人与“大跃进”关系的研究

毛泽东与“大跃进”的关系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赵士刚指出，应当把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经济建设的“冒进”结果区别开来。国际历史环境的压力、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加群众运动能创造更高生产力与毛泽东“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想等能解释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愿望的成因，但不能说明“冒进”的成因。[56]王玉贵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严厉批评与“大跃进”运动发动之间的因果关系。[14]陈晋指出，“大

跃进”以后，对经济工作不像在军事上那样自信的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57]陈立旭分别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概述了毛泽东纠“大跃进”之“左”的努力。[58]王建华的研究指出，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有认识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也有奋力纠“左”的重大举措，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成果。[59]任萍就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进行了研究。[60]张德鹏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心态。[60]唐蹕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进行了分析评价。[62]王贵安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政策进行了研究。[63]张德鹏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采用的发展生产力的错误方法进行了研究。[64]王也扬较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分析了这种思想的现实、历史及哲学来源。[65]王明生对“大跃进”前后毛泽东的分配思想进行了研究。[66]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有关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李晓红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为例，对“大跃进”中刘少奇的求是精神作了总体分析并指出了其原因。[67]曾成贵指出，刘少奇当时是极力主张搞跃进的。但在纠“左”期间，刘少奇主张采取朝前看的态度，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与毛泽东是一致的。[68]黄岭峻也指出，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69]杜本礼就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反思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70]

此外，乔培华对“大跃进”中有着极大影响的“信阳事件”作了概述，指出了周恩来对这一事件的关心与检讨。[71]蒋永青对陈云在“大跃进”后恢复农业和减轻国民经济损失的努力作了研究。[72]马冀就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模式的反思进行了研究。[73]尚柯记述了“大跃进”期间李锐给毛泽东写的三封信的内容及其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74]萧岛泉的文章反映了杨献珍在“大跃进”中的言行和品格。[75]郜忠武的文章，反映了赵树理在“大跃进”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和大搞公共食堂的做法。[76]

(七)对地方及各行业“大跃进”情况的研究

朱培民对新疆的“大跃进”运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并分析新疆的“大跃进”运动错误和损失较少的原因。[77]张业赏对山东“大跃进”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78]石尚斌对贵州“大跃进”的发动、过程及造成的结果与经验教训做了概述。[79]孙保定对“大跃进”期间河南人民公社的发展状况做了研究。[80]尹书博阐述了“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81]郭圣莉、高民政研究了“大跃进”中上海居委会组织“大办经济”的功能及其主要活动。[82]高华、黄骏简要分析了1960年“持续跃进”中城市人民公社兴起的背景、内容以及若干特征。[83]周飞舟对与“大跃进”有关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大部分省份对灾荒作出的反应和救助一方面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即使大量返销救荒，也显然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够及时，同时现行的购销体制内含高昂的执行成本，大大降低了对灾荒的救助效率，使得本来就已经太晚的救荒变得收效甚微。[84]

对省以下地方“大跃进”有关情况的研究，有的学者挖掘得较细。如：张胜林对当时河南省信阳县鸡公山水稻浮夸情况进行了调查；[85]陈兴荣对四川省安县“大跃进”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86]梁志远就安徽亳县农业大放“卫星”情况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教训；[87]左颖巍考察了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炼钢铁”运动的有关情况。[88]

另外，学者们也对各行业领域的“大跃进”情况进行了研究。罗平汉对科学界的浮夸情况进行了概述。[89]“大跃进”运动中，统计工作的浮夸为运动火上加油。赵胜忠和孔德超的文章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90]李荫培考察了北京市统计局工作在“大跃进”中受到挫折的情况。[91]辛建领记述了济南一中在当时大搞“体育大跃进”的情况。[92]

(八)关于“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研究

翁有为对 1958 年的“大跃进”思想、人民公社思想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了探析。[93]宋连科分析了“大跃进”思潮产生的条件。[94]万俊人从道德的角度对“大跃进”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没有科学理性的约束、缺乏健全社会体制规范或制度控制、没有健全的公民美德的支持和基础，社会总体化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文化道德行为就会失控，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盲动。这是“大跃进”时代经济冒进的社会心理原因。[95]王章维、郭学旺探讨了“大跃进”中的国人心态。这种心态主要有：忽视客观规律，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违反科学原则，狂热的权威崇拜的社会心态；缺乏理智思考，巨大的社会遵从和行为依附心态。[96]罗重一从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赶超”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思想四个方面，分析了“大跃进”发动之初时的思想环境。[97]王光银指出，“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着“急于求成”、“攀比竞赛”、“‘左’比右好”、“妄自尊大”、“盲目崇拜”等五种特殊的群众社会心理。这些群众社会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8]谢永川指出，“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急于求成、自负、崇上、盲目攀比、从众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形成。[99]崔广陵论述了三种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大跃进”运动之间的关系：一是强烈狂热的赶超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盲目提出和制定不具现实可能性的赶超战略；二是主观精神决定一切的唯意志心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以为凡是只要想为的就能达到目的，从而导致不顾客观条件的空想与盲干；三是普遍的过高欲望期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辅助之下，那些“左”倾冒进决策才得以顺利地贯彻与推行。[100]

(九)对“大跃进”时期社会群体及事件的研究

任何运动都是由人参与其中的。对于“大跃进”中群众的热情与干劲，李成贵给予了赞扬。他指出，人民群众在“大跃进”中表现出的艰苦奋斗和纯粹献身的精神，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12]对于“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孙运菊指出，运动是对严谨、科学的规章制度的一次大冲击，是对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一次大破坏，是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同时，“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自身积极性的迸发，也是对我们党威望的一次检验。[101]发动群众运动，当时的基层干部发挥了巨大作用，李若建对“大跃进”中基层干部的行为进行了分析。[102]对于“大跃进”这样激烈而又带来严重后果的运动，却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李若建指出，“大跃进”时期并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在大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种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社会控制的严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政策调整比较有效，找到一批人来担当责任、平息民愤等等。[103]

“大跃进”中，运动和事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李锐回顾了“信阳事件”并指出了其教训。[104]对于“大跃进”中的公共食堂问题，孙闻浪指出，对公共食堂，领导人经历了从热情称赞到冷静对待再到做出正确决策的过程。[105]李若建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106]李若建还对“大跃进”时期城镇化高潮与衰退情况进行了研究。[107]

(十)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的研究

黄根兰分析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108]戴清亮也指出，浮夸风是“大跃进”中的首祸，浮夸风根源源于“左”倾指导思想。[109]刘明钢论述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指出浮夸风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致使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110]高其荣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指出“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有不自觉浮夸和自觉浮夸两种表现形式，“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浮夸程度惊人、牵涉人员多、危害性大等特点。[111]梁宝渭

介绍了广西的三大浮夸个案，对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 1.13 亩的中稻田亩产达到 13 万斤的情况、对忻城煤炭“卫星”上天(日产煤炭 110.36 万吨)及鹿寨钢铁“卫星”(一天生产钢铁 20.7 万吨，一天完成中央分配给广西全年生产 20 万吨的任务)的情况作了介绍。[112]

“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形成，与当时的新闻报道失实互为促进，关系很大。唐秀平对“大跃进”中新闻报道失实情况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其原因。[113]

(十一)“大跃进”与决策民主化

“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形成与决策没有做到民主化有很大关系。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赖亦明指出，“大跃进”决策总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严重偏离。首先是实现目标的方案抉择错误，全党接受了“大跃进”方案；其次，作为目标的重要内容的时间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一再缩短；再次是实现目标的措施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工业方面，钢产量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的任务按当时的能力是不能达到的。[114]程自功指出，“大跃进”的失误，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机制失灵所造成的。“大跃进”期间，正是由于中央计划的信息壅塞和决策盲目，而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资源配置决策的严重失误，导致了大刮“共产风”的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重失误。[115]戈宁、戴泰指出，从科学决策的观点看，“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从科学决策的前提看，“大跃进”决策目标的确立，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基础上的。从科学决策的保障看，“大跃进”是在反右扩大化和多次批判反冒进的背景下发生的，民主遭到严重损害，慑于政治压力，下级机关提供信息和反馈时报喜不报忧。从科学决策的原则看，“大跃进”赶超英美的决策目标，盲目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了重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116]谢春涛指出，决策缺乏民主程序，是“大跃进”运动付出惨重代价的最沉痛的教训。[117]

(十二)“大跃进”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张涛指出，“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成功的，但这种模式之中存在“合理的内核”，即将发展建立在中国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上，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的资源，摆脱对苏联的依附。毛泽东设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最终决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中国的资金和物质资源，而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他认为，无论对“大跃进”式的人力资本发展政策如何评价，“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从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强调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的发展，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118]朱耀武也肯定了这一点。但又指出，“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在动力安排上，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却偏颇地把政治运动作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改革程序的设计上，无论从改革的经济环境的选择还是对改革路径的依赖，都内含着激情和理性的冲突。[119]周树立指出，“大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力争高速度。[120]

对于“大跃进”与抗战时期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关系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朱地指出，“大跃进”运动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毛泽东希望通过发扬革命传统，以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发挥，来弥补当时资金、物资的匮乏。[19]王也扬也同意这种看法：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想再现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他把过去的斗争经验当作了完成新的任务的制胜法宝。[65]而黄义英认为，“大跃进”不是再现了大生产。不同之处：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说“大跃进”再现大生产，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会令人对党的群众路线产生误解，认为走群众路线的结果有时是好的、有时是不好的。“大跃进”自始至终都是背离党的群众路线的。[121]王玉贵指出，“大跃进”与大生产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但两者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反对单纯从财政打主意，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与继承之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两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不尽相同，因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122]

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2

文艺作品来源于社会，反映社会现实。对于反映“大跃进”的新民歌和文学的发展，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赵金钟、严象品指出，“大跃进”新民歌的产生，弊大于利。[123]赵金钟具体指出了“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新民歌运动的本质属性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新民歌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虚假的、片面的、违反客观规律的；新民歌在诗体形式上存在着单一化和排斥形式美的倾向；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违反艺术规律的口号给新诗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把“民歌体”定为一尊，破坏了诗坛的“生态平衡”，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124]岳冗指出，“大跃进”诗歌无疑具有某种积极意义，但就整体而言是失败的，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25]陈翔探讨了“大跃进”民歌兴起的原因及作用，指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大跃进”民歌。[126]彭礼贤以《红旗歌谣》为主要研究参照，论述了“大跃进”民歌中的劳动主题、爱情主题、颂歌主题以及民歌从迷误到开始有所醒悟的轨迹。[127]邢小群以郭沫若在“大跃进”中的《百花齐放》和《红旗歌谣》的创作与编辑为例指出，当时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精神的主导面，不是疏离当时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环境。这也是他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128]刘涵华也对郭沫若与《百花齐放》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百花齐放》曲折地反映出了郭沫若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角色意识产生怀疑与动摇。[129]张军云对郭志刚、董健等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论述“大跃进”时期文艺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教材囿于时代因素局限，一些观点失之偏颇。[130]李新宇将 1958 年的文艺“大跃进”放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流变的坐标上进行考察，认为正是在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中，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一道彻底扫荡了残存的知识分子话语，并决定了此后 20 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131]赵俊贤对“大跃进”时期的文学进行了研究，认为“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文学的品性。[132]

(十四)对“大跃进”中教育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

在“大跃进”中，以“教育跃进”为表现形式，以突破苏联教育模式束缚，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达到培养更多工农知识分子为目标，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如何看待这一“革命”，有关学者进行了探讨。杨凤城对“文化大革命”前的 1958 年和 1964 年的两次“教育革命”情况进行了研究，比较了它们的异同与关联。[133]张健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既要否定当时不正确的做法，又要肯定其取得了一定成绩。[134]周玉良、方晓东[135]、邹时炎的观点[136]与张健基本一致。对于“大跃进”时期颇有规模与声势的扫除文盲运动，李庆刚作了评述，总结了经验教训[137]。此外，李庆刚还考察了“大跃进”中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农业中学的曲折发展过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138]。

谢春涛十年前写的研究综述中，指出了“大跃进”研究中的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思潮问题；“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问题；“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来源问题；“大跃进”期间的决策机制问题；“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以外其他领导人的作用问题等。[1]综上所述，应该说，在十年中，学者们在探讨这些问题方面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研究的问题也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拓展，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研究中成果虽然数量较多而有深刻见解的少，深度不够，重复选题和重复论述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研究视角独特，但挖掘深度不够。这是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对于作为运动的“大跃进”，学术界研究的较多；对于作为一个时期的“大跃进”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学术界已开始给予较多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将是今后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2]齐霁：《八十年代以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述评》，《北京党史》1999年第6期。
- [3]张志辉：《以“跃进”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
- [4]李丹慧：《也谈“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 [5]李庆刚：《“大跃进”口号提出时间辨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5期。
- [6]鲁振祥：《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7]李向前：《“大跃进”历史成因刍论》，《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8]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9]黄爱军：《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深层思考》，《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增刊；《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
- [10]杭国芳：《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再认识》，《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 [11]王令金：《试论“大跃进”的成因及教训》，《东方论坛》2001年第2期。
- [12]李成贵：《关于“大跃进”的注解》，《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
- [13]虞文清：《“大跃进”运动的理性思考》，《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 [14]王玉贵：《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严厉批评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广西党史》1996年第1期。
- [15]王军正：《“大跃进”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 [16]李知明：《简论“大跃进”运动的几种关系》，《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增刊。
- [17]王萌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利发动的几个因素浅析》，《理论观察》2001年第5期。
- [18]何云峰：《“大跃进”运动对革命经验的采借》，《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 [19]朱地：《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20]尹书博：《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与持续》，《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 [21]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 [22]杨乃良：《“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再探析——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其中的互动分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 [23]李若建：《经济体制因素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影响》，《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
- [24]李若建：《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 [25]吴海红：《毛泽东“赶超”思想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
- [26]齐卫平、王军：《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兼与吴海红商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
- [27]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28]程重阳：《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与“大跃进”运动》，《北京党史》1997年第6期。
- [29]刘际钢、林桂平：《“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与经验教训》，《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 [30]李安增、赵付科：《“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 [31]李晓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动因》，《实事求是》2003年第1期。
- [32]刘建国：《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江汉论坛》2000年第4期。
- [33]陈冬生：《“大跃进”运动与中苏关系》，《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 [34]高其荣：《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
- [35]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 [36]李付安：《“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 [37]郭德宏：《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10期。
- [38]董志凯：《“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作用辨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39]陈卫华：《“大跃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两重性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
- [40]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 [41]鲍素萍：《试析“大跃进”失误的教训》，《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6期。
- [42]李付安：《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历史反思》，《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 [43]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44]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 [45]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http://www.xys.org>；转引自<http://www.usc.cuhk.edu.hk/wk.asp>。
- [46]林毅夫、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Economic Journal*, Jan. 2000, pp. 136~158；转引自<http://www.usc.cuhk.edu.hk/wk.asp>。
- [47]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 [48]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流动人口》，《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4期。
- [49]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 [50]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开放时代》2000年5月号。
- [51]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 [52]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美]《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总第72期)；转引自<http://www.usc.cuhk.edu.hk/wk.asp>。
- [53]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 [54]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55]张海东、张尚印、李庆祥：《对我国1959~1961年气候条件的分析与评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56]赵士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57]陈晋：《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及“大跃进”的反思》，《广西党史》1997年第1期。
- [58]陈立旭：《毛泽东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湖南党史》1997年第4期。
- [59]王建华：《毛泽东与大跃进运动》，《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 [60]任萍：《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 [61]张德鹏：《“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分析》，《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 [62]唐蹕：《略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及评价》，《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增刊。
- [63]王贵安：《“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关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政策》，《生产力研究》2001年第6期。
- [64]张德鹏：《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错误方法》，《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张艳国、张德鹏：《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思路与方法》，《经济

评论》2002年第2期。

[65]王也扬：《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66]王明生：《“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分配思想述论》，《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7]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是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68]曾成贵：《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和庐山会议中》，《湖北文史资料》1999年第1期。

[69]黄岭峻：《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0]杜本礼：《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71]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72]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中为减轻国民经济损失所做的努力》，《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73]马冀：《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模式的反思》，《南都学坛》2002年第2期。

[74]尚柯：《李锐：“大跃进”期间直言毛泽东》，《党史纵横》2003年第6期。

[75]萧岛泉：《杨献珍和“大跃进”运动》，《党史文汇》2003年第9期。

[76]郜忠武：《赵树理在“大跃进”前后》，《党史文汇》1996年第11期。

[77]朱培民：《新疆“大跃进”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8]张业赏：《山东“大跃进”运动述评》，《理论学刊》1999年第4期。

[79]石尚斌：《贵州“大跃进”运动概述》，《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4期。

[80]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人民公社》，《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81]尹书博：《“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

[82]郭圣莉、高民政：《1958~1966：居民委员会功能的变异与恢复——以上海市为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3期。

[83]高华、黄骏：《1960年“持续跃进”中的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84]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85]张胜林：《鸡公山水稻亩产四万八真相》，《南方周末》2000年6月2日。

[86]陈兴荣：《对“大跃进”期间“安县落后”的历史思考》，《四川党史》2000年增刊。[87]梁志远：《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88]左颖巍：《风雨故土——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美]《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转引自 <http://www.use.cuhk.edu.hk/wk.asp>。

[89]罗平汉：《话说1958年的科学“大跃进”》，《文史春秋》2001年第1期。

[90]赵胜忠：《大跃进中曲折发展的统计工作》，《统计与预测》2001年第1期；孔德超：《“大跃进”期间的统计工作》，《党史文汇》2001年第4期(两篇文章内容几乎雷同，不知何故——笔者)。

[91]李荫培：《经历挫折，继续前进——“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市统计局》，《北京统计》2002年第6期。

[92]辛建领：《关于“体育大跃进”的回忆与思考》，《山东教育》2003年4月(上旬)。

[93]翁有为：《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探析》，《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94]宋连科：《简论“大跃进”思潮形成和产生条件》，《长白学刊》1999年第1期。

[95]万俊人：《“道德泡沫”与“大跃进”》，《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2期。

[96]王章维、郭学旺：《“大跃进”时期国人社会心态探析》，《新视野》2000年第2期。

[97]罗重一：《浅析“大跃进”发动之初时的思想环境》，《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

- [98]王光银：《“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
- [99]谢永川：《“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剖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 [100]崔广陵：《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理论学刊》2003年第5期。
- [101]孙运菊：《“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龙江党史》1998年第4期。
- [102]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冬季号。
- [103]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 [104]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 [105]孙闻浪：《大跃进的公共食堂是怎样消失的？》，《文史春秋》2002年第4期。
- [106]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
- [107]李若建：《大跃进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衰退》，《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5期。
- [108]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4期。
- [109]戴清亮：《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探析》，《学术界》1996年第2期。
- [110]刘明钢：《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 [111]高其荣：《论大跃进“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云梦学刊》2002年第2期。
- [112]梁宝渭：《“大跃进”中广西的三大高产“卫星”》，《广西党史》2002年第2期。
- [113]唐秀平：《大跃进中新闻报道失实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 [114]赖亦明：《“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115]程自功：《调查研究与信息机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 [116]戈宁、戴黍：《科学决策的前提、保障与原则：以“大跃进”为案例》，《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 [117]谢春涛：《“大跃进”反思》，《科学决策》2001年第6期。
- [118]张涛：《“大跃进”运动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评价》，《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 [119]朱耀武：《“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解读》，《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120]周树立：《“大跃进”经济发展模式个案研究》，《中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周树立：《“大跃进”与“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
- [121]黄义英：《大跃进与大生产》，《广西党史》2002年第5期。
- [122]王玉贵：《大跃进与大生产运动比较研究》，《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
- [123]赵金钟、严象品：《“大跃进”新民歌现象评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 [124]赵金钟：《“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 [125]岳亢：《大跃进诗歌概述》，《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
- [126]陈翔：《“大跃进”运动中民歌的兴起及其作用》，《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4期。
- [127]彭礼贤：《评1958年大跃进民歌》，《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 [128]邢小群：《试析郭沫若在大跃进年代的诗歌活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 [129]刘涵华：《复杂心态的曲折流露——郭沫若〈百花齐放〉的重新解读》，《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 [130]张军云：《浅议〈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保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 [131]李新宇：《1958：“文艺大跃进”的战略》，《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132]赵俊贤：《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 [133]杨风城：《评“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次教育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 [134]张健：《实事求是地评价 1958～1960 年的“教育革命”》，《教育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 [135]周玉良、方晓东：《对 1958～1960 年教育革命的几点看法》，《教育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 [136]邹时炎：《对 1958 年教育革命的初步认识》，《教育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 [137]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 [138]李庆刚：《对“大跃进”时期江苏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张蒙]

史海钩沉：1960 年持续跃进中的江苏人民公社

1958 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寄托了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理想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至今日，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亩产万斤”等图景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人民公社不仅在中国农村建立过，在城市也曾一度风行，1960 年“持续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持续近半年的“持续跃进”因该年大灾荒的发生而中断。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各地纷纷对城市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城市人民公社也因此宛若昙花一现，终被历史所遗忘。本文即以此为主线，以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为个案，简要分析城市人民公社的兴革和若干特征。

一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建党起即为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1949 年中共成为中国执政党之后，迅速将其意识形态理念付诸改造中国的实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毛泽东于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正是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快速飞跃，而人民公社则被认为是通向这未来理想社会的一座“金桥”。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关于“公社”的概念，并结合中共革命成功的若干经验，在大跃进期间推出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它有两大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即“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至于“公”，“就是比合作化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搞掉。”在毛的推动下，1958 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开始建立公社，但毛更希望全社会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表示“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兴起了组建人民公社的狂潮。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豪言壮语充斥于神州大地。大跃进“红旗省”之一的河南省，在率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据河南省办公厅 1958 年 10 月 1 日报告，到 9 月底，全省 9 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 482 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 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 4950 人。”仅仅一年之间，“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城市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

尽管如此，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只是几个“红旗省”的创造。人民公社运动的重点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豪情中，人民公社“忽如一夜春风来”，然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十分严重。一时间围绕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发生了争论。在 1959 年 7 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对“大跃进”有所批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反党集团”。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只能坚持，不能动摇。由此，1959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整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满之辞从公开

场合消失了。然而毛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又酝酿掀起新一轮跃进高潮，试图用“持续跃进”取得的成绩向国内外证明，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向。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吹响了“持续跃进”的号角。上海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要求在城市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随后的3月杭州会议更是号召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

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由五大运动即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和卫生工作运动组成，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其中的重点。它秉承农村人民公社运动而来，又是对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在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毛希望进一步实现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样既能体现跃进在“持续”，又能证明人民公社确实“好得很”。

3月26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稿，毛泽东对其略作修改后，将此文件发往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毛指示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则应一律挂上公社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毛并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周恩来也积极拥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他“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后来，周恩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看，城市人民公社势不可挡，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在中共核心层对此看法取得一致后，毛泽东将心中的“金桥”迅速从农村延伸至城市。二在一片“持续跃进”的欢呼声中，1960年3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江苏省各级干部的动员会。专程赶至南京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与会干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没有底，干劲越鼓越足，上游越争越上，越多快好省，越来越多快好省。”为了给各级干部“鼓干劲”，柯庆施更加语出惊人：“今年‘越’，明年再加一个‘越’，是‘越越’，后年再加一个‘越’，是‘越越越’。总路线为什么会万岁？就是因为年年有个‘越’字。听到了柯庆施的报告后，与会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他们称赞道：柯的报告既通俗，又深刻，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亲切深刻，击中要害”：“是一次‘大开寂’”。这次会议结束后，江苏省的“持续跃进”果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新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在全省大规模地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指示下，专门成立了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以布署引导全省运动的进行。与农村相比，城市中存在着多种阶层，社会结构比农村更为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认为，快速实现城市人民公社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在省委的指导下，江苏省的各种报纸、广播广泛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这类宣传报道中，对于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在进行普遍宣传的同时，还重点就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举办大辩论，这类“大辩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各种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

密集的宣传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十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由于社员入社须将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而他们并无多少私人财产，入社不仅不会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实际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因财产公有而使自己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于公社的建立“欢欣鼓舞”，甚至有人还热情歌颂——“毛主席给我们办了许多好事，现在又给我们办人民公社，我们一定永远听您的话，永远跟您走。”

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面前，他们只好采取变通方式——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无独有偶，比邻江苏的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迅速脱销”。对“错误思想”

和“错误倾向”的批判推动了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步伐，各地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以国营工厂为支柱建构的城市人民公社。南通市即以国营工厂为中心建立了六个城市人民公社。文教单位也不甘人后。南京大学领导提出要建成“南京大学人民公社”，“实行全校师生吃饭不要钱，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则组织居民成立以街道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对号入座”，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人民公社。4、5两个月间，各地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城市人民公社。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这在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在人民基本生活方面，城市人民公社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最能突出说明这一点。公共食堂既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又被视为新生活的桥头堡。于是各种宣传工具奉命开足马力，反复告诫群众“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公社领导则组织社员大办公共食堂。“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据统计，截止4月底，江苏十个城市共“建立了九千三百多个食堂。就餐人数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多人。”与农村农民公社一样，公共食堂成了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大象征。

第二，在集体福利方面，为了显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各个城市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的运动。然而并不是任何符合条件的社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因为集体福利的分派也要体现阶级优先与阶级差别的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的敬老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白下区建成白下人民公社后，将原先办的敬老院划归下属的分社管理。上级指示白下区人民公社，出身劳动人民的孤老可进敬老院养老；至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孤老不应进敬老院，而应由公社组织教养院教养。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工业生产组织。工业生产离不开工厂，建设工厂本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一片跃进的火热形势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依靠“小土群”的方法，公社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这些工厂与原先的街道办工厂被看做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支柱。北京对这些工厂寄予厚望，称它们为“工业战线上的一支新生的力量”。在制定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国家计委更是要求它们达到产值增长一倍的目标，实现产值四十亿。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江苏各地社办工厂，充分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配合同时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新技术”与“尖端产品”从社办工厂中不断涌现，产值也是屡创新高。当时的报道宣称，江苏省的社办工业和街道工业仅用一个季度就达到了产值七亿元。但是和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相比，社办工厂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白下区社办工厂的一些复员军人因此而“产生了攀比思想，有的甚至不安心于生产和工作。”

第四，在妇女解放方面，公社积极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被“解放”的妇女被安排参加各项工作，从而实现了“变消费者为生产者”。据当时的报导，“许多妇女反映：成立了公社，参加了劳动，家庭不知增加了多少温暖，邻里之间也大大加强了团结。”三城市人民公社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作有工厂，吃饭有食堂”，一时间人们似乎已生活在一种类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了。尽管毛泽东曾说过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可那只属于未来。就现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体现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在公社化前，党和国家已建立并完善起一整套对城市领导的体制。各种命令通过区一级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再由它们在居民中广为传达。公社化后，原区一级政府改为“人民公社”，另成立“分社”，作为“公社”的下级单位。与原先的街道办和居委会相比，分社的管辖范围大为扩大，平均管辖人数可达10000人左右。

新的形势呼唤着新的体制，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下属的王老村分社干脆撤消街道办，将几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街道委员会。每个街道委员会管辖人数高达

7000——10,000 人不等，与之相适应的是街道委员会的职能也大为增加。街道委员会下设生产、生活福利、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和妇女等六个专业委员会。南京市委以此为模本，在全市试行“两级核算（公社、分社）、三级管理（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扬州市则计划成立公社、管理区两级机构，“撤消居委会，再把居民小组适当扩大，管理区干部分工分片包干，直接抓到居民小组。”在公社一级成立党委会，下设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财贸科，同时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作为公社的行政部门。管委会下设生活福利科、工业交通科、治安保卫科、文教卫生科、副业生产科、武装科等；至于管理区则成立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文教卫生和治安调解四个委员会。至此，一个新的管理体制已初步建成。

在公社中，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虽然加入了人民公社，但并不属于“人民”。江苏省委要求城市人民公社应贯彻体现阶级差别、阶级区分的阶级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就曾因“救济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条件”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社会救济工作中，首先要贯彻阶级路线。对救济户中的劳动人民和五类分子，应区别对待。对劳动人民要规定适当的救济标准，分别予以定量定期或临时的救济，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对五类分子主要应当在群众的监督下，使其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对“顽劣儿童的教育”也要体现阶级原则，“要教育五类分子的子女认识五类分子的罪恶，认识党和政府对五类分子的处理是正确的，同时组织他们参加适当的劳动，使他们通过教育、劳动，培养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中，五类分子感受不到生活的丝毫新意。

就在城市人民公社“捷报频传”之际，公社自身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中。这固然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业并不足以支持公社——公社集体福利无法正常运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城市的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江苏省各个城市为此专门成立粮食办公室，检查城镇口粮供应情况。同时，为了“节约粮食”，江苏省在北京的指示下降低了城市粮食供应定量标准。在这严峻的时刻，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已成为刻不容缓、压倒一切的任务。

至此城市人民公社已难以维系，“共产主义”般的生活、生产已处于半停顿状态。终于，乌托邦的色彩开始从城市中逐渐褪去。胡乔木在一年后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城市人民公社的某些实情：“由城市人民公社办的实际上强迫参加的，城市居民食堂的情况，其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公社的企业和农民，都要揩大工厂的油，侵占国家财产，这也是个一个严重问题。”胡乔木信中指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各省的城市人民公社也大多陷于同样的困境之中。不仅城市人民公社如此，“持续跃进”的浪潮到了1960年下半年事实上已全面下落。农村陷入一场大灾荒之中，城市的供粮则日益告急，一切都等待着北京作出新的指示。

毛泽东也意识到了现实已不容“乐观”。他在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正确”的前提下，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现在的毛泽东已无意于实现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化，甚至不愿再提及城市人民公社一事。毛默许了各地对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整”。但对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不愿做任何让步。毛的这种复杂态度决定了在城市人民公社偃旗息鼓的同时，农村仍然高高飘扬着人民公社的红旗。人民公社将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形式，贯串其后的二十年。这则属于另一页历史了。作者：高华 选自《浙江学刊》

邓小平江西下放记——会种菜酿酒的“老钳工”（1）

【】【】【】【】【中 小】【】

"邓小平来了”，

这消息在修造厂里暗暗传递着，引起了工人人们的惊奇和关切。但是，限于严格纪律，他们只能远望着或借故走到邓小平身边多看几眼。修理车间主任陶端先是安排邓小平做比较

轻一点的洗零件工作。安排卓琳在电工班，修理发动机的电线。邓小平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把要擦洗的零部件放进盛着汽油的盆子里，一件件地擦洗起来。过了一阵儿，陶端发现邓小平坐在小凳上总是弯着腰，心想，他年纪大，不宜久蹲，况且两只手有油，想轻松一下都不方便，便征询他的意见："你看图纸行吗？以后只要看看图纸就行了。"邓小平面露难色，说："看图纸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哟！"可是，当听到陶端问能不能干钳工活时，他高兴起来，马上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我还可能多活十年。"经陶端安排，邓小平来到车间一个角落的新工作台前，看到各种新锉具，他很满意。顺手抄起一把锉刀，熟练地干起来。站在一旁的陶端很惊奇，看着邓小平有板有眼地锉着，心想，工厂里恐怕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老邓这几下子呢。嘴上不禁赞叹道："老邓，你的锉刀活儿蛮结棍哩！"看着邓小平侧耳询问，显然没有听懂的样子。陶端又解释说："蛮结棍是江西土话，就是说蛮不错的意思，你的钳工手艺有两下子呀！"这次，邓小平听懂了，但他也只是笑了笑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个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邓小平加工的第一种零件是轮胎螺栓，第二种零件是车厢门板。这两种零件加工、修整的工作量都很大，但邓小平加工得又快又好，竟一时出现了毛坯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的事情。这使工人们从心里感到敬佩。有一天，工厂一位技术员来到车间。陶主任连忙上前说："老邓手头没活干了，怎么办？"技术员想了想说："让我和老邓一块儿试做一个丝攻绞手吧，这个活儿不重，可是锯锉的手脚很多，起码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干完。"随后，技术员从废料堆里找到一块料头，拿起毛坯，带着手弓锯，来到邓小平身边。听完技术员关于这种丝攻绞手作用、加工过程的详细说明，邓小平和善地说着："要得。"两个人轮流地干起来。邓小平详细询问技术员简历，对他的特长不能很好发挥表示理解。技术员也主动把自己做的毛坯交给邓小平，请他指出来哪里不合格，哪里需要返工。邓小平仔细看完后，并不说什么，只是根据设计要求认真加工毛坯。边锉边察看毛坯的尺寸和光滑程度，使它达到质量要求。经过两个人密切配合，两星期以后，这种丝攻绞手工夹具终于制作成功了。它是由一个绞手主体，两个X型夹块和两个手柄组成，全部利用废料加工而成，使用起来可成倍地提高加工零件的工效。当工人们为这种省力、节时、高效的工夹具做成而向邓小平表示祝贺时，他却谦虚地讲："是技术员的点子，应该表扬他。"1970年3月12日，邓小平、卓琳照常顺着那条小道向工厂走去。黄文华也照例在后边跟着。两位老人边走边想着心事。原来，小儿子飞飞(即邓质方)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今天就要返回山西。看着小儿子长高了，晒黑了，身体强壮了，做父母的心里感到无限慰藉。骨肉别离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纷乱年代，飞飞的远离怎能不令邓小平夫妇牵肠挂肚呢？按常理，邓小平、卓琳这一天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在家再同儿子叙叙亲情，或者再帮飞飞整顿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出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个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一个工人早已跑到工厂大门口传达室，告诉在那里的黄文华。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黄文华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随即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修理车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面色苍白，便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听到问话，卓琳难过地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低血糖病。"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策。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黄文华，"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过来，脸色也略微好些。后来，工人

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饶是很受中央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满。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于是，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不仅如此，高岗还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对刘少奇大搞小动作。高岗在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于是高岗到处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是他高岗。1953年初，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则使高饶日益膨胀的野心变成了迫不及待的夺权行动了。1952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定修改税制。接着，全国第四次税务会议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52年12月26日召开的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于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名义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先后作出了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都必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另外，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8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等等。对于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他们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而这时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考虑大幅度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个人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发难了。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高岗唱主角，作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作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副报告。从7月13日起，领导小组举行有13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由薄一波、吴波检讨税制修正案的错误，与会者进行了揭发批判。财经会议期间，6月15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就“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高岗、饶漱石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倒刘倒周的时机到了。于是利用中央开会各大区、各省领导人到会的机会，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夸大中央领导人在合作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借批薄一波，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等人，引起中央的警觉。1953年九、十月份，高岗、饶漱石又利用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时机，再一次进行反党活动。在这次会议期间，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极力活动，未向党中央汇报就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以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在这场严峻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始终紧紧站在党中央一边。调北

京之前，他与高、饶的接触和交往并不多。来中央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又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他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饶的接触也多了起来。

高岗、饶漱石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达到其分裂党的目的，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以高官厚禄相利诱，取得他的支持。

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示态度，并且在事后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时隔二十余年后，邓小平于1980年3月再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央虽然发现了高、饶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饶的权力。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副总理的人选。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在大家的报告和发言中，一致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七届四中全会没有对高岗和饶漱石作组织结论。在此之后，为了对证高、饶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中央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共开7次，前4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然后到会同志继续揭露，第7次由饶漱石发言，做自我批评。会议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作了总结发言。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由于在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邓小平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革命品德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此后，反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斗争还在继续。在全党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反对高、饶的斗争对于刚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斗争中，他坚持原则，站稳立场，不拿原则作交易，在事关全党大局的问题面前毫不犹豫，断然拒绝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利诱，并及时与陈云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对于党中央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两报一刊泄国家机密 华国锋把邓小平的信扔一边(1)

【】【】【】【】【中 小】【】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邓小平的信被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三〇一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公布“最大机密”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

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

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叶永烈/文

风起于青萍之末 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图）（1）

【】【】【】【】【】中 小 【】 【】 在庐山会议上，有人劝粟裕把自己蒙受的冤屈提出来，他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起伏。” 《百年潮》杂志 1997 年第 2 期曾发表过萧克同志的一篇文章，回忆 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文章提到，当时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包括刘伯承元帅在内的一批高级将帅及高中级干部因此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而实际上，处理这一问题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还有另外一个议题，那就是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会后，粟裕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在 1958 年那次风波中粟裕大将曾蒙冤。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这之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 月 29 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扩大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这时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

总参与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于 1950 年初即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 年 10 月又增调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由于从建国初一直到 1952 年 7 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粟裕在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工作还比较顺利。 唯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 1952 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 年 7 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 1954 年 10 月做了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

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反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出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领导认为粟裕是“告洋状”。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难免会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黑白颠倒有口难辩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者基本上都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去中南海居仁堂参加有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来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裕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态度说:“我不能同意XXX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裕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做检

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的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关于“告洋状”。当时他和苏军总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粟裕解释说,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违心地进行检讨。粟裕看得很清楚,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入敌我矛盾。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毛泽东曾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很好,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2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漫漫平反路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总参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明确讲,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接触部队的权利都没有了。此后他长期任闲职。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自然也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

兼政委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华野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也就是说,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由于粟裕有了“错误”,也就被从历史上抹去了。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时,有的老战友劝粟裕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包括他经过呕心沥血的研究,为国家防务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也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他的军事才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起到应有的作用。种种不公正对待,长期心情压抑,使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据此,粟裕于是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正式写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0月16日,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结果,粟裕在蒙冤26年后,没能等到组织上正式为他平反,就含冤离开了人世。在中共中央的讣告里,也只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讣告中一句未提。

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子。”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

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 36 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作者:梁丞)

历史解密：中南局“文革”第一大案的前因后果(1)

【 】 【 】 【 】 【 】 【 中 小 】 【 】

□沈容(北京)

李普，1918 年生，湖南人。抗战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采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和副社长等职。本文作者沈容，是李普的妻子。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

的妻子。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后来听说，此案报到了“中央文革”，上头十分重视。于是立马成立专案组，并由军管组组长亲自挂帅。这事还要从抄家讲起。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第一次抄家之后，我还整理一下，然而刚整理好，抄家的又来了。如此反复几次，不胜其烦，只得任由衣物、箱笼、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这样倒好，各地的红卫兵来过几茬，后来的觉得没油水，也就不来了。

不久，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来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说它大规模，是因为来了十几二十人之多。查抄之细，也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我家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他们每一本书都翻个遍，因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们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辛苦，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更多的是好奇。这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南局大院里其他干部恐怕都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究竟所为何来？渐渐地我发现，有的人认真地在一页一页地翻；不过也有的人拿起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马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了，似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有一位还没有翻几本，就点着一根香烟，还递给李普一根，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的抄家，是由王匡家被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

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的抄家，是由王匡家被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来中南局以前是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管过港澳工作。我们和王匡早在解放以前就认识了。王匡和李普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李普来中南局工作，是经过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于管过港澳的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更要命的是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这还了得！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吗？这是一张什么

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吗？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说来话长。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有一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分社全体人员的这张照片，洗了很多张，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张。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那时，前线分社自带电台，记者写的稿子，都由译电员译成电码，报务员用自带的电台发给总社，因此有译电员、报务员。这样简单的事，只要问问当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识的人也想得到，决没有一个暗藏的敌特会把他的成员名单和照片

堂而皇之地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的。但立功心切的人们却如获至宝，把它看成一个大收获！接着，就有了我们家的抄家。事有凑巧，在我家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这下好了，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有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还有抄好的电报号码，又还有子弹。这不是板上钉钉，不是特务是什么？我们家怎么会有子弹呢，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我家曾住过两批红卫兵，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我女儿干的。“文革”初期，我们收听电台的广播，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现在成了又一个“铁证”！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嘲笑那些人立功心切，因为李普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留着一顶“特嫌”的帽子。1955年内部肃反，李普由于两起冤假错案的株连被“肃”住了。结论是他“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被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是当面告诉了他的。他不知道的是他从此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更不知道档案袋里还摆着一顶“特嫌”的帽子。好了，在那些人看来，“特嫌”之谜现在已经解开了，“特嫌”可以改成货真价实的“特务”了。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个“特务”果然神通广大，而竟打进党的高级机关来了！但是他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说他们这一功多大吧。陶铸被打倒的时候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包庇李普”算是他在中南局的“罪行”之一。他到北京以后“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这一件就排不上了。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家抄到了我和李普同叶剑英的合影。那是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照的。这个机构由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共同组成，任务是调处日寇投降以后中共和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叶剑英是这个常设机构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我当时做翻译工作，李普是新华日报特派员兼新华社的特派记者。这下可好了，连叶剑英都扯在里面了，这个大案马上又变成“要案”了！人物越大，案件越重要。这当然毫无疑问。叶剑英那时的本职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加新四军)的总参谋长，人称“参座”。这回真是钓到大鱼了！我记得军管的头头刘组长有一次提审我，没有一个专案组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满屋子都是北京来的军人，看样子全是军官。那气氛真是严肃到了极点。他们一言不发，而刘组长提的问题，都是有关叶剑英的。我只是一个翻译，能知道什么？只能实话实说，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叶剑英那样感兴趣。原来这个“案子”又同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应当说是有很大的关系才对。我父亲是国民党里的一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算很小，特别是他的“背景”很不简单。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这个“书记长”毫无实权，是摆样子的，根本不能同我们这边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日寇投降后，钱大钧接收上海，叫我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钱大钧下台，他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明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当地士绅迎接解放，解放后送我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他说我这话毫无道理，是十足的狡辩，是一派胡言。从他说话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肃地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他们已经肯定我是我父亲派进共产党内来的，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突然想到，我曾从我父亲那里搞到过情报。我就说：“我没有为我父亲做任何事情，反倒是从我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

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对于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当时有的工人想不通，说，既然我们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就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刘少奇此行，还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红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讲话”的主体部分。会上，有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讲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在谈到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家怎么办时，刘少奇

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毛主席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你们搞独立王国”

“你们搞独立王国”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 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大家相信，“搞独立王国，”毛泽东虽然是面对着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和陈永贵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生日宴会气氛沉闷

生日宴会气氛沉闷。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

记，则分坐另外两桌。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喜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毛泽东一连

串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象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就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一年多后，即 1966 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终于爆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一年多后，即 1966 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档案解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冤死实录（组图）

【 】【 】【 】【 】【 中 小 】

在病床上被迫“疏散”

1969年10月，林彪一伙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有碍他乱中夺权的人清除出北京。10月18日，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以毛泽东说“很好，烧掉”为指示，继续通知疏散，刘少奇是“第一号令”最早受害人之一。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

继续通知疏散，刘少奇是“第一号令”最早受害人之一。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鼻孔插着长期放置的鼻饲管，吸痰器不时伸进他的喉头，医护人员知道，这位国家主席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为了通知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无言以答，他知道转移意味着什么。他把脸转了过去，护士把报纸移到另一边，他再次把脸扭开。他是无声地作最后一次抗议！愿削职为民，去延安或老家种地都不行，硬是要他的命啊！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刘少奇，长期卧床，没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走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缎面被里，外面蒙了床白色床单。晚上 7 时，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的监护下，由护士和刘少奇卫士长陪同，放在飞机后舱，运往河南开封。

赤裸着身体被抬进监狱

那天，开封机场突然戒

后舱，运往河南开封。赤裸着身体被抬进监狱 那天，开封机场突然戒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到机场，岗哨林立，如临大敌。工作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都十分紧张。军用飞机在跑道上缓缓停下来，人们仰头张望，只见两个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彪形壮汉，抬下来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皮包的脸埋在又长又乱的头发胡子中。这个白被单裹着的人盖有一条毛毯，从毯子下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恶

臭……

这个人是谁呢？在他已变了形的脸上，人们仍依稀发现过去残留的影子，他就是曾经让亿万人民崇敬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开封后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抬进了监狱。

停止呼吸，嘴和鼻子都变形了

11月13日清晨，当刘少奇的卫

士长再次来到他的身边时，在监狱的地下室，刘少奇已经停止了呼吸。刘少奇的遗体上，盖了床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卫士长小心地为刘少奇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

火化单上职业一栏竟写着“无业”

1969年11月14日深夜，头部和面部全

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遗体，由几个人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短，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15日零点刚过，“灵车”在淅淅细雨中驶向火葬场。他那为中国革命、建设奔波了半个多世纪的两脚，屈傲地伸展在风雨中……

刘少

奇的火化单上填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共和国的主席竟然成了“无业”游民，死后连名字还要遭到侮辱：刘卫皇，是当时最忌讳的“保皇派”的代名词。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就这样从政治舞台上顿然消失了，而且经年累月的沉沦冤海，直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才为刘少奇作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议。

档案破解：毛泽东为何同意立案审

理刘少奇？(1)

【】【】【】【】【中 小】【】

“倒刘”狂潮的

形成 在刘少奇蒙冤的整个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

小组副组

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与此同

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全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1966年8月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

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 61 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 月 21 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 3 月 30 日公开发表。

毛泽东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是主要原因。

早在 1966 年，叶群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8 月 14 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 年 8 月 13 日，由康生妻子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9 月 16 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 1936 年薄一波等 61 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这阴险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1967 年 2 月发生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到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刘少奇被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专案组的组成 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1966 年 12 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谢富治（组长）、江青（汪东兴）、肖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真相大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凭伪证拼凑成的，所有指控都不能成立。

伪证的制造，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间接的手段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 年 12 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在没有进行调查取证时，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刘少奇“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她武断地说：“刘少奇可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二是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法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的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者逮捕入狱。

三是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

一开始，江青等人曾寄希望于能找到物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动员全国各地揭发，一方面不惜劳民伤财组织大批人马从报纸堆中查找。在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只好不择手段从犯人嘴里掏口供。据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 64 人。至于因专案组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1967 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 11 人。这 11 人都是江青亲自批示逮捕的。

专案组将人抓来之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

1968年9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上报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主要就是这种逼供信的产物。

毛泽东为何打倒刘少奇——林彪江青的阴谋陷害(1)

【】【】【】浏览字号： 中 小 【】【】

相关故事：

“倒刘”狂潮的形成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全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问题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不是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呢？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是主要原因。

早在1966年，叶群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8月14日，林彪要人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年8月13日，由康生妻子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9月16

进修，1902 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一面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 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 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 250 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 1923 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女中文美读书，于 1927 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 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 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 300 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1937 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解放以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党的八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文革”中，她受到冲击，不过因威信高，1968 年末，还被允许参加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她伏在桌上拒绝举手。当时发表的全会公报虽宣布“一致通过”，历史事实却是缺了陈少敏一票。奸人康生于会后向她质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得到的只是一句正气凛然的答复：“这是我的权利！”康生、江青之流为对陈少敏进行打击，借故将她赶出北京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病导致半身不遂，“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北京治疗。欣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陈少敏曾希望能重新工作，却不幸于 1977 年 12 月因病重逝世。

-严酷斗争环境造就了坚定的女革命家，在解放后的政治风浪中，她也总是铁骨铮铮，并告诫他人“不能犯软骨病”。时势造英雄。特定的烈火般的残酷斗争环境，造就了陈少敏这样经过千锤百炼的女革命家。陈少敏本人从小便受到地主残酷的压迫，并挨过日本工头的皮鞭。1925 年，参加罢工遭镇压时，她目睹许多女伴被枪杀和投到海里，自己虽幸免一死，心中却深深种下了阶级仇和民族恨。她在教会学校时，曾带领女同学痛打美国牧师，在枪林弹雨中往往比男人还勇敢地站在最前线，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这三者在陈少敏身上最好地融为一体。尤其令党内敬佩的是，遇政治风浪时，陈少敏总是铁骨铮铮，并告诫他人“不能犯软骨病”。她在“文革”浩劫中表现出的罕见的反潮流精神，成为共产党员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和抵制错误的光辉典范。

-宁可到工厂一天做 12 小时苦工，也不嫁有钱人。从事地下工作时，丈夫牺牲，女儿夭折。

-与涂正坤结婚后，突然得知他的前妻从死人堆中爬出，又主动提出分手，牺牲了个人的家庭生活，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陈少敏有着非凡的个人生活经历。少年时，她便在乡下打破旧习俗，坚持不缠足，被人嘲笑为“孙大脚”并称其“傻气”时全然不理。1921 年大灾荒时，全家难以活命，母亲要她嫁给有钱人，她坚决不肯，宁可到纱厂当一天干 12 小时活的女工。在山东从事地下活动时，陈少敏与任国桢相爱并结婚，两人于 1930 年一同调往北平。翌年，丈夫任省委特派员去山西时被捕牺牲，刚生下的女儿也因无钱治病而夭折。1937 年，陈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得知妻子牺牲，二人在人生经历相似的情况下很快有了感情并结了婚。不久，涂正坤的前妻突然来信，说自己从敌人大屠杀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接信后，陈少敏主动提

出分手，让涂正坤与前妻团聚(1939年涂在平江惨案中被害)。当时，面对新婚丈夫的左右为难，她还坚定地表示：“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里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陈少敏在抗战初期护送徐特立返湘时曾假扮夫人，被毛泽东称赞为“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实际上，她牺牲了个人的家庭生活，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抗战期间，鄂豫边区生产了一种“女将军”牌香烟，烟盒的画面便是陈少敏跃马举枪的形象。——解放战争期间，全军各战略区首长中只有陈少敏是女同志，她还亲率教导旅攻下荆紫关。——继红军时期惟一的女将领张琴秋之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全军部队中，陈少敏真正称得上是女将。在河南竹沟，她就以政委身份带起一支游击队，并于1939年率这支部队东进，在平汉铁路一次伏击中歼灭日寇百余人，在当时可算战绩显著的一仗。正是靠着战功树立起的威信，新四军五师成立时，她便担任了副政委。当时，鄂豫边区还特地生产了一种“女将军”牌香烟，烟盒上的画面便是陈少敏跃马举枪的形象。——解放战争开始时，陈少敏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直接领导下属的纵队(相当于军)旅，在全军各战略区的首长中，她是惟一的女同志。在1946年夏天艰苦的中原突围中，她虽生病却不肯坐担架，亲自率领教导旅作战，突破了敌军重兵把守的荆紫关，冲到陕南。

全国解放后，陈少敏因早年在白区从事女工工作并富有经验，被调到工会系统，未能参加军队授衔。不过，她总是缅怀当年的战斗生活，1962年，曾返回鄂豫边区看望干部和乡亲们，所到之处人们都欢呼“陈大姐回来了！”某县委曾摆酒宴招待她，陈少敏气得扭头便走，并严肃批评县委负责人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僚。现在群众没有饭吃，你们不去关心群众，却来招待我。你们这样搞，群众不骂共产党才怪呢！”此后，她所到之处，一餐只许上一个菜，最多再加半个鸡蛋。撰文/国防大学教授徐焰 震动公众的情节是虚构 江姐到底受过什么酷刑

【】【】【】浏览字号： 中 小 【】【】 江姐，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士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

1950年1月中旬，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

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可见，在早期的介绍中，江姐所受的酷刑并没有什么竹签子“钉手指”，而只有一个“夹手指”。这个“夹手指”，即刘德彬后来所说的“夹竹筷子”，是通俗的说法，其实它就是古已有之的一种酷刑，名叫“拶”，拶，是旧时酷刑的一种，以绳穿5根小木棍(比吃饭用的筷子略粗)为刑具。行刑时，将受刑者手指分别套入木棍之间，用力紧收，叫“拶指”，简称“拶”。(来源：《文史精华》)档案破译：看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图)(1)

【】【】【】浏览字号： 中 小 【】【】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了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

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

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

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

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

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

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

“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

“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

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桓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

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我们认为似可作如下评说：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林彪不是自称“一贯紧跟”吗？仅就拙文所列就有九次他没有紧跟，“一贯反对”吗？上述九次分歧的性质没有一件可构成所谓的“路线斗争”，更构不成敌我矛盾。来源：党史博览

抄家游斗被虐待--回忆文革那些血泪斑斑的暴行(1)

【】【】【】浏览字号：中 小 【】【】

来源：炎黄

春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几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说评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9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 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

“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5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

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

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 10 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 10 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儿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 10 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 8 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 8 月 31 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 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

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

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

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有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

一部“文革”中被滥用的毛泽东著作(1)

【】【】【】【】【中 小】【】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便不由地想起毛泽东1927年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这部著作的第一节——“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中写道：……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和朋友想一想，那个时期所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在形式上是不是和兴起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有些相仿和类似？我看，除了性质、范围、内容、组织和起因不同外，其形式大体相似。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主要限于南方几省，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而60年代中期的红卫兵运动，则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横扫960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关于1966年6月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写有一首《有所思》的七律，其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被喊得震天响，而实际起作用 and 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部著作了。什么“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如此等等，此起彼伏，一刻也不停地震响在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当时谁对红卫兵、“造反派”的过火行动和乱来提出异议，红卫兵、“造反派”

马上就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等等。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说法，“革命”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干都应该、都合理……这仅仅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想法和说法吗？不，“文质彬彬”等话还上了“中央文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赫然写道：“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在起草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等曾建议删去这些话。穆欣指出，刘志坚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刘志坚等讲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造反派”确实确实是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本系统的领导干部的，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一些领导人和媒体引用、宣传所造成的舆论是够大的。我们不妨举例看看。林彪制造“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提出他的“乱子观”，就是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根据的。他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市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还有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我们要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整官僚主义也好，整领导的错误也好，都要群众轰一轰，不能包办代替。”再看报刊宣传。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南京28日电：《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南京部队某部侦察连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深理解〈十六条〉》。同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9月9日讯：《正确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北京部队某中队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发言摘要》，其中心内容就是讲如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红卫兵运动。

同年10月6日，《解放军报》刊发《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介绍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伟大意义”、“要着重领会的问题”等等。篇前并加有编者按，着重指出：毛主席这部著作，“为我们党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为我们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主义。”凡是革命的中国人，谁都不否认，也不会否认，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部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著作（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它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深刻地揭示了没有农民便没有中国革命的重要规律，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把这部著作应用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其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滥用的，还有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

讲话》中的一段话，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曾被 1966 年 6 月 5 日的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和《解放军报》引述。除了当时的整个环境，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可能直接受这段话的影响，于 6 月 24 日、7 月 4 日、7 月 27 日连续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张大字报。前两张曾通过江青上达毛泽东。三张全部同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后又转载。这样，“三论”就走出清华附中，传遍全国，震撼九州，成为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宣言和纲领！——“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造反”至高无上！“造反”就是一切！“好得很”吼声震耳欲聋。从此“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殃及各个方面而又贯彻始终的最核心、最流行的口号。某单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1966 年 8 月 22 日发表《宣言》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目前的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他们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把那些牛鬼蛇神打得一败涂地。1966 年 8 月 18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和首都革命群众见面，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我们不仅是对准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牛鬼蛇神开火，而且对准了社会上残余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统统打倒，砸它个稀巴烂。什么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滚他妈的蛋！我们要把这些修正主义的货色扔在地上，踢（踏）上一脚，让它永世不得再兴起！某单位的“东方红战斗组织”8 月 23 日发出“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最后通牒”，其中写道：过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逃到北京逍遥法外，继续过着臭虫式的寄生虫生活，这些坏蛋凭着其在北京工作的亲属关系，赖在北京不走，逃避当地人民的管制，逃避劳动改造。我们绝不让你们再继续散发毒素，腐蚀职工、腐蚀下一代。我们决定：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必须立即回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劳动。为此，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底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的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耍花招。这仅是当时无数大字报中的两份，但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运动的实质和精神。当时，许多红卫兵就是喊着这些口号，横冲直撞，杀向社会，制造了种种破坏和灾难的。真理是具体的，一切以地点、时间和条件为转移。历史反复表明，同样的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搬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指导思想，其影响之不良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真理。这种教训之惨痛也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不问青红皂白拳打脚踢：罗瑞卿秘书忆文革批斗(1)

【】【】【】【】【】中 小 【】

作者：王仲方

我不如地狱 谁入地狱 中央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定了案，在青海省昨天受打击的“‘八一八’造反派”又成了革命派，同“‘八一八’造反派”对立的那一派成了反革命派。全省风云骤变，杀气腾腾，在“二·二三”事件中死亡者的亲属、受伤的“红卫兵”，在西宁掀起了“以血还血”的白色恐怖，到处抓捕与“二·二三”事件有关的人，见到这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拳打脚踢。我虽然与“二·二三”事件无关，但是“造反派”不会放过我，何况又有林彪亲自点名，更大的灾难已迫在眼前，随时可能被抓。我和洛明也做好准备，把铺盖和换洗衣服、洗漱用具捆好。我们互相勉励：洛明嘱咐我，不管遇到多大磨难，都要坚持住。我嘱咐洛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把一点积蓄、手表、钢笔交给她，历年的日记、笔记都拜托她设法保存。一切都安排妥当，反而轻松了。照样到大院里，甚至上

街去看看动静。一位关心我的同志看见我大吃一惊，悄悄告诉我，军管会已决定逮捕你，并告诉我一定要挺得住。临别时，曹毓五同志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活着就是胜利。果然，1967年3月27日夜，刚过零点，有人敲门。洛明去开了房门，省公安厅两位干部进门就拿出拘留证，宣布将我拘留。两人都是我熟悉的部下，一位是郝明新，一位是秦开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拘留证上签了我的名字。当他们拿出手铐，扣住我的双手时，我笑着对他们说：“怎么还来这一套。”他俩无言以对，只好帮助拿起铺盖，我自己端着脸盆，与洛明告别，上了门前的汽车。洛明在家，看着秦开华作例行的搜查，主要是查枪支，我保存的自卫手枪，在批斗开始时已交给保卫科。汽车在半夜里穿过寂静的西宁市大街，进入南滩看守所。说起来真是笑话。这座看守所是我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参考北京秦城监狱图纸建造的，准备一旦打仗，就把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的重要犯人转移到青海。因此，建筑规格比较高，开间较大，后墙有一排窗子，囚室内一个大的木板炕，有暖气、自来水、抽水马桶。在建造过程中，我亲自视察多次，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建成使用，想不到我自己负责建的监狱，自己竟先进来了。郝明新是看守所的负责人，他把我领进一间囚室，铺开被褥，告诉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让家里送来。我让他告诉史洛明放心，告诉她把家里旧的军大衣送来。他把铁门关好，上了锁，又把过道铁门上了锁。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牢狱生活。囚室有电灯，但开关在门外，平时晚上也不开灯，我在黑暗的监房中沉思着。很奇怪，我进了监狱，听到两道铁门上锁的咣当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白毛女》喜儿的歌声，“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提心吊胆，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死了也无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里，说骂就骂，说打就打，人身安全是一点也没有保障的。如今进了监狱，反倒觉得比在外面有安全感。我惟一担心的是洛明一人在家里，我被关押的消息传开，她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眼前的日子怎么过呢？我托人给张文芳送了一封信，我们两家分住楼上楼下，离得很近，让他看在多年同事的分上，照顾史洛明。而张文芳不仅不予照顾，反把她扫地出门，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找到一间房子把她安置下来。我被抓进监狱，史洛明立即回到公安部向谢富治求救，谢富治告诉她，关起来好，比在外面安全。对比眼前的大动乱，她也觉得只好如此，心情也不那么着急了。第二天，我被叫出监房，按规定，作为囚犯，照了正面侧面的相，按了十个指印。这些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他们一个也不敢同我打招呼，紧张地办完就走了。这座看守所是辐射形的，有四个胡同，胡同口有铁栅门锁着，每个胡同有八间监房。辐射中心是天井，围着天井有看守员室、问讯室、医务室、浴室。囚犯有事可以大声喊报告，看守员会开门看望。监房门上有小窗，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到外面。开始，我以为他们拘留我是暂时的，因为按规定拘留期不能超过七天。到了第七天，郝明新给我出示逮捕证，说我被逮捕了。我问他是谁决定逮捕我？ he说是军管会。我说按中央规定，逮捕我这样一级的干部，必须有中央、毛主席批准，军管会是无权逮捕我的。我要求军管会立即释放我。不久，看守所也军管了，军管小组组长栾春芳，是军区某部团政委。我再次向他说明，他说逮捕你是林副主席点名的，青海省军管会无权决定释放你。我问为什么逮捕我？ he说是因为同罗瑞卿问题有牵连。我又问，是罗瑞卿问题大还是我的问题大？ he说当然罗瑞卿的问题比你大。我又问既然这样，那么，罗瑞卿没有被捕，为什么逮捕我？栾春芳只好说，逮捕你只是一种审查方式，你就耐心接受审查。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可以要家属送生活用品给你，有事可直接找我。看来，这位组长还是通情达理的。既然是逮捕，我就只好耐心在监房住下去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我入狱之初，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有问题我自己负责，希望不要牵连我的亲属。他们说党的政策不株连亲属，你可以放心。在狱中五年多，我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出狱后才知道全家都受到了牵连，遭遇是惨痛的。我的父亲王肖山是老教育家，建国后任国家教育部参事，本来住在教

育部宿舍，他的学生李克农看到老师年近八十，要我把他老人家搬到公安部宿舍与我们同住，好有一个照应。我的问题与他毫无关系。竟被公安部“造反派”批斗打骂赶出宿舍，几经波折，安置在浙江德清县我的堂兄王仲俭家中。仲俭夫妇对老人很孝敬，供养是不成问题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入狱后，“造反派”追到德清，逼迫仲俭交出所谓王仲方的黑材料，仲俭莫名其妙，“造反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隔离批斗，连续几昼夜，仲俭忍受不了而自杀。他的妻子也被隔离。家中无人照看老人，邻居也不敢进门，可怜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竟然被活活饿死。父亲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草草埋葬在荒山上。我父亲满清末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派回安徽任皖北宣抚使，后在芜湖办学，李克农、柯庆施、宫乔岩、曹渊等一批安徽省的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学生。他与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等党的早期革命家关系密切。三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王忠和是黄埔军校学生，在红军中牺牲。二儿子王仲文是高语罕秘书，病死。他自己一生受蒋介石迫害，终于盼到共产党胜利。他万万想不到在全国解放二十年后，竟然遭受如此迫害，活活饿死在家中。我出狱后得知此事，万分悲痛。经教育部报告周总理，将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妻子史洛明，1938年十四岁到延安，一直忠心耿耿，在各个岗位上为党为国家勤恳工作，曾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干部。她也受到牵连，被公安部赶到青海，无依无靠。今天抄家，明天批斗。后又被赶出西宁，到牧区干校劳动，受了许多侮辱和折磨。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方方，在七机部工作。我入狱之后，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先后被抓，逼他交出“黑材料”。王方方告诉他们，我父亲年轻参加革命，是无辜的。结果是不仅批斗，还把他关在地下室两年之久。小儿子王天明，是清华附中第一批“红卫兵”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之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为我的牵连，后来被关在山西省阳泉监狱一年。

一家人，因为一个人莫须有的罪名，都惨遭迫害，是我在狱中想不到的。幸好，全家坚信我是无辜的，没有同我划清界限，还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以安慰。我被关押五年多而不垮，与亲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竟然体现在我的家中。我对家人负疚良深。可是谁为我负疚呢？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我的人，你们感到过内疚吗？

疯狂批斗 火的洗礼

监所外面有所学校，每天高音喇叭播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听到因胳膊摔伤在外治疗的王昭同志已被押解回到西宁。接着以批斗王昭为中心的高潮掀起来了。省委机关、各系统相继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每次大会也少不了我。王昭、王仲方成了青海省“走资派”主要代表，每次大会，我俩分别被架在两辆大卡车上，车上放了长桌。批斗会开始，有两位“造反派”把我们架到桌上，面向群众高高站着。王昭右臂有伤打着石膏，左臂被拉到身后，被人按着脑袋，压低着头，只能算是半个“喷气式”。我因为戴着手铐，搞不了“喷气式”，就被揪着头发往后仰。在我们两旁是一排卡车，每个卡车上跪着省委常委和各部部长。不过，已经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人如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副省长李芳远等人，则高坐在主席台上，原来的领导集体，一下子被分成了“座上客”与“阶下囚”。每次大会，都安排好几个人揭发控诉、批判，大约有两三个小时。大会结束，王昭和我被分别押上两辆大卡车，王昭在前，我在后，大喇叭开路，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有很多陪斗者跪在马路两旁，围观者很多。我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写着“彭罗陆杨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仲方”。他们把牌子用细铁丝系在我的脖子上，勒破皮肤，流着鲜血。最难受的，是用绳子拴住手铐的链条，把我吊在卡车的铁架子上，双脚只有脚尖着地，还时时拉紧绳索向上吊，每拉紧一次绳索，就痛得一身大汗。好不容易游街结束，我已浑身湿透，满身泥土，脖子和手腕留着深深的血痕。回到监房，倒在炕上，全身散架动不了。好不容易透过气来，洗洗脸，掸去身上的泥土，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在批斗高潮中的一个多月，正值夏天，人们穿着单衣，我却在最热的时候也不脱棉裤，因为批斗会上他们逼我跪在运矿石的大卡车上，卡车铁皮上钉着露头的铁钉，双膝跪在铁钉上，磨得

血肉模糊。后来就用毛巾和一切能用的东西，包在膝盖上，痛苦稍为减轻些。各系统轮流召开的大批斗会，大约有十次左右，批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神经和肉体也麻木了，不觉得痛苦了。在挨斗的时候，在游街的时候，看着两旁陪斗的干部，觉得他们吃的苦比我多；看到面前黑压压的群众，搜寻着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面孔。我甚至希望记者照下我的镜头，特别是挂着牌子吊在卡车上游街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受难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如果你们有一天也会清醒过来，一定会比我更加难受。你们不是说彻底纠正了“王明路线”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们不是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你们对这种变本加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熟视无睹。你们在政治上、道义上付出的代价，比我受到的屈辱要大一千倍。

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1)

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号，却被人们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12月6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会议，至于讨论什么问题，连周都不知道。我有些纳闷。过了两天，谢的秘书来说，这次会上秘书很轻松，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到与会者手中，不让秘书参与。什么事情这样保密？我有些疑惑。接着我看到与会者住房名单，党政军领导人都有，惟独没有罗瑞卿。我有些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12月12日，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云南省委书记周兴约我到 he 那里休养。我推测这封信是罗瑞卿的秘书从云南带来的，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估计罗瑞卿已到上海，一种神秘的气氛，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会议结束后，大约在12月15日前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向我传达：罗瑞卿犯了严重错误，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中央已批准他辞去军队一切职务，深刻检讨，接受批判。这不仅对罗瑞卿是一次突发事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次突发事件。根据我多年的了解，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是深厚的、密切的，毛对罗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开始，亲手培养提拔罗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罗有成绩，毛泽东就加以肯定和表扬。罗有缺点，毛泽东当面给予批评教育。听到别人对罗有意见，毛泽东就给罗打招呼，让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罗瑞卿可以说是信任有加，爱护备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从红一军团到抗大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两家往来也是密切的。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反对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毛泽东不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如此急促地背着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一定是到了非“挥泪斩马谡”不可的地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罗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还会发展下去，甚至会株连不少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在公安部当过罗十年政治秘书，同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会不会连累到我？即使我已经离开六年，恐怕还是难以幸免的吧？我为自己的前景设想了多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当我的办公厅主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工作和读书。再一种可能是把我挂起来，西北局不敢要我，只有回青海停职闲居。最坏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罗的圈子里受审查，被隔离，如果被这个阴影笼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将受到破坏。此时已近年关，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会受到“上海会议”的冲击。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已经六年了，他的问题又主要出在军队，照常理公安部不会有过分的反应。但是党内斗争的经历使我预感到公安部会要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响”。这样就必然会牵连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同全家老小在风暴前夕一起过个年，也许是最后一个团聚年。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充满忧虑的心情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家里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离开上海前，胡耀邦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谈了心中的忧虑。胡宽慰我说：罗在军队职务虽免，但还保留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罗同毛主席的关系，事态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觉到空气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和神秘。所

鼓吹走“捷径”。与此同时，林彪提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警句”以及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的主张。林彪的这些主张，受到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和军队其他领导人的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对林彪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和看法。1960年3月至4月，谭政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不顾林彪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提出系统地加强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的观点。对当时林彪的一些提法，谭政敢于直言发表不同意见。比如，林彪把毛泽东对“抗大”的题词：“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为“三八作风”，谭政虽对这三句话、八个字有深刻理解，完全赞同，但对林彪将其概括为“三八作风”，表示了异议。他对此说：“是不是三八妇女节，会不会引起误解？”全军政工会上，谭政对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没有进行研究贯彻。报纸的宣传也避开“三八”两字，只用光荣传统和优良传统等提法，并通知《解放军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掌握。8月，林彪在全军第八次院校工作会议上，针对谭政搞文化教育说：文化学习应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在谭政外出期间，林彪直接插手总政治部，叫总政治部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不久，林彪又直指谭政：“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谭政挨整，早已列入林彪召开会议的计划之中。9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在研究讨论政治思想工作时，林彪原指定谭政在会上做报告，但同时又指定总政治部另一位领导同志做另一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实际上是以后一个报告代替前一个报告，并企图从谭政的报告中“鸡蛋里挑骨头”，找茬批谭政，将会议引向自己早已安排好的整谭政的路上去。20日上午，谭政向大会做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然而，却遭到林彪的指责。22日，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会议各组长开会，指出谭政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林彪的“四个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林彪开始找茬整谭政了。林彪的“四个第一”，是在9月12日常委会上讲的，而军委扩大会议14日就召开了，按常规，会议各种文件应该在会议之前、至少在几天前就应该准备就绪，谭政的报告更应该提前准备好，总不可能在会议召开后再仓促准备吧，这样，报告怎么能围绕和突出“四个第一”呢？23日，会议形势突然变化，矛头直接指向谭政以及总政治部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会议批评总政治部工作偏离了方向，没能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打思想仗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委的许多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不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等。谭政对此实在是想不通，为此，他进行了申辩。他在发言中说：要我检查什么呢？工作上有不同意见，难道就能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吗？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经过了30余天的“揭发批判”和讨论，10月20日，林彪在大会上做了总结讲话。林彪指责总政治部对上级的指示，“闻风也不动，打雷也不动”，“不传达，也不布置，历次运动，总是落在后头。”谭政“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军委会议后，总政治部进行“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的“错误”，并进一步上纲为“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抵制新军委和林彪的领导”等等。在整风最后阶段，军委对总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销了谭政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些牵连的人也受到了处分。谭政蒙冤之后，很快就被调离军界。1975年8月起，谭政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那次遭受错误批判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8年11月6日，

谭政在北京逝世。摘自《党史纵览》斯夫、鹿海燕/文

档案解密：姚文元是如何“红”起来的？（图）(1)

【 】 【 】 【 】 【 】 【 中 小 】 【 】

批胡风崭露头角

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风的崇拜者。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出版社。为了紧跟形势，标榜自己，他马上“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张春桥暗忖：要把胡风彻底批烂批臭，不正需要姚文元这样的“棍子”吗？于是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同时，还亲自审定、推荐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时间，姚文元名声大振，成了反胡风的“英雄”。

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 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

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 1956 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1957 年 2 月 6 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3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原来，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也许是应该姚文元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

“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评《海瑞罢官》步入政界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4 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

喜爱读书的他每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胡风的思想、文章风格、写作笔法等，都在姚文元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那个时候，姚文元也经常跟着父亲去胡风家，还常常奉父命去胡风家里送校对稿、送清样、送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的姚蓬子仍然办作家书屋，姚文元则进入上海大同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入沪新中学读书。此时的姚文元仍是胡风著作的热心读者。19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党后，更热心读胡风的书了。他的书架上摆着胡风的书，桌子上放着胡风的书，偶尔出门，手里仍拿着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好，了解胡风是文坛大家，自然支持儿子读胡风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从前，他只是在崇拜的心情下学习胡风的思想、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姚文元下决心要成为胡风不入门的“学生”，自有他的考虑。在这些考虑中，有三个因素是主要的：一来姚文元自从少年时代接触胡风后，就是胡风的崇拜者，对胡风思想和笔法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二来胡风过去与鲁迅关系密切，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曾经把胡风当作鲁迅的继承人来看待的，胡风由此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在中国文学艺术界树立了领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会得到胡风的赞许，他个人也会由此捞到好处，至少会为自己跻身文艺界打开一道门。三来青年姚文元立志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从研究文艺评论大家胡风的著作入手，是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条捷径。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姚文元的口才并不好，说话慢吞吞的，像是说一句想一句的样子。尽管这样，别人也愿意与他交谈。姚文元的这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的注意。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

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不仅他姚文元攀不上，就连他的父亲、曾经是胡风老朋友的姚蓬子也攀不上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惊怵之后的转向 惊怵之后的转向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炸雷：胡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动的；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对胡风的批判，并没有使胡风服气，他在会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交了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

当时中央还只是要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到1955年4

月，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中宣部把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报送中央。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55年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按语，将胡风及其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然而，在1954年底，周扬批判胡风的消息即在文艺界传开了。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读了这篇文章，感到震惊。虽然那时胡风尚未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但是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于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认为是自己“老师”的胡风，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想来想去，他感到了惊怵，他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如果自己真的在卢湾区委宣传部作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如果自己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真的在上海和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了，自己岂不真的成了胡风的“学生”？不光是胡风的学生，说不定还会被定为“胡风集团”中“反动”的一员呢！现在该怎么办？为自己的前途计，除了转向，即从胡风的崇拜者赶快转向胡风的批判者外，别无他途。于是，在惊怵之下，几天之内姚文元就转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风的批判者了。突然打响的两炮

1955年，文化部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艺报》通讯员”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篇文章除了按周扬文章的观点说胡风是反动的，还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说《文艺报》“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说《文艺报》“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这篇文章的实际作者正是姚文元！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正是在他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周扬《我们必须战斗》后反复考虑数日并决定转向后写出来的。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批胡风正处于僵持阶段，真正写文章批胡风的人还很少。《文艺报》也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章，但组织得不很理想。正当此时，姚文元的文章寄来了。加之这篇文章文笔老到，不像是青年人写的，编辑们便以为是个文艺界的老作家所写，很赏识他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也正适合《文艺报》的需要，于是，便把姚文元的文章用“《文艺报》通讯员”的署名方式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篇表态性的文章。由于文章敢于直言胡风的问题，敢于批评《文艺报》，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久，《文艺报》上又发表了几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这更抬高了姚文元的身价。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姚文元打响了第一炮。1955年初，上海文艺界召开了一次批判胡风的大会。会前，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些人准备在会上发言，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姚文元那时在上海文艺界算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发言被排在会议最后。会议开始后，一些发言者的发言调子是很温和的，大家都没有指出胡风存在“反马克思主义、搞唯心主义”的问题。另外一些发言者由于对胡风的作品不十分了解或了解很少，除了在发言中提了一大串问题，喊几句口号之外，没有什么内容。会议眼看就要草草收场了，这时，轮到姚文元发言。姚文元一登上台，就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一板一眼地读起来：“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姚文元在发言中说，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有三套手段：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张冠李戴”，三是“硬搬教条”。说完胡风的这三套手段之后，姚文元给胡风扣上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的帽子，并说胡风这一套是历史上各修正主义分子惯用的手法。姚文元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对批胡风持有保留意见的人认为姚文元的发言“上纲”太高，火药味太浓；

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认为姚文元转得太快；一些人则认为姚文元的发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风的本质。总之，一时间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姚文元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上海文艺界开会批判胡风那天，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观望着每一个人的态度。参加会议的人和发言的人大多让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发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听完了姚文元的发言，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单位。会议开完之后，张春桥回到办公室，立即给上海《文艺月报》的副主编王若望打了一个电话，推荐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姚文元的发言稿。事有凑巧，当天，上海市作协某领导人也打电话给王若望，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望连接两个不小的人物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不能不重视。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办公室的座上客。王若望仔细地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议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边的口号式的文字。姚文元回去后，对文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不久，《文艺月报》1955年3月号上刊出了姚文元的这篇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文元这第二炮也打响了。这一炮，是改变姚文元命运的一炮；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出了名。

走向全国文坛 在打响这第二炮之前，姚文元并不知道他有“贵人”相助。打响第二炮之后，暗中相助的“贵人”开始走向前台了。这使姚文元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能够打响第二炮的原因。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张春桥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斗力。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批判胡风座谈会发言稿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后发表的。文章的发表，自然也得益于张春桥的推荐。《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作为重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

接着，张春桥又连续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发表。那个时候，《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在这两种报纸上经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后来的“出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这一时期姚文元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载1955年3月28日《文汇报》）、《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载1955年5月7日《解放日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载1955年5月9日《解放日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载1955年5月11日《解放日报》）、《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载1955年5月17日《解放日报》）、《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载1955年5月24日《新闻日报》）、《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载1955年5月29日《文汇报》）、《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载1955年6月1日《人民日报》）、《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载1955年6月14日《青年报》）、《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载1955年6月18日《新闻日报》）……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姚文元批胡风是十分积极的，每隔几天，就有一篇重头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由于姚文元对胡风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胡风著作中的观点，然后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风著作的基础上写的，自然不那么空洞。这

那个时候，姚文元真的从少年时代读胡风的著作中得到了“好处”。不过，这种好处却是在他批判胡风中得到的。这一点，可能连胡风本人都没有想到。而且，随着中央对胡风问题定性的升级，姚文元文章的调子也就跟着升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么纯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在《文汇报》、《解放日报》这样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时名声大噪，“青年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已经广为人知。从那时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国文坛。

并非“壮士”的“断腕” 然而，正当姚文元大批胡风之时，他的“后院”却起火了。原来，在胡风的问题被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的同时，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胡风和潘汉年，当年都与姚蓬子有着密切的关系。胡风是姚蓬子的老朋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潘汉年呢？他是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共事时，交往就很密切。胡风的问题被中央定为“反党”问题后，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 年 4 月 4 日，潘汉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过问下，1955 年 5 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姚蓬子的问题。5 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姚蓬子被逮捕审查，对姚文元是一次重大打击，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批判胡风的“青年英雄”的父亲，竟然是“胡风分子”，而且还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紧接着而来的，是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的审查。6 月，区委审干办公室找姚文元谈话了。谈话的内容，是了解姚文元与其父亲的关系，以进一步了解姚家与胡风的关系。对这次谈话，姚文元早就有思想准备。谈话中，他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姚蓬子的叛变问题，所以才在以前填写履历表时写道：“父亲，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后来知道父亲的事情后，便与父亲划清了界限。他说，对于父亲与胡风的来往，他并不知道，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学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他说，他读过胡风的书，但他是批判地读的。姚文元的这些表白，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并不能使他轻易过关。于是，姚文元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

姚文元从得意的“云端”一下子跌落下来，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着摆脱逆境的办法。想来想去，除了与父母亲断绝来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之外，别无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单位不回家了。其实，姚文元对他父母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姚家唯一的儿子，自小姚蓬子就对他疼爱有加，视其为掌上明珠。姚蓬子为了培养姚文元成才，费了不少苦心。对这些，姚文元是知道的，在内心里也是感恩的。表面上看，姚文元是住在区委机关的宿舍里不再回家了，真像是一个“断腕”的“壮士”，其实他仍然与家里的父母有来往。因此，他的这个“断腕”，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壮士断腕”。1955 年 11 月，姚蓬子的问题在审来审去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建国后与“胡风反党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审出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问题。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此时开始回家了，也不再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又开始继续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了。

当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审查报告。报告中说，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与胡风、潘汉年见过面，但姚文元未向组织汇报。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也没有把这种具体情况揭发过。解放前，姚文元经常阅读与研究胡风的书，解放后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姚文元曾认为胡风是进步的。对胡风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言论，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没有写下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姚蓬子被结束审查送回上海后，对姚文元的审查自然也就草草结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

了。

在批判胡风中学会了“攀龙术” 在批判胡风时，姚文元并没有想到他会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注意。但是，他通过批判胡风，却结交了张春桥。张春桥的点拨，使他掌握了“攀龙术”。这个“攀龙术”，说白了就是：写文艺评论文章，一定要注意政治动向，特别是要注意报刊上透露出的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按照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写文章，最终会引起一贯重视文章也爱看文章的毛泽东的注意，到那时，他自然就会平步青云了。 姚文元是个聪明人，自然把这一“要术”牢记在心。他在批判胡风时，就开始运用上了这个“本事”。此后，他更是十分关注政治，经常细读《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时，他把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找来仔细研读，把毛泽东的一些话烂熟于心，随时在写文章时引用。 在批判胡风时学到的这个“攀龙术”确实帮了姚文元的大忙。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真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且，毛泽东在1957年两次提到姚文元、称赞姚文元。 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报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他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也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 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动向了。他写的文章，也更与上边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早也比较多。19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的安排下，在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共同密谋后，执笔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末了，该提一下胡风和姚文元的结局了。1978年底，胡风被公安部门宣布撤销无期徒刑判决，予以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又进行了复查，对其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撤销。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为胡风彻底平反。而姚文元则被作为江青反党集团的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作者：霞飞）

史海钩沉：张春桥“九大”迫害陈毅全过程实录(1)

【】【】【】【】【中 小】【】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

终积极参加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 批判“二月逆流” 这件事首先得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对参加1967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他到会的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联，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全会在讨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资格。

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 张春桥：陈毅只会下棋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三野司令员，上海干部中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毅十分爱戴；二是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亲率三野解放上海，接着出任上海首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享有崇高的威信。现在张春桥要想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

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张春桥看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张春桥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张春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 选陈毅为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陈毅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信发出后不到一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短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准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份尖端材料！“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搜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编成

《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份，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

对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等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九大”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司’”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专案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等人的材料。“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1969年3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姚文元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份，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可以。”张春桥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 王洪文：请陈毅清算自己 1969年3月27日晚，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老实交代！”“陈毅必须低头认罪！”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

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是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咀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 张春桥：让陈毅讲话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意犹未尽，仍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

“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 翻陈毅旧账 陈毅刚讲完话，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

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我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着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我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我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作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查。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作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了。

◇ 周恩来透过吴法宪传话 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十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

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和我们没能再整陈毅。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康生精于揣摩上意 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变色龙”

【】【】【】【】【中 小】【】 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中央大权实际上为李立三所控制。善于钻营投机的康生就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由于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表现了极度的“忠诚”，很快于1930年2月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对此，康生是很清楚的，但他不是进行抵制和反对，而是追随、拥护和支持。 同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迅速转向反对李立三。并被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摘自2月12日《党史信息报》作者何方） 中共早期一桩旷世冤案：六七千人遭酷刑后被处决（1）

【】【】【】【】【中 小】【】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一、只因会上错呼口号，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1931年春节前夕的闽西，气候尚有几分清冷。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生疏的纪念大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寄(这)个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们对这两个事不相关外国人，听得半懂不懂，只知道这个卢森堡还是一个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岁。 李主任的报告结束了，台下的几千官兵，按照时兴的与会规矩，鼓起了掌。出于激情，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跟着吴拙哉呼喊口号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这是两句平时不曾听过的口号。对于大多官兵们来说，这事就像风吹行云那样过去了。 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却坐不住了，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政委吓了一跳，马上郑重地向对方说：“你不

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但保卫干事依旧坚持：“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保卫干事走了后，林梅汀坐下来，心里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紧紧地攫住。

他的不安，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时的闽西苏区，正处在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前夜。首先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一再发来电令和文件，强调“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根据这种理论，把持中央的李立三，以其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然险的敌人。

来自中央的政策，恰合时宜地成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闽西特委在党内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特委对于前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各方面受到的严重挫折，不是从自身的原因去总结教训，而是队左倾观念出发，判断党内、军内混进了“改组派、社民党”，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另一方面，与之毗邻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地打 AB 团，前不久爆发了惊震党内、军内的“富田事变”，很多人都知道，赣西南那边已经杀了很多的人……

林梅汀想到这些，再也坐不住了，到外面去找保卫干事。可是，他向很多人打听，都说没有看见。林梅汀这下有些发慌了，然而又侥幸地想：“事情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吧。”只读过 3 年师塾的林梅汀，错过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这不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由此引发了六七千人罹难其中的旷世冤案！再说那个年轻的团部保卫干事，因反映的情况未得到团政委的重视，不觉心里有气，又找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校的林一株，任过中共龙岩县委秘书、宣传部长。1930 年 2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担任秘书长、文化部长，同年 11 月改任裁判部长，12 月兼任肃委主席。当他听完保卫干事的讲述后，眼睛瞪得溜圆，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在临时召集的肃委紧急会议上，林一株的讲话像鼓点一样敲在人们的心上：“我们正要抓‘社党’分子，现在他们自动跳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我们要以决然的手段，勇敢地扑灭这些反革命！”

与会者的心情紧张起来。近几个月，特委一直为闽西到底有没有社会民主党所困惑，感到这场运动无从下手，而现在“社党”分子突然冒出来了，会议在几近一边倒的情形下作出了立即在第 100 团肃反的决定。

2 月 10 日，离春节只有 7 天。林一株亲率调来的一个连，在第 100 团驻地，首先逮捕了林梅汀。当被棕绳锁住喉咙的林政委，又看见吴拙哉等 60 多个官兵俱被五花大绑押走时，觉得身子就像掉进冰窟，万分后悔当初没有把保卫干事追回来……

传统的春节喜庆，不能迟缓肃“社党”分子的步履。正月初三，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发出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强调了肃“社民党”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与事实，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通告着重对下一步的清肃斗争作出布置：“对‘社党’的主要首领，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肃委会处理。对其重要首领，应当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通告特别地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地处理！”

这两个通告的发布，等于宣布闽西不但有“社民党”，而且还有庞大的组织。

3 月 2 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一天，由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民党分子大会”，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上午 10 时，在 3000 多双焦虑不安的目光中，荷枪实弹的战士押出了一长串绳捆索绑的“社党”分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林梅汀。仅仅 20 天时间，这个团政委已经脱形得让人难以辨认了，浑身亏垢伤痕累累，昔日英姿不复存在。显然，他受到残酷的折磨。吴拙哉等人也都受到了刑讯，有的被烙铁烫烂了胸脯，有的被木杠压断了双腿。

审讯大会开始，在人们屏息凝神的聆听中，担任大会主席的林一株，借助铁皮喇叭筒，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肃委

主席宣布了部分“社党”分子的罪行和职务。 “原 100 团政委林梅汀，系社民党特委宣传部长； “原 100 团长黄洪，系社民党特委组织部长； “原 100 团参谋长江桂华，系社民党特委常委； “原 100 团团部青年一：事吴拙哉，系扑民党特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被宣布为社民党重要分子的名单，共有 34 个。更令与会军民们为之震惊的，是林一株宣布，立即将林梅汀、吴拙哉等 17 名“主犯”，执行枪决！ 不仅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就是被武装看押的 60 多个“社党”分子，也炸了营，有的被吓得发出惊恐绝望的叫声，有的扭动着绳捆的身子发出愤慨已极的抗议。但他们的行动马上被战士们压下去了。林梅汀的双眼呆瞪瞪地朝前望着，喉咙里像哑巴一样吐不出字来，只是“啊、啊”地叫着，原来林的喉结已被一根细小的铁丝给勒住了，铁丝的两头扭捆在后颈上，一扭动就痛疼难忍，这是他无法呼喊的原因。 会场上的骚动被制止了。林一株接着宣布今后对“社党”分子的惩办原则，概括起来有三条，即三个杀字：一、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予以处决；二、在“社党”内部担任科长以上的负责者，判处死刑；三、隐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社党”分子，也予以最严厉的惩处——枪决。在全场人听得毛发悚然的气氛中，肃委会主席发出森冷庄严的号召：“各地的肃委机关，要继续努力地破获未被发现的‘社党’机关及其党羽。” 林一株的讲话一结束，林梅汀、江桂华、吴拙哉等 17 人，被行刑队押往刑场，执行处决。刑场设在虎岗 3 里外的荒山坳。一阵枪声响过，闽西苏区第一批破获的“社党首领”的灵魂连同躯壳，长留在行人罕至的荒岭上。行刑之前，林梅汀和吴拙哉等人喊起了“打倒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可悲的是，这些人直到死的时分，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何怪物，而他们恰恰被诬为“社党首领”！ 二、林一株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党”首领，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赶走 处决林梅汀等 17 人的当晚，林一株指挥特行队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首先在红 12 军的 3 个团当中，抓捕了 40 多个“社党”成员，全是排以上连营干部，职务最高者为 102 团政委卢肇西。接着，特行队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 15 人。 卢肇西在闽西算个名气不小的人物。1928 年 6 月，他担任过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后来调任红四军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曾被红四军前委派往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了上海至闽西的地下交通线。他既是闽西特委成员，又是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委员。卢肇西首先受到了线香火烧身的刑罚，接着倒悬吊起用藤鞭抽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这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审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认。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也在再次提审中被讯问到同样的问题。 尽管卢肇西、曾牧春等人否认傅柏翠是“社党首领”，但在 3 月 6 日下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 23 号通告，公开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他的家乡蛟洋是“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之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刑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柏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认直至把“社党”消灭为止。 傅柏翠为何等人物，时年 35 岁的傅柏翠，福建上杭县蛟洋人，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回乡后领导民众查清县知事丘嘉谟侵吞公款 5 万余元的事实，将这个上杭最大的官绅扳倒在地。1926 年，傅柏翠被委任为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党委，旗帜鲜明地支持闽西的农民运动。次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当局的通缉。经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与之推心置腹地长谈多次，在罗的晓以大义的感召下，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按照省委指示，在蛟洋办起千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形成与反动军阀郭凤鸣公开对抗的局面。郭 多次派兵攻打蛟洋，均被傅部击退。蛟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傅柏翠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1929 年 3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毛朱联名写信给“闽西王”>，

邀他赶来“见面一叙”。傅柏翠在古田的游鱼坝收到信，随即带人连夜赶到红四军驻地。对朱毛心怀仰慕的“闽西王”，与他们一见如故。毛泽东向傅交代了几项任务，其中一项是集中上杭的地方武装，组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由傅任司令员。同年6月19日，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主力，攻克闽西重镇龙岩。是年9月，傅部又打头阵夺取了400年来无人破取的“铁上杭”。同年12月，已是前委委员的傅柏翠，在上杭古田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作为深孚众望的“闽西王”，傅柏翠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竭忠尽智，辛劳奔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勋。然而毛泽东、朱德离开之后，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不能正确地对待傅柏翠，“闽西王”连连受挫。

1930年春，受到苏联大办集体农庄的启发，傅柏翠也要在蛟洋搞集体耕种的试验。特委认为这是破坏苏区的土地革命，并指责傅与共产党对抗。3月中旬，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傅负气不参加，但他还是当选为政府执委、财政部长。傅柏翠因与特委意见不合，不愿就任。不久，特委派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来到蛟洋找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分枪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宁手枪。“闽西王”勃然大怒，将林轰走，然后写信给特委反对“党霸”。12月初，在闽粤赣省党代会上，邓发与林一株指责傅柏翠“对抗党的路线、违反组织纪律”，开除了傅的党籍。为要削弱“闽西王”的势力，特委将上杭北四区的13个乡的党政组织及其党员干部，一概摒弃在党外。这样一来，党员、群众大有意见了，以至于特委派的干部进了北四区，群众愤怒喊打。特委遂说这些人随傅柏翠“反水”了。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林一株等人驾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并对卢肇西、曾牧春等人搞刑讯逼供，给傅戴定帽子。

以傅柏翠在闽西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第23号通告的宣布，让许多军民惊疑交加，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按捺不住心头的焦虑，拉上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来到肃委会找林一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么叫随便，不是经过了特委吗？”张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证据，林一株高声说：“证据，当然掌握了，要不然怎么会抓人？你说，谁能担保卢肇西不是‘社党’分子？”看见张、郭二人发愣，林一株不耐烦地说：“有问题你们找特委吧。我们肃委会的任务就是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组派和社民党！”说完，竟撇下二人出门而去。

3月下旬，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兵分两路向蛟洋进发，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闽西王”获知军情后，紧急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加上所掌握的部队，组成3000多人枪的军力，严阵以待。林一株不敢贸然开进蛟洋，只在北四区边缘地方寻机作战。这两支原本同属于红军的武装力量，紧张地对峙了10余天，最后以林一株率队退走而告终。闽西特委派兵剿击傅柏翠，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推了出去。此后傅柏翠离开上杭来到福州，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当面委任他为龙岩县县长，被傅拒绝。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头子陈立夫，也想把“闽西王”拉到身边，傅柏翠亦不买账。后傅终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傅柏翠曾热心帮助共产党。

在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王”回到了闽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对红军游击队帮助很大。1949年5月，他统领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投归人民，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曾一再地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邓发后来在延安也明确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这些都是后话。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在这场红色狂潮中，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

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 17 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子”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 12 军的 40 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 15 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林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卜跪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 25 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 25 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

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 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 25 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 13 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 12 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 1931 年 6 月 1 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 12 个干部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 16 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

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 200 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 200 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 12 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 月 29 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 月 1 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士，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 6352 人（见于 1986 年 5 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 1932 年 2 月 19 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 8000 人减为 5000 人不到。”闽西团特委 1931 年 7 月 12 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 30 个区委中，只有 1 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 1931 年 5 月 1 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 12 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 48 个区，锐减到 22 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7 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 月 8 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 月 12 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 月 18 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 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

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文件。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径庭：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宣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林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住他发出泣诉和呼吁。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的“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主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毛泽东听完张、郭的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恤，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

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杀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1954 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49 年 11

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 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 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 年 7 月 1 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 3 个月薪津资遣。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 1946 年 1 月底全部结束。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

要细节的真实 作为小说，不可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 《红

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 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重庆，在军统望

【 】 【 】 【 】 【 】 【 】 报告草稿迟迟不出，毛泽东对陈伯达非常生气。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九大）的具体准备

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2月19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3

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用毛的话说，敌人已为自己掘了坟墓。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很可能，此时的康生、陈伯达知道了毛已下定决心。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张，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刘等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毛内心十分清楚，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

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史海钩沉：长征路上毛泽东是怎样复出的？(图)(1)

[illegible]

首先争取王稼祥

1930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不久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这时，王稼祥开始与毛泽东接触，在工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毛泽东。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极力说服张闻天 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

的一票。极力说服张闻天 1931 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说服和争取他。起初，张闻天并不认识毛泽东，1933 年到苏区后才开始接触。当时，“左”倾中央派他主持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泽东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两人互相接触越来越多，互相了解也越来越深。张闻天主动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毛泽东也总是极力接近张闻天，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越来越接近。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交谈，王稼祥有时会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and 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向毛泽东报告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不能再照原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 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当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于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着王稼祥第二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

与周恩来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

来领导。与周恩来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已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周恩来仍坚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的胜利，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

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五、六倍兵力的敌军作战、全军覆没的危险。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采纳了毛泽东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订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还决定恢复过去毛泽东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此，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对红军的领导工作。1935年1月1日，在猴场(草塘)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荒谬指挥，开始恢复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又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党史文苑》廖述江/文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及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揭秘

【】【】【】【】中 小 【】【】

毛泽东推崇中国

菜，终生喜欢中国菜，但这并非说他反对西餐，拒绝西餐。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肴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

大概从60年代初开始，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物色精通中西菜肴制作工艺的厨师。当时，毛泽东聘请的一位姓陈的厨师擅作西餐，毛泽东对他的手艺常常赞不绝口。江青很欣赏西餐，有一次在吃过陈师傅做的几样西菜后，称羡不已。她对毛泽东说：“陈师傅的手艺还真不错，我那边的师傅没一个比得上！”毛泽东听罢便对她说：“如果你想要，就把陈师傅调到你那边去好了。”江青闻言大喜过望，最后真的毫不客气地将陈师傅要过去了。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已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晚年生活遗物中，尽管餐具品种丰富齐备，但没有一套完整的西餐具。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盆、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毛泽东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以此换换口味。其实，他吃的鱼虾大多是国产货。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上几个小箱，里面放上一些饭粒，丢进中海里，第二天取箱时一般能捞上一小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有时他用中国菜的做法做了吃，有时也用外国的方法来做吃。

毛泽东吃鸡，但谈不上特别喜欢。西餐中鸡的做法比中餐要多，因为西方人以肉食为主，因此制作花样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泽东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一番风味。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肉的膻味。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

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又一次说到刘冰的来信，说信中的矛头是冲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你要帮助他提高。”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11月2日下午，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会议，“帮助”邓小平。当毛远新再次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反驳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指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的情况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帮助”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注意到不但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远新马上又扩大了“帮助”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在路线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但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决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由政治局来“帮助”邓小平，但政治局会议开得不理想。听取了“扩大”的“帮助”会议的汇报和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说，他（指邓小平）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他（指邓小平）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但是毛泽东又说，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对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政治局会议依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都不发言，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邓小平又写了一篇书面检查，但仍然同上次差不多。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但会议仍未达到毛泽东期望的效果。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提出让邓小平先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但是被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于是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并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同时主持会议。

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议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果然，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又开展起来。“四人帮”趁机制造舆论，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于是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历史是公正的。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古今中外最庞大的非战争集体杀人事件（图）

——桑普：信阳事件五十周年记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人民报消息】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也是信阳事件五十周年。六十年前，毛泽东站上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到头来只有他一个人站了起来，让人记忆犹新。然而，谁会追念五十年前三千万至五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况？时至今日，中共当局还没有真诚地、彻底地检讨这段三年大饥荒的悲惨历史，跟全国人民说声对不起。没有道歉，没有真相，继续欺骗，继续掩盖，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和解。时间持久，压力飙升，后果恐将不堪设想。

五十年前，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樑。然而，毛泽东只不过认为公社可以节省粮食，集中劳力，继而榨取人民口粮和烂铜烂铁，倒卖给苏联和东欧，换取核武技术，跟苏联争锋，实现他将全世界「管起来」的春秋大梦。

当时，人民不知道他的阴谋，还以为他是大救星，还以为他真心相信和建造共产主义天堂，于是将锅碗瓢盆全部上交公社，私产归零，由公共食堂负责伙食，开大锅饭。开始时，大家还有得吃，但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徵购、反瞒产雷厉风行，导致全国许多公共食堂停粮断火。其中，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合计六百多万人口，竟然在三个月内饿死一百多万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史称「信阳事件」。

综合杨继绳、乔培华等调查结果，信阳事件实在惨不忍睹。根据老干部郑大军的回忆，公共食堂先是一日三餐清水野菜，撒米糠搅匀充饥已算奢侈，之后更完全断炊，饥民满山疯转。树枝、树叶、草根、地菌、蚯蚓、地蚕全吃光，中毒吐沫者众。之后就吃一种白色粘土，俗称「观音土」，一撮泥一口水，肚皮由饿转痛，伏地打滚，猛灌桐油，最后只有三种选择：饿死、胀死、泻死。

为免一死，人开始吃人了。从五九年十二月到六零年十一月为止，七岁以下的女童有九成被虐杀分吃。有人更吃自己亲生三岁的女孩，引来饥民围在漆黑灶房中烹煮共吃，小女孩被剁成拳头大小的肉块，用筷子戳起一块，一煮即噬，剩下头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吃完就挖陷阱，设兽夹，将炸弹包装成欢喜豆来招引小孩，一咬下去立即爆头。人至此境，禽兽不如。

信阳事件只是一例，类似事件遍布全国。以当时全国人口保守估计，每二十人就有一人饿死，

是古今中外最庞大的非战争集体杀人事件，跟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若还不信，可查找当年水文气象记录为证。此外，当局更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不许饥民外逃或投诉。最后，毛泽东更卸责给地方干部，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降职了事，还说要提防阶级敌人复辟。不但无耻，简直疯狂。

五年前，信阳光山县吴永宽先生整理出一份死亡名单，在当地自资兴建一座墓碑，向埋藏在当地田野下的白骨和亡灵致意，心怀谦卑，呼籲反思。然而，在中共眼中，信阳事件至今仍是个敏感话题，中宣部依然禁止国内媒体采访。

我们又再看到当今中共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坦克炮弹面前自鸣得意一番。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观音土、欢喜豆、小肉团、油荤味。即使想到，也不希望有人记得或提起。当人民越来越会反思，学会谦卑，但中共却不断背道而驰的时候，倒数计时也快将结束了。

【大跃进与大饥荒】姚监复：从乌托邦噩梦回归现实土地——对农村改革 30 年的粗浅反思

【大跃进与大饥荒】李若建：趋利避害 - 大跃进时期官员造假行为分析 【大跃进与大饥荒】

丁抒：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下限

【大跃进与大饥荒】文贯中：公共食堂在大饥荒中扮演的谋杀性角色
没有退出自由的强制性大锅饭

【大跃进与大饥荒】陈意新：大饥荒中安徽江西非正常死亡情况比较

1961 年 毛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 作者：周宇新 1961 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刘少奇在 1961 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 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当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

在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959~1961 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情形的文字：“凤阳全县死绝 8404 户，死跑而空的村庄 27 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 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

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销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但事情到了毛泽东嘴里却成了：“中国没有饥荒”！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更新时间：2007-3-27

作者：马钟嶽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数：371 更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250 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 1959 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一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 18 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 1960 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三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耩”，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四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事

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美国中情局档案中的中国大跃进 中共政权的动向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点关注对象，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村大范围推广人民公社，后来又发起了生产大跃进。中情局曾就此进行过很详细的调查与评估，相关报告于后来解密。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引文，中情局当时认为，公社成立四个月就已经面临一些棘手问题，公社明显的失败可能是免费供给制度；毛泽东的地位很稳固，他的意志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知识分子的处境则是被任用而不被信任。

人民公社：免费供给是明显失败

中情局的报告说，从1956年开始，中国通过将合作社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而进行零星的试验。这种尝试显然使共产党领导层确信他们至少已发现一种组织形式可充分利用全国的劳动力——包括妇女儿童乃至老年人，并满足“大跃进”事业的经济需求。

当这些公社成立四个月时，他们的倡导者已经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了。一开始，新的形式尚不完善，旧的制度已经被抛弃了。结果是在管理、账目、税收、地区商业等方面出现了混乱。对农民管理的加强和对其时间的额外征用造成了辅助性粮食作物的急剧减少，如织布、工具制造等传统家庭副业也遭到相应损失。

即使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也很难完成艰苦的长时间的劳作。尽管现在公社最长的工作时间是 12 小时，允许有 8 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仍会要求一日 18 小时的工作量。

公社计划中一个明显的失败可能是“免费供给”制度。在这种按需分配的体制下，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农民在总体上比以前吃得好得多的情况。但是粮食消费的略微增加就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夸张的统计数据。公社社员一开始是抱怨饭菜冷而无味，而现在开始抱怨吃不饱。1959 年初很多公社关闭了食堂，允许农民在自己家吃饭。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得不提醒公社领导不要以免费供给的方式来供应公社成员，并且近来食堂饭票的发行量已经与完成工作的类型和数量相挂钩。

中共权力架构：毛泽东意志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

中情局的评估报道还提到了当时中共党内的权力架构和政策。中情局虽然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之间基本上仍是团结的，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紧密团结关系已经受到了影响。毛泽东的个性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至少，一些党员认为他对政策的引导是错误的、不明智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被迫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中情局认为，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本人主动放弃了次要的职务，目的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党主席的职务上，投入到基本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而且，毛泽东可能在考虑建立一个明确的最高领导人继承次序。很明显，他至高的地位没有遇到挑战。现在，他比作为国家主席接班人的刘少奇还要更加引人注目，得到了更多的好评。他还是党的首脑，会继续在中共内保持其主导地位。

知识分子：被任用而不被信任

在关于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中情局的报告说：为了达到其雄伟的目标，中国必须全力使用知识分子和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尽管当局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非马列主义者。这些人被任用但是并不被信任，这和当局多方努力要求他们全力支持的做法是明显矛盾的。

这种需要是毛泽东 1956、1957 年发动“百花齐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他已明显地确信，共产党体制在中国已经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并认为更为自由的氛围将促成知识分子为这个政权提供更加热心的支持。当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提出批评（1957 年 5 月）并开始攻击政权本身的基础时，这样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这些人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农村改造或以其他方式被镇压。尽管共产党还继续采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名义上恢复了一些被指控为“右派”的人的地位，但是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策似乎只是容忍知识分子和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此同时，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16 万广东人偷渡香港 地方当局密件告急 广东省档案局近期解密的八万份档案显示，在 1961 至 1963 年的“困难时期”里，有近十六万人由大陆偷渡到香港，事件更上报到总理周恩来处。尽管广东档案局职员告知，相关材料还不会完全公之于众，但是由已解密的材料可见，有许多“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各沿海地区政府纷纷上书要求阻止偷渡潮。

香港《文汇报》报道，1960 年代初，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同时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为逃避饥荒及经济困难，大量广东农民及工人偷渡到香港。

地方纷上书研遏止方案

报道说，在解密的档案中夹着一系列的“急密件”。中共珠海县委办公室在 1963 年 3 月整

理了一份“怎样办好流动渔民培训班”的文件，就是针对当时严重的渔民逃港事件而开设的。渔民逃港严重地区还有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他们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面对大量渔民外流，台山县府非常焦急，在此份文件中，就提到以五种方法防止渔民外流，包括反复进行思想教育；认真安排好生产；认真贯彻渔区各项政策派购等福利政策，尤其是困难户的安置等；加强领导对于内部的控制；严防“敌人”的破坏，提高警惕，对渔船上的“五类分子”加强监督等。

出极端政策对付偷渡者

档案材料还显示，大量沿海地区渔民的外逃给当地带来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家乡留下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父母子女，这些人的赡养成为政府的重要负担。惠阳渔业工作委员会就针对该状况于1963年6月上报当地县委，要求如外流港澳渔民遗留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家人，则由外流人员和政府各负担一个；如遗留一个，则由外流人员自己负担；遗留三个则由外流人负担两个；四个则由政府负担一半……以此类推。

地方基层政府甚至在上书中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土政策，如取消偷渡人员家属享受国家定量食品供给、医疗等福利的权利；偷渡者家属还需偿还偷渡者带走的公家财产，即使“无生产能力者也必须分期偿还”；再者，凡外流港澳渔民，其家具房屋、按配额分发的自留开荒地全部由生产队收回。

广东划边防区阻止逃港

1963年2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下发了一份机密文件——《省人委关于港、澳边境地区治安行政管理的规定》，提出七方面的内容来加强边防管理，防止逃港事件的发生。

文件提出，通过划分边防区，将边境的宝安县39个乡、两个镇，中山县的六个乡，还有之前批准的包括珠海县、沙头角的横岗大队和宝安县的大鹏公社等划为边防区；凡是边防区居民，年满十二周岁，有正式户口的，均需向公安局申请“边防区居民证”，未取得边防区正式户口的，不发给居民证。同时，驻边防区的现役军人、警察，可不领居民证；沿海水上居民，另发船民证。

另设边防禁区，包括宝安县的罗湖桥头、沙头角镇、文锦渡口和珠海县的拱北关闸、茂生围等五处划为边防禁区，并从严管理，除到禁区视察者外，一般应禁止参观。

地方报称香港渔船煽动偷渡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1963年5月24日也给广东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

香港流动渔船除在大陆渔场生产外，更给大陆政府带来了另外的恐慌。这些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大陆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大陆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拉！”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档案还列举，1962年7月间，前进大队的张某、蔡某等就被流动渔船拖走逃跑，“像这样造谣的例子不胜枚举”。

赴港奔丧须经层层严审

